三联生活周刊®
2014.11.10
2014年第45期
www.lifeweek.com.cn



大时代的写家
人民艺术家老舍

811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2元
生活周刊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真正的品位，在看不见的风景。
大多数人认为，眼睛是欣赏风景的唯一专利，但真正懂得品位的人，却总能在外表之下发现更多。新蒙迪欧宽大内饰的自由舒适，豪华皮质工艺的精致触感，按摩通风座椅的轻松惬意……对身体感官而言，无一不是令人陶醉的风景，让你置身卓越的经典品质中，领略更赋深意的生活品位。
www.ford.com.cn 800-810-8168/400-887-7766
新蒙迪欧

安福特 荣誉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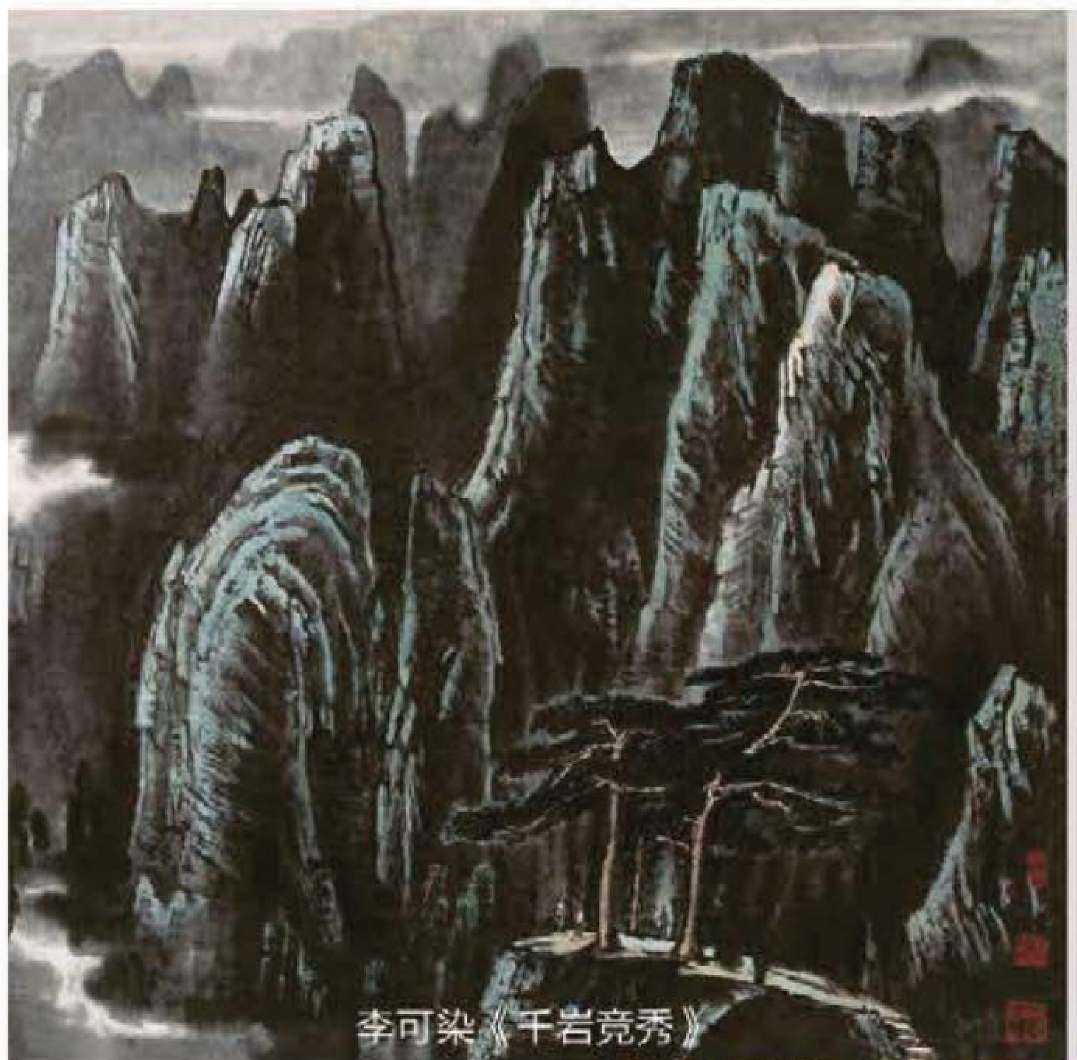


进 无 止 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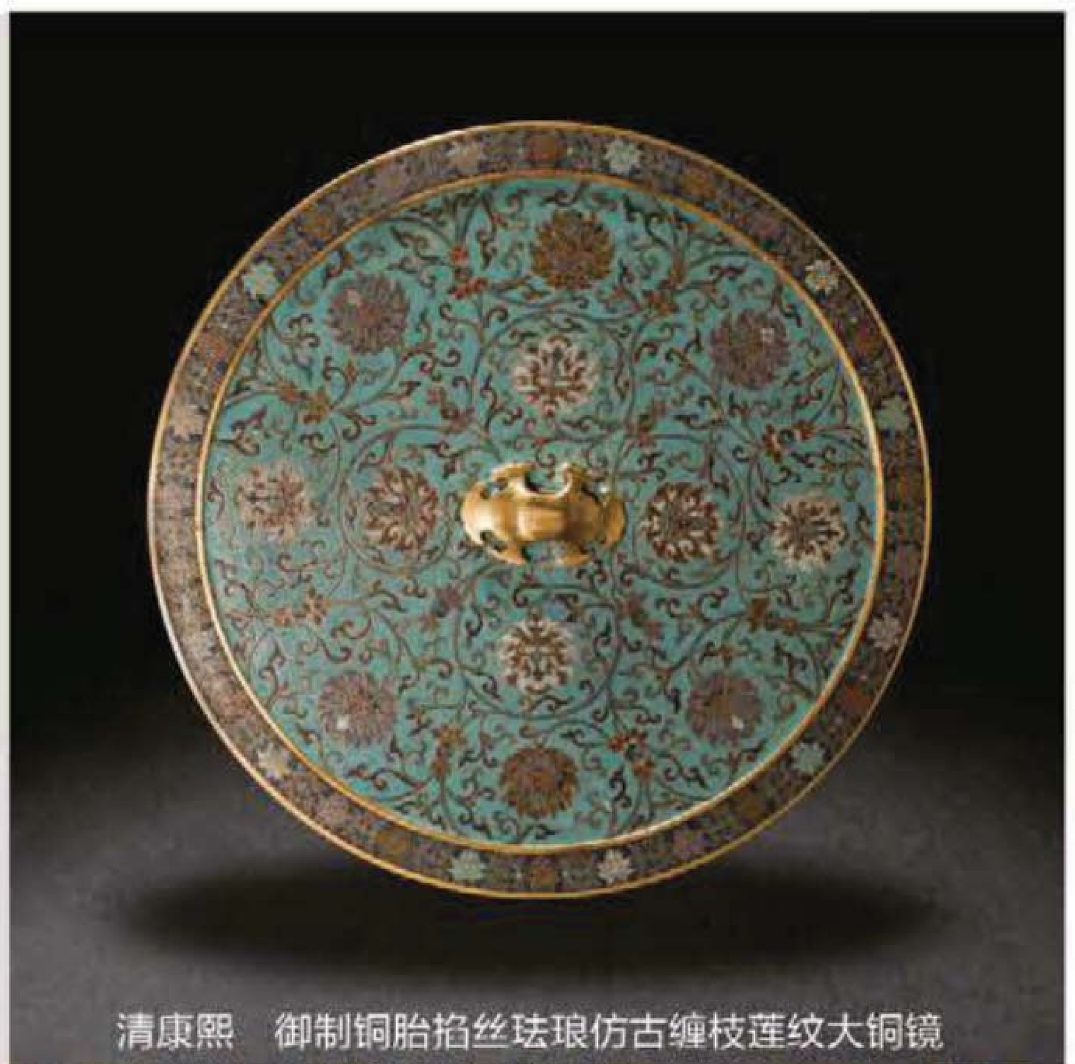
BEIJING POLY AUCTION

北京保利2014秋季拍卖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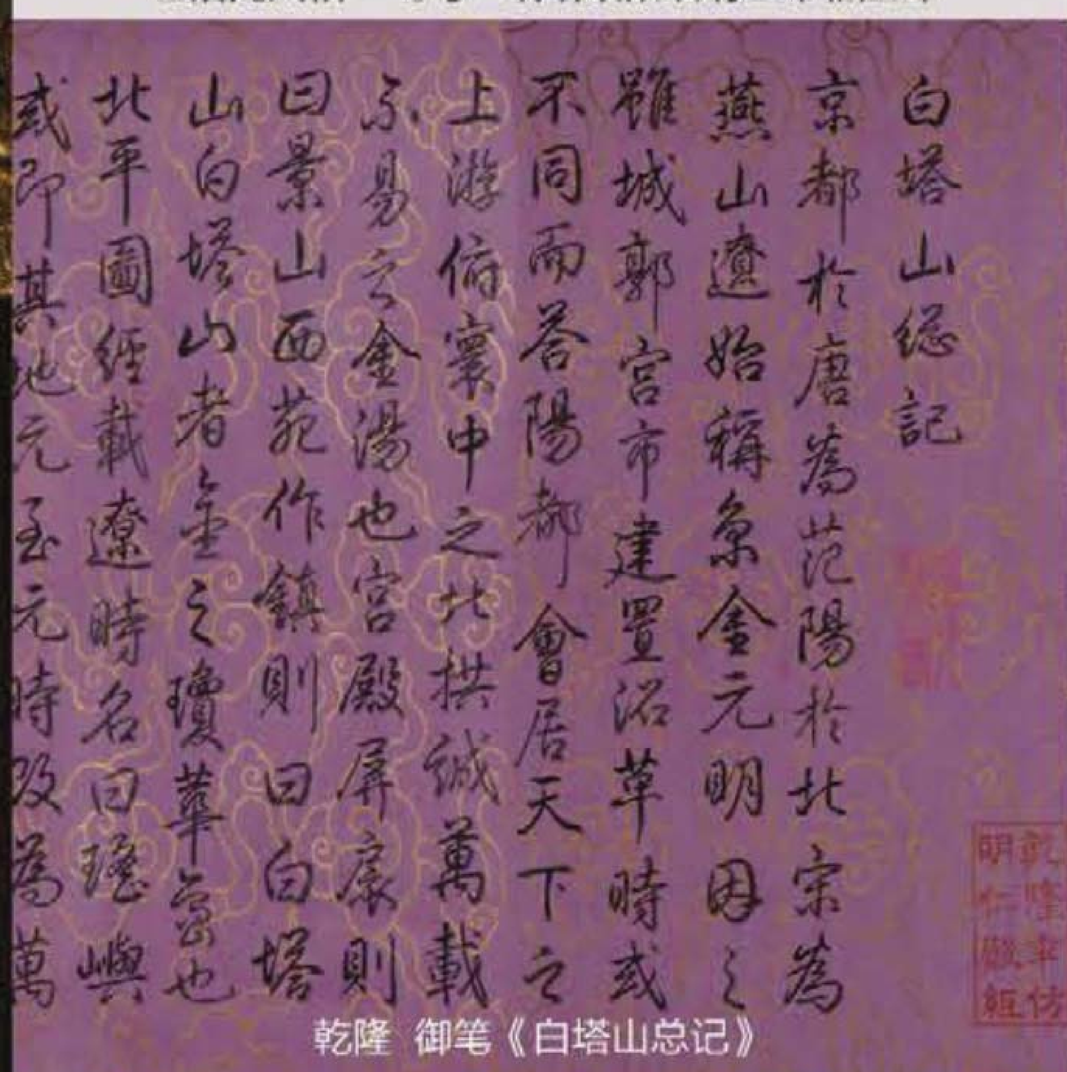
预展时间：2014年11月28日起至各专场拍卖前一日
预展地点：全国农业展览馆
拍卖时间：2014年11月30日-12月5日
拍卖地点：北京四季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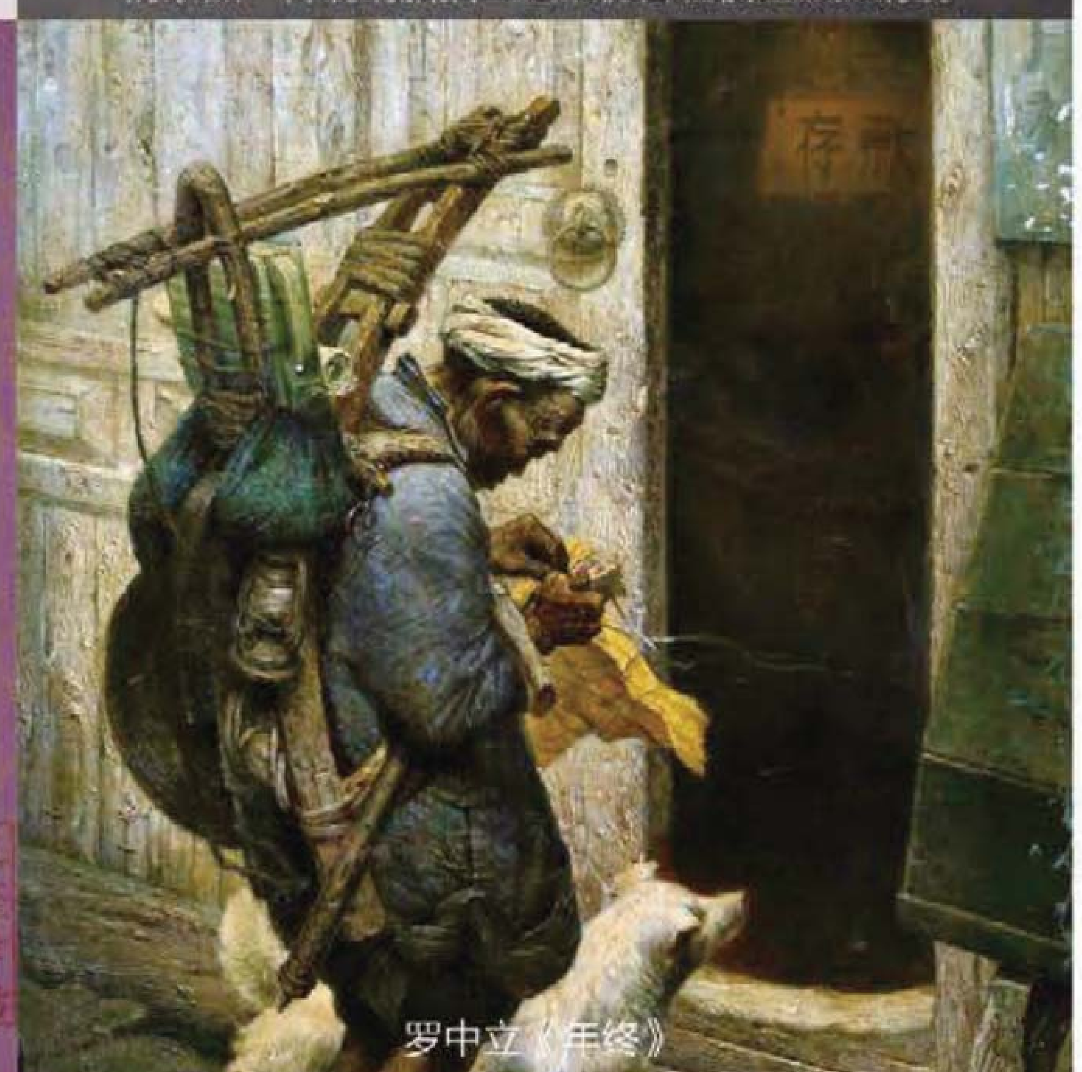

李可染《千岩竞秀》


巴洛克风格“飞马”玳瑁镶嵌细铜丝布勒座钟


清康熙　御制铜胎掐丝珐琅仿古缠枝莲纹大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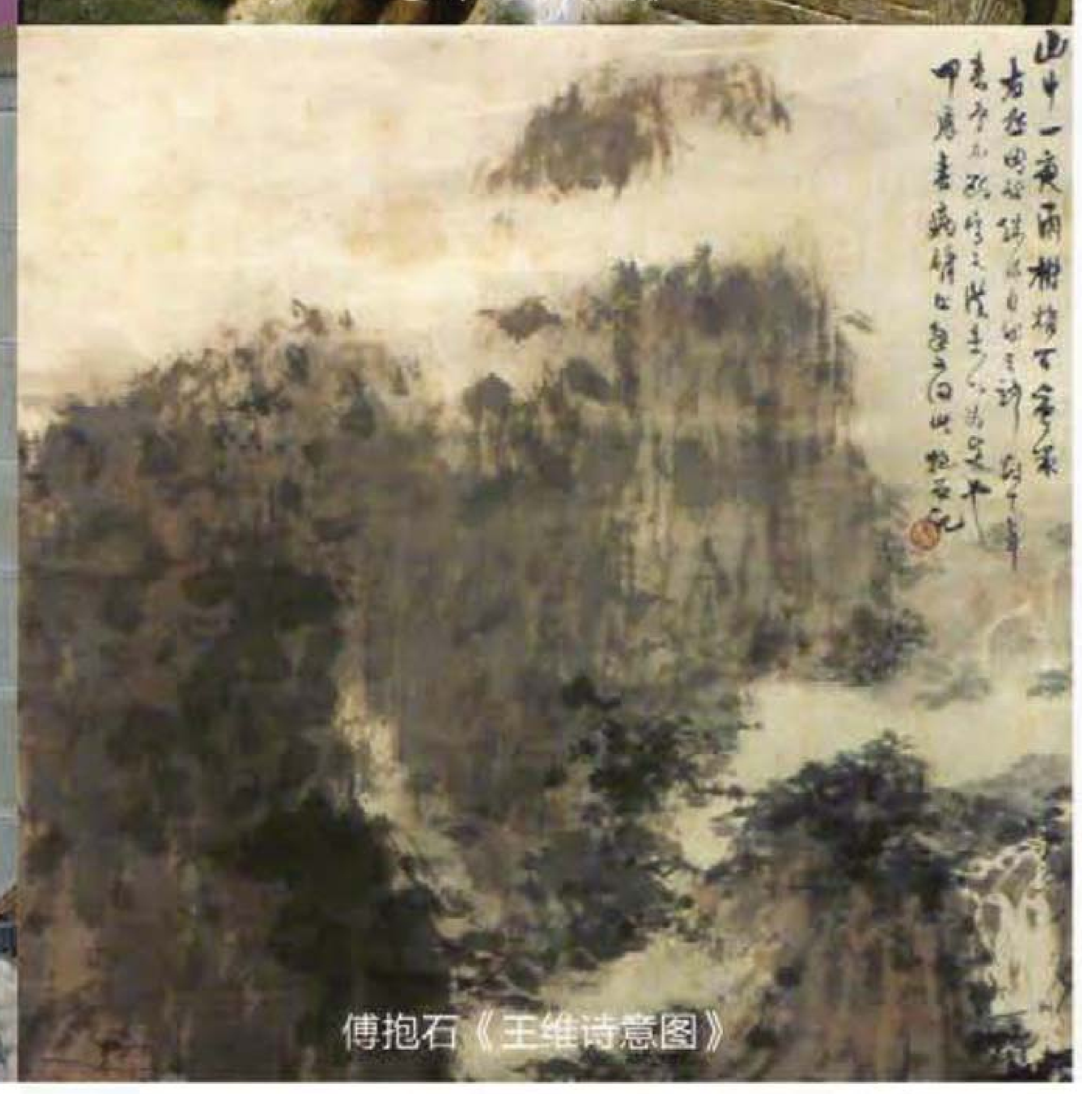

宝瓶天珠配珊瑚项链


乾隆　御笔《白塔山总记》


罗中立《年终》


荷塘鸳鸯镜


刘炜《自画像》


傅抱石《王维诗意图》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POLY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联系电话：(86-10) 64083188　公司传真：(86-10) 64083186
中国拍卖行业概念股——保利文化(3636·HK)

北京保利　保利香港

更多拍卖相关信息请访问北京保利官网：www.polypm.com.cn　或使用 iOS、Andriod 电子平台搜索“北京保利拍卖”下载官方 APP　保利香港官网：www.polyauction.com.hk



清乾隆 御制紫檀高浮雕吉庆有余顶箱式四件柜
高 210.5cm 宽 101cm 进深 55.8cm
估价：RMB 15,000,000–25,000,000

明 乾隆御赏“头等十六号”月露知音琴
琴长：121cm 弦长：110.5cm
头宽：19cm 肩宽：19cm 尾宽：13.5cm
估价待询

乾隆 御笔《白塔山总记》
水墨纸本 手卷
1773 年作
27 × 80cm
估价待询



温叔与他的正山小种

桐木关高山野生手工红茶



“合益和”正山小种产自海拔1500米的桐木关高山野生茶核心区



山雀防虫 春采開面 自然萎凋 揉捻發酵 紅鍋提香 遠銷英倫

统一零售价：1500元/盒

现在拨打400—088—2271　即可品鉴到真正的正山小种之美

庆典活动，敬请期待！

微店购物　微信公众号

扫描进入购物平台，即有好茶品鉴

www.teahyh.com

实甲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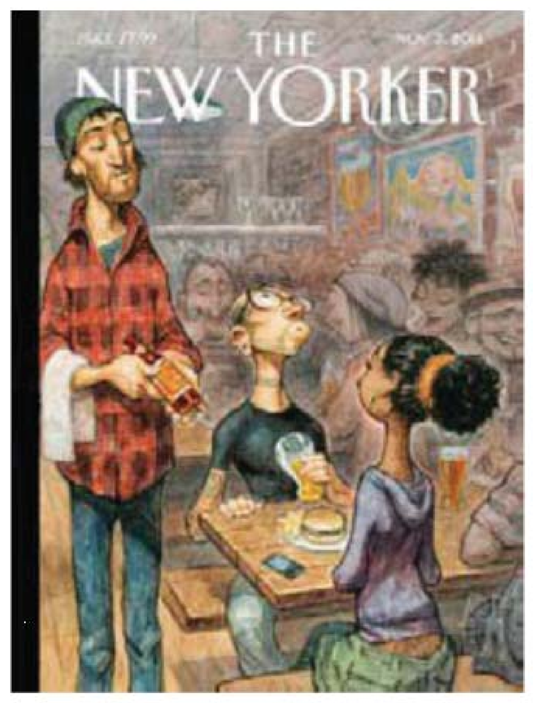
合益和茶业



《明镜》2014.11.3

生态谎言

德国市场上对于生态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几乎成了一个新的黄金产业，但许多本土农民却在这片战场上选择了退却——对于沼气能源的依赖和便宜的进口农产品使得这个行业在德国逐渐萎缩。大公司贴着生态标签的新农产品也在挤压传统农业，传统农民的生产成本逐渐升高，却无法通过直接的售卖价格来赚回成本，这成了目前德国农业的核心矛盾，“生态”农产品真的能取代传统农业吗？



《纽约客》2014.11.3

谷物之战

谷物中的麸质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人类食用它的历史已经超过1万年。但近年来，一些医学家认为，食用麸质与众多疾病有关。到2016年，美国无麸质食品的销售额将到达150亿美元，这甚至已成为文化和身份标签。麸质身份转变的罪魁祸首是人类基因无法适应高糖高热的现代西方饮食。谷物过分精细化处理，使人们摄入的营养种类减少，但麸质增加，引发了血糖问题及慢性疾病。



《经济学人》2014.11.1

革命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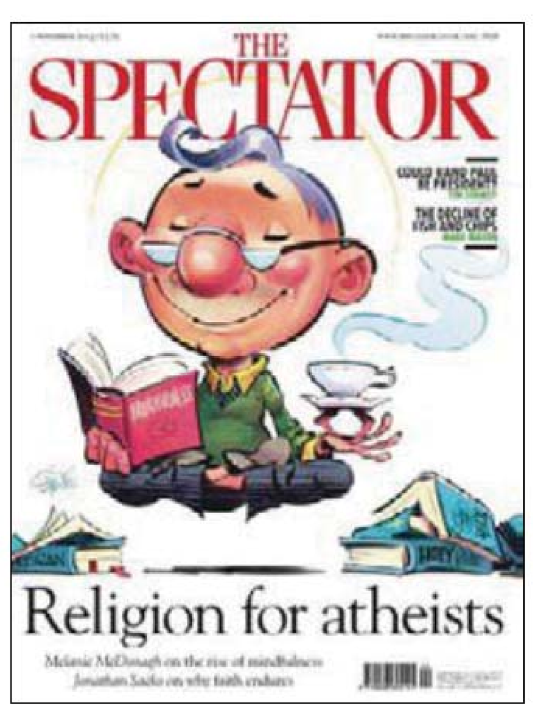
不到一个月后，伊朗核谈判将产生结果。一旦谈判破裂，核武器将在中东迅速扩散。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设施展开军事行动，无论哪种结局都是灾难。现在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伊朗应该拥有多少离心机，协议的有效时间是多长，对伊制裁在何时取消。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逐渐“正常化”。而油价的下降和制裁的加剧使伊朗遭遇经济萎缩，这些都将促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走实用主义的道路。



《旗帜周刊》2014.11.10

现代美德和古典美德

现代美德包括自由、合宜、进步、平等、本真、健康、不偏不倚。抽烟被视为不道德的，因为不健康，而健康是美德。但吸大麻之所以在道德上变成一些人可接受的，是因为健康被另一种现代美德——自由给压倒了。现代美德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们相互冲突，而在于它们关心的只是外在的自我，而古典美德关涉的是我们的内在自我，它们使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过上完整、幸福的生活。



《旁观者》2014.11.1

专念崇拜

专念是简化版的佛教，专注于冥想和当下。近年来它已经从一种无害的嬉皮士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流行的伪宗教。如果你在火车上看到一位旅客在慈爱地看着你，他可能不是疯子，只是在显示专念的同情。专念要求戒绝评判，观察和接受自我，但对于我们自身和环境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去加以改变。专念专注的是自己，它也许能减轻压力，但显示同情不会变成行动。

空中客车A330

上乘之选

空客A330系列飞机备受全球各地航空公司以及不同领域运营商的广泛欢迎。持续技术改进使A330一直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是航空史上最成功的宽体飞机之一。将提高乘坐舒适性融入设计理念，A330在中远程航线上能够为任何舱位的乘客提供更宽的座椅，其中经济舱座椅宽18英寸。A330系列飞机平均签派可靠率高达99.4%，在同级别飞机中运营成本更低，拥有兼顾远程和区域运行的极大灵活性。

空客A330系列，目前世界上成本效益最高的双发宽体飞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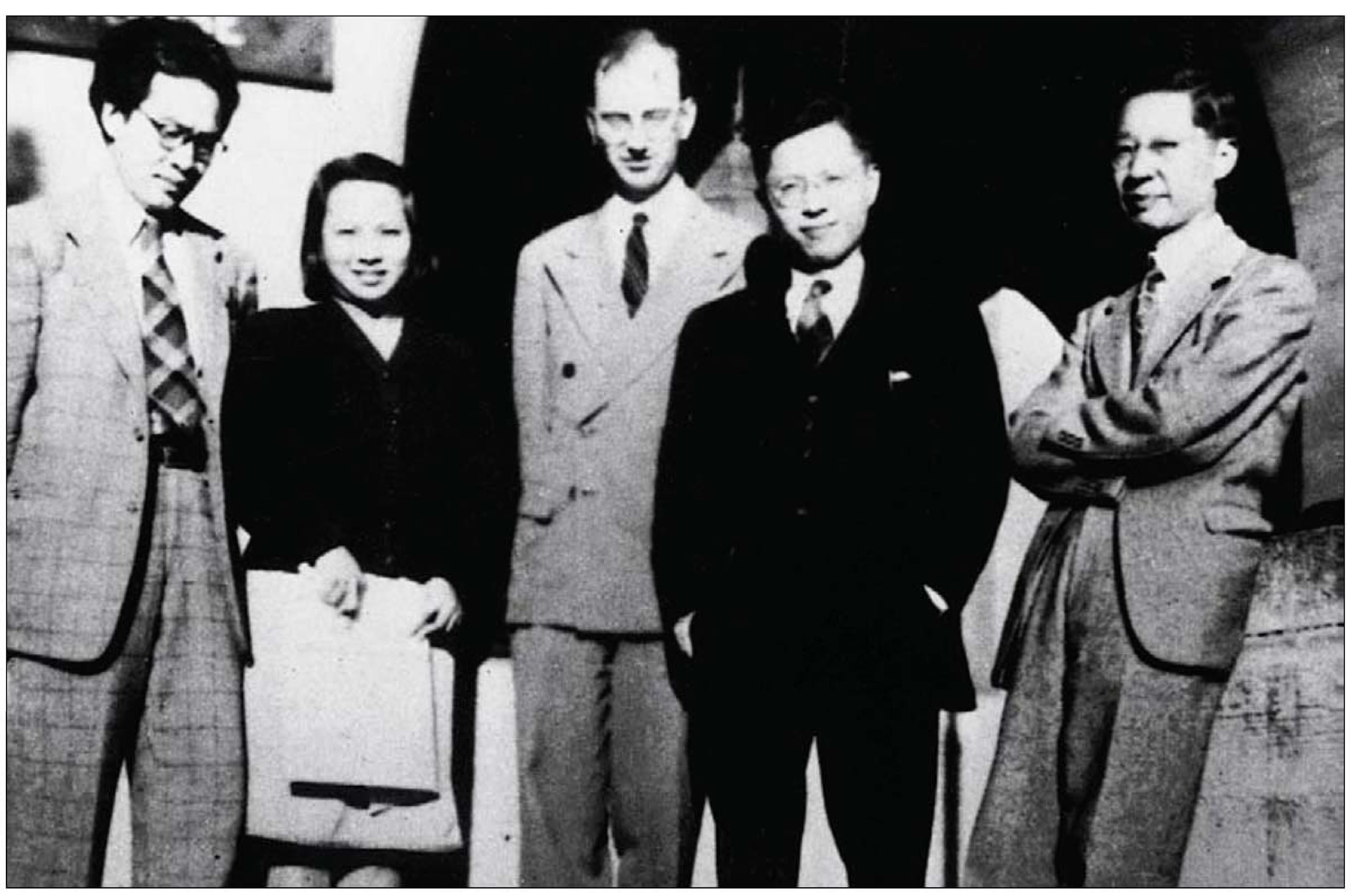
Airbus, its logo and the product name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封面故事

P42

大时代的写家
人民艺术家老舍





50 老舍在美国

60 “写家”与新时代：老舍的“叛逆”
专访老舍之子舒乙

68 老舍的最后十七年

一汽-大众 FAW-VOLKSWAGEN

中国 长春 www.faw-vw.com vw.faw-vw.com 客户关怀热线：4008-171-888



迈腾2015年型 豪华升华 耀级上市

成而极尽豪华，承而再度升华。迈腾2015年型，承袭纯正德国血统，以全面升级的豪华科技，光耀而至。精湛严谨的设计工艺，打造凝练流畅的车身线条，成就奢华之美；加长轴距带来宽适空间，令赫赫气度深蕴于内；卓然创新的澎湃动力系统，缔造巅峰之至的激情体验；全方位安全防护系统，以智能科技任您从容掌握。豪华再度升华，大器卓然天成。更多创新科技，敬请莅临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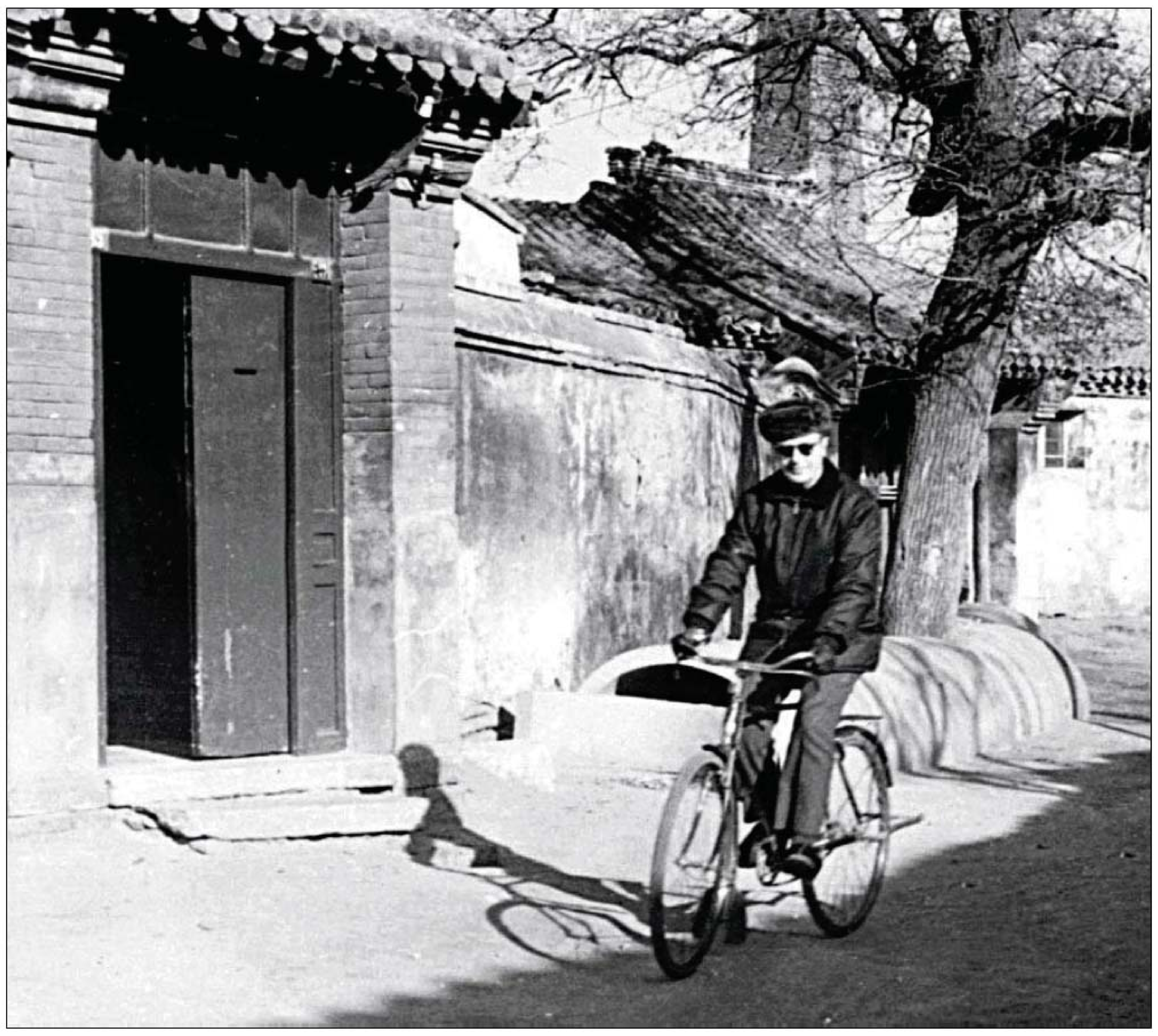
MAGOTAN|迈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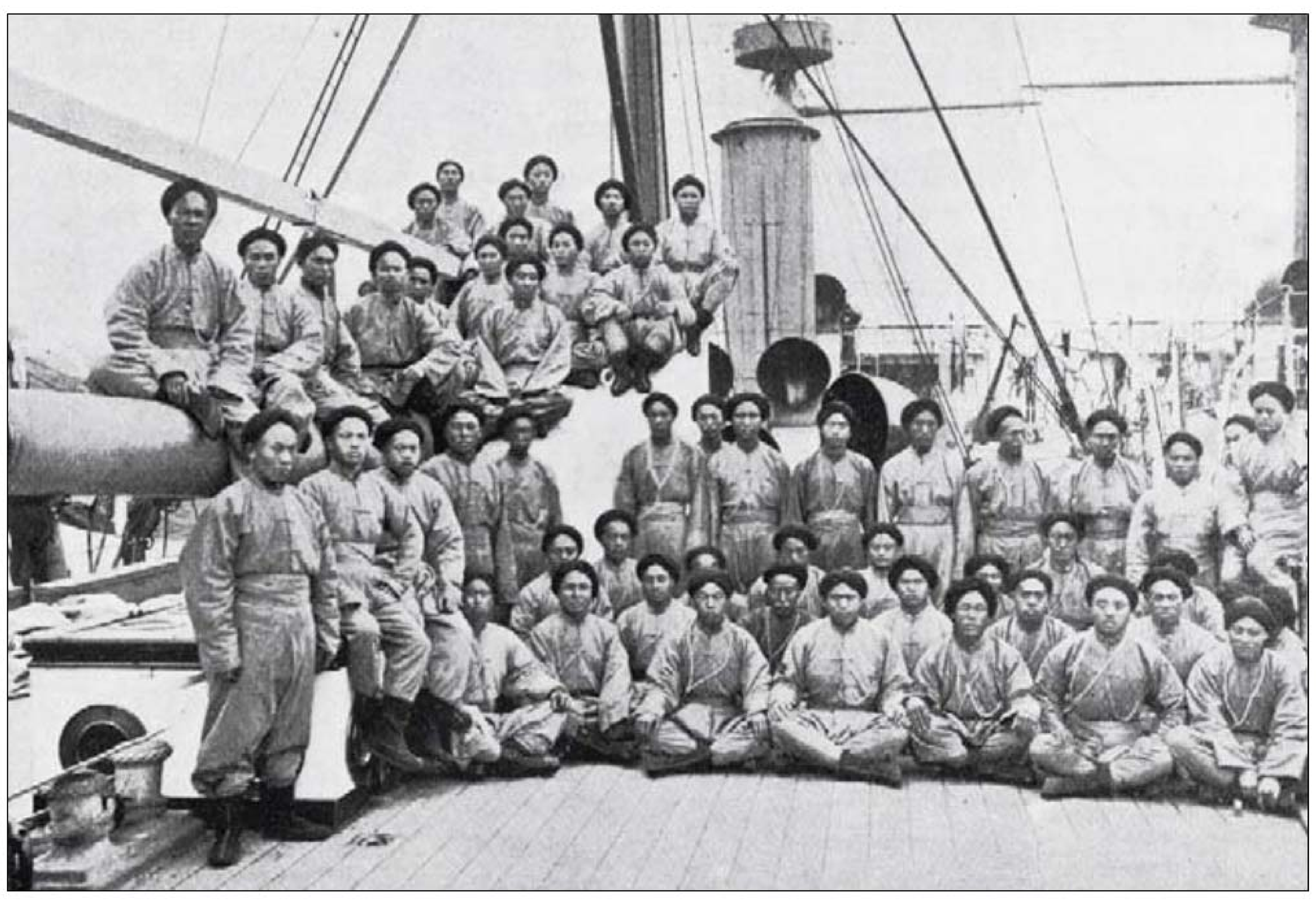
登陆智·汇100
领略科技升华

Das Auto.



P110


P94


P100

社会

94 逝者：沙博理：在中国“旅行”一生

100 热点：甲午沉船：120年后重见天日

110 热点：北京进入APEC时间

120 问题与讨论：“里根经济奇迹”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结果

130 问题与讨论：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经济

92 市场分析：美国QE落幕

138 收藏：原汁原味的中国

144 商业：斯柯达想吸引更多年轻人

文化

152 科技：神秘莫测北极光

162 书与人：贾平凹：原来如此等老生

166 书话：金融业行话大起底

专栏

28 邢海洋：沪港通之“通”

158 张斌：终点？未必

160 宋晓军：俄罗斯的“面子”与中国的“里子”

6 环球要刊速览

16 读者来信

20 观察

22 天下

30 理财与消费

32 好消息·坏消息

33 声音

34 生活圆桌

38 好东西

168 个人问题

2014年第45期　总第811期　2014年11月10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MADE in CHINA 2.0
优强中国造

优强中国造 成就中国骄傲

升级中国造，今天已经来到。
一切正在提升，并向我们证明——优强，由中国造。

优强中国造，强在不止步于制造更优质商品，
而是为客户创造更高附加价值，强在海外客户成功，中国企业决胜千里。

从此，先进的全球物流助您面对市场风云先发制人，
成功拓展商业版图，供应链效率过人，纵横天下。

UPS物流，以专业的物流人才，丰富的物流经验与资源，
助力中国企业领先全球市场，成为中国骄傲。

欢迎了解UPS如何帮助您成就优强中国造
登录官网ups.com/mic或关注官方微信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执行总编辑 Executive Publisher
翟德芳 Zhai Defang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吴琪 Wu Q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曾焱 Zeng Yan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朱步冲 Zhu Buchong　王星 Wang Xi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蒲实 Pu Shi　庄山 Zhuang Shan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贾子建 Jia Zijian
王珑锟 Wang Longkun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邹珊 Zou Shan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王玄 Wang Xu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邢宇 Xing Yu　龚融 Gong Rong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浛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渠道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ationwide Marketing Channel
林琳 Lin Lin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大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orthern China
乔继斌 Qiao Jibin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罗洪旗 Luo Hongqi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于硕 Yu Shu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发行统筹 Circulation Coordinator
周旭 Zhou Xu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桂礼白 Gui Libai　袁媛 Yuan Yua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陈陌阳 Chen Moyang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薛芃 Xue Peng
广告部 Commercial Department
张维 Zhang Wei　史超 Shi Chao　孟佳 Meng Jia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和您一样，我们也不喜欢机内餐。

星级名厨，品酒大师，饮品专家和全日空自有厨师携手组成“美食专家团队”
共同为您打造空中盛宴。国际美食和日式料理菜品每三个月更新，
更有世界各国经典佳肴可供单点。您将享用到难忘旅途中的难忘一餐。

一切，源自精心设计。

www.anaskyweb.com

ANA Inspiration of JAPAN

A STAR ALLIANCE MEMBER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 6-8 号银珠商务中心 405 室
邮编：510230
电话 / 传真：（020）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成 都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 ：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 ：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2100585
昆 明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 ：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347099
哈尔滨 ：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 ：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0431）82708592
大 连 ：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 ：沧海书店（0791）8592810
太 原 ：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 ：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 ：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 ：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017749
安 徽 ：合肥皖新书店（0551）64252409
新 疆 ：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 沙 ：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长安福特
2~3 · 保利拍卖
4~5 · 合益和
7 · 空客
9 · 一汽大众迈腾
11 · UPS
13 · 全日空
15 · 雪花啤酒
17 · 鄂尔多斯
19 · 楼兰葡萄酒
29 · 周刊征订
49 · 自然之宝
59 · 联想
63 · 易郡
65 · 易郡
67 · 易郡
135 · 酒鬼酒
136~137 · 航美传媒
150~151 · 极草
159 · 三联新媒体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暇步士
封底 · 欧米茄

唯思堂传媒 WISDOM MEDIA
广告总代理 Adcraft
北京唯思堂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电话：（010）65280118
传真：（010）65272098
上海电话：（021）32013813
传真：（021）32013813
广州电话：（020）38768563
传真：（020）38769520-604
深圳电话：（0755）86129132
传真：（0755）26478827
杭州电话：（0571）86070421
传真：（0571）86070479
成都电话：（028）85056991
传真：（028）85054991
南京电话：（025）84705110
传真：（025）84715010
烟台电话：（0535）2602308
传真：（0535）2602308
西安电话：（029）85232132
传真：（029）85232123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 新浪微博 weibo.com 鳳凰網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YOUKU 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雪花
勇闯天涯
挑战未登峰
活动招募现已全国启动
7月—10月，期待与您共赴征程！
雪花啤酒 勇闯天涯
主办单位：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扫一扫，即刻踏上征程



No.810 李克强访欧记

李克强总理访欧，务实外交硕果累累，一路谈论创新，一路展现创新，70场活动亮点无数。但我更喜欢观看平实的细节——默克尔陪同逛超市，梅德韦杰夫家中设宴，伦奇陪观中意创新周——不否认象征意味大，但人性化的东西更强大。大国领袖，尊重彼此、温情对话、相互合作是为正道，此番数据支持和非数据感受的那些温暖人心的东西，带给各自的人民以希望。这个世界还有人迷恋单极时代，可称霸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了。

北京 常一昶

小飞的“变通腐败”

小飞是市直某单位的一名公务员。前不久，对婚礼有着美丽憧憬的他精心筹划了一场温馨的婚礼。不过，同事闻知后的一番劝阻让他的好心情瞬间消散。

一位与小飞关系不错的老资历同事告诉小飞，婚礼还是不举行的好。这让小飞疑惑不解。同事解释道：当下反腐呈现高压态势，严格禁止领导干部家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借婚丧嫁娶敛财更是决不允许。可就是如此，仍有人搞一些“变通之道”，比如有的在一个饭店搞一两个大厅，再设若干个小包间；有的搞化整为零，城市和老家农村分别举办，一个城市分批举办；有的甚至连婚宴也不举办，通知亲友直接到家，在家收取礼金礼物。这些情况媒体都屡有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举行婚礼，合适吗？

听了同事的解释，让小飞不禁哑然失笑，小飞说自己结婚举行婚礼，也只不过是想请亲朋好友聚一聚，热闹一番而已，自己虽是公务员，但只是一名普通的办事员，不要说从未想过借婚礼敛财，就是自己想敛财，也没人给送呀。中央反腐，反的是借婚礼敛财，自己坚决拥护，即便要举办婚礼，也绝对不会出现违反规定的情况。所以，还是请同事们不要担心。同事听完，直笑小飞太幼稚，同事说：你是否有借婚礼敛财的情况，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婚礼有没有可能给单位带来影响。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万一有人把你举行婚礼的图片发到了网上一两张，又或者某个好事之人向媒体爆料说某单位某某举行婚礼摆酒席多少桌，此类消息只要一见诸报端，就有可能给单位带来被动和负面影响，即使最后经查证，不存在任何违规之处，影响也难以消解，这必然会让领导对你产生看法，认为你做事不稳重。为了一场婚礼，你觉得有必要让领导对你产生看法吗？同事接着解释说，所谓影响和看法，虚无缥缈，但很多时候，却可以操控一个人的命运。听完同事的话，小飞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办还是不办婚礼，的确是一个问题。

小飞来自农村，在老家，婚礼对亲朋的宣示意义甚至要高于结婚证，现在取消婚礼，怎么给老家的亲朋交代？当然，还有一个小飞不愿意说出口的原因，小飞结婚晚，前几年，朋友同学陆续结婚，份子钱小飞没少给，也想着借婚礼能够达到一个“收支平衡”。后来，小飞思量良久，还是取消了婚礼。不过，出乎小飞意料的是，虽然没有婚礼，仍有不少朋友给了份子钱，小飞推脱不过，大多还是收下了。只不过，事后小飞想，自己没举办酒席还收钱，如此一来，岂不是真成了媒体报道的“变通腐败”？那么，婚礼究竟该办还是不该办呢？

河南 邵宁

名人故居的感触

前不久，到天津旅游，参观了一批名人故居，所见所闻，颇令人感触。

我们先是来到民国军阀冯国璋故居，这是一幢端庄素雅的奥地利式小楼，曾在1917年担任过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下野后，就住在这里。该故居是冯氏于1913年购自奥地利工程师布吕纳的三所楼房，占地6.376亩，人称“冯家花园”。“冯家花园”设计非同一般。得原楼后，冯家认为这位奥国工程师在房屋设计及施工方面技术高超，因此又委托他在此楼前方再设计建造新的住宅楼，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共四座，连同从前的三所小楼，共计110间，建筑面积达到4661.29平方米。与“冯家花园”仅一街之隔，还有一幢袁世凯故居，据说，两届民国大总统将住宅建得如此之近，且全国仅此一处，可能是方便二人议论国事。

冯氏故居环境幽静，四面采光。从清晨到黄昏，阳光自不同方位洒进来，从每一种角度体验，都有别具一格的美：清晨的东边客厅，全家人可迎着朝阳，享受温馨的早餐；正午的滨河阳台，迎着河风轻抚，可以充分感受城市气息；午后的四个西部厢房，则可品着下午茶，尽享闲的氛围，以及夜的曼妙。工作人员介绍说，冯国璋的曾孙、著名相声演员冯巩，曾在西厢房里度过九载童年时光。而今的袁氏故居和冯氏故居，已被改成高档餐厅，袁氏故居极少向普通人开放，冯氏故居则开始接纳平民，让南来北往的客人领略一番总统之家的奢华。那一个秋后的正午，我与友人在一楼餐厅内，点了一盘红酒焙鱼及一份特色宫保鸡丁，菜的分量很少，价格却高得离谱。和我们一样，不少选在这儿就餐的外来客，只是为了体验一番贵族生活。也许，正是这不菲的收入，才让这些历经百年的故居，仍然可以开门迎客。

距冯、袁故居不远，还


鄂尔多斯 ERDOS

有一处梁启超故居，现已改造成纪念馆。较之冯、袁故居，无论是建筑档次还是参观人数，都要冷清许多。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才看到一对青年夫妇在门前张望，面对10元一张的门票，脚步又有些停滞不前："不就几间旧房子吗，还要掏钱，不看了。"见此情形，纪念馆工作人员热情地介绍："这儿是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梁先生在这里写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青年夫妇有些尴尬地回答："对不起，我们不清楚什么冰室，只是看到有这么一家纪念馆，有些好奇，所以……"工作人员赶紧改口："林徽因你们知道么？民国有名的美女、才女，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儿媳妇。"青年夫妇还是摇头。见工作人员一脸失望的模样，我于是上前帮着解释："周迅你们知道吧？"青年夫妇眼睛一亮："知道呀，她是著名演员。""她和黄磊主演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你们看过吧？""看过，周迅演的电影电视我们都喜欢看。""林徽因，就是《人间四月天》里周迅演的那个主角啊。"听我这一介绍，青年夫妇恍然大悟，当即松松爽爽地买票进去参观了。

一方面，纪念馆要抓收入，另一方面，很多游客不熟悉历史，不愿意掏钱，对此，最尴尬的还是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我们虽然守的是梁启超纪念馆，可打得最多的却是他儿媳妇的牌。今天，您还让我们学了一招，有时还得靠影视明星来拉人气。"他们说。

湖南永州　蒋平

变味的"文明城市"

近日，在武汉街头，特别是人流量大的十字路口，总是可以看见戴着小红帽、别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的志愿者——政府临时"聘请"的文明交通劝导员。他们的出现，提醒着我：噢，又到了武汉创建"文明城市"的时候了。志愿者们的"生命周期"伴随着创建"文明城市"时间或长或短，创建活动开始时，他们出现了，创建活动结束后，他们也将"消失不见"。

武汉市从2005年开始创建"文明城市"。每一届创建期间，政府都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壮志未酬。今年是武汉市连续第四届创建"文明城市"。从造势上来说，创建热情达到了空前高涨。今天，我乘坐出租车，和的士师傅闲聊得知，的哥的姐们被强制要求背诵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应对上级部门的抽检。我的一个好友也在微信朋友圈里"抱怨"：单位组织全体职工默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能默写正确的人，将拿不到奖金。有了经济利益的驱使，效果应该会比的士师傅们强吧。

创建"文明城市"，本应是提高城市知名度、提升城市形象、优化发展环境的利民的好事情，可如今的某些做法，让"文明城市"有点变味儿。依靠强制手段，"强迫"市民参与创建活动，即使这次评上了"文明城市"，武汉就真的文明了吗？市文明办在"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里写道："一个温馨的微笑、一句热情的问候、一个友善的举动；看到垃圾时的一次弯腰、遇到红灯时的一次等候、给街坊邻里的一次帮助、给老弱病残孕的一次让座、给外地游客的一次指引、对不文明行为的一次劝止……"试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以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即使没有"文明城市"的头衔，武汉也是一座拥有文明市民的文明城市。

实际上，靠强制手段和利益驱使评上的"文明城市"，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只有每一位市民发自内心地认同"文明城市"理念，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做文明有礼的武汉人，"文明城市"自然水到渠成。

武汉　孙思

政府不作为，村民瞎折腾

我在山西太原工作，家乡山西晋中榆次区长凝镇原来是个山清水秀的村庄，虽说没有大的企业，也没有支柱型产业，但村民都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可是自从前些年国家对城镇居民禁止土葬以来，我们整个镇变了大样，都在把国家分给自己的地（旱地）绝大部分卖给外地人、城市人作为坟地，而且其中不乏村委、镇政府、区政府牵线搭桥。

从此，整个山头、山里每天车来车往，挖掘机等都上阵，站在村子里最高处，进入眼里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企业、产业、景观，全部是热火朝天的非法墓地建设。起初就是买块地立个碑，人一埋就行，现在不仅圈地栽树、盖房，而且越来越豪华。榆次每年规模大的上坟要4次，大年初二、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每到这时候，从榆次区到长凝20华里的路上，可以排满上坟的车，都需要交警出动来疏通道路。刚开始人们牵线搭桥镇政府还收取部分占地费用，一处墓地3000元左右，随着时间推移，从5000、8000、1万元到现在已经是1.5万元了，"能干"的村民已经把自己的和别人的地卖出十几处了，获利也可说收入达十几万元。我们镇政府所在地并非每月都有人去世，但去年清明到今年清明仅仅一年坟墓至少增加了50个，还没说整个镇的，估算一下，整个镇一年增加200～300个坟墓吧，整个镇一条山脉都成了坟山脉了。

自从区政府下文件不准私自买卖坟地后，整个镇跟疯了似的，卖地愈加厉害，"能干"的村民越来越多。而且政府一级级都在推责任，谁也不管。问村委，领导说乡里乡亲的，怎么管，难道给他们挖开还是填埋？问镇政府，领导要么说让村委自己管，要不就是不理不睬；问区委，书记要求谨慎对待、酌情处理。反正就是没有处理的办法。据说区政府已经成立过由检察院、民政局、土地局、公安局等单位组成的调查小组，但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马上到阴历十月初一，买坟地的高峰又来了。

办法是非常多的，但就是没人管。究竟该谁来管？希望媒体能到实地看看那触目惊心的坟村。

太原　一读者

本期截稿时间：11月3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楼蘭
LOU LAN
楼兰葡萄酒 中国酒庄酒
海拔
5445m
天山雪水浇灌
新疆楼兰葡萄酒庄，濒临沙漠，极端干燥少雨。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峰冰雪融水，就是楼兰酒庄的生命之源。纯净的雪融水，经潜伏在戈壁滩下的清代坎儿井，引流至楼兰酒庄葡萄园，隔绝工业、人群污染，从水源上保证楼兰酒庄酿酒葡萄的有机健康。
LOULAN
樓蘭
樓蘭酒莊
尊享级
百轩尼干白葡萄酒
Chenin Blanc
吐鲁番楼兰酒业有限公司
TURPAN LOULAN WINE CO., LTD.
2012-2014
中国年度佳酿
清华大学百年
校庆宴用酒
中国有机
产品认证
ORGANIC
葡萄酒
明星产品
中国酒庄葡萄酒
明星产品奖
中国葡萄酒产区
龙头企业/优秀代表性企业奖
中国葡萄酒产区最佳个性化酒庄
400-100-5710
WWW.LOULAN.CN
腾讯微信

巴西大选：罗塞夫险胜

记者 邹珊

巴 西



10 月 26 日，赢得总统大选的罗塞夫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出席新闻发布会

10 月 26 日，巴西总统大选结果揭晓。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凭借 2.58% 的微弱得票优势，击败了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对手阿埃西奥·内韦斯。

罗塞夫的胜选之路可谓险象环生。数据显示，巴西经济增长势头自她上台以来便迅速衰减，2011 至 2013 年的年均增速仅为 2.4%，为南美洲国家中最低。今年前两季度，该国 GDP 环比增速分别萎缩 0.2% 和 0.6%，物价却一路飙升，当前通胀率也已达到了政府调控目标上限，而巴西国企（如巴西石油公司）和官员接连不断的腐败丑闻又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消极影响。去年 6 月，一场规模空前的反政府示威在巴西爆发。本次大选的首轮投票中，她的得票率没有过半，在第二轮投票前一天的两场民意调查中，她也只获得了 52% 和 53% 的支持率。

那么，罗塞夫赢在了哪里？“虽为险胜，罗塞夫的民意基础还是比内韦斯坚固得多。对于贫苦大众和被称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人群而言，罗塞夫是他们的选择。”美国卡尔顿学院政治系主任蒙特罗（Alfred P. Montero）告诉本刊。“近 12 年中，从卢拉到罗塞夫，劳工党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水平，收入差别也有所缩小。政府创造了上百个行业的工作岗位，最低工资上调，穷人接受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机会也增加了不少。所以，罗塞夫的支持者中，大部分人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只有大概 1400 雷亚尔（约 565 美元）。”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巴西研究中心的主任佩雷拉（Anthony Pereira）也告诉本刊。“她拿下了 15 个州，这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十分依赖联邦政府实施的‘家庭补助金’等政府转移支付项目。”美国伊丽莎白敦学院的巴西政治学荣誉教授塞尔切尔（Wayne A. Selcher）对本刊说。

“脱贫”政策之外，罗塞夫也比较注重政府对市场的人为干预。“此次竞选中，劳工党和其中左翼联盟依然倡导政府干预，强调中央经济统治论。”塞尔切尔说，“而内韦斯则更加‘利商’。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中右翼联盟认为，私营部门和自由企业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内韦斯共赢得了 12 个州的胜利，主要集中在较为富裕的中西部、东南部和南部地区，那里中产阶级队伍近年来明显壮大。”但是，“罗塞夫的选举阵营还是成功地让其支持者相信，内韦斯是不可能实现与现任联邦政府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的。内韦斯的立场也的确不对底层选民的胃口。他不断重申‘巴西的最低工资太高了’，这让他在较为贫困的地区付出了惨痛代价”。蒙特罗说。

但不能忽视的是，正是得益于劳工党的福利政策，近年来，数千万巴西人脱离了贫困阶层。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逐渐产生了新的社会诉求，罗塞夫多年如一的民生政策则由此凸显出了局限性。“这种划分地域的得票模式在 2010 年大选中已经有所显现，它反映了巴西社会对政府和私营企业在国家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激烈争论。”塞尔切尔说，“如今，包括古巴和委内瑞拉在内，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府都正经受来自地区和世界的严酷考验。罗塞夫虽是个实干者而非理论家，但仍需以更为实际的行动，与国内外商界更加紧密合作，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兼顾社会公正。”“总体而言，罗塞夫的下一任期不会轻松。除了应对贪腐丑闻，她还需努力与私营企业重建积极的工作关系，因为该领域人士更加支持内韦斯。”蒙特罗说。

乌克兰议会选举：亲欧阵营占上风

记者 邹珊

10月26日，乌克兰迎来了去年冬季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民调结果显示，总统波罗申科领导的“波罗申科联盟”以及包括总理亚采纽克领导的“人民阵线”在内的其他4个亲西方党派共获得了70%左右的选票，是乌克兰亲西方阵营自独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在统计超过97%的选票后，波罗申科联盟和人民阵线的得票率领先，分别为21.82%和22.22%，这意味着新议会很快就要成立议会联盟。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巴卡诺夫（Boris Barkanov）告诉本刊：“新议会将面临至少两个内政挑战。首先，虽然大部分成员持亲西方立场，但在国内经济与政治系统的改革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而在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和东部分离势力之间的关系方面，他们也未能达成一致，两个票数领先的政党间也存在重大分歧。但在没有一个党派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它们又必须通过结盟来结成联合政府。此次选举中，许多独立政客、右翼政治家和反对党成员进入了议会，其中不乏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继承者。也就是说，组建联盟的过程将充斥各种政治运作，而且联盟也可能不会稳定。”

除了结盟前景，新议会未来的合法地位也令人生忧。虽然乌政府于9月16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特殊地位法”，但东部地区民间武装仍然坚持独立。此次，顿、卢两州不仅出现了约半数选区无法组织选举，大概460万选民（约占乌克兰全体选民的10%）未能参与投票的情况，还自行筹备了一场大选。11月2日，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拉开帷幕，投票后，他们将拥有“自己的领导人和国会”。“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投票率要比中、西部低很多，即使在非分离分子的管辖区域也是如此。”巴卡诺夫说，“比如，第四大城市，位于南部黑海沿岸的敖德萨的投票率仅为40%，而西部主要城市利沃夫则为70%。这是新议会将面临的第二个难题。这种投票趋势说明，无论选民出于何种原因参投，新议会都不能算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机构。将来，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政策的合法性可能会因此被削弱。”

一个亲西方政府必将进一步坚定乌克兰向西推进的步伐。一个多月前，波罗申科就已推出了“2020战略”——一套为乌克兰在6年内申请加入欧盟而铺路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方案。“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的政治发展方向一直不能确定。现在，该国的确需要一个清晰的目标。”德国外交智库“SSC欧洲”的CEO沙费尔（Sebastian Schaffer）对本刊说。但是，若要达成这一目标，最棘手的要属经济难关。亲欧示威运动爆发以来，乌克兰国库严重受损。据估计，该国今年GDP或将减少7%至8%。另外，“俄国虽与乌克兰签署了协议，保证天然气供应到2015年3月，但乌方亏欠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22亿美元债务却还未解决”。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客座教授布劳恩（Aurel Braun）对本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救助乌经济至少需要550亿美元。所以，“新一届政府急需推进能源改革和经济改革，使国家经济上升到能承受欧盟共同市场压力的稳定程度。另外，还要完善立法体系、逐步向欧盟标准靠拢等。但普通民众是无法从这些改革中迅速获益的。而这就意味着，改革的推行将困难重重”。沙费尔说。



10月26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首都基辅的一处投票站接受记者采访





印度 | **太阳神节**

10 月 30 日，印度教教徒在新德里亚穆纳河中向太阳神祈祷。节日期间，妇人们争先恐后地在日出和日落时分敬神。祈祷者们通常首先会祈求孩子们的幸福安康。





土耳其 | **库尔德难民**

10 月 30 日，土耳其尚勒乌尔法省东南部苏鲁克镇的难民营里，一名库尔德男子在雨中抱着孩子。自从 2011 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冲突，曾受压制的库尔德族趁机扩张势力，取得对叙利亚北部多个省份的控制权。因为库尔德人占据的是北部的富饶之地，成为其他武装派别攻击乃至火并的对象。10 月以来，“伊斯兰国”武装持续围攻与土耳其交界的叙利亚北部重镇科巴尼，造成至少 18 万名叙利亚库尔德族难民逃入土耳其境内避难。







英国 ｜ **水下跑车**

一种类似于“007”曾经开过的水下跑车,售价 120 万英镑。这款革命性的汽车是由电动马达推动的，在水下能够达到 75 英里的时速。



美国 ｜ **“天鹅座”爆炸**

10 月 28 日，美国轨道科学公司研发的“天鹅座”飞船从美国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岛发射升空，但搭载飞船的“安塔瑞斯号”运载火箭起飞后 6 秒就在半空中爆炸。

泰国 ｜ **万人放天灯**

(左页上图) 10 月 25 日，泰国清迈，众多当地人和游客参加放天灯活动。放天灯是水灯节的一部分，人们相信孔明灯会把一整年的晦气、厄运带到九霄云外。

以色列 ｜ **监狱时装秀**

(左页下图) 10 月 27 日，位于拉姆勒的以色列唯一的女子监狱举行首届时装秀。模特们展示在押犯人设计、制作的服装。

沪港通之“通”

文 / 邢海洋

10 月 27 日这一业界公认的沪港通开通日已过，沪港通爽约了。资本市场任何重大的改革动作，从来都是好事多磨，爽约实例俯拾皆是。但这次不一样，“十八大”提出了明确的资本市场开放目标，两地交易所也给出了时间表，如箭在弦。全球资本从大宗商品中撤出，蜂拥入市，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耗”不起了。

之所以业界预计 10 月 27 开通沪港通，是因为 4 月 10 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上交所和港交所随后在联合公报上，又明确给出了“从本联合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沪港通正式启动，需要 6 个月准备时间”。再算上准备工作就绪后再给予市场的两周提前告知期，正好是 10 月 27 日。10 月初，各方机构似乎已经笃定了沪港通的开通，在此之前，两地交易所已经进行了多轮测试，包括业务流程、市场功能和危机应变等，9 月还进行了全球市场推介。至于困扰两地投资者的征税难题也似乎得到了解决，双方暂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可以说沪港通已经站在起跑线上，只待发令枪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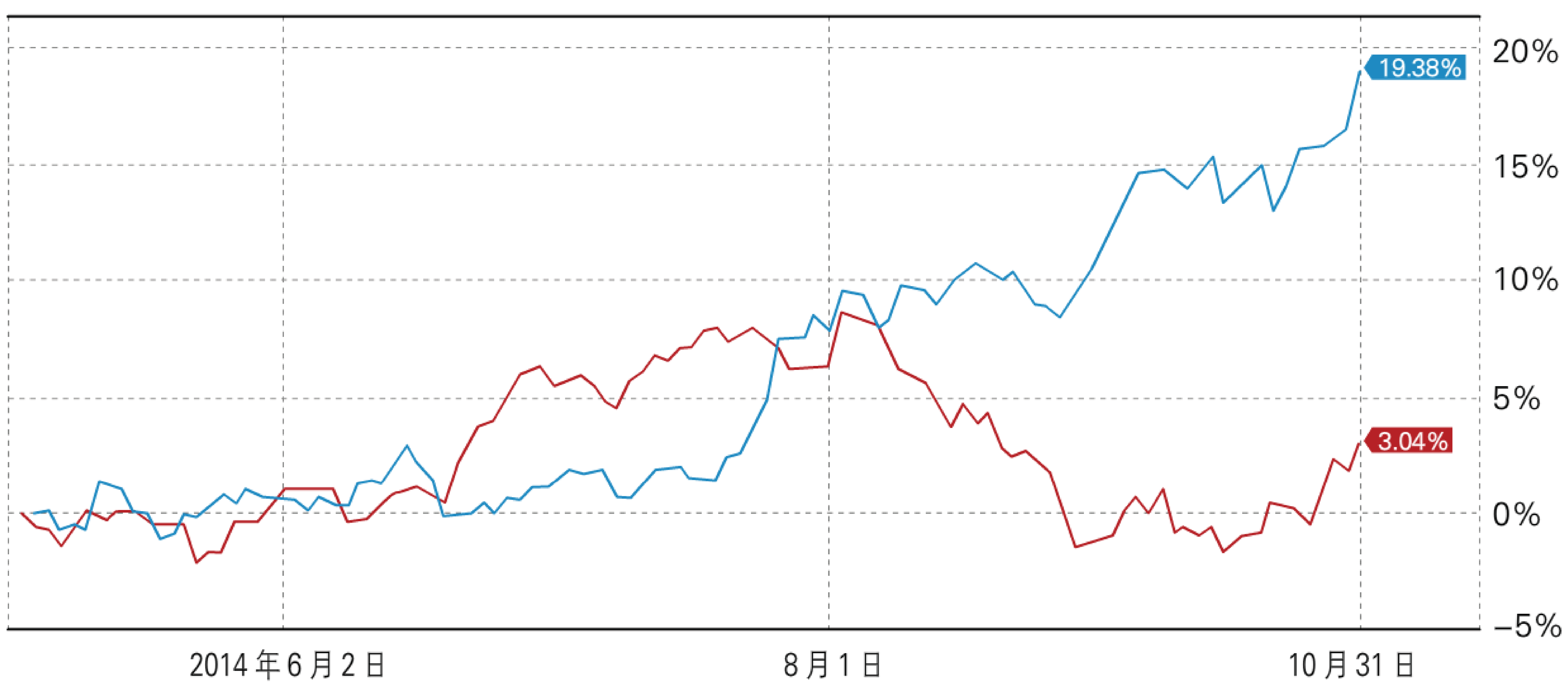
就如同法律不健全，规则不明，资本市场最惧怕的是不确定性。虽然监管部门的说法是半年内免征，海外投资者还在纠结于半年后是否继续减免，以及将面对突然征税的风险。香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内地则征收 10% 的利得税，并征收 5.6% 的营业税。并且，按照现有税收政策，对内地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的征税存在差异。机构和个人都需缴纳红利税，这部分税款在发放红利和利息时已经被扣除。对于买卖证券形成的差价收入，即所谓“资本利得”却不一致，表面上，个人和机构都不会面对资本利得这一税种，税务部门也不会征收，但却需计入营业利润。个人却因为不必对此报税，从而免了这部分税款。

这并不是海外资本第一次进入 A 股，根据国务院 2009 年的一项规定，QFII 在中国的税收原则和内地投资者相同。QFII 在内地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需按 10%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资本利得则同样不征税。沪股通当然可以比照这一规定实行，问题是，这势必造成征税方面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新的不公。个人投资者无需缴税，机构投资者则面对税收压力。当海外投资面对 QFII 单一渠道时，这种不公还是隐性的，一旦有了个人投资免税的渠道，QFII 就会因缴费成本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海外投资均以个人面目出现。而更严重的后果是，若海外的机构投资者获得了比内地机构的成本优势，长此以往，内地资本也将向海外机构转移，从而动摇内地的税收根基。这样看来，沪港通之不通，已经不是技术准备原因，而是制度设计上存在瑕疵。

回想资本市场的爽约事件，沪港通的先行者港股直通车的无疾而终算是最著名的一件。那是 2007 年 8 月，以外管局公布《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行方案》为标志，市场在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左右摇摆，最终因管理层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而跳水。可以说港股直通车直接促成了 2007 年 10 月沪指 6124 这个世纪大顶的形成。随后的爽约事件还包括股指期货的推出、创业板的设立等等。但证券市场在创新与开发大方向下，这些万众瞩目的市场化改革，虽然一推再推，毕竟迎来了推出的时刻，但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A 股丢失了宝贵的成长期，沦落为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资本市场的开放，则因为缺乏顶层设计，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但愿沪港通如同弓弦上的箭，不得不发，从而倒逼资本市场的改革形成整体思路，下一盘大棋。

“沪港通”宣布后的上海与香港股市（蓝色为上证指数；红色为恒生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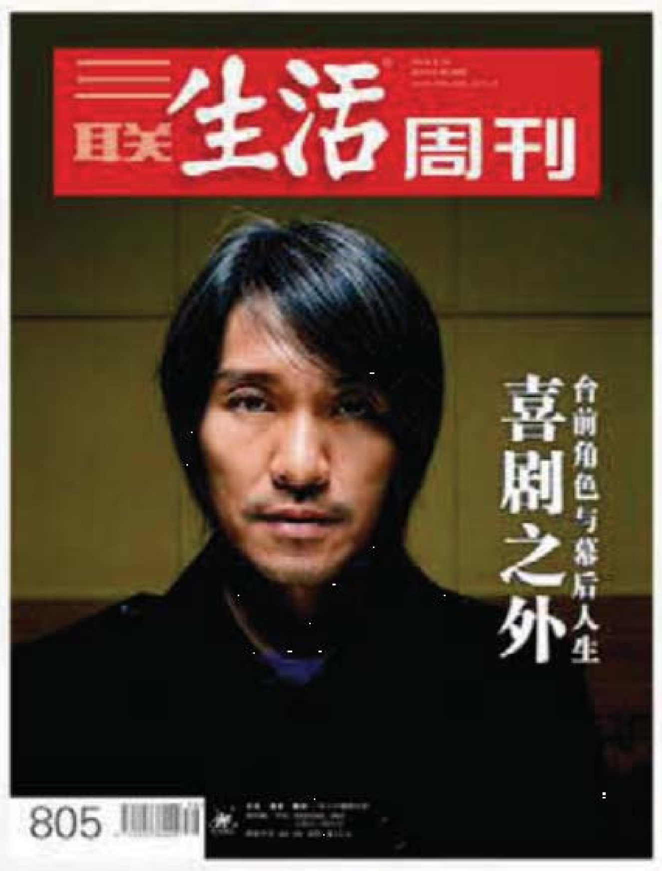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2015 年更多精彩，订阅更优惠

2015 订阅全年净省 208 元

全年52期，零售单价12元 | 订阅单价8元 | 订阅年价416元

内容更全面、深入地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热点
一支高质量的主笔、编辑、记者队伍，更加大采访成本投入，更强调原创性
可读性更强，内容更丰富，涉及投资、理财、收藏、家居、健康 ……方方面面的实用生活指导
一本高端综合类周刊承载更多理想，以坚持不懈的成长回报读者厚爱，证明自己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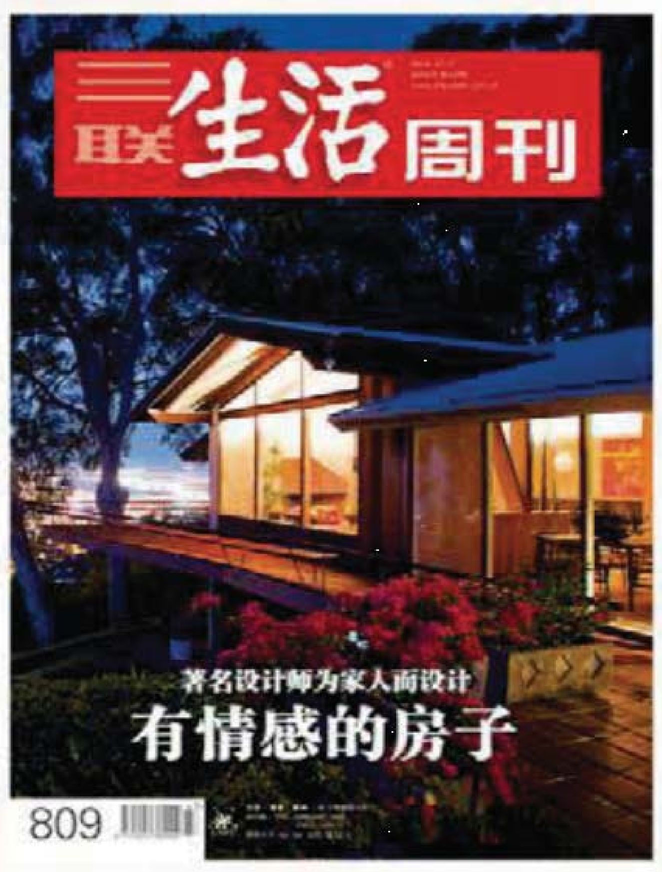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 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 " 百强报刊 "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邮发代号： 82-20 / 拨打 11185 上门收订
委托声明： 三联生活周刊订阅服务由邮政部门独家代理，未委托其他机构订阅本刊。
杂志社咨询电话： 010-84050425 / 84050451
联系信箱： dzfw@lifeweek.com.cn



栏目插图 | **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自贸区 2.0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加快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多个自贸区以竞争促进效率提升的场面值得期待。新设自贸区将各有特色，如前海的金融、天津的融资租赁；也不乏区域特色，比如广东可以对接港澳、天津的一带一路、福建的对台。自贸区之间的竞争必然存在，但不是全方位竞争。比如有了上海金，就不需天津金，前海金融创新成效就不明显，原因是产业基础不够强，缺乏相应的实体经济承载。自贸区 2.0 涉及股票包括天津港、珠海港、厦门港务等。

"跳板"意大利

据估计，中国外管局已斥资逾 25 亿欧元分别购入意大利 5 家最大企业约 2% 的股权，包括菲亚特—克莱斯勒、意大利电信和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等。2013 年至今中国人在意大利的投资接近 60 亿欧元，位于英国和法国之后，意大利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三大欧洲投资目的国。意大利企业超 14 人就必须有工会，很多不到 14 人就分家，意大利还对中小型企业有政策倾斜。中小企业专业化程度很高，灵活性较强，但是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此种经济结构，正与中国大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互补。





QE3 结束

在美联储正式宣布 QE3（第三轮量化宽松）结束后，资本市场的“RISK OFF”模式再度启动。美元出现大涨，股市和非美货币以及贵金属明显下跌。在 QE 实施的 6 年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到 4.45 万亿美元，市场担心 QE 退出后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加不稳定。可美国一枝独秀，美联储内部的倾向正在从“鸽”转“鹰”。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认为，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美联储 2015 年中加息了。美联储更新了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评述：新增就业人数稳健、失业率继续降低、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足的状况在好转等。



人民币强势不减

10 月末，尽管美元强势，人民币对美元仍创近 8 个月新高。此前，境外资金盯住沪港通，希望抄底 A 股，成为推高人民币汇率的一大因素。但沪港通延期，人民币升值仍未退潮。出口坚挺，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的比重仍在扩大，成为支撑人民币的重要因素。另外，随着四季度到来，企业有工资、奖金等更多的支付需要，往往集中卖美元而换成人民币，从而推高人民币汇率。通常，每年的四季度到年末都是人民币汇率走高的时期。



滞胀下的加息

总统选举过后，巴西央行意外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至 11.25%。罗塞夫因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就业而当选，却面临着经济下行，通胀走高的挑战。8 月底数据显示，巴西投资和制造业下滑严重，二季度 GDP 环比年化跌 0.6%，一季度下修为环比年化跌 0.2%，表明巴西经济金融危机以来首次陷入衰退。而通胀走高，超过了 2.0% ～ 6.5% 的巴西央行调控目标，巴西雷亚尔已经成为和俄罗斯卢布一样的弱势货币。提高利率以阻抗货币流失，实是无奈之举。



用阳光驱散哮喘

对于急性哮喘发作的患者，医生常常建议减少外出，避免接触过敏源。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过敏》杂志上指出，经常在晴好的天气里户外运动也许是减少哮喘发作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其中关键在于身体在接受日照后合成的维生素D：针对30余万人进行的追踪调查显示，伴有维生素D缺乏的哮喘病患者发病风险比对照组高出25%。根据研究者的建议，药物治疗收效不佳的哮喘病人均应考虑检测血液中的维生素D水平，而除了晒太阳，鱼肉、鸡蛋、鱼肝油和强化牛奶也是维生素D的理想来源。

好消息



用手机做普查

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代社会，进行人口普查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准确性欠佳。一个比利时研究小组日前指出，鉴于目前全球96%的人都是手机用户，与问卷调查相比，分析手机信号数据不仅可以快速且精确地了解特定区域的人口密度，而且还能反映出传统方法所无法体现的人口动态。



偏向高原行

由于缺氧、严寒和强日照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地球上的高原是最晚被人类占领居住的地区。然而，缅因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早在1.28万年以前，南美的古印第安人可能已经在海拔4355米的高原上安家了。这比此前学界认定的人类进驻高原的时间要早1000年。

坏消息



生不逢时

一个匈牙利研究小组对400余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出生时的季节对人的个性可能有显著影响。生在夏天的人比冬天出生的人性子更急，更容易忽悲忽喜；出生在春夏两季的人通常会过度乐观；出生在冬天的人不那么容易被别人触怒冒犯；而出生在秋天的人患抑郁风险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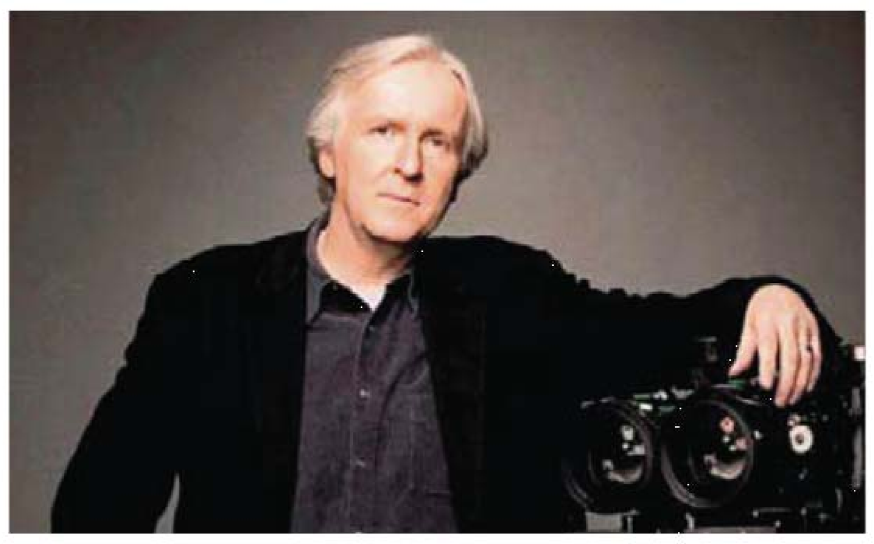


天灾不改人祸

即便一场规模巨大的灾难——世界大战或小行星撞击——突然夺去地球上5%的人的生命，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依然不会因此变缓。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者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院院刊》上指出，10种计算机人口模型均显示，到2100年时，地球人口极有可能将超过100亿大关。



（插图 山羊胡）



环顾四周，多少人低头弯腰看着手里的机器。机器已经赢了，只不过不是《终结者》里想象的方式。

——詹姆斯·卡梅隆说

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些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

——奥威尔《1884》中论述“双重思想”

威廉姆斯兄弟让人觉得害怕，美国女选手都是体格壮硕，俄罗斯女选手身材苗条、气质优雅。

——俄罗斯网球协会主席塔尔皮谢夫在国内一综艺节目中称“威廉姆斯姐妹”为“兄弟”，他的这番言论受到广泛抨击

过去一百年来，魔鬼在欧洲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人类在贪食（Gluttony）问题上真正做到了问心无愧，人们把重点从“贪恋暴饮滥食”（Gluttony of Excess）转移到了“贪恋珍馐美味”（Gluttony of Delicacy）上。

——在《魔鬼家书》中，C.S. 刘易斯说

立法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的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这种信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

——哈耶克说

+/- 数字

13 厘米

拥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娜塔莉·埃克特（Natalie Eckert）多年来参加了伦敦几乎所有的马拉松比赛，她打算穿高跟鞋跑完一次马拉松来筹集善款。这一灵感源于在她 37 岁时听到德国短跑运动员朱莉亚穿着 13 厘米高的金色高跟鞋以 14.531 秒的成绩跑完 100 米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记载的事迹。

0.8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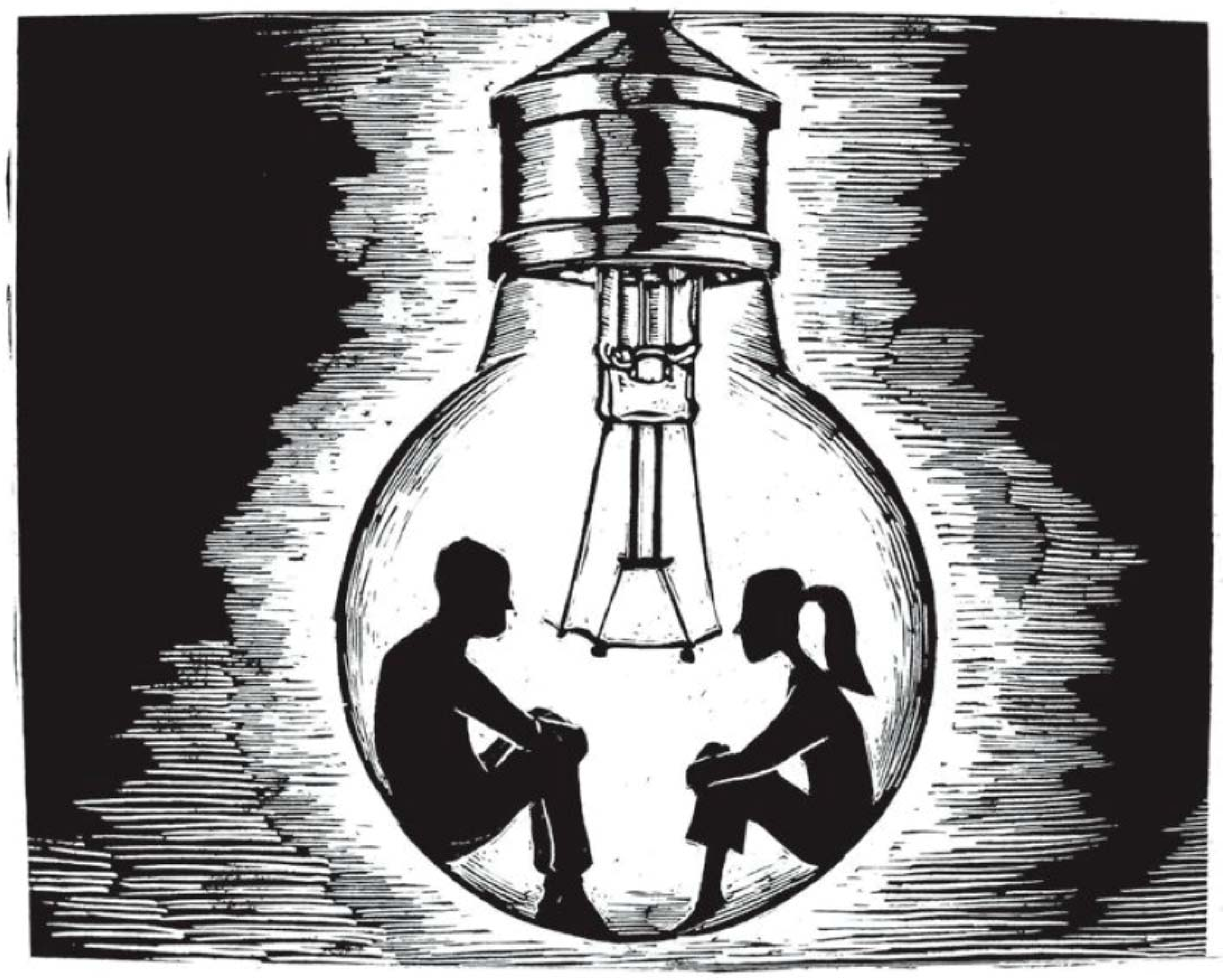
科学家在报告中说，过去 30 年中，每 10 年的地球表面平均温度都比 1850 年后每 10 年的年均温度高。而 1983 ～ 2012 年北半球可能经历了 1400 年以来最热的 30 年。而全球在 1880 ～ 2012 年平均增温 0.85℃（陆温增加 0.65℃，海洋增加 1.06℃）。

109.9 分贝

据英国《每日记事报》报道，英国男子保罗·胡恩（Paul Hunn）以打嗝声巨响而闻名。几年前，他参加吉尼斯在英国某电台举办的“寻找打嗝声最响的人”活动，一举创下 109.9 分贝的打嗝声纪录。这个打嗝声纪录相当于一台除草机在工作时所发出的噪音。

关于停电的记忆碎片

文 ✎ 王俊
图 ✎ 谢驭飞



我的家在一个小镇上，我无特殊才能，亦无家庭背景，所以我的初中只能在镇上度过，这个初中学校距我家300米，城里的那个初中和我很遥远。那时候老师经常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说：勤奋读书是改变你们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从初中开始，我们便需要进行晚自修。那时候的校舍有些简陋，电线直接钉在墙上，偶尔风吹雨打，便可能造成停电。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40多个孩子在焦头烂额解题时，灯忽然灭了。短暂的宁静后，便是雷鸣般的欢呼声，这就是一次集体的狂欢。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到操场上玩，等电通了再回来自修。

这样一个没有日光只有月光的操场是很美丽的。我们可以尽情地打闹、嬉戏、追逐。后来的日子，停电时有发生，我和我的几个死党就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起初我们聊学习，谁成绩最好，谁进步最快，后来话题不知怎么就落到了哪个女生最漂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个人答案如出一辙，真是臭味相投。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谈论人生，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谁都不想重复父辈的生活，刚才谈论女孩子的表情烟消云散。这或许就是农村的孩子，在不经意的瞬间成熟了。

终于有一天，学校对停电忍无可忍，把全校的电力系统修整了一番，停电一下变成稀罕的事情。我的一位仁兄，估计是太过于怀念停电的日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把学校的电闸给拔了。这事震惊了校长，仁兄很快被查出了，并被记大过处分。但他俨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更具戏剧性的是，去年回老家碰到了那位仁兄，他的工作是电工。

像我这样天天盼着停电的人，中考自然考不好。我的高中又只能在镇上度过了。虽然高中和初中有太多的不同，但停电却是相似的。高二下半学期，又有一次停电了，我勇敢地找到班里喜欢的那个女生：我想和你探讨几个问题，可以不？如此拙劣的手段，她也居然同意了，真是一个清纯无比的时代。接下来我便和她在校园的操场上，一本正经地探讨了若干个数学问题，她也向我请教了文言文的阅读方法，差不多操场快走了十圈了，埋在心里头最想说的话一直没有说出来。等我们回到教室的时候，里面是跳动的烛光，烛光背后是一张张勤奋的脸，想想刚才的我，神情有些恍惚，也突然间明白了：我要和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说再见了。

再后来，学校买了一台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即便是停电了，教室里照样可以灯火通明。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高三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都考上了大学，有的同学走向工作岗位。那些烛光背后的脸，那些停电时发生的往事渐渐被遗忘。这或许就是岁月，她就像一个容量有限的硬盘，不断记忆的同时，需要不断地遗忘。

梦里的男孩

文✎ 邹云
图✎ 谢驭飞



昨夜做梦，不知为何梦到了他。

他是初一时班上的一个小男生。真的是小男生，个子不高，瘦瘦的，加上侧脸有颗还有些明显的痣，十足像只小猴子，名字也叫小猴子。关于和小猴同班时有交集的片段，时隔好几年后现在的我只能清晰记得一个场景。那是寒假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在教室讲台附近遇到他，就特别自然地问了一句："你考第几？"对当年和男生交流有障碍的我来说，这次主动与人说话却没有丝毫怪异的感觉。说起来，初一那一年和班上几个男生的友谊，是我这辈子与异性同学开始做朋友的开端。

我初中就读的学校采取年年分班的政策，因而在这样一所对待男女交流中任何小问题都十分敏感的中学里，我和异性的友谊们都只存在于同班时期，一分班就不再熟络，自然和小猴的友谊也就此终断。

和他再一次同班是高一。两年不见，生长期的男生外形上的变化比女生大好多，重新见到小猴时我不只一眼没认出他，是好多眼也没认出来。他不仅高了很多，穿着打扮也好看了，再不是当年那个穿着校服一脸稚嫩的小屁孩。记得那时宿舍夜谈，邻铺的姑娘们聊起班上的男孩子，小猴成了必然的讨论对象之一。只是我和他，友谊不再，我们几乎再没说过话，我也未曾和人说起他曾经的模样。后来，班上的一个女生，一个蛮漂亮的女生被坏男生造谣，小猴超帅气地去帮她讨回公道。再后来，据说他们在一起了。再再后来，据说他们分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他不再是我的朋友。

女生往往比男生成熟得早，很早便借由各种媒介建立起自己心中的理想型，而对身边的男生形成了"他们都很幼稚"的刻板印象。而当小男生变得高大帅气，被其他女孩子侧目之时，即使他成了当年心中理想型的样子，那个认识他太早的女生还是不能将眼前的这个帅哥和曾经的小男孩做一个完整的连接，在意识深处，也许是两个人。生活由一幅幅连续画组成，每一幅都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与那个世界里的人并不一定绝对相关。

梦中的家总是过去住的地方，梦中的人总是小时候的样子，那另一个世界总是毫无理由地就出现在一个人的脑里。本来几乎要忘记的人，突然梦到了，过去与此相关的人和物又一点点浮现在脑海里，似乎有一丝丝想念。上网搜索他们现在哪里，成了怎样的人，却不愿也不该留下只言片语。美好有时候是属于回忆的，真实也许并不美，现状也许千疮百孔。梦帮人回到过去，给干枯麻木的心灵一点甜、一点酸、一点痛、一泓清泉。

时光流逝，记忆犹存。就像对小猴，多年不见，我梦里的他依旧如初一时风风火火、单纯简单的样子。

黑色星期一

文 肖遥
图 谢驭飞



周末加班，可以选择一天轮休，他们都抢周五，于是我拥有了一个睡到自然醒的星期一。周日晚上，我就像赚了一笔钱不知该怎么花的土豪，卧在沙发上，抱着遥控器，看到各个台都跟我再见。而窗外，月明星稀，整个城市都沉默了，只有渣土车轰轰隆隆，随风潜入夜，路宽任其疯。

我枕着工地轰鸣声睡去，伴着广场舞音乐声醒来。想起多年前，我住在一个布匹批发市场里，确切地说，当时刚毕业，没有宿舍，住在陌生城市一间地下室仓库里，确切地说，那个仓库就是我的办公室，每天半夜，市场开始卸货，大批布料从卡车上推下来，发出巨大的砰砰声，为了磨炼自己的没心没肺，我索性戴上耳机，借助想象力度过睡前黑暗，一觉跌入流光溢彩的梦幻时光。一天半夜，有人跑下来，激烈地敲着地下室的门，嘴里喊着我听不清也听不懂的当地方言，我的反应是，熄灯、躺下、睡着、做梦。第二天，听说夜里卸货的时候，有人把烟头扔到布匹上起火了，而我，一点儿也没有后怕，也不留恋那所谓的花样年华。

现在想来，那种绝望不是因为年龄或处境，而是因为——没有星期一，没有一个分外黑暗的周一来刷新节奏，导致生活没有一丝高光。话说还要感谢周一例会，如果说还有比地下室更无边的黑暗，那就是周一例会，就像小品里的台词：“我找不到我的腰，哪里疼我才知道哪里是我的腰。”周一例会就是那个动不动疼一疼的腰，提醒咱其他不疼的部位有多幸运多舒坦。但是这种阿Q式的安慰仅限于自我安慰，别人如此提醒就不好玩了，比如周一例会上，上司老Q总是说：“让你们擦个窗户打扫个卫生你们都有怨言，一点儿没有奉献精神……”小咪在底下私语：“我就是不想打扫卫生，我家卫生都是钟点工打扫的，我在家都不擦窗户，我老公把窗户擦得亮亮的，招呼我说：亲爱的，坐这儿晒太阳，这里有阳光！”

小咪他们家窗户到底是她擦还是她老公擦还是钟点工擦不得而知，其实小咪到底有没有老公也不得而知，别人家的真相，永远都是微信朋友圈里的火热周末，你看不出来他们周一到周五在单位里累得跟马似的，也看不出来这场家庭狂欢里有多少人在委曲求全。

让我展开自己当时在“不知周一，无论周几”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里训练的想象力，也许小咪家根本没有窗户，小咪早就被外星人囚禁了，她出来上班其实是一种放风，难怪每到周一她都糊着各种诡异妆容来上班，并且表现得莫名兴奋。也许，小咪她家从来不擦窗户，窗户脏了房子旧了就换新的，就像在小咪嘴里，永远没有黑色星期一，每天都是热火朝天心花怒放的周末好时光。

了不起的黄桃罐头

文 大龙勉
图 谢驭飞



“百度知道”里总有一些轻微白痴的温情小问题，比如这一条：为什么得病了吃黄桃罐头就会好？

这问题就和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公公一样，魔怔般只相信世界的美好，对药片针头的选择性失忆，以及对于黄桃罐头执拗的热爱，每一罐黄桃罐头里，储存的不只是阻隔了空气的清甜味道，还有对终将逝去的幼年时代的记忆，好像杏花香、绿树荫、小霸王和北冰洋。

作为黄桃罐头的重度“脑残粉”，我无数次在超市货架上沉醉于它那肤浅甜酸防腐剂味道，即便刚刚吃过撑到爆的火锅和香腻饱足的红烧肉，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再来一罐。五星级餐厅的大厨精选和安全系数百分百的有机甜品，都无法阻止我堕入那玻璃罐里的糖水浓汁。幼时大病初愈时，得到了父母在那个时代能提供的最好安慰，甜酸的黄桃罐头，在经过悲痛折磨、针头打击下的日子里重新找到了对世界的欲望，对幼儿园的向往、对小朋友的思念、对烈日高空下依然可以活蹦乱跳的冲动。

但是在我沉迷了这味道 20 多年后，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品尝过新鲜黄桃的味道，开始幻想这个泡在糖水里的尤物原本的姿态，它一定比水蜜桃更扎实，桃肉中还是充满甜蜜，黄色的它应该像一个晒出小麦肤色的运动女孩，多汁甜美，会挥着小拳头打在你的味蕾上，欲罢不能。

终于有机会买到了新鲜的黄桃，吃到了向往已久的味道，却全然感受不到吃罐头时的肆意快感，才发现自己如此需要不健康食品给自己带来的快意，就像你对我说不要喝酒，不要吃辣，不要吃高胆固醇，不要巴拉巴拉，但谁来拯救我幼年时幸福味道，我的重口味神经？就像盖茨比的小绿灯，黄桃罐头就是我回望童年的望远镜，都模糊得看不清楚了，但短暂的美好还是觉得它真是了不起。

我很喜欢日剧《大川端侦探社》第一集里的黑社会老大，病入膏肓的老人固执地喜欢年轻时在小摊上的馄饨，让手下不计代价地寻找，结果发现那味道其实是味精兑出来的，却也在人生终点时吃得甘之如饴。味觉是我们记忆功能的一部分，通过舌尖而直接控制大脑，和看一幅画、听一首音乐没什么区别。

反过来说，黄桃之所以做成罐头，也是因为它味道鲜美却不易保存，只能在玻璃罐中保留完整的形状和滋味，易碎的黛西就是个黄桃罐头，已然不新鲜不营养，盖茨比却非要倔强地打开来寻找自己的过去，试图发现一个黄桃罐头的理想国，没尝过那滋味的人会觉得无关痛痒，但他却愿意为之毁灭自己。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HUBLOT 经典融合德维恩·韦德腕表

采用抛光黑色陶瓷表圈，表壳直径 45 毫米，整体设计以具备 NBA 迈阿密热火队当家球星德维恩·韦德领袖风范的红色、黑色以及奢华金色为主，表盘 3 点钟位置的小秒盘巧妙地融入了韦德的个人 Logo，6 点钟位置还印有金色韦德签名。HUB1155 自动机械镂空计时机芯，约 42 小时动力储存，防水性能为 5 个标准大气压或约水下 50 米。



Alfred Dunhill 2014 秋冬高尔夫 Links 系列

该系列产品配色体现了典型的英伦风格特征，配色以英国邮筒正红色、深夜蓝和赛车绿为主，包括可拆分成三件不同衣服的巅峰之旅全气候夹克。同时该外套具有出色的防水性能，足以适应多变的气候。采用 3XDRY Schoeller 技术的版型贴身，包括吸湿排汗的千鸟纹透气舒爽休闲裤和 Cashtech 针织衫。

Fitbit 可穿戴式设备

作为美国可穿戴式设备研发后起之秀的 Fitbit，一口气推出了三款全新产品：Fitbit Charge，Charge HR，Surge。Fitbit Charge 用以监测反馈穿戴者的睡眠质量，运动卡路里消耗量以及每日营养摄入量；Charge HR 是一款专业的运动模式制定与监测设备；Surge 则是一款针对苹果 i-watch 的智能手表，采用 OLED 显示屏幕，支持蓝牙功能，超长待机时间达到 7 天。



三星智能相机 NX3000

搭载 2030 万有效像素 APS-C CMOS 传感器，2030 万高像素展现丰富的影像细节，APS-C 传感器比其他小型传感器拥有更明显的背景虚化效果，最高 1/4000 秒快门速度，支持 5FPS 高速连拍，配备了便于自拍的 3.0 英寸上翻式显示屏和眨眼拍照功能。





索尼 S9000B 第二代弧面屏液晶电视

全新 4.2 声道多角度扬声器（MULTI-ANGLE LIVE SPEAKER），侧面 LED 装饰灯，4.2ch 环绕声开启及影院 / 音乐 / 运动 / 游戏模式，主动式 3D，4K 迅锐图像处理引擎 PRO（4K X-Reality PRO），特丽魅彩显示技术（TRILUMINOS Display），支持 HDMI 2.0，可播放 60 帧每秒的 4K 影像配备 HEVC 解码器，支持 USB 接口 4K 硬解码。

John Lobb 2014 年度限量款 St Crispin 皮鞋

以西方传统制鞋与皮革匠保护神 Saint Crispin 为主题制造的年度限量鞋款，优雅的 7000 鞋楦融合了素面鞋头之牛津鞋款设计，以“阿德莱德”切割手法制作而成。该款独具风格的牛津鞋，鞋面与鞋身采用整片皮革设计，鞋腰无缝衔接，鞋底与鞋腰自然流线过渡；其鞋头盖与鞋面由三条等距的原色缝线独立缝制。





Gucci 男士 Flora 花卉系列背包

于 1966 年诞生，向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莉致敬的 Flora 花卉图案已经不再是女士系列的专利。创作总监弗里达·贾娜妮（Frida Giannini）特别携手加拿大艺术家克里斯·奈特（Kris Knight），将经典的 Flora 花卉图案印刷于男士行李箱、背包等产品的表面，以回旋萦绕的夜间植物为主角。



珐琅吊坠

Jewelvary品牌的Cloud珐琅系列吊坠以一圈钻石围绕珐琅之彩，提供了18种色彩选择。珐琅直接在金底上烧制，温润饱满的色彩得自低温珐琅的烧制方法。

恒定动力

迪菲伦恒定动力陀飞轮高级珠宝腕表，色珍珠母贝表盘直径43毫米，恒定动力调节系统让动力保持在最稳定状态。腕表配置手动上链机芯，动力储备显示器用红、黄、绿三色显示，芝麻链设于发条鼓与12时位置的动力储存器之间，负责将动力由发条鼓传送到储备显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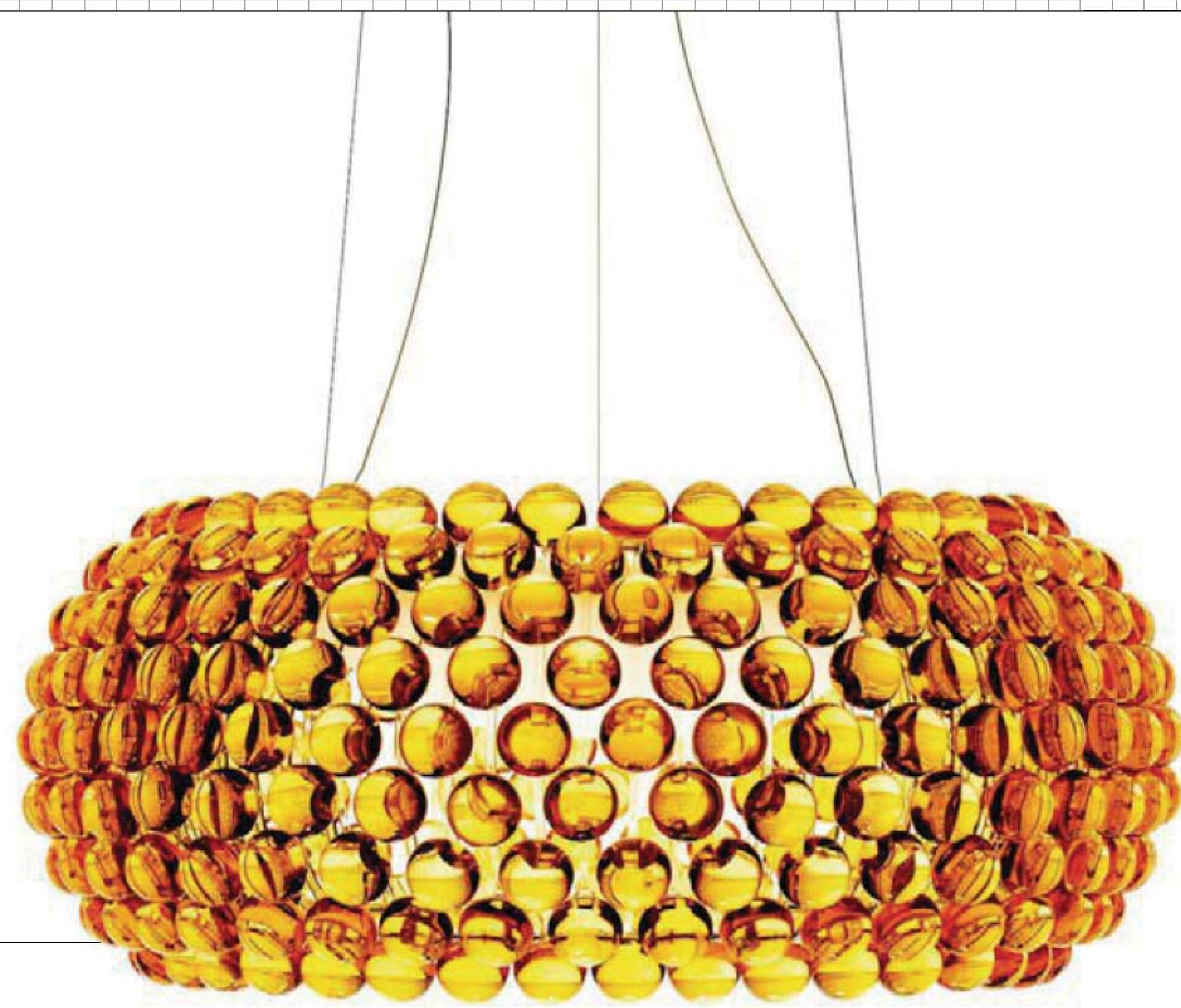
麦当劳包

Moschino把麦当劳标志鲜明的红色和黄色作为设计元素，叠加在香奈儿的菱格链条包上。设计师以这两者的结合表明时尚与快餐之间的相似性，并制造出一个新的潮流符号。



金黄色圆珠

Foscarini 的 Caboche 吊灯由透明的聚甲基圆珠构成，如同一串串珍珠项链，规则地排列在内部玻璃扩光器四周。金黄色的圆珠不仅让灯光穿透，还可以形成镜面一般的美丽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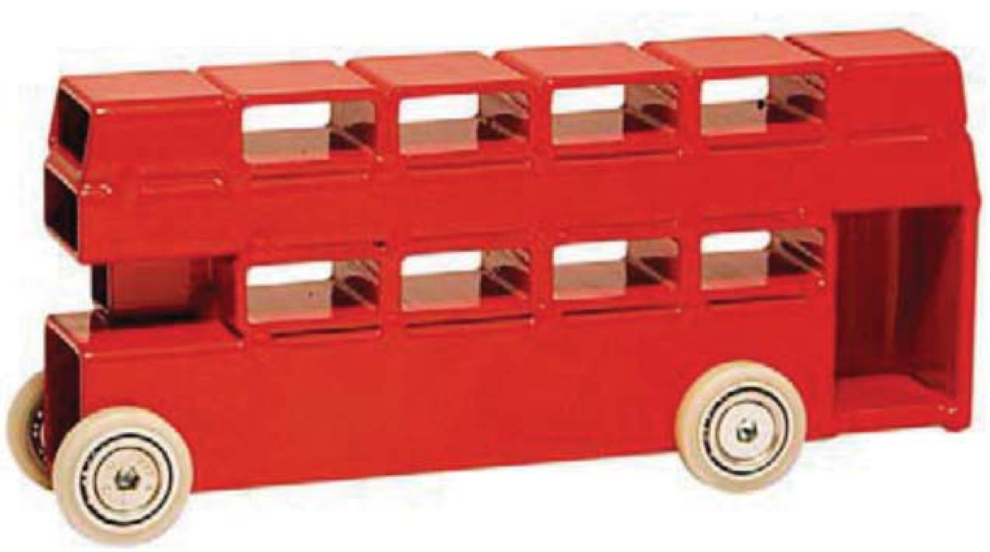
折叠咖啡桌

伦敦设计师塞缪尔·威尔金森（Samuel Wilkinson）为意大利家具品牌 EMU 设计的 Grace 系列折叠咖啡桌，他的灵感来自 20 世纪早期的轻质木制家具。压铸铝材料的折叠咖啡桌具有简单的自锁机构，腿被设计成适合叠放整齐的造型，跨越了室内和户外家具的界限。

Tub 椅

今年是汉斯·韦格纳诞辰 100 周年，丹麦家具公司 PP Möbler 把他的 Tub 椅投入生产作为纪念。韦格纳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设计出 Tub 椅的原型，他融合了当时新兴的胶合板成型技术，并在后背添加了一个角度调整机制来提高椅子的舒适度。





金属模型车

弗洛里斯·霍弗斯（Floris Hovers）为 Magis 设计的 Archetoys 系列，总共 17 种不同尺寸的金属模型车，用工厂制造的金属部件手工组装而成。这是一些人们熟悉的电动汽车原型，包括救护车、消防车以及著名的伦敦红色双层巴士等。

大时代的写家

人民艺术家老舍

文 李伟

从丹柿小院到太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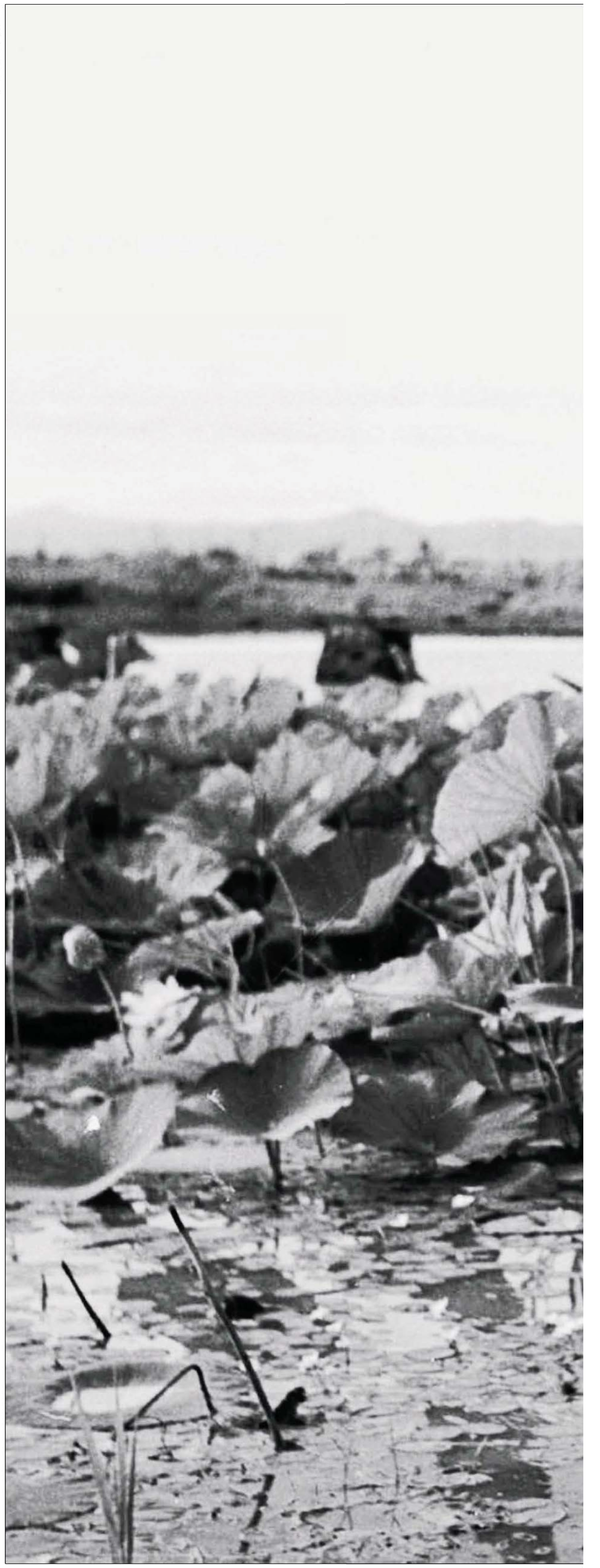
老舍的故居，就在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王府井向北，再往西一拐就是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廼兹府大街。丰富胡同就在灯市口西街路北，胡同很窄，把口的一座小院，便是老舍的家。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归来后，买下了这座院子，在此居住了17年。他一生颠沛流离，晚年归乡，这里是他除出生地外，住得最久的一处。

小院的门并不是开在中轴线上，而是开在正房方向的东南角。据说，风水学要求按照八卦"巽"的方向开门，取"坎宅巽门"之意，"巽"就是东南方向。院子总共300余平方米，院内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当年亲手种下的，因此被他称作"丹柿小院"。北面三间为正房，两边各有一间耳房。东面的耳房就是老舍的书房，书房内的光线很暗，书桌对着门，背后是嵌在墙里的大书架。书桌是硬木的，桌面嵌着青色大理石，上面放着文房用品，其中有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冯玉祥将军送他的圆形玉石印泥盒，有他收藏的清朝文人李渔的砚台，上面刻有"笠翁李渔书画砚"字样。还有一个黄铜做的烛台，似乎是美国带回来的，烛台上面有一个打棒球的小人雕像。桌面上当然少不了月份牌，日期还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阴历八月初九"。

40多年前的这个日子，老舍离开了自己的家，再也没有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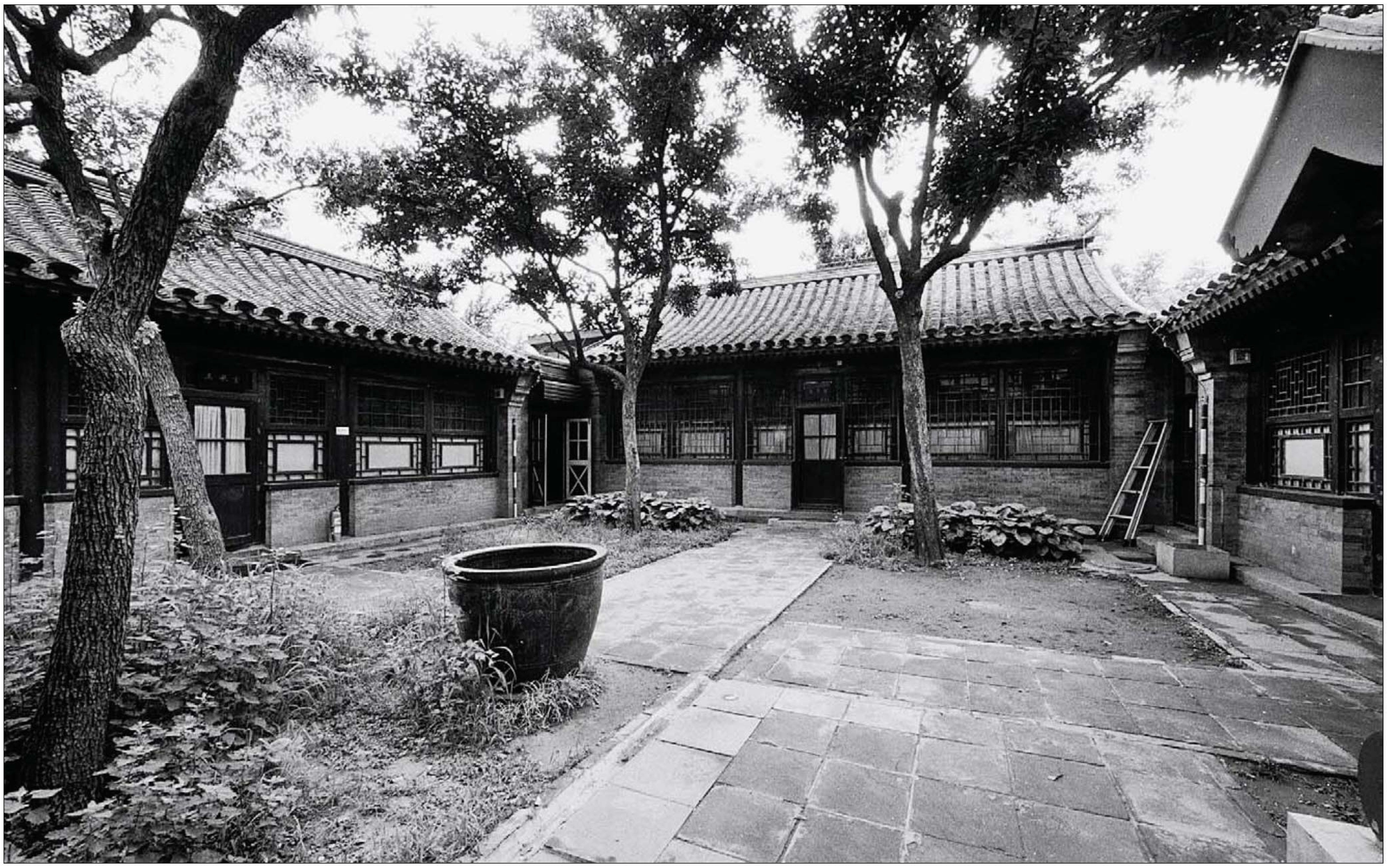
从积水潭向北，穿过今天的二环路，在积水潭桥的西北角就是原来的太平湖，那是老舍的目的地。这个小湖早被填平，成为地铁公司的"太平湖车辆段"，透过围墙可以看到里面的蓝色地铁机车。这里比起积水潭来野趣更浓，当时水面有迎风摇曳的荷花，水边芦苇繁茂，时有野鸭、水鸟从苇丛中飞起。从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出发，走到太平湖约8公里多。老舍腿脚不好，一路上走走停停，要花上大半天。在湖边的长椅上，他呆呆坐着，直到天黑后，才站起身走进了平静的湖水。没有人看到他是怎样被淹没的。

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写到过240多个北京地名，却从未写过太平湖，这似乎是他留给自己的私属地带。上世纪30年代，他


（中新社/供图）



1958 年盛夏，老舍先生在北京一处荷花池边小憩



老舍在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家——“丹柿小院”

曾为母亲买过一处房子，就在西直门内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了一道城墙。就在同一时期，他写了一首名为《慈母》的诗：

听着，虔敬的，我的慈亲，
就是它们的圣母，名字叫中国！
我唤着它的圣名，
婴孩挨着饥饿，
把我的血还洒在你的怀中，
我将永远在那儿欣卧；
年年的春燕，岁岁的秋虫，
将唱着你的儿歌，告诉我：
睡吧，儿，还在母亲的怀中，
你曾爱过母亲，她还记得，永远记得！

母亲和中国，占据着老舍心中最崇高的位置。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此时的中国，对他而言，也已经面目全非。就在他自杀前一周，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开始在北京发起，挂了70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砸烂，店铺里山水字画被撕毁；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瑞蚨祥绸缎庄内的宫灯、唱片、字画、黄历、美女商标等统统被捣毁，店名改为“立新”；王府井四联理发店的镜子被贴上了白纸，理发照镜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8月23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市文联办公室，把老舍和多位艺术家拉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毒打、侮辱。戏装、书籍被点燃，火焰冲天。那天晚上，老舍被接回时已是遍体鳞伤，第二天他便走向了太平湖。

“抑郁寡欢的孩子”

“我赶上了大清朝的‘残灯末庙’，至于我们穷旗兵们，虽然好歹还有点铁杆庄稼，可是已经觉得脖子上仿佛有道绳子，越勒越紧。”1961年，老舍才开始动笔写他的家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他这样讲述埋在内心多年的家史。

1899年2月3日，老舍就出生在一个穷旗兵的家里。刚出生时，母亲就昏死过去，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揣在怀里才免于冻死。那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也是狗年。姑母给他起了个外号“小狗尾巴”。他的父亲姓舒叫舒永寿，因临近春节，便给小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舒庆春。

老舍后来说：“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有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才不过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掺着两小块假的。”大清入关200多年，到了他出生时候，已是国运颓废，下层旗兵多已沦为赤贫之家。老舍就出生

于这样的家庭中，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生他时已经41岁，父亲的钱粮只够勉强生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舅舅家的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老舍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这个粮店等死。二哥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道："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的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父亲死后，养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她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小说《月牙儿》中，老舍有这样的描写："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去饭。……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这些都是真实的写照。

彼时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到了三伏天，夜里下雨，全家只能在屋里坐到天亮，害怕被坍塌的房子埋起来。冬天则八面透风，白天连水都会冻在缸里。至于吃，一天通常只有两顿饭。老舍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辛苦一年，才勉强吃上一顿饺子。老舍没有玩具，只有撕棉花玩。小说《牛天赐传》中，少年牛天赐的玩具也是棉花。

老舍的一家，祖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很偶然机会，他受善人刘寿绵的资助上了私塾和小学，随后又考上了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嫂子卖了两个结婚时的箱子才凑齐了10元钱的入学保证金。6年后，不满19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

在中国近代作家群体中，老舍是少有的穷人出身，且生活在他周围并与之来往的，也多是在贫困中挣扎的毫无希望的下层百姓。对贫穷的刺痛感，是他体验世界的起点，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在晚年创作的《神拳•后记》中老舍说："在精神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

"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话，用于老舍则意味着更多的复杂。他不仅见识了世人的真面目，也体会到了满民族的衰落与歧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作为满族的旗人也成了和统治者一起被驱逐的对象。老舍在新中国曾经说过："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话剧《茶馆》中也有"旗人也是中国人"的话，代表了普通旗人内心的委屈和精神上的另类感。他们爱国，他们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却在清王朝覆灭后承担着某种程度的敌意对待。

辛亥革命断了旗人的生计，京城里大部分满人跌入贫民阶层，一部分当车夫、茶坊、裁缝、木匠、巡警。更可怜的，便是始终没有找到职业的一群，他们四处流浪，敲着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行乞、摆茶摊儿，还有一部分沦为妓女。就像话剧《茶馆》中松二爷的叹息："想起来啊，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在《小型的复活》中老舍这样描述自己："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安全感。

1949年前，老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满族身份。30年代中期，在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中给父亲的身份是"在外做生意"，"死在了外乡"；40年代在回忆文章《我的母亲》中依然只是如此简略，"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老舍说他在"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舒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茶馆》中有一句台词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

"写家"的态度

老舍19岁成为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3年后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他说自己："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

1922年，老舍辞去了劝学员职位，不久后，他在西单附近缸瓦市基督教会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为了学好英文，常常去燕



1926 年，老舍在伦敦寓所。1926~1928 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的结婚照（摄于 1931 年）

京大学旁听课程。后来经易文思介绍，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把它当作外语学习的捷径。看得多了，便想自己也提笔试试身手。故乡风物，陈年旧事，就像一幅幅图画涌上心头。他在谈及何以开始写小说时写道："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老舍写作的师傅，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第一部《老张的哲学》，便是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玩票儿"的成分更大。然后是《赵子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他在国内当教师和教育官员时的所见所闻。随后，他又怀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写下了《二马》。老舍最初的文学尝试都取得了较大影响，张爱玲就曾说，她是看着《二马》长大的。

1930 年，当老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著名作家了。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利用暑假写小说。他为上课而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持反对态度。他说："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达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为什么理做宣传。""思想既有一定，那么文人还有什么把戏好耍呢？"针对二三十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革命文艺思潮，老舍在理论上回应说："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

他对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许多粗糙生硬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是抵触的。1950 年，他曾真诚地回顾当年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我看见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他还说："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美好，好是好了，怎奈天下没有这么完美的人。"

他说："文学革命也好，革命文学

也好，没有这颗心总不会有文艺。”

上世纪30年代，老舍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去写。就像“祥子”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老舍也固执地想当一名自由作家，但却不得不考虑养家的薪水。为了决定是否辞职，他还专门跑到中国出版业的重镇——上海去考察一番。当时老舍为十几个刊物写小说，他的《小人物自述》就发表在天津的《方舟》月刊上。那是一本由生产“抵羊牌”毛线公司办的妇女生活杂志，主要内容是教授如何织毛衣、如何育儿。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他在抗战前的小说中，除了《离婚》外，都是先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样一部书至少可以卖两次钱。为了应付众多约稿，他不得不把长篇小说的创意拆散，写成短篇小说，由批发改为零售。

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置身事外，只做个旁观者。左右两大文坛领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幽默”风格都评价不高，老舍也不在意，只是写了一篇《幽默的危险》聊作回应。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卓然成宗。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趋奉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相对而言，他更喜欢结交出版家。良友公司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就是老舍往来30多年的好友。抗战结束后，他俩还合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是老舍的理想之一，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几个侄子去印刷厂当学徒。

似乎是故意表明姿态，老舍始终坚称自己是“写家”，而刻意与“作家”称谓划清界限。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而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他说自己因为自幼穷困而“孤高”，便喜欢独自沉思。抗战爆发前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根植于他的穷人出身——“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老舍得以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鄙夷自己所认为错的，疏离于主流文坛，不愿与谁为伍。这种精神状态，他后来称之为“独立不倚”。解放后，老舍借悼念好友罗常培先生，谈到了“独立不倚”对他的影响——“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只不过那时的立场，已经换成了自我批判。

国家与个人

1936年暑假前，山东大学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开始了学生运动。老舍借此机会，正式辞去了教职。这次，他“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门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从1936年7月算起，老舍的自由作家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两大代表作。到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军炮舰集结胶州湾，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专心写作的事业，折回济南，又在齐鲁大学做了3个月的文学教授。到了11月，济南也待不下去了。因害怕被捉去做汉奸，他便拎了一只皮箱，告别了妻子儿女，开始了流亡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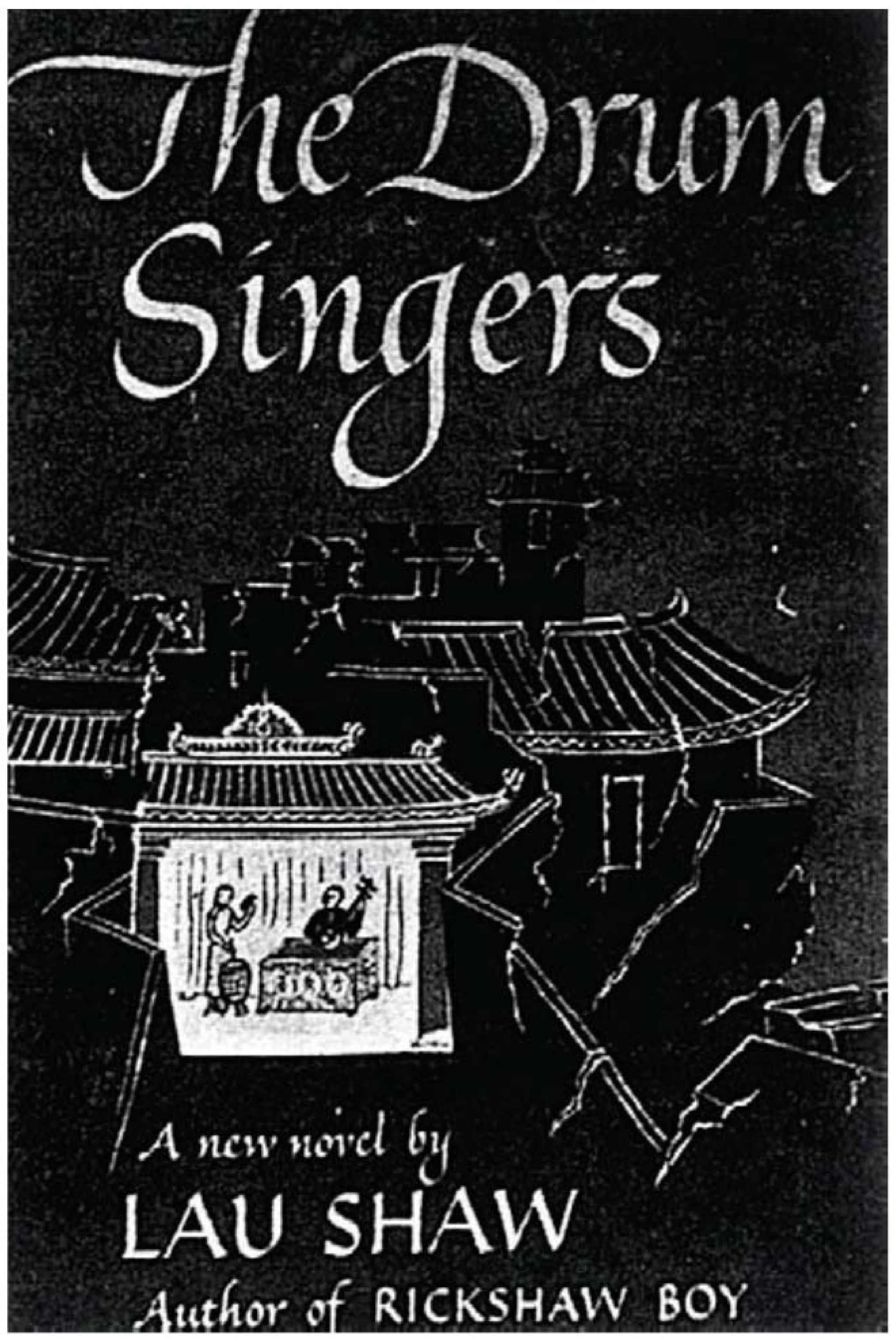
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个人的悲喜就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幽默、自我，甚至忧郁、痛苦、焦虑，转瞬间一并解体。就像鲁迅在1936年所写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

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这在民众的眼里即属天经地义，在具备救国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老舍当然也不例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对臧克家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啊！……种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1937年7月前，老舍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此后，他成为了千千万万救亡者中的一员。他从一个自由撰稿人，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

被改变的，还有写作。战争爆发后，他就停止了《病夫》和《小人物自述》两部长篇的写作和连载，全身心投入抗战文艺创作。老舍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他从来是单纯的小说家，连诗都极少写。而今，“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

1938年，夏衍执笔发出了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展望》的“檄文”：“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

> “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



老舍于 1949 年初在纽约完成的小说《鼓书艺人》英文版



1987 年，小说《鼓书艺人》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

这个定义的‘艺术至上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为汉奸的一种了。”老舍、郭沫若等 19 名作家在这篇文章上签了名。

老舍的爱国精神经过抗战洗礼，升华为国家至上的思想，他的话剧《桃李春风》中，辛永年对儿子说：“在作战期间，一个军人应当什么也不爱，而只爱他的国家。”《四世同堂》在写到祁瑞全时说：“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国家。”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在抗战时期，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与艺术追求。他表示：“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

人民艺术家

抗战胜利后，老舍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为了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他又在美国多停留了两年半。老舍并不喜欢美国，可是，“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

在美期间，除头一年以游历为主，以后，都在勤奋写作中度过。在美国，他完成了《四世同堂》最后一部的写作，以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了英文。

等老舍放下写作任务回国后，已经是 1949 年底了。他直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很快，他便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发自内心地热爱新政府、新社会。他看到身边的底层人民翻身过上了好生活，“祥子”们不再沦为“走兽”，“小福子”们也不再为生存而出卖肉体。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毕竟充满了希望。他的归属感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

在“狂喜”之中，老舍开始全身心地以他的才华服务于新中国。回国投入新时代后，他总共写了 40 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和诗歌。此时，对老舍而言，写作已经不再源于自身的兴趣和快乐，而是被不断燃烧的政治热情所推动。他一次次地说：“政治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政治热情使我们欲罢不能地前进”；“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

从“三反”“五反”，到制定宪法、推进普选、妇女解放、婚姻法，到反对美帝国主义，他都不遗余力全身心地投入，将自己奉献给这个时代。但老舍始终不满意于他那些作品，他在回顾性文章中，一遍遍认为写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生活不够，不了解“新生活”，自然写不了“新人物”。

新中国的 17 年，作为一个以反映人们生活为己任的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直在真诚、执著地思考自己与人民的关系，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为此苦恼，为此焦虑，为此孜孜以求。遗憾的是 1966 年爆发的“文革”，最终导致了他的含屈离去。

老舍一生的道路，也许是上一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自己道路的一个缩影，他不同时代所留下的那些供我们缅怀的文字，提供了我们一个思考的契机。


联想推荐使用Windows。
lenovo FOR THOSE WHO DO.
YOGA
致·极致
联想YOGA 3 Pro笔记本
813个零件 纯手工 唯美表链式转轴设计
笔记本模式
站立模式
帐篷模式
平板电脑模式
intel inside CORE m
英特尔®酷睿™m
薄|智|美
联想YOGA 3 Pro笔记本 美倾心 艺夺目
■ 智能英特尔® 酷睿™ M70处理器
■ Windows 8.1 中文版
■ 8G/4G内存，512G/256G/128G固态硬盘
■ 轻1.19千克，薄12.8毫米(最厚处)
■ 由813个零件构成，纯手工组装，唯美表链式转轴设计
■ OGS触控技术，屏幕分辨率3200x1800
■ 屏幕采用康宁第三代大猩猩玻璃
■ Harmony智能多模应用，智能推送，智能设置
轻松工作，纵情娱乐，我有英特尔® 酷睿™ M 处理器
联想网站:www.lenovo.com.cn 联想官方网上商城:shop.lenovo.com.cn 销售热线:400-822-2008 服务热线:400-100-2000 详情咨询联想专卖店或联想授权服务站，产品图片仅供参考，请以销售实物为准。联想服务，您的数字生活好管家！2年整机全保服务，全面保护，意外无忧！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Intel Inside、英特尔酷睿和Core Inside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


1946 年，老舍（左）与曹禺同赴美国讲学。图为老舍在耶鲁大学演讲后两人合影

向左转：老舍在美国

从 1946 年 3 月到 1949 年 10 月，老舍在美国生活 3 年半。这一阶段，国内政权易手，天翻地覆。老舍自己的思想经历了急遽的变化。他逐渐放弃了自由作家的身份，准备回国，融入一个新的时代。

文 / 李伟

“放青儿”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流亡于重庆的文化人也开始陆续回家。但老舍一家仍客居重庆的北碚，他无家可回。

来重庆前，他的家在山东济南，早已被日军飞机炸毁。母亲也在战争期间病逝于北京。老舍是自由职业者，不愿回到南京去，说那儿没他的事。虽极想回北京，但去了也无事可干。于是，利用难得稳定的时间，他决定留在重庆，继续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另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他需要处理“文协”的善后事宜。

老舍并不从“文协”拿薪水，一家生活全靠卖文为生。他很穷，居无定所。无论酷暑寒冬，总是在那个缺少阳光的小房间里，日复一日埋头写作。老友罗荣培来了，他请客吃饭，就要去当掉身上的袍子。因为营养不良，他患上了贫血，经常头晕而无法工作。香烟都只能单支地买。

好友宁承恩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老舍的窘况：“他的小说卖出去的时候法币还值点钱，两三年后币值跌落不堪，等法币到了老舍手中，那些法币就买不了几碗面。老舍一辈子穷。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试’。但是几十年没人能接受他的挑战。”

这一年的 10 月，在绝大多数会员的要求下，“文协”决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继续存在下去，老舍暂时还无法卸任。“文协”成立于 1938 年 3 月，在武汉，当时冯玉祥将军和周恩来共同推举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文协”是当时最大的全国性文艺组织，会员囊括了左中右各类文人。为了协调国共之争，协会不设主席和副主席，因而老舍也是实际的负责人。老舍之所以走上前台，一方面在于他的知名度与文学地位，更重要的，则是其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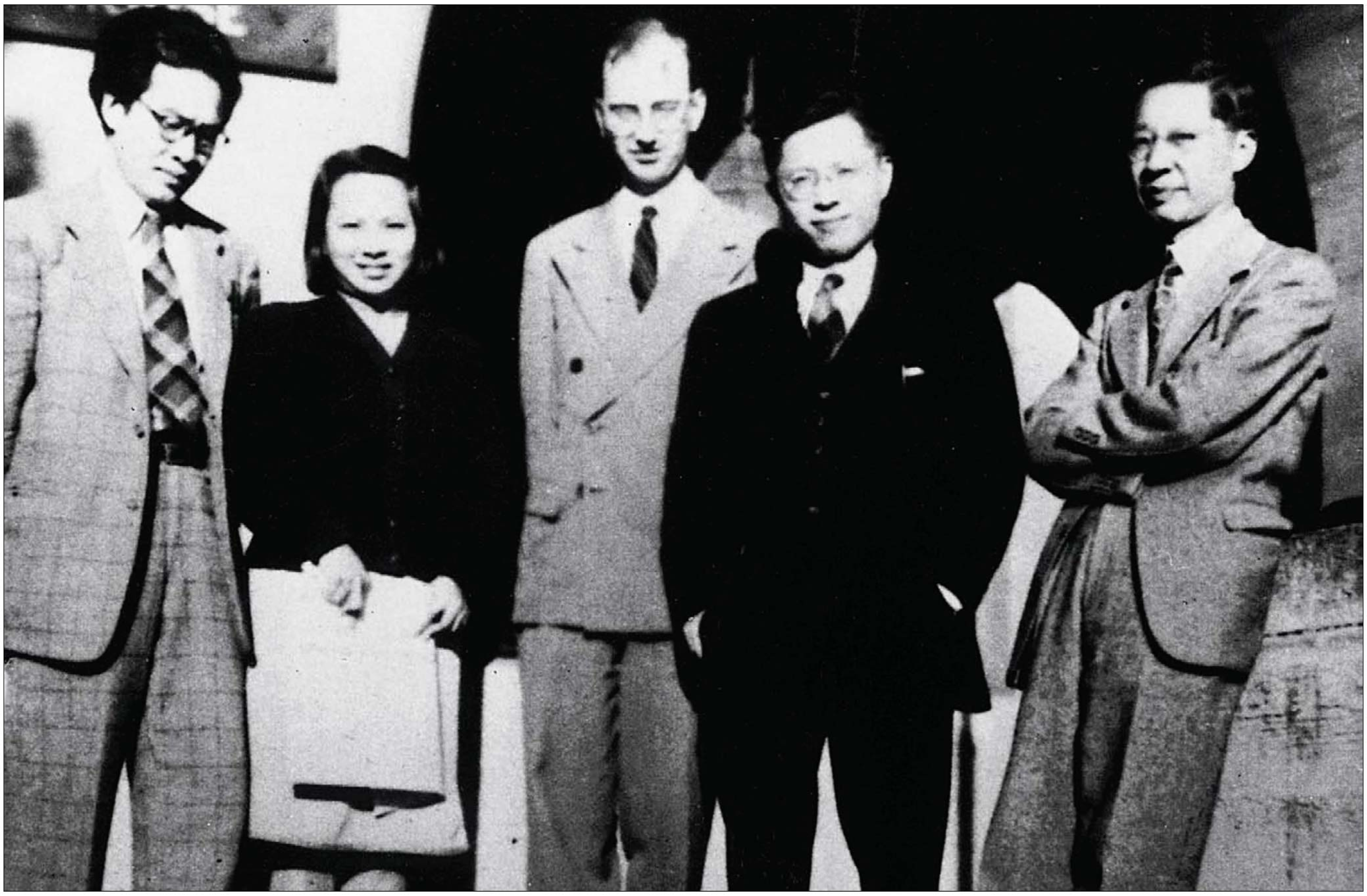
在战后的重庆，老舍一面写小说，一面继续以文化界领袖的身份阻止内战，推动和平、民主建国。他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 30 多位文化人一道，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上签字，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废止党化教育，取消豢养特务政策。同时，他还联络会同众多作家，通过赛珍珠向美国作家发出公开信，请求他们尽力阻止美国卷入中国内战。

就在致信赛珍珠后不久，1946 年 1 月，老舍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行的还有剧作家曹禺。

老舍与曹禺所参加的项目，全称“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归美国国务院负责，其肇始于 1940 年，最初面对的只是拉美国家。“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强中国抗战援助，首次于



重庆白象街老舍曾住过的小屋



1946年6月，老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与友人合影。左起：陈士襄与夫人，汉斯，曹禺和老舍

西半球以外，特辟对华关系项目，在教育、公共健康、卫生、农业和工程学诸领域，给学界人士以切实支持。

1942年9月，汉学家费正清代表美国政府，经印度和昆明抵达重庆，直接介入对华文化关系规划。他认为："中国人会像日本人曾做过的那样，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当然，要把中国变成跟美国一样，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且也不可能。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美中两国之间建造一个共同的立场。"

正是为了"共同的立场"，从1943到1947年，共有26位中国知识分子，分四批受邀赴美。前三批参加者主要是知名大学教授，比如金岳霖、费孝通、陈序经、杨振声、林同济、梅贻宝、严济慈、陶孟和等。唯独最后一批，也就是1946至1947年的入选者，不光有张孝骞、侯宝璋和赵九章等五位学者，另外还有三位文艺家，即老舍、曹禺和叶浅予，他们分别代表中国的小说、戏剧和美术界。

文艺家受邀请，也是费正清的主意。他说："美国人在系统地阐述我们美国文化的价值准则，即我们现在称之为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就在美国向老舍发出邀请前，苏联已经邀请了郭沫若、丁西林等左翼知识分子访问苏联。所以，美国对老舍的邀请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老舍的自由主义身份使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他是公认的"自由主义"作家。他曾公开多次表示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法国研究者保尔·巴迪写道："战前中国的作家中拒绝听命于党派的并不很多，但老舍是其中之一，他竭力捍卫自由的价值：如人类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当时，美国步苏联后尘，面对的只能是中间派，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老舍。

选择老舍很可能也是出于费正清的偏爱。老舍之子舒乙，曾经受斯坦福大学之邀访问美国，探寻老舍在美国的足迹。他在美国主要图书馆中，找到了大量老舍的书籍。1949年以前的老版本，美国收藏了133种。其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就收藏有大量抗战时期的老舍书籍，不少是在重庆用土纸印刷，这些书都出自费正清之手，上面有他捐赠的标志，是他当年由重庆收集带回美国的。还有一些是老舍的赠书，署有老舍的签名，也就是说，费正清在华期间专门研究过老舍，熟

悉他的作品。

在费正清的专著《美国与中国》中，他介绍中国文学，推荐 11 部译成英文的中国著作，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选集，其中老舍著作所占比例，远在他人之上。5 部古典文学中，《金瓶梅》的艾吉敦译本，是老舍在伦敦当老师时，帮助翻译而成。6 部现代文学作品中，和赛珍珠的《大地》并列的，就是《骆驼祥子》。王际真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里，所收老舍也最多，包括 5 个短篇。以余英时的观点看，费正清这部书，是“一部销行很广、影响很大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国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因而也可以说，老舍能进入美国文坛，费正清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实，在老舍赴美前一年，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已翻译成英文，由雷诺·希区柯克公司（Reynal Hitchcock Co.）在美国出版，被选为“每月畅销书”。老舍虽在国内穷困不堪，但在美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

《骆驼祥子》的翻译者是伊凡·金(Evan King)，原名罗伯特·S. 沃德(Robert S.Ward)，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工作。他在翻译过程中，却违背了老舍的意图，把悲剧的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祥子和小福子都活了下来。翻译者还杜撰了一些新的情节，在小说结尾，临刑的清华女生，一路高呼着“出版自由”、“打倒秘密警察”、“反对奸诈政客出卖正义”、“驱除政府腐败”和“言论自由”等口号。在这部盗译的《骆驼祥子》中，美国人似乎从中感受到了“美国民主”的意味，将老舍幻想为“自己人”。但遗憾的是，无论费正清还是其他国务院官员，都辨识不出这些进步女生，还有她的口号，并不属于老舍，而是出自翻译者，也是他们的外交官同事沃德之手，其目的在于逢迎本国读者的趣味。而当时老舍也并不了解，他自己的作品已被篡改。

就老舍而言，他对这次美国之行充满了期望。在临行前他对《上海文化》杂志的朋友王敬康谈起此行的目的：“第一，希望能积极沟通中美两国的文化，以促进邦谊。其次，希望好莱坞在采取他的小说摄成电影时，他希望收集一笔款子，能对国内文化人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在老舍出发前，出版商雷诺·希区柯克已经答应支付《骆驼祥子》的版税，同时已有电影公司考虑将其搬上银幕。

另一方面，老舍内心深处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期待，他也希望中国能真正走上民主之路。

近年来，马里兰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老舍呈送给美方的“访问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书中，老舍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中国虽有上千年文明，“却在民主制度方面，仍是一个刚刚蹒跚学步幼童的民族”。所以，“在艰辛的国家复兴和建设中，我相信，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但需要吸纳的则更多……我衷心期望，能把在美国学到的一切，传递给我的同胞，对促进两国互相理解，略尽绵薄之力”。

老舍离开中国前写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民主世界》，发表在重庆的《民心半月刊》上。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小镇——金光镇，影射他所居住的北碚。官僚们虽然“曾到英美各民主国家考察过政治”，但他们的民主只是一个幌子。他们在镇上推行他们的“法律”和“法治”，明确姨太太在家中的地位，制定“法律”规定不支付房租。老舍讽刺地写道：“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只发表了最初 3 章，便戛然而止，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

1946 年 3 月 4 日，老舍和曹禺乘坐美国“史各脱将军号”运输船离开了上海。当时《上海文化》杂志称赞老舍是：“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作家。”

美国的隔阂

海上漂泊了 16 天后，3 月 20 日，老舍与曹禺抵达了美国西雅图。稍作休整，他们经芝加哥，于 29 日抵达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确定了讲学和访问日程。在此后半年中，他们辗转了大半个美国，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

在华盛顿，他们受到了高规格接待，被安排在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来世礼宾馆（Leslie House）下榻。恰好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住在来世礼的甲宾馆，而老舍和曹禺住在乙宾馆，两人各住一室，周围环境幽雅，美国外交部还特派专人来招待他们。

当时《上海文化》杂志称赞老舍是：“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作家。”

4 月，两人抵达纽约，在车站受到朋友、翻译家乔志高（即高克毅）的迎接。他是第一个向美国文学界介绍老舍的人。当时“二战”刚结束，纽约战时畸形繁荣的气氛尚未消退，旅馆和公寓都非常紧张。乔志高考虑到老舍曾在英国生活过多年，随便把他安排在位于闹市中心、粗俗不堪的旅馆里去显然不合适。于是便在史丹霍饭店订了两个房间。这家宾馆位于第五大道 81 街，绿荫夹道，这里写作也没人打扰，会客也不失体面，过一条马路就可以去大都会博物馆参观。

过了几天，乔志高请他们在纽约



纽约近郊“雅斗（Yaddo）文艺创作中心”。1946 年 9 月 23 日老舍到达这里，并在此写作一个月

小有名气的广州茶园就餐。老舍说他们已经搬了旅馆，从史丹霍到了塔夫脱饭店。塔夫脱地处闹市，与静谧的史丹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舍直言相告，搬到塔夫脱，无非是因为房价便宜。美国国务院的津贴是有标准的，超标了便要自己付钱。而就在塔夫脱酒店门口，老舍还被骗去了 50 美元。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老舍和曹禺格外忙碌。他们见到了旅美的中国电影演员王莹，在王莹安排下与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座谈了两次。又经王莹引见，拜访了旅美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当时布莱希特正在写作《伽利略传》。

老舍还受邀在纽约附近的“雅斗（Yaddo）文艺创作中心”居住了三周。雅斗是一座大花园，占地 1 万多亩，花园的主人名叫萨拉托加·斯普林，热心艺术。他去世后，继承人便招待艺术家、作家来此创作休养。当时，日本作家石垣绫子也在此创作。她后来回忆，老舍刚来时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系着一条朴素的领带，“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教师”。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也正住在园内，她在撰写《朱德传》，因此也与老舍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经历了动荡的岁月，老舍难得有这样一段富足而安宁的写作时光。他每天起床后便在花丛中打太极，早饭后在属于自己的小书房内写作。傍晚，作家们则聚在一起，打球、散步、划船，共进晚餐。这是老舍在美国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在美国，老舍与曹禺的主要任务是讲学。老舍讲题为《中国的现代小说》等，曹禺讲《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老舍到美国后，很快感受到了巨大隔阂。美国人热衷于唐诗宋词和明清瓷器，对今日之中国文化知之甚少。《骆驼祥子》在美国做的广告，画面上是一个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辫子翘得高高的，这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老舍希望通过他的演讲改变美国人的偏见，但收效甚微。他后来对石垣绫子说：“如果他们都是想要了解中国的认认真真的听众，那当然很好，可并不是这样。长期以来的战争使中国人蒙受了多大的苦难，而且，至今这种苦难仍然还在继续呢，可他们却不想了解中国人的苦恼。”

如果说在赴美之前，老舍内心深处还有一些“美国梦”的憧憬，那么很快，这个憧憬便烟消云散了。到美国不久，他就在一篇题为《旅美观感》的广播讲话中，告诫国人：“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社会不安的原因，作为改进我们社会不景现象的参考。”

老舍和曹禺只去过南方一次，却给他们留下了难忘印象。新墨西哥州有专为印第安人圈设的“保留地”，他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老舍和曹禺下了车，围过来一大群土著人的孩子，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手里举着自制的陶器兜售叫卖。老舍见了心里很难过，对比美国北方白人富足文明的生活，实在难以相信这群孩子与他们同处一国。老舍和曹禺谈起了美国的起源，说美国自有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有掠夺和有残酷的压榨。

在华盛顿，老舍也为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感到愤怒。当时，他们邀请黑人作家去吃饭，但那家饭店门口却立着“禁止黑人进餐”的牌子。

更让老舍感到愤怒的是，他发现

《骆驼祥子》被译者伊凡·金肆意篡改，牟取暴利。伊凡·金还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偷译了老舍最满意的作品《离婚》，他让书中的“老李”和“马太太”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还加入了大量性描写。可笑的是，他不用老舍常用的英译名“Lau Shaw”或“Lao Sheh”，而改用意译“Venerable House”（古老的房子）。这让老舍感到了侮辱。更可恶的是，版权页上写着“版权归伊凡·金所有”，而封套上写着这本书是译者根据老舍所作《离婚》京话本（Pekinese）翻译改编而成。他故意不用“中文本”而说“京话本”，是为了混淆读者耳目，逃避法律责任。最后，老舍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夺回了自己的著作权，伊凡·金的“翻译本”只能在他自己的书店里销售。他又邀请旅美华人作家郭镜秋女士合作，将《离婚》翻译出来，取名《老李对爱的追求》（*The Quest of Love of Lao Lee*）。

版权纠纷，让老舍对美国社会的过度商业化感到厌恶。他在后来给楼适夷的信中倾吐了在美国的种种苦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

去美国的前几年，老舍曾写过一篇名为《牺牲》的讽刺小说，主人公是美国回来的毛博士。这位毛博士没有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他心中只有自己的感官享受，他带回的美国理想不是自由、民主和科学，而是“家中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院，男人都有女人，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七十以上，女人们好看，客厅里有地毯”。

老舍回国后还在话剧《人民代表》中塑造了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秦大辛，他是个洋奴和败家子，比毛博士还不如，既没有事业心也没有责任感，在美国只学了一身坏习气，是个没用的花花公子。

在他的作品中，美国是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温床和沃土。至少在生活方式上与他格格不入。

老舍的年轻时代，曾在英国伦敦担任过5年教师。老舍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强国，他主要是看它们的长处，寻找强盛的根源和成功的秘诀，以为民族振兴的借鉴。他在《二马》中通过人物之口这样看待英国的强大：“最可耻的事是光摇旗呐喊，不干真事……英国的强大，大半是因为英国人不呐喊，而是低着头死干！”又说：“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英国人厉害，同时也多么可佩服呢！”

可是在美国，他对西方的态度却发生了转折。就像他回国后再一次聚会上说：“美国人搞文化，就跟做生意差不多，一本书出版，先得在各方面大做广告，明星也能代你吹一通，戏院、药店……都得有些小广告，加上广播那才成。否则什么书都别想卖。”

这种视角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老舍赴美后，中国即陷入国共内战。而美国迅速介入，支持蒋介石政府，这更让老舍产生了对美国的不满和愤怒。曹禺后来回忆，某次，他们与美国朋友聚会，面对着众多来客，主人忽然问起：“现在美国如何可以帮助中国？”老舍直截了当答道：“你们政府帮助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撤军回国。”然后，他本人神色严肃，再不说话了。

1947年初，乔志高与老舍会同几位朋友在纽约125街一家小饭馆“上海楼”聚会。寒暄几句后，“他（老舍）忽然针对当天报上的消息，把正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魏德迈将军严厉地批评了几句”。乔志高说，“这是他很少同我谈到政治问题的一次”。魏德迈曾任驻华美军总司令，1947年7～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魏德迈为特使，率使团来华“调查”，要在国民党政府崩溃的前夜，急谋挽救危局的办法。显然，老舍对美国此时的“调停”十分不满。

“到人民中去的做法，是一种获得写作源泉的好办法。”这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相通之处了。

写作与翻译

1946年底，曹禺结束访问按计划回国。老舍则继续留下来，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这部小说是他在出国前已经规划好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都已经出版。分手前，老舍十分难过，他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曹禺上车，摇着手一直看他远去。

此后，老舍也由公开的社会活动，转为以个人创作、翻译为主。在赛珍珠介绍下，美国出版人大卫·劳埃得成为老舍的版权代理人。在美国，他是与老舍联系密切的人，直到老舍回国，他们仍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版税汇寄，一直持续到1952年。

在美国第一年，他们的生活费用由美国政府提供。但美国国务院的津贴不过一年，从第二年起至1949年秋离开美国止，老舍的生活即主要凭《骆驼祥子》英译本的版税及其他一些小说译本的零星版税借以维持。美国膳

宿费用昂贵，而版税是有限的，在其后长达两年半时间内，老舍孤悬异国，除埋头著译外再无其他收入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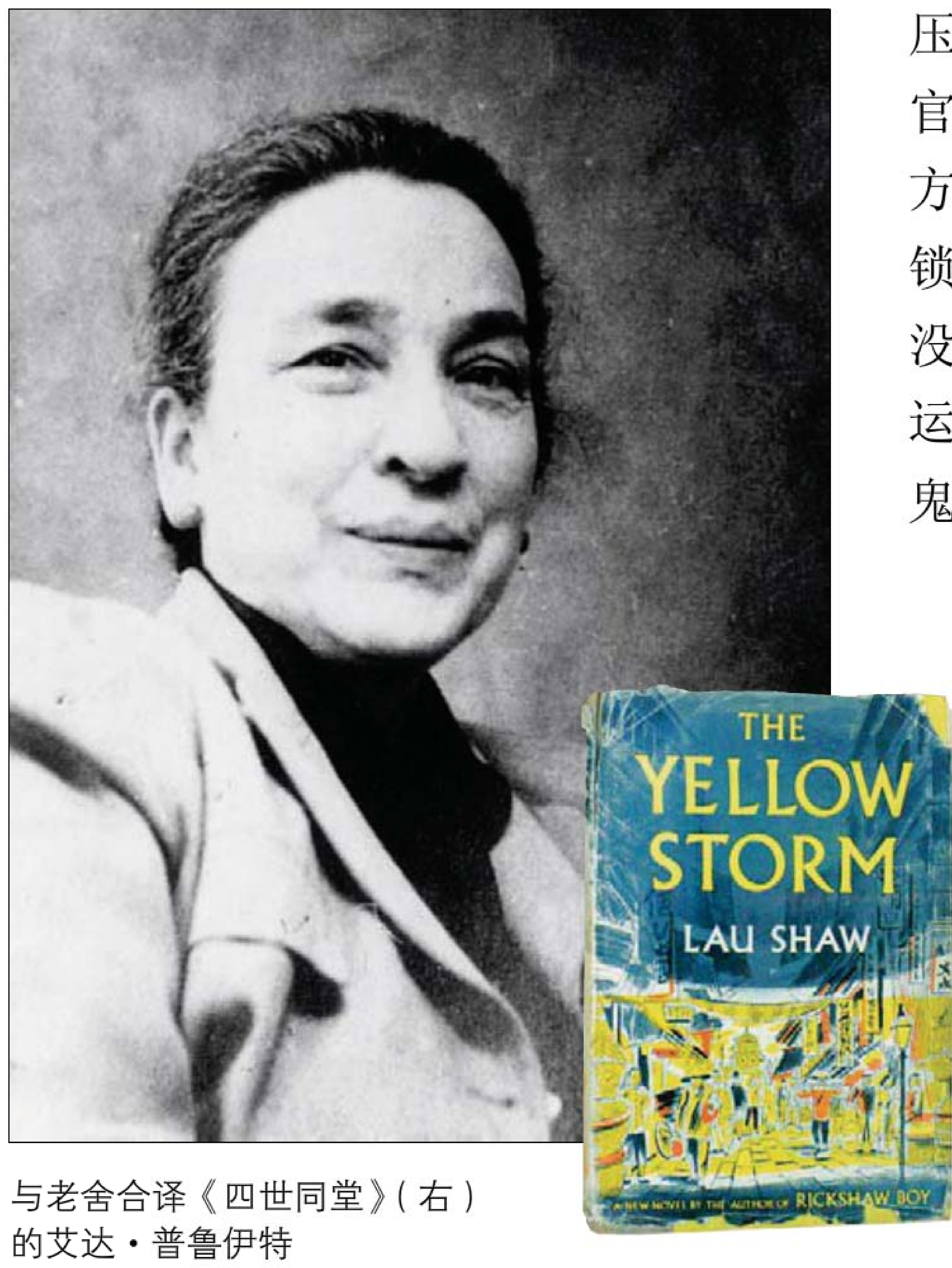
老舍在美国挣版税、“拿美金”的事情，在“文革”期间成为他的一大“罪证”。从经济角度看，美国的商业化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多少收益，虽然《骆驼祥子》成为畅销书，但大部分利润由伊凡·金拿走了。“文革”后，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女士曾受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她专门去看望了老舍妻子胡絜青，还向胡絜青提及原作者在美所得的稿酬，比起英译者所得巨款，实在微不足道。后来老舍还有其他作品在美出版，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美邦交中断，他应得的版税，“简直一无所得”。因此，当年上海有人散布谣言，说老舍净赚了许多美元，在美国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这使他十分气愤。

曹禺走后，老舍在纽约 24 大道 83 西街 118 号租了两间公寓房，一边埋头苦写，一边关注着国内局势，过着既紧张又十分孤单的生活。

在给楼适夷的信中，老舍透露了自己在美国的创作情况：“今年，剩下我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四世同堂》的第三部。”“……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从老舍和朋友往来的信件推断，1947 年第二季度至 1948 年底，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这是他生命中最长的一部小说，长约百万字，共分 100 段。老舍对这部小说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经说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他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

1948 年 3 月，老舍计划回国，但因《骆驼祥子》摄制电影的关系，经美国务院核准又续居了半年。当时，中国籍的好莱坞摄影师黄宗霑等人组织了制片公司，计划把《骆驼祥子》搬上银幕，要把它拍成一部富有民族



与老舍合译《四世同堂》（右）的艾达·普鲁伊特

风格的影片。老舍表示愿意以优惠条件给他改编拍摄权。黄宗霑特地从好莱坞回到香港、广州，还准备了一个到北平拍摄外景的计划，但由于内部分歧加上中国战事的影响，影片终于未能拍成。

其后，老舍又应美国出版家之请，协助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女士将《四世同堂》译成英文，普鲁伊特的中文名字是普爱德，出于商业考虑，美国出版商要求不出全本而是出缩译本，取名为《黄色风暴》。老舍特地请国内合作伙伴赵家璧先生，用航空快件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邮寄到了纽约。

《饥荒》的写作完成后，1948 年下半年，老舍又开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鼓书艺人》。在老舍众多作品中，这部小说名气不大，但地位十分重要，体现了他在转折时代的思想变迁。

与老舍塑造的众多形象有相似之处，故事的主人公方宝庆和她的养女方秀莲，是旧时代下层艺人的代表，“他们是人生大舞台上，受人拨弄的木偶”。他们逃难到重庆，既面临着侵略者的压迫，又时刻遭受着地痞恶霸、军阀、官僚、特务的压榨，凄苦无告。另一方面，他们则给自己也戴上了精神枷锁，“贱业”就像鬼魂缠身。但老舍并没给“苦人”安排“祥子”一般的命运，没有让他们像“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那般死去。他把时代潮流写进了小说——方宝庆父女开始了觉醒和反抗，他们意识到应该尊重自己和别人，把人当人，要成为一个“新人”，不该世代永远被欺侮。他们明白了新道理，接受了新思想，因而产生了新的渴望和追求。老舍还在书中塑造了革命者——孟良，他帮助方家妇女找到反抗与觉醒的意义。

小说的最后，抗战胜利，孟良和方宝庆重逢在滔滔长江之畔。孟良指着大江，饱含深意地说：“看这条江水里……有的鱼就知道躲在石头缝里，永远一动也不动”，“您的行为总是跟着潮流走”，“您跟她（秀莲）都卷入了漩涡”。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大江东去，前途未卜，虽然难免迷茫，但一个新时代毕竟要来了。老舍以一段京韵大鼓词作为小说的结尾——“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待停笔时已是 1949 年初，老舍的故乡北京刚刚和平解放。

写作完成后，老舍再度与郭镜秋合作将《鼓书艺人》翻译成了英文，1952 年由纽约的哈各脱·勃莱斯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在美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旧金山新闻》上一篇书评将老舍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老舍的成就，也许已达到像托尔斯泰那样伟大小说家的地位。在今天还健在的小说家中，在托尔斯泰那样的传统方面，老舍已远远地超过他们，正像托尔斯泰是永生的那样，几个世纪后，老舍的作品也会传颂于世。”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与《鼓书艺人》，是老舍在特殊时期、特

殊地点完成的作品。它们的命运都十分曲折。《饥荒》后来在国内发表时故意删除了后 13 段，而原稿又由于政治运动散失。直到 1982 年，那 13 段才由马小弥由英文转译回中文。而《鼓书艺人》,则似乎被老舍故意“遗忘”了，就像他不愿再提及美国的经历，对美国只有抨击和控诉。这部小说的底稿也不翼而飞，似乎老舍并没有将其带回国。直到 1980 年，再次由马小弥将其从英文转译回来。

向左转

1946 年，老舍因一次关于“原子弹”的谈话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一阵风波，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叶圣陶在这一年 11 月 6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情况:“上午梅林来谈老舍事。老舍到美国后，美国通讯社曾发简短消息，谓老舍曾在某一会中发言，美国应保持原子弹秘密，以与苏联折冲云云。上海友人见此，颇不满于老舍，沫若、雁冰、田汉皆尝为文论此事。”

从叶圣陶的日记看，老舍似乎表态支持美国而反对苏联。于是，当时左翼文坛的领袖郭沫若、茅盾都针对老舍写了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传到了美国，令老舍不安。叶圣陶还在日记中说，老舍认为作为文协老朋友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便横加指摘，令他很伤心。于是，老舍给叶圣陶、郑振铎和梅林都写了信，请求辞去“文协”理事职务，并退还此前文协资助他的药费。但在信中，老舍并没有解释关于“原子弹事件”的发言，只是说“到美国后未公开演说”。

老舍当时“不愿声辩”，“自信谣传终必不攻自破”。直到 1983 年，曹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做了澄清。曹禺回忆，当时他们应邀参加一个关于原子能的科学回忆，会上老舍被问道 :“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因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所以回答说不应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

> “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的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老舍是个和平主义者，一向反对战争，自然反对核武器扩散。出国前，他在一篇题为《和平》的短文中写道 :“原子弹！假若它只为杀人用的，难道人类，多么聪明的人类，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毁灭了自己么？那才是最大的悲剧！”“和平，和平应当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在和平之中，大家去继续研究科学，把自相残杀的武器变成抵御大自然的威胁与危害的利器，我们才可以不同归于尽。”

老舍在美国的三年多时间，国内正在上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决战。他不可能不关注国内政局。1947 年 10 月 9 日，老舍与挚友冯玉祥将军在纽约相逢，其时冯先生正借口考察水利，在美国积极开展活动，促使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那晚上，老舍买了水果到旅馆看冯玉祥，并带他到一家北方饭馆共进晚餐。老舍提到，美国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名叫《希特勒的下场》，描述了希特勒当年败局已定、身陷重围时，像疯子似的抓人杀人，如今蒋介石正与当年希特勒一样，已是人所共愤。冯玉祥深有同感，在次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便将蒋介石称为“希特勒第二”。

在美国滞留期间，老舍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和国民党，与冯玉祥会面时，他的政治倾向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在美国，老舍与左翼作家有很深的交往，其中包括史沫特莱和斯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每次来中国，都会去老舍位于灯市口的“丹柿小院”做客。

在与国内联系中，也以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居多。据粗略统计，当时曾与老舍互通音信的有曹禺、吴



纽约 24 大道 83 西街 118 号是老舍曾租住并创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地方

祖光、臧克家、楼适夷、夏衍、冯乃超、郭沫若、茅盾、丁玲、肖三等人。在国内各报刊关于老舍在美的报道十分鲜见的情况下，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茶亭”于1947年11月、1949年2月，分别以“海外书简”、“作家书简”为题，刊载了老舍自纽约发给国内“×× 兄”的两封信。

这位“×× 兄”，就是楼适夷。他是老舍在《抗战文艺》的老战友，战后由中共派驻香港主办《小说月刊》。而《华商报》则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地下组织在香港的机关报刊，是党在南方的宣传据点。信中，老舍详述了自己在美国的思想、情绪和境遇，后一封信，更直接地对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做了恳切的说明。

另一方面，老舍对归附于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则表现出强烈不满。乔治高回忆，老舍在纽约时，他曾带老舍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王际真。王际真和胡适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交往较多，他向老舍说起：“战后国内文化界大概仍然是推胡先生为领导人物吧。”“老舍听了脸色登时一变，表示大不以为然。”

在美国，老舍放弃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开始转向文学的功利主义。即文学要走向大众，文学要为现实服务，甚至文学要放弃自身的独立性，为政治服务。

1946年6月24日，老舍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做了题为《中国作家之路》的讲演。他谈道：“中国人已放弃为艺术而艺术之观念。”“形式之美丽与完善，对于吾人，远不及民族与社会福利之重要，吾人若果能凭借吾人之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吾人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金，更觉满足。”

一个月后，老舍用英文写成《现代中国小说》一文，发表在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的刊物上（即《国家重建季刊》）。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老舍谈道，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作家和大众的关系，即作家们开始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学习，认识到群众身上的“正直、刻苦、耐劳、仁慈的美德”。老舍写道：“这种到人民去的做法，是一种获得写作源泉的好办法。”

事实上，这种态度已经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相通之处了。

抉择

老舍虽然在政治倾向上已经明确靠近了新政权，但在回国问题上却拖延了几次。一方面，他希望在美国完成自己的写作和翻译计划，履行一个作家的义务；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内战局面的担心。

1948年他写信给在台湾的老友何容，能看出这种观望与等待中的无奈：“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回去吧，又怎样呢？”“英国又约我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然如丧家之犬！”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王昆仑之女王金陵，在《老舍•茅盾•王昆仑》一文中回忆，为避开国民党迫害，王昆仑托辞赴美考察“中等”教育。他于1948年初携女儿来到纽约。这一年初秋，得到中共指示，取道欧洲回东北解放区，筹备政协会议。离开前，王昆仑特地去看望老舍，如有可能，便约老舍一道回国。“他说老舍先生的讲学工作尚未结束，而且正忙着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但老舍表示一定回国，到解放区去，只要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走。”也就是说，到1948年的下半年，老舍已经明确了回国的愿望。

1949年，老舍回国的心情愈发强烈了。他的合作翻译者普鲁伊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的夫人，谈起老舍当时的情况：“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到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老舍不得不加快他的翻译工作，白天和郭镜秋在一起翻译《鼓书艺人》，晚上19～22点则和普鲁伊特翻译《四世同堂》。但他的身体又出了问题，坐骨神经痛发作，1949年4月住进医院做了手术。

出院后不久，就在这一年的6月，老舍邀请石垣绫子夫妇来寓所吃饭。解放军攻克上海的消息传到美国，他显得异常兴奋。当时，老舍借住在纽约126街区，一个贫民区，房间的墙上挂着郭沫若手书殷墟文字的匾额。石垣夫妇进门时，便听见厨房里传来阵阵剁菜的声音，老舍正系着围裙下厨，他从唐人街买来了烧鸭、叉烧、蔬菜和豆腐。石垣绫子后来写道：“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一天老舍实在精神特别好。初次见面时那种郁郁闷闷的神情烟消云散。他只穿了一件衬衣，两腮红鼓鼓的，声音也带着点劲儿。”

老舍对她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写不出什么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的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他最后说：“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到中国去。”

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历史学家史景迁形象地写道：“到了1949年，老舍对美国的种种事情越来越恼火，从艾伦•拉德和贝蒂•菲尔德担任主角的影片的剧本，到冰淇淋和可口可乐，他都感到厌烦。”史景迁估计，老舍是在1949年秋天做出回国决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无可争议了”。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准确，从前面很多迹象看，老舍的回国决定还要更早一些。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在郭沫若提议下，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提出邀请老舍回国。根据他的意见，由郭沫若、茅盾、周扬、

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 30 多人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特殊渠道传递到了老舍手中。老舍后来将这封信带回国，特意夹在《鲁迅全集》里，可惜在“文革”抄家时不知所终。周恩来也曾委托曹禺给老舍写信，邀请他回国。也就是说，老舍至少收到了两封国内的邀请信。

据 40 年代后期负责党在文化界组织工作的冯乃超生前回忆，邀请老舍回国，是中共综合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后做出的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邀请他去台湾的信息也通过他的老朋友吴延环到了美国。开出的条件，包括工作、房子、接家属同来，都非常优厚。但老舍没有考虑，此后甚至没有再提起过。抗战时期，吴延环是国民党系统的地下工作者，曾将老舍妻子胡絜青和三个孩子从北平接出，帮助他们到达重庆。

老舍最终定下来在 1949 年 10 月，由旧金山乘船回国。在回国前，他还专门去拜访了费正清。费氏劝老舍再等一等，看一看。但老舍说：“不能等了，我必须立即回去！”可以想见，在 1949 年的夏秋之际，老舍内心是多么澎湃。

在旧金山等船时，老舍与朋友乔治高又盘桓了几日。临到启程，他的内心又有过忐忑，他就像《鼓书艺人》中顺江东下的方宝庆，准备融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中，但又对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在美国，他曾对演员王莹说：“我过去写坏了《猫城记》，对共产党缺乏认识，真是太遗憾！”《猫城记》是老舍 30 年代写成的一部小说，对“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了讽刺。

乔治高回忆，老舍就像其他回大陆的朋友一样，“他们在离美前夕常常情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美国——美国的生活方式，凡是百物——愈来愈讨厌、鄙夷甚至憎恶。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坚强他们回大陆的决心吧”。

临行前，老舍告诉乔治高，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即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此时的老舍，与石垣绫子回忆中那个一扫阴翳的老舍，仿佛是另外一个人。这种矛盾，恰恰体现出个人在转折时代的复杂心情，因而也便更加真实。

10 月 13 日，老舍终于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转道香港回国。这一年他已经 50 岁了。



“诺天源官方旗舰店”已震撼入驻天猫，旗下百余品牌11月11日特惠狂欢促！活动期间，诺天源旗下“自然之宝”“美瑞克斯”等多个品牌冰点折扣！更有多重好礼相赠，礼品价值千万元！

诺天源致力于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营养补充剂，NBTY前身为创建于1971年的“自然之宝”（NATURE'S BOUNTY.INC）。于1990年5月正式更名为NBTY.INC，并在同年于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总部设在美国纽约。2006年诺天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中国。成为美国NBTY在华的全资子公司，作为美国健康食品市场最为悠久的经典品牌之一，诺天源“天然营养带来健康”的理念和卓越品质早已家喻户晓，为世人熟知。

扫一扫.关注诺天源官方旗舰店

咨询热线：400-686-9797 | nuotianyuan.tmall.com
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nbty

11.11 购物狂欢节 2014

NBTY
诺天源官方旗舰店



舒乙

“写家”与新时代：老舍的“叛逆”

——专访老舍之子舒乙

“老舍的文学，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地方与当时主流文学不同，甚至是唱反调。我称之为‘正统的叛逆’。”

文 / 李伟　实习记者 / 祝童


（黄宇摄）

主流的隔阂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底老舍回国，很快他就因话剧《龙须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中国文学界，对老舍的实际评价如何？

舒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来对老舍的评价并不高。评价最高的是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我党称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学旗手”。鲁迅在世时候就获得了这样的评价，他去世后，毛泽东又不断提升他的地位。周恩来后来又在重庆说，我们还有两个“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就是郭沫若和茅盾。

解放后，老舍虽然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但在当时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里，关于老舍内容的只有三行。鲁迅一个人好几章，郭沫若和茅盾都单独成一章。

老舍是一个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印量也很高。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在我党正统的评价系统中，排名确实不高。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文学，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地方与当时主流文学不同，甚至是唱反调，我称之为“正统的叛逆”。

首先是理论上的不同。老舍曾经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边教书一边创作，虽然创作量很大，但本职还是教书。他教的一门课就是“文学概论”，这是一门理论课，讲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

在《文学概论讲义》中，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文以载道”。他说，文学与艺术不是政治的附庸和奴隶，应独立于政治之外，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文学，是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政治，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这是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老舍看来，文学特性是感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自己去思考。而政治，是告诉你要走什么路，不会关心是否被感动。

所以老舍的文学理论和毛主席的理论是不一样的。毛主席认为是政治第一、内容第一，后来最多强调思想性和内容性统一，但是思想性肯定放在前面。而老舍恰好相反，认为艺术性第一这才叫文学。

其次，在他的作品中，许多人物、情节都是和当时正统政策、观念相违背。比如，老舍塑造了一系列的巡警角色，他们都是好人。但当时政治认为，旧巡警是旧社会的专政工具。“文革”时期还划出“地、富、反、坏、右……”等“九种人”。巡警就是其中之一，是反动统治者的爪牙，每个人都是历史反革命。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须沟》，一共三幕戏。第一幕还在旧社会，有个巡警来收“卫生捐”。他是当差的，执行命令。他想掩护这几个穷人，帮“二嘎子”介绍工作，帮穷人渡过难关。到了第三幕，解放后政府为大家修沟，原先的巡警成了派出所副所长。领导看了之后说：“老舍先生您胡闹，巡警都是反动派，您怎么让他在解放后当龙须沟派出所副所长呢？这是违反政策的，不可以留任。”老舍先生却说：“不对。他是好人，可以留下来的。你不让他当正所长，当副所长总可以吧？”

排演的时候，到了第三幕还是换了一个新警察，是我党的一个干部。不管舞台上怎么演，老舍还是坚持出了一个文学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老舍的文学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脑子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从小就生活在老百姓中间，邻居都是穷人。他同情老百姓，知道如何判断人，而不是按照“理论”、“政策”去分析。上面改他的剧本，他内心是不服的。

还有一个例子，老舍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一股破坏力量。老舍这种看法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他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就做了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他看到了“五四”以后学生运动的破坏性，见过把老师吊起来打，把书烧掉。在这一点，他和胡适一派是一样的。同情学生运动，但是反对罢课，反对不学知识，反对暴力。然而学生运动后来发展到“文革”，越来越极端化，红卫兵也是学生运动，他自己也被殴打凌辱，导致了他的死亡。

1944年，由周总理提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老舍组织了一次



话剧《茶馆》剧照

活动——“老舍先生45岁及从事写作20周年纪念”。在这个会上，茅盾先生的发言很婉转，说看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书，嬉笑怒骂，看到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认可。也就是说，老舍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会对老舍形成压力？

舒乙：老舍回国很晚。第一次文代会都开过了，文联主席是郭沫若，作协主席是茅盾，没有他的事儿，就先补选他当文联的理事。同时补选理事的还有四川作家沙汀和艾芜，因为那时西南刚刚解放。到了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和作家代表大会，正式要再选举几位副主席。原来两位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丁玲、冯雪峰和巴金肯定要选上，再选一个就是老舍。一共6个副主席。但是解放区作家很有意见，不给老舍投票，认为他对革命没有贡献，是个“摘桃派”——“我们都革命成功了，他回来了怎么就当副主席？”

老舍想不通。我记得他回来跟我们说:“抗战时期，咱是文协的‘主席’，现在怎么连副主席都不能当？”抗战时候文协是唯一全国性的文化组织，而且在各地设有分会，延安也有分会，丁玲就是延安分会的负责人。而现在老舍当选全国作协副主席都被解放区作家反对，他不高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无论从文学理念还是实际处境，他与主流环境是有很大隔阂的。

新时代的“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写文章说，回国后他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表示毛主席给了他艺术新生命。老舍对“讲话”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舒乙：有一次在北大未名湖畔，我和老舍的好朋友吴组缃先生聊天。他当时在北大教《红楼梦》。吴先生说，你爸爸说我有才气，但经常批评我懒，写得太少。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我告诉你，我最好的作品是日记，每天都写，几十年没有间断，但是不能发表，里面有大量的隐私，大量的实话。其中就有关于老舍的。

吴组缃先生告诉我，还是在抗战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张光年、何其芳到重庆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老舍和吴组缃都听了。后来日本飞机轰炸，他们俩一起跑防空洞。就在防空洞里，吴组缃问老舍对“讲话”怎么看。老舍回答说：“路太窄，只写工农兵。”当时老舍就是有看法的。

从美国回来后，他非常喜欢新社会，喜欢共产党，他的心情也是非常愉快的，于是又重新学习“讲话”，进而产生认同感。其实，他对“讲话”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认为文艺应

该为人民，作家不该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所以他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吴组缃日记里的那些内容。

但老舍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种文艺政策的局限性，他写文章对某些领域进行了突破。比如他提倡写悲剧，说法还很吓人——“社会主义也有悲剧”。这在当时是足以打成“右派”的言论。老舍认为，悲剧是非常高级的艺术形式。他自己写了大量悲剧，最优秀的作品都是悲剧，这是他一直倡导的。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与老舍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在解放后作品很少，也没有写出精品。老舍却相反。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功劳是让文艺走向人民。在解放前，“讲话”的精神就是两句话：写工农兵，为工农兵。当时还没有提人民，但它的方向是为人民的。

遗憾的是，解放后文艺服务的“主体”却没有变，依旧片面强调“工农兵”，这就排斥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等阶层。于是巴金、冰心等很多老作家就无法写出作品了。

因为他们既不是工农兵，还必须要写工农兵。只有一个办法——“体验生活”。其结果就是“隔靴搔痒”。解放后，很多老作家拿不动这支笔了。他刚想写，马上意识到：我是小资产阶级，写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的才华没有变，但创作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他们内心害怕，“我得改造啊，我得脱裤子割尾巴，我得检讨啊”。

于是，两种文学题材就一下子没落了：一种是诗歌，一种是散文。诗歌和散文都是描写个人情感的，是抒情的。作家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怎么抒情，抒发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看不到周作人、朱自清那样的散文了。

巴金、冰心都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了。而且还有几位大作家带头不写，如茅盾、叶圣陶，专门教育其他作家怎么写，自己不写。郭沫若写了几部话剧，但比起解放前的剧也是差很多。

这里面只出来一个人，就是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别人看他像怪物。但他觉得自己是穷人，跟执政党是一头的，用不着“改造思想”。劳动人民都是咱邻居，我根本用不着体验生活，就知道他们想什么。龙须沟他只去了半天，那些人脑子里都装着呢。于是，他在新社会一下子迸发了巨大的创作热情。

严格说，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分析文艺现象并不准确的，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却很合适。过去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比较富裕，穷人没有资格读书。在北京，即使公立学校也要交上几元钱的保证金，所以作家一般都是有钱人的后代。如果老舍没有遇到善人刘寿绵——他资助老舍去读私塾——那么老舍就在街上卖花生米了，或者在商店里当学徒。在他成为作家后，他写了大量底层穷人的形象。

老舍在解放后活了不到17年。在这段时间，他一共写了40个剧本。其中，大部分作废，没有上演，上演的有16部，平均一年一部，还有两部长篇小说。质量上，我认为《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都是精品。解放后有两个“文艺的春天”。一个是在解放初，文艺政策比较宽松，老舍创作了《方珍珠》和《龙须沟》。还有就是1956～1957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写出了话剧《茶馆》。这是他创作的高潮期。《正红旗下》写于1961～1962年，是一本家传体小说，8万多字，才写到主人公1岁，没写完，太可惜了。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文学》正式发表，加了一个编者按说“这又是一个鸿篇巨著的开头”。现在也算他的代表作。

在解放后的作家中，老舍是劳动模范。1956年开过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大会，老舍是文艺界唯一的一位劳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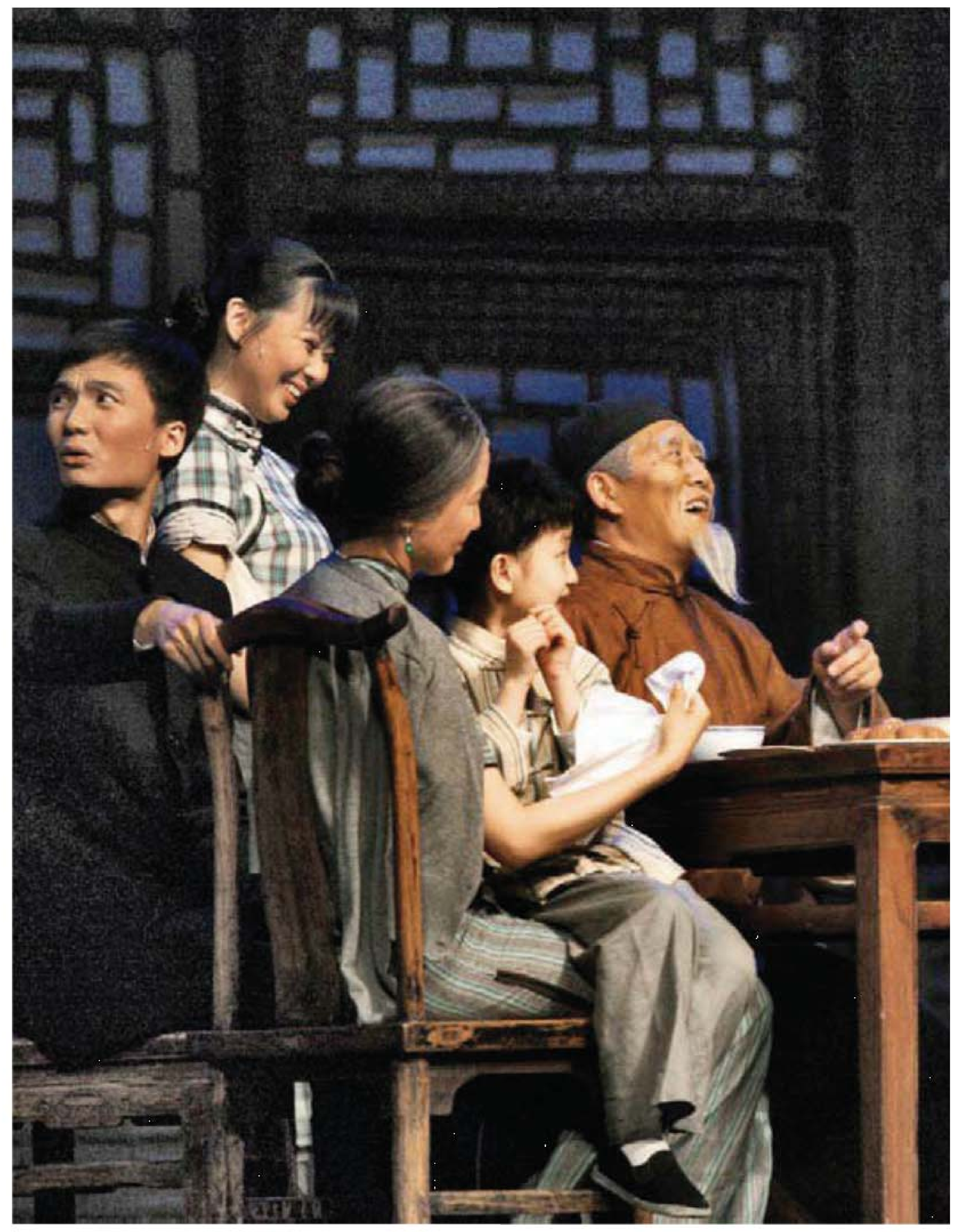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他如何保持自己的写作状态？

舒乙：老舍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优点，都是缺点，



易郡
BEIJING I-HOUSE
新北京四合院
HOT LINE
010-89483551
北京市 顺义区 李遂镇 柳各庄村 易郡山庄
京房售证字[2005]435号 本广告最终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





话剧《骆驼祥子》剧照

但是有一个优点可以自傲，就是勤劳。他每天写，没有一天落空。每天上午写作，雷打不动，节假日、过年也是如此，所以能够积少成多。他写作很慢，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每天3000字；最慢的时候1000字。但是如果每天保持1000字，一年就是30多万字，是一个长篇小说了。所以他的朋友都知道，上午不来找他，下午他再出去开会、会客、办公、看节目等等。最后积攒起来的，一辈子写了1000多万字。他坚称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时期，很多作家都修改了自己此前的作品，老舍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的？

舒乙：周扬曾找巴金、曹禺和老舍谈话，说想出版你们三人的代表作，但是必须修改。因为你们是在解放前写的，现在已经解放了，书里还是老观念，要变成共产党的观念再出版。巴金修改《家》，600多页改了500多页。曹禺把《雷雨》改得惨不忍睹，主角成了鲁大海，变成了革命题材。

到了老舍这儿，周扬说你的代表作是《四世同堂》，也要改。老舍问怎么改，周扬说你要把"蒋委员长"改成"蒋介石"，"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成"国旗"。老舍一听就生气了。他回答周扬：你每天要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法，但我写的就是历史，沦陷的北平老百姓，盼着国民政府的元首回来，他肯定说，我盼着蒋委员长回来，他绝不会说，我盼着蒋介石回来。当时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为什么不能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这是后来的事儿啊。当时，政府就是这个国旗，连延安都得打这个。周扬突然说了一句狠话：你不改，不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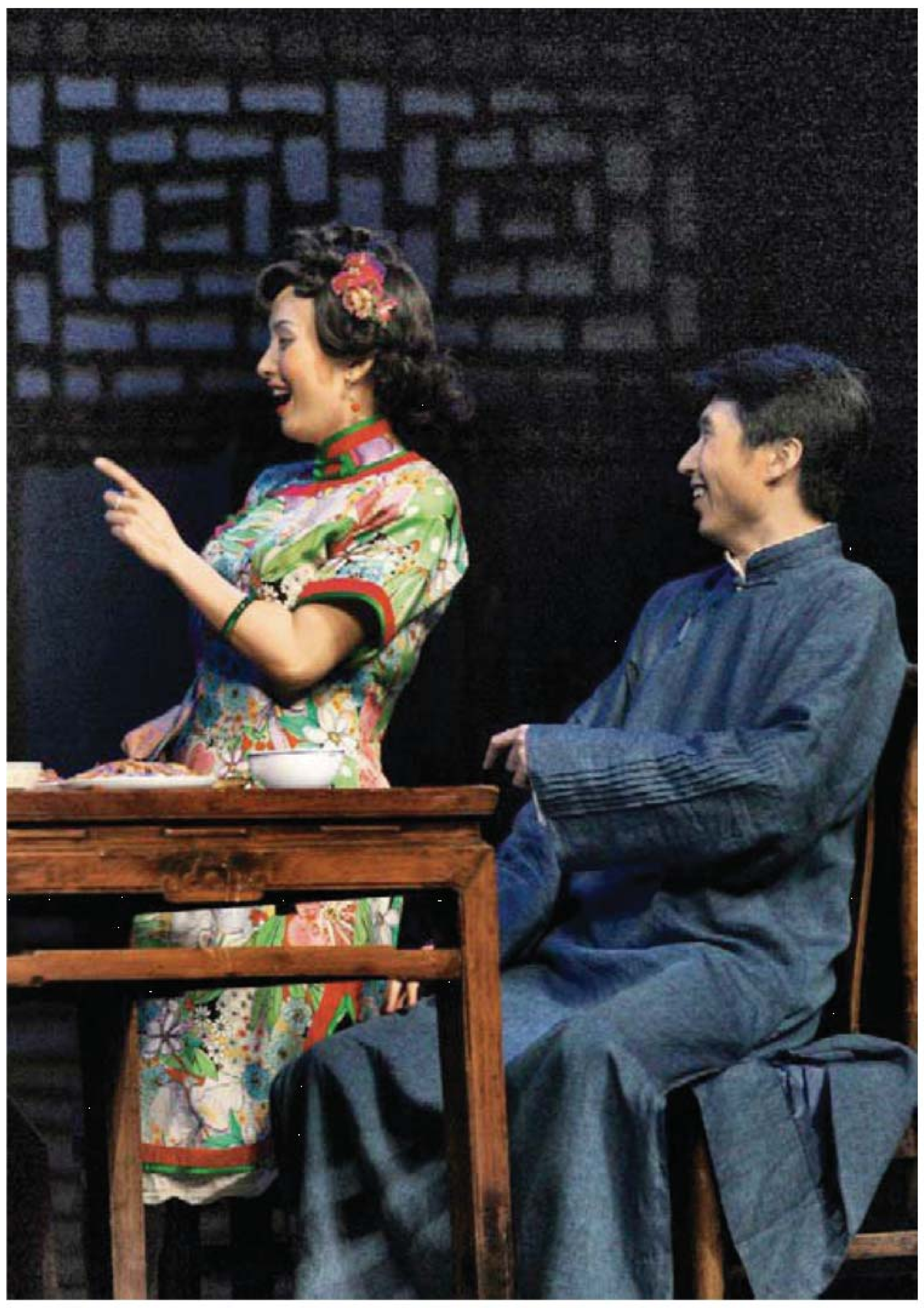
后来我整理他的手稿，发现《四世同堂》100章，只改了十几章，而且改的全是标点符号和个别的字，如规范"的、地、得"的使用。内容一个字没改。最后他找周扬说，我改不下去了，我给你写新的。

老舍的意思是，不给我出版以前的小说，那就拉倒，我还会写新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创作《龙须沟》了。所以，很长时期内《四世同堂》都没有出版，解放后的人，甚至中文系的学生都不知道老舍有这部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话剧《龙须沟》为什么会为老舍带来巨大的荣誉？

舒乙：《龙须沟》作品出来后，周恩来最高兴。他要求周扬写文章表扬老舍。解放区作家心里不平衡，周恩来说，解放军入城后，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但是这个新的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我们就要一天到晚上课，讲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学习党史，学习政治、发社论、搞讲演、办学习班。突然出来一个老舍，写了个《龙须沟》，这部话剧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新政府和旧政府是不一样的，一下子帮我们解释清楚了。他说，新政权需要巩固，就需要有舆论去支持它，老舍帮了大忙，必须要表扬，所以北京市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龙须沟》演遍全国，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他们拿到的是焦菊隐先生的演出本，里面台词都被焦先生改成了北京土话，各地剧团都不懂，演起来就莫名其妙。但毕竟影响面很大，老舍很高兴，他始终把那个"人民艺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

术家”的奖状挂在自己书桌前头。

周恩来还把《龙须沟》带进了怀仁堂。那是1951年底，主席进城三年了还没看过话剧。周总理说，我介绍你看一个话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焦菊隐先生导演、老舍写的《龙须沟》。那天老舍把我们所有孩子都带去中南海了，恰好周总理就坐在我前面，主席坐在另一边。表演结束后，周总理特意把老舍引荐到主席面前。

毛主席也很器重老舍。他组织最高国务会议，每次都让老舍参加。老舍开会回来，在家里面原原本本传达主席讲话，包括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老舍为配合政治宣传所写的大量作品？

舒乙：解放后，老舍写了很多配合政治的戏，而且多半都是周总理出题的，不免图解政治。最突出的就是《春华秋实》，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运动搞了一年多，政策始终在变，政府也在摸索怎么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开始恨不得全部打倒，每个都是贪污犯、每个人都偷工减料，后来慢慢修正，又利用又改造。老舍就惨了，他跟着政策的变化不断修改剧本，一共改了10稿，50多万字。我们找出来这个戏的手稿有一尺厚，每一次差不多都是推倒重写。

老舍确实是共产党的热情支持者、新社会的拥护者，积极配合政府做宣传，但也走了很多冤枉路。上演的十几出剧目中，真正立得住的也就是三四部，比如《龙须沟》、《茶馆》、《女店员》，大量的都被历史淘汰了。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不趋时、不太结合政治的作品。因为政治价值是短暂的，艺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比如《茶馆》就没有写革命，但很感人。他没有讲非得革命不可，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绝对要不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80年代，《茶馆》被带到欧洲巡演，引起轰动。于是之带队谢幕，多达30多次，根本下不了台。《茶馆》回到了话剧的老家，引发了一场中国话剧风暴。报纸评论说，现实主义又回来了。话剧在中国100年，有两大扛鼎之作，解放前的是《雷雨》，解放后的是《茶馆》。当然这是在老舍死后才获得的评价。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中国作家群体中，你认为老舍还有哪些特殊性？

舒乙：因为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经历，老舍还倡导歌剧。他认为国外最高的艺术形式有三项：芭蕾舞、交响乐和歌剧。歌剧远在话剧之上，可是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写完话剧之后，居然还写了三部歌剧，但一个也没演过。

他另一个特殊之处，便是大力倡导曲艺。他自己写相声、大鼓、单弦、快板、河南坠子。所有形式的曲艺他都会写，很多作品现在还在流传。这在作家当中是很少见的。解放区作家赵树理也倡导曲艺，所以他俩成了莫逆之交。

还有就是提倡少数民族文学，他自己是满族，曾经到过新疆、内蒙古



去和少数民族作家座谈，倡导给他们写剧本。

老舍之死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老舍先生的最后几年是怎样的心态？

舒乙：1960年，北京市要拔白旗，本来把老舍也列进去批斗，材料都完成了排版，但后来还是被彭真和周恩来给保护下来。

最后两三年，他非常苦恼。毛主席提出来批判文联和作协，认为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他是文联、作协的领导，压力也很大。毛主席提出要把"钢琴赶到乡下去"，所有的作家、文艺家包括唱歌剧的、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都要到农村去。老舍突然对领导说："带上我。我有用，咱们上哪个村，住下来，我就能写快板，马上就可以唱出来。"领导说不行，你没有资格。

他后来很惨，自己一个人背着铺盖卷下农村，去了两个北京少数民族聚集的村子。还是想写少数民族解放后翻身的故事。1965年他写了很长的一个访日散文。居然退稿，没有地方发。这时候，阳翰笙、陈荒煤、夏衍已经开始被批判了，这些都是他的党内好友，也是他的领导。他觉得非常悲哀。

三联生活周刊："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你认为老舍先生自杀身死，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挨打，受到了屈辱。他有文人气节，宁折不弯，不愿苟活。这是导致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他内心长期积累的压抑与苦闷。他觉得自己没有出路。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先生自杀后，你们家庭有没有受到冲击？

舒乙：对家庭影响太大了，我们四处分离，下乡的下乡，挨斗的挨斗。妈妈在北京一个人过，很惨。后来政府把老舍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手稿抄走。但是我们留了个心眼，把《正红旗下》手稿偷出来了，各处转移。藏在亲戚家，藏在煤堆里、烟囱里，终于保护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对老舍之死的定性是什么？

舒乙：北京市文联给了我一个书面文字说"舒舍予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的人是不可以保留骨灰的，所以老舍没有骨灰。火葬场的两个小姑娘告诉我，全国政协常委中第一个不能保留骨灰的就是他。后来为他安放骨灰时，在骨灰盒内放了他的眼镜、毛笔、钢笔及他钟爱的茉莉花瓣。我后来又设计了一个坟墓，将他和妈妈合葬。

1970年前后，苏联翻译出版了老舍的小说《猫城记》，而且很快成为畅销书。然而《猫城记》很长时期都被认为是反动作品。当时中苏对立，国内报纸马上"鞭尸"，给他戴上"反共"的帽子。批判文章的编者按说："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拥护的，凡是我们拥护的就是敌人反对的。"所以老舍肯定是个反动文人。

后来，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他顾问委员会中有三名作家也来了。我参与了这次接待。这时我才了解，当时苏联翻译出版《猫城记》完全是出于文学价值，和政治没有关系。《猫城记》这本书，最近几年才有了单行本，很多出版社不敢印。

三联生活周刊：被抄走的东西都还回来了吗？

舒乙：90%还回了，拿走的时候有清单。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损失，但是量不大。老舍、胡絜青夫妇收藏了很多大家的名画。仅齐白石的精品，他们就有80幅。最精品的画我们都捐给了中国作协，包括他出题齐白石画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我打算明年春节，为他们二位办一次藏画展，应该会引起轰动。

老舍自己收藏了很多名伶画的扇面，一共163把。许多著名京剧演员都会画画，四大名旦的，他们前辈金少山的扇面，他都有。有些扇面就是道具。比如，梅兰芳先生唱《晴雯撕扇》，这是一出折子戏。梅先生自己画一个牡丹扇面，在台上表演时，撕掉扔在地下。散戏后，他的琴师把它捡回来送给老舍。老舍专门做了锦盒，一个盒子放十把。这些扇子后来找不回来了，清单只是写着"扇子一捆163把"，不知所终。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之死对周恩来有没有触动？

舒乙：周恩来是老舍党内最好的朋友。老舍死后，他非常伤心。1966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遇到了王昆仑。王昆仑是排名最后的北京市副市长，他前面都被打倒了。他向王昆仑打听老舍之死的情况，让他晚上进中南海专门汇报。当时周总理是想自己调查老舍的死因。

后来周总理病重，住在北海边上的306医院。他的医疗组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她的丈夫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那一年的8月24日，刘湘屏陪总理在北海散步。周总理突然盯着湖水问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刘湘屏想了半天说不知道。总理说:"今天是老舍的忌日。"又问她："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她说有所耳闻，但不太清楚。周总理突然说："我知道，我讲给你听！"

这段对话是刘湘屏的女儿刘晓沁告诉我的。她原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后来王铁成主演的电影《周恩来》中，把这个情节拍了进去。

老舍的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为老舍平反的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舒乙："文革"后，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出了一个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做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

随后，在八宝山为老舍举行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那是 1978 年 5 月，正好赶上了作家协会的主席团在北京开扩大会议，“文革”后作家们第一次聚首。有 300 多名作家出席了骨灰安放。有的作家还没有被“解放”。比如艾青，他没法参加，就叫别人带一个字条，贴在礼堂大门上，上面写着“追悼会就是庆祝会”。巴金写了一篇著名文章《纪念老舍同志》收在《随想录》中，他在文章中说：老舍同志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我们没有保护他，是我们大家的耻辱。

那天邓颖超是第一位来的。他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说：“我是代表恩来来的，他生前无数次地悼念老舍，为老舍的去世非常伤心。我想如果他活着，他肯定第一个来。”

从老舍开始，文艺界开始获得解放。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平反后，他的文学地位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舒乙：冯牧曾对我说过文艺政策修正的经过。1978 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要召开文代会。由周扬先起草报告。周扬组织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林默涵一起写，每人起草一章，他来总提调。报告上交后，邓小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谓扩大，就是安排五人起草小组列席会议。周扬的报告，方向基本还是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写工农兵。胡乔木率先反对，建议把“为政治”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改为“文艺为人民”。当时会上反对胡乔木的意见比较多，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咱们文艺的总方针，用了几十年了，不可以变更。最后，是邓小平坚持：“按乔木同志意见办！”

改革开放后 30 年，中国文艺迎来了新的春天，这和党修正文艺政策分不开。在这个背景下，老舍的文学地位也大幅提高，因为他写的是人民，他写的是艺术性很强的、令人感动的文学性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于是，老舍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民性也有了重新定位。


舒乙：新千年的时候，几大出版社联合起来，计划推出“百年百部”文学丛书。在 20 世纪 100 年中，选出 100 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几十位文学评论家、学者投票。第一名是鲁迅，有四部进入；第二名就是老舍，有三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剩下七个人各自进去两部，包括巴金、冰心、汪曾祺。其余 91 人，都是一人一部。所有作品中，有 80 多部是解放前的，解放后的只有十几部，而且以改革开放后的为主，之前 30 年的作品只有《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几部。在这个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到老舍作品地位的提升速度。

现在《老舍全集》是 1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般“全集”主要是为了彰显作家的成就，收录了作者的次品，甚至错误的作品。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说，《老舍全集》是可以再版的，而且再版后很快又卖完了。现在市场上居然找不到。这也说明了他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

老舍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等形式也是最多，这方面他是冠军。因为他的文学艺术性强，可供改编的深度和广度都很大。他被改编的作品已经超过 20 部了。涵盖各个品类，电影、电视剧，还有各种戏曲：京剧、曲剧、歌剧、舞剧全有。没有一个作家能超过他。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老舍的评价，你认为比较准确的是哪一条？

舒乙：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曾为法文版《四世同堂》作序。序言里说：“我的老师是一个中国人，叫老舍。”他很崇拜老舍，第一，《四世同堂》使法国人想起了“二战”中沦陷的巴黎。第二，他说老舍的价值在于替上亿个没有话语权的人说话。的确，老舍笔下刻画了大量下层民众，他们承受着困难，心里有话要说，是老舍帮他们说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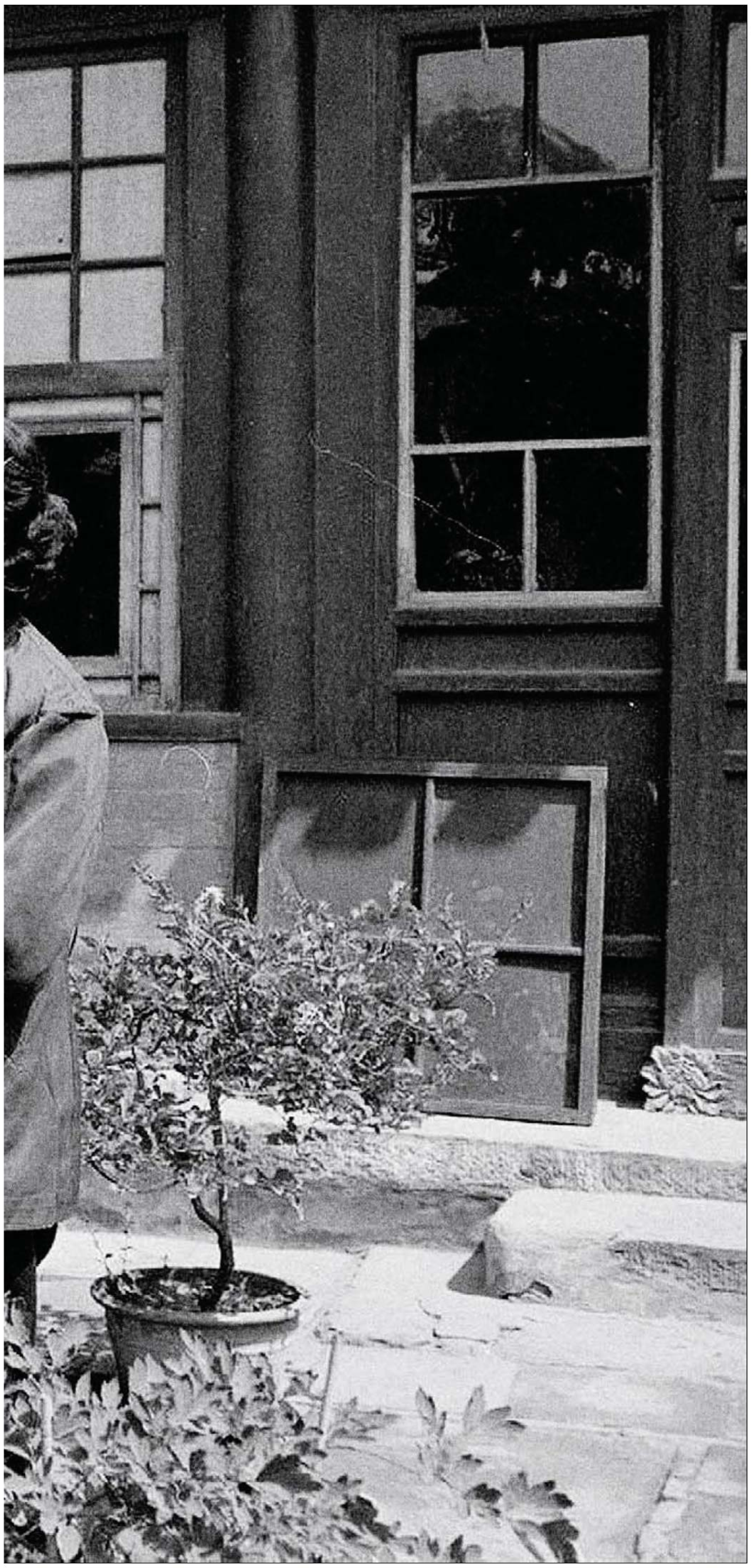




荣耀与屈辱：老舍的最后十七年

老舍回国后，很快便融入了新时代。他的命运也如同坐上了过山车，跌宕起伏。

文 ✎ 李伟


（新华社/供图）

1954 年 5 月，老舍夫妇在自家小院里赏花

新政权与新生活

老舍先生回到北京，是在 1949 年 12 月 13 日。至此，他离开故乡已经有 15 个年头。刚从美国回来，老舍还保持着国外的装束：西服、领带、金丝眼镜、尖头皮鞋。这在当时中山装、列宁装、八角帽、布鞋的海洋中，显得突兀。但老舍不以为意，他觉得自己是穷人，和新政权是“一头儿的”。

北京解放后，北京饭店就承担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任务，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高层民主人士都住在这里。包括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陈嘉庚等，济济一堂。民主人士也分级别。萧乾在他的自传中说，一些“民主人士”们根据居住状况，“推敲起个人的行情了”。最高一级的住在北京饭店，其次是翠明庄。萧乾当时就被分配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亚洲饭店，老舍则受到了最高礼遇，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三楼的一个房间。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阳翰笙就陪同周恩来总理来看望老舍。周恩来与老舍的交往始于 1938 年的武汉，当时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和夫人邓颖超开始广泛接触文艺界进步人士，团结他们一致抗日。老舍就是重要的统战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深刻影响了老舍对共产党的认识。好友吴组缃曾回忆说：“老舍对周总理衷心敬仰，他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在邀请老舍回国后，周恩来也是第一个来看他的高级官员，他对老舍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三个星期后，1950 年 1 月 4 日，中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开新年联欢会，并欢迎老舍先生归国。茅盾、周扬、田汉讲了话，老舍先生致答辞，说自己愿意学习，充实自己，希望利用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对革命有所贡献。老舍还当场演说了他刚刚写好的一段太平鼓词——《过新年》。歌词结尾部分唱道：“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人民的胜利真胜利，胜利的新年好新年。劝诸位，紧跟着毛主席走，实现新民主，国泰民安！”

1949 年 7 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召开后，新政权文艺方面的岗位陆续分配完毕。郭沫若任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等要职；茅盾任文化部长，并兼任作家协会主席；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夏衍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老舍回来得晚，只能先给他一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名义。好在他只愿写作，并不愿任职，所以并没有太多想法。自从抗战后，老舍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坚持自称为“写家”，就是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稿费为生。



赵树理（左）、王亚平到老舍（右）家中讨论文联工作

由于战乱漂泊，老舍的日记保留下来很少。但回国后的几个月则是保留得最完整的一段。从日记可以看出，他回来后的生活丰富而充实，心情非常舒畅。白天访友、聚会、吃饭、写文章，晚上有时看看演出，虽然妻儿还在重庆，但也并不寂寞。

1950 年 2 月，《文汇报》发表了记者黄裳写的《老舍在北京》，这或许是最早向读者报告归国后老舍近况的文章。朋友们相约在玉华台饭庄吃饭，老舍上衣穿件绿呢西装，里面是大红黑花的呢衬衫，就像美国牧童的装束，而下身则穿着蓝绸子棉套裤，还扎着裤脚。土洋结合，看起来十分滑稽。黄裳热情地赞扬说："老舍已经不是从前的老舍。"在这次聚会上，老舍特意向副市长吴晗敬了一杯酒，唱了一句大鼓词："第一位民选市长，他叫吴晗。"

在北京，老舍找到了自己分别多年的哥哥、姐姐。他是家里的小儿子，哥哥、姐姐比他大得多，都是穷人，不识字。他们有十几年没见过面，原以为亲人们都贫困饿死，但他很快就把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找到。老舍于是格外高兴，频频请他们吃饭，下饭馆。他还把侄子、外甥也找来，见他们虽然穷得衣服打补丁，但依然洗得很干净，而且都成了工人阶级。

老舍觉得人民是真正翻身解放了。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我的老姐姐们》，在文章最后说："她们的牙齿已脱落，衣服很破，吃喝很苦，可是在操劳之外，她们似乎看到尔后有了光明的前途，所以老有那么一点从心里发出的光亮儿。"

新社会的每一点改进都让他欢欣鼓舞。他去考察老百姓的环境卫生，看了居民大杂院的公共厕所，回来还写出意见。他激动地说："难得呀！大杂院的土坑厕所那么干净，粪坑都盖着有提手的木盖儿，周围撒上石灰，没有蛆蝇。这不容易呀！……共产党就是行！连老百姓的厕所都管好。……解决好了，老百姓心里就痛快，就和人民政府一条心，建设新中国就有劲头儿啊！"

进入新时代，老舍的精神格外亢奋。他逢人便说，新社会好，新政府好，共产党好。感激与狂喜填充了他的整个心灵，流淌出一篇篇豪情万丈的文字。在美国制定的"三不主义"——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很快自动作废了。

1950 年"十一"，是老舍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他写文章说："现在我恢复了写家的尊严，可以抬头走路了，

可以自由地走路了，我的头不再发昏了。”“现在穷人翻了身，我必须给他们写作，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呢！而且，写得很不够啊；我恨自己只有一只手会写字！”

1951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热爱新北京》，歌颂新政府和毛主席：“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能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啊！”

回国后的前两年，他继续着与美国第二任版权代理人大卫·劳埃得的通信。与歌颂的文章相比，通信的文字则平实朴素得多，但也更有真情实感。他告诉劳埃得：“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他还在信中表示不解：“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

1951年，老舍在话剧《一家代表》中塑造了一个名叫程善恒的人物——男，54岁，北京人，颇有学问，做过中学校长，倾向民主，痛恨蒋介石口说民主而实行法西斯暴政，也是个“不会鬼混的人”。从年龄、经历到思想，程善恒身上集中了很多老舍的影子。最初，程善恒“不管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只要谁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我就拥护谁！”后来他逐渐认识到，新政权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只要政府实行民主，我就破出老命去拥护！这真是民主呀？不要叫我又失望呦”。老舍通过程善恒的妻子王雅娴之口，对新中国的民主制度下了最后结论：“现在，经过学习，经过参加政治活动，我们认清楚了，英美的民主只是政客们的口号，政权实际是操控在财阀军阀手里，我们的才是民主，因为我们的政权是在人民的手里。”老舍后来反复强调：“民主政治是咱们新国家建国的基础，顶要紧。”

因此，老舍先生十分珍惜作为人民政府委员这一职务。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属于民主政治的实证程序，他就是新中国的主人翁。1954年，老舍作为崇文区代表被选为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在那次北京市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老舍又与彭真、张友渔、吴晗、梁思成、华罗庚、梅兰芳等成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北京代表团成员，一直延续到1964年。

舒乙后来回忆说：“市政府委员有20多人，开会非常民主。在那时记录稿上，发言人舒舍予（老舍）的名字频频出现，一会儿说哪个胡同的灯坏了，哪个胡同的下水道堵了，什么地方房屋又漏雨了，他觉得政府就应该为穷人办事。彭真乐于听取意见，马上派人去修。”

1950年的4月，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带着四个孩子从重庆回到北京。他不能再住酒店了，周恩来曾提议政府帮助老舍解决住房。但老舍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他自己花钱在迺兹府丰富胡同买下一个小院，全家搬了进去，第一次拥有了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家。

“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在新社会，人人劳动，人人都有单位，有工作，就连后来老舍笔下的“程疯子”也有了份“看自来水”的工作。老舍先生也不能一直当他的自由职业者。

1951年2月，在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同期增补的还有沙汀、艾芜、邵荃麟和孙伏园。

此后，周总理经过认真思考，建议成立北京文联，由老舍领衔；成立上海文联，由巴金领衔。这样，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四员大将各有其位，一派和谐，有利于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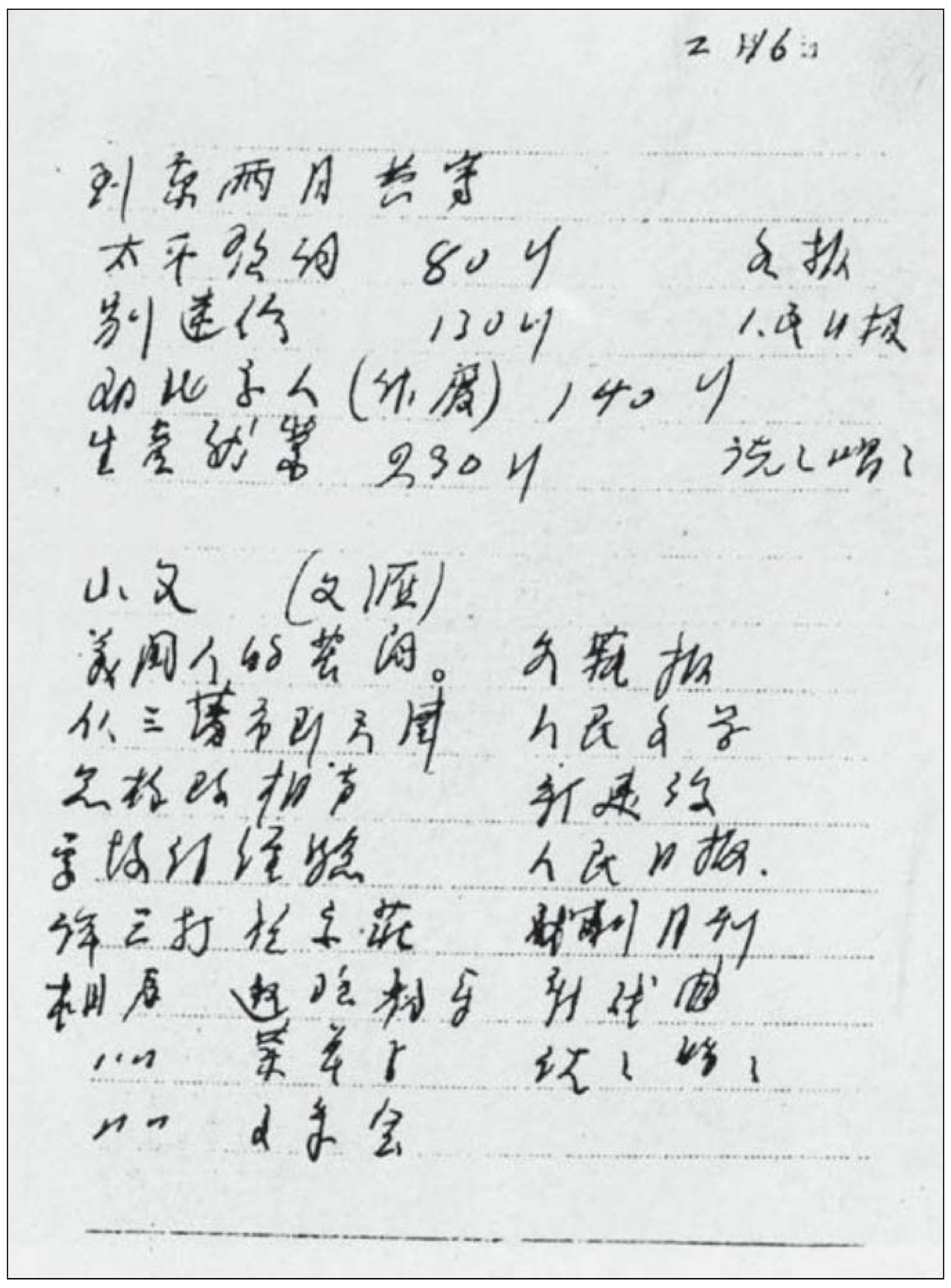
1950年5月28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总理亲自出席，他发言说：“老舍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大作家，又是北京人，长期与我党合作，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建议选举他为文联主席。”邵燕祥后来回忆说：“老舍在重庆时期，周恩来就对他特别倚重。……老舍是个很外场的人，一个场面上的人，会周旋，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

最后，大会选举老舍为主席，李伯钊、梅兰芳、赵树理为副主席，王亚平为秘书长，王松声为副秘书长，仿效重庆时代的“文协”，成立四个部。由杨振声、罗常培、凤子、金紫光、张梦庚、端木蕻良等人负责。6月，在北京文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老舍论述了成立北京文联的必要：“从北京市人民政府看，因为政府是人民的，就理当有个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团体，好帮助政府与党，在文艺上为人民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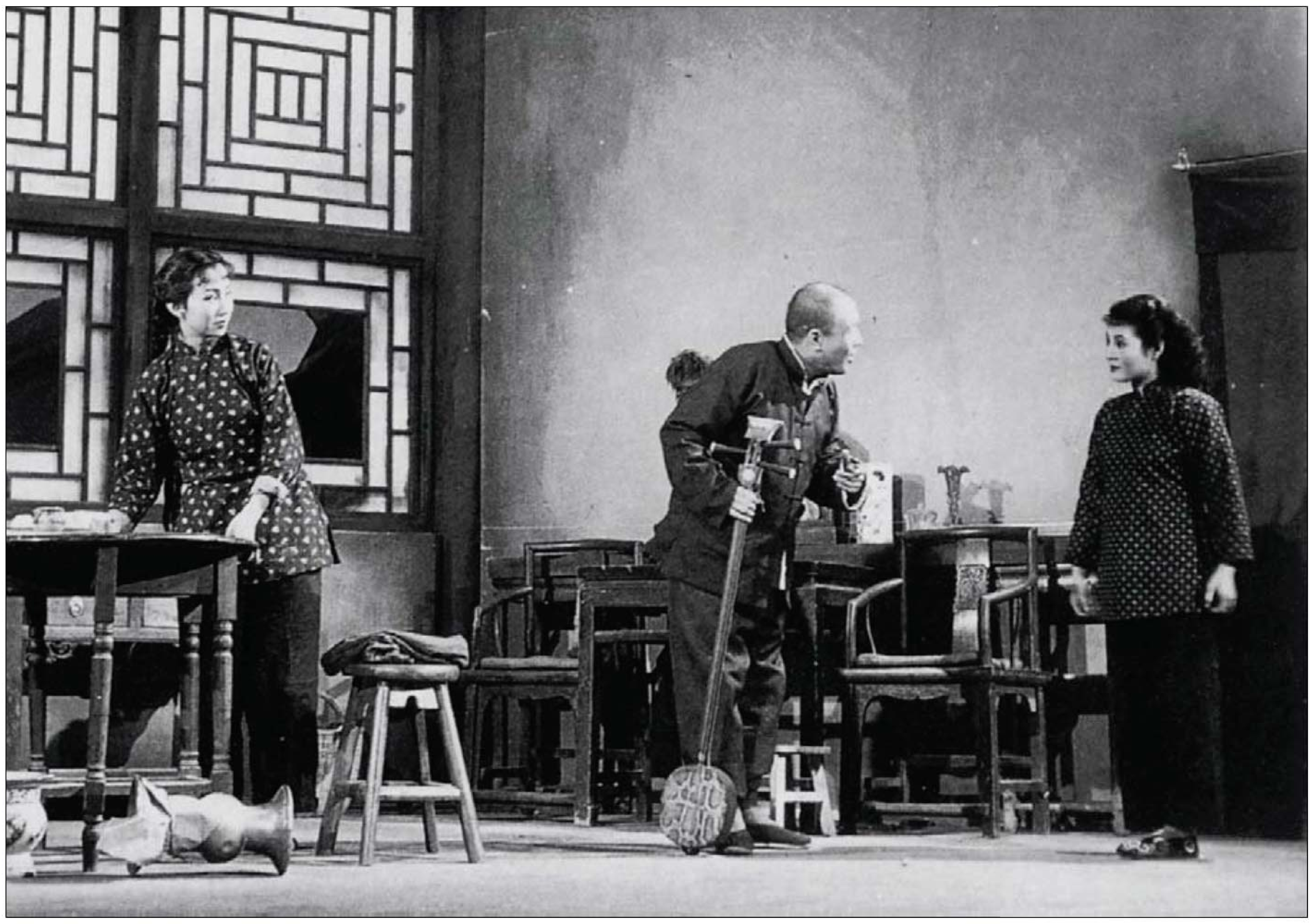
“帮助政府与党，在文艺上为人民服务。”这也是老舍对自己在新中国的文学使命和人生使命的界定。就在这个月，他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发言说：“我理解到：当今的文艺活动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演为原则的。那就是说：文艺须为工农兵大众去服务。”

在老舍回国前的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周扬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肯定解放区文学方向的同时，指出：“除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老舍回国后，找来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52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谈到这篇文章对他的思想震撼。老舍说，他一下子明白了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他自己在小资产阶级的圈



记在老舍笔记本上的老舍曲艺作品目录



话剧《方珍珠》剧照

里混得久了，思想、生活和作品都已经慢慢瘫痪了。以前，在文艺与斗争中，他能把文艺与政治截然分开，以为政治是不同于文艺的“另一回事”。而“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老舍决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

翻看《老舍画册》，发现老舍的装束也发生了变化。刚回国时他穿的是从美国带回的西装。从 1951 年 2 月担任北京市政府委员开始，老舍就正式穿上了标志着政治身份的有棱有角的中山装。

老舍迅速接受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最直接的表现，是老舍放弃了自己的长项——小说，开始大量创作通俗曲艺作品——鼓词、相声、快板，以及开始大量创作话剧。他认为曲艺可以更好地做宣传，“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尖兵”。

根据老舍日记上的记录，回到北京短短两个月里，他就共写了太平歌词 80 行，《别迷信》130 行，《劝北京》（作废）140 行，《生产就业》203 行，以及相声《逛隆福寺》、《新戏曲》、《菜单子》、《文章会》。

他不仅自己写，作为北京文联主席，他还要带动旧艺人转型，搞好团结。

北京市文联成立前，老舍就参加了赵树理、王亚平、苗培时等创办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这是个团结、改造章回小说家和各类旧时代民间艺人的群众性组织。参加的有梅娘、杨六郎、张恨水、陈慎言、陶君起等所谓旧文人。解放后，原先写才子佳人、武侠传奇的作家们都没了出路，需要改造思想，以便写出新时代能接受的作品。老舍在研究会做演讲，给予指导，还支持曲艺界开办“大众游艺社”和“西单游艺社”，亲自带头编写曲艺新段子交给艺人演唱。

老舍认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他说：“国家大事，文艺界不宣传，谁宣传啊？魏喜奎要宣传婚姻法，没本子，总得有人给她写呀！别看不起通俗文艺，老百姓需要啊。大作品要写，而且要写好。曲艺、快板也不可缺，我们国家不识字的人还多着呢！”

1950 年初，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孙玉奎、侯宝林等相声演员也向老舍求救。原先的段子过于低俗不能说了，“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三四篇文章，说相声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为政治作宣传”。相声戴上了“政治不正确”的帽子，剧场不上座儿，说不下去了。当时的相声演员文盲很多，自己也写不出新段子。于是，老舍应相声界之请，迅速写了《菜单子》、《文章会》、《地理图》、《铃铛谱》等新段子，帮相声转型。后来三联书店将老舍的几个相声结集为一本《对口相声》。

老舍出身底层，同情同样底层的旧艺人，彼此交往颇深。他始终称自称“写家”，认为与打拳、卖艺、唱曲儿的一样，没什么崇高之处。小说《鼓书艺人》就取材于他与艺人富少舫的交往，在重庆他为富少舫写过大鼓词。重回北京，他便不由自主的承担起小说中“孟良”的角色，旧瓶装新酒，帮助旧艺人转型。

曾担任老舍秘书的葛翠琳后来回忆说：“当时戏曲还都是戏班，并没有国家津贴，老舍先生很急切地呼吁：戏曲界那么多人要吃饭哪！而且艺不能



1952 年 5 月，在北京参加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的代表们合影
（前排左二齐白石；二排左三梅兰芳；后排左起老舍、郭沫若）

荒，总要演出啊！要多一些人写剧本。”

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国画。解放初期，国画市场很不景气。因为国画内容较窄，画花鸟、山水、仕女为主，有一种论调认为这不能为政治服务，于是出现了山水画中生硬地加入红旗飘扬、拖拉机奔驰等画面。老舍很不赞成。他多次说：“国画具有民族艺术之魂。画中意境、艺术魅力，感人至深。生硬地塞进政治内容，破坏了艺术，也没有了政治。”

国家百废待兴，普通人没钱买画；国画家没有被组织起来，都是自由职业者。这样的状况下，一大批鼎鼎大名的画家们变得穷困潦倒，家里基本上被变卖一空。就连大师齐白石的日子都很难过，一个扇面才 5 元钱，一幅裱好带轴的画才十几元。在文联办公室，老舍甚至亲自帮齐白石卖画。只有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买了一把齐白石老先生画虾的扇子，付了 5 元钱，还说：“老舍亲自为齐白石卖画，一幅也卖不出去，总不大好，我就买了这扇子吧！”除他之外，再没第二人买。老舍无可奈何，就自己买下许多画存放在家中。对于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画家，每到过年，老舍就用自己的稿费发红包，让夫人去送。

后来，老舍觉得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就把画家们组织起来，上午学习，下午找点活儿来干。当时找的第一个活儿是给天安门城楼上画宫灯。宫灯很大，一人多高，先在绢上画，然后绷上去。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批宫灯都是这些大画家画的。再后来，老舍建议成立了国画院，即北京画院的前身。画院成了正规美术家的组织，可以揽更多的活儿。成立画院时，老舍还把周恩来总理请来讲话。

流浪的盲艺人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不仅生活上贫困，而且唱的同样是“陈词老调”，老舍拄着拐杖在街上遛弯的时候，经常和他们聊天。他们告诉老舍，说解放后都很愿意学习改造，可就是没人管。于是 1950 年底，在老舍推动下，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处合作开办了“盲艺人讲习班”，最初有 60 多人参加。地点离老舍家不远，就在丰盛胡同南口。不少盲艺人只要在街上听到拄着拐杖的脚步声，和他们一搭话，就知道老舍来了。后来这些盲艺人，一部分被安排到了戏曲班去演奏。老舍找到北京市长彭真，在香山脚下开办了一个橡胶厂，将另一部分没着落的安排进去工作。

这些旧时代的艺人都成了老舍的好朋友。1966 年老舍自杀后，受到“四人帮”批判，他的家也成了禁区，他人躲之不及，但仍有许多旧艺人常去看望老舍的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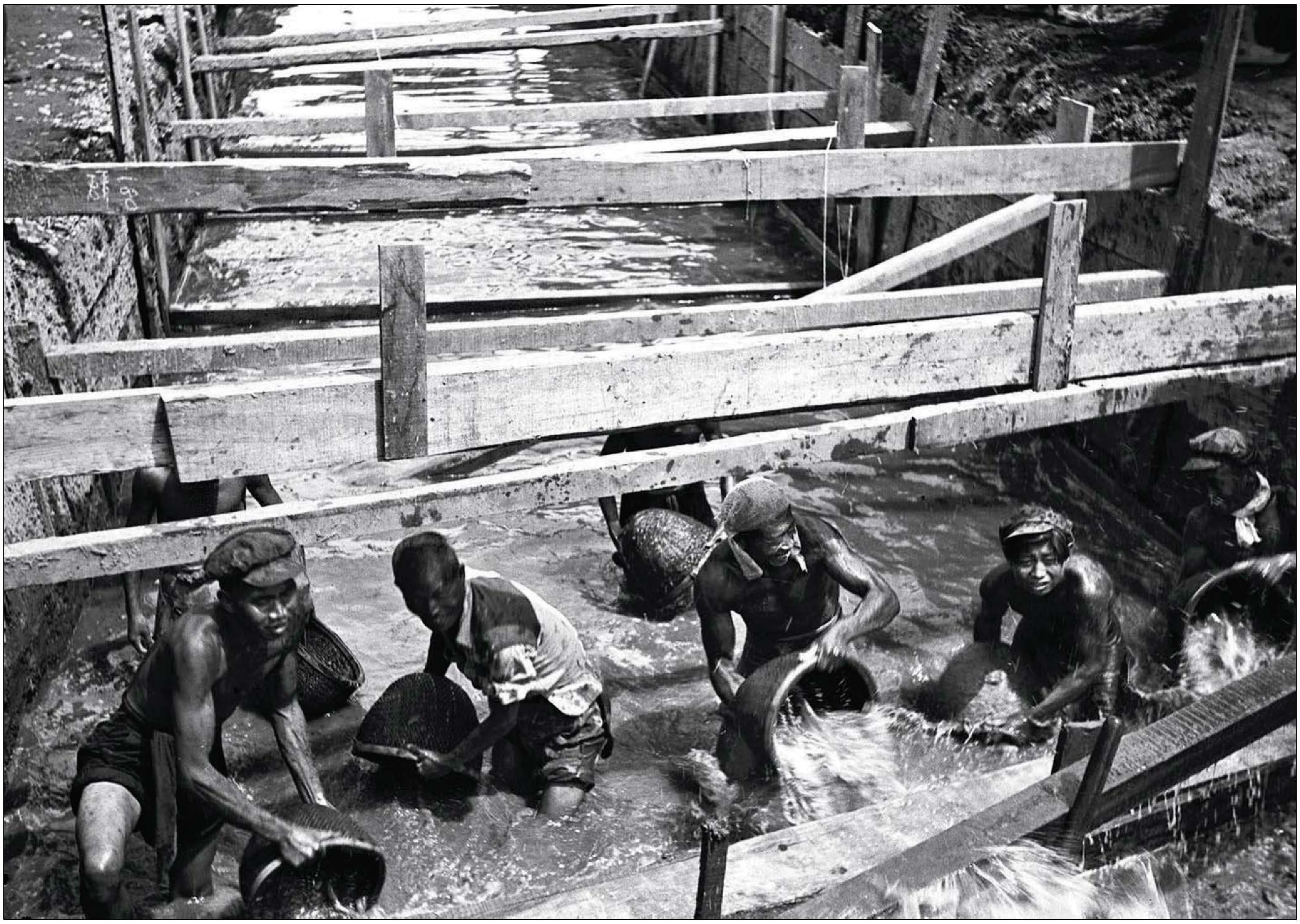
人民艺术家

1950 年 3 月，老舍接受了《文汇报》的采访。他特别谈到，曾有学校请他去教书，他婉言谢绝：“用新道理讲旧玩意儿，由于对新道理还没搞得太清。同时，许多书也都没在手边，所以现在还不敢去教。”他还说，对新社会认识不够，不敢下笔，所以只好写些短篇的、通俗的东西。

与很多曾经的自由主义作家一样，老舍内心是谨慎的。他知道自己以前的东西不能写了，现在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怎么服务？他也很茫然。

这年夏天，老舍先把他所熟悉的旧艺人搬上了舞台，就是话剧《方珍珠》。五幕剧《方珍珠》脱胎于在美国创作的小说《鼓书艺人》，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艺人的不同境遇。艺人们“翻身”解放，不再像过去受各种恶势力的压迫和歧视，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得到政府的尊重和承认，并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开始改造自己的表演内容。

更重要的是，他还创作另一部奠定他在新时代地位的作品——《龙须沟》。这两部话剧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翻身”。如同一切“翻身”模式的故事一样，这两个剧本非常鲜明地凸显了新旧社会的不同。老舍在《暑中写剧记》中说：“我理应写工农兵的生活，但是对他们的生活我毫无所知；闭着



1950 年春，北京市政府组织人力疏浚南城有名的臭水沟——龙须沟。老舍的三幕话剧《龙须沟》据此事创作而成

眼睛乱写是万不行的。”所以他决定写他“所熟悉的人”。

这一年 7 月，周恩来宴请老舍，问他有什么创作计划。老舍说他已基本写完了话剧《方珍珠》，交由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他打算再写一部以北京龙须沟变迁为题材的话剧，并且说，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实地采访。

在北京城南有一条两岸住满贫民的臭水沟，在天桥东侧。由西向东，一直流到今天的龙潭湖。政府决定把一条明沟改造成真正的下水道。时任市委文委书记、文联副主席李伯钊便向老舍提出以此为题材写一个话剧。市政府当时不去修王府井，不去修东单，更不去修中南海，却修了这么一条远离市中心的、两岸住满了穷人的臭水沟。主题是政治性的：刚刚解放，很多人不了解共产党，通过这件事老百姓可以了解共产党，了解党的方针。老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题材，完全可以说明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借此告诉老百姓以前的政权为什么不行。

老舍腿脚不好，文联安排了助手帮助他去实地采访。但实际上，老舍并没有取材于现实，而是像写小说一样，在一个小杂院中塑造了一组他最熟悉的北京贫民。就像李伯钊说的：“拉车的在什么地方解手他都知道。”龙须沟反倒不重要了，只是一个道具。

老舍在剧中塑造一个游离的人物——“赵老头”，简称赵老，“没儿没女，为人正直好义”。在小杂院的居民中，他年纪最大，脾气最刚直，敢于为小杂院里所有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深得居民们的敬重和信赖。他虽然是个 60 岁的泥水匠，却经常让人觉得他更像是政府派到民间来的思想工作者。在此前《方珍珠》中，老舍也安插了另一个相似的角色——王力，负责向旧艺人宣扬新政策，帮助他们实现“翻身”解放，并为他们指引发展方向。

王力和赵老并非推动戏剧动作的内在力量，实际上游离于矛盾冲突之外，但就作品所要实现的主题来说，他们却是核心人物，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作为联结新政府和人民的桥梁。因此，他们被赋予了双重身份：其一是作为“大仁大义”的新政府在民间的化身，引导和帮助人民走上“翻



1952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龙须沟》剧照

身”的光明大道；其二是作为最先接近和信赖新政府的人民代表，时时表达出人民对政府的感激之情。

这两个人物，都有老舍自身的影子，反映了他在新中国之初对自己身份的新定位，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新理解。

作为著名作家，老舍自己也意识到了这部戏的不足。帮助老舍采访的助手濮思温后来回忆，他曾给老舍提过一个意见，觉得最后扭秧歌这场戏不对劲。老舍表示承认：“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睡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后，可就不行啦，不下去，没有生活，戏不够，秧歌凑。”老舍知道，自己对新时代、新生活和新人物是不了解的，所以当他歌颂新社会的时候，难免陷入口号化、标语化、符号化的政治宣讲。

但老舍能写出为百姓、为新政权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是有意识地要迎合谁，而是自觉的生活体验。而新政权对老舍的肯定，也是建立在作家叙述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在《龙须沟》中，老舍借二春之口说：“从此，谁敢再说政府半句坏话，我就掰下他的脑袋来！”1950 年的老舍就是这么想的。

焦菊隐成了《龙须沟》的导演，这是他和老舍的第一次合作。他带了一群刚二十出头的青年演员，包括于是之、郑榕、黎萍等，加上个别老演员，如叶子，花了好大力气，排演成功，一炮打响，不仅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风格，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人艺”的演出制度。

《龙须沟》的上演引起了政府高层的注意。1951 年初，周恩来观看了这部话剧，给予了很高评价。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表示：“它帮了我的大忙。”话剧通过艺术的形式告诉人们，人民政权是怎么回事。他还将舞台搬到了中南海怀仁堂，推荐毛泽东观看，同时希望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出面给予表扬。

1951 年 2 月，李伯钊在《人民日报》上率先刊出评论《看〈龙须沟〉》。3 月 1 日，廖承志的《贺〈龙须沟〉演出成功》一文发表于《光明日报》。3 月 4 日，《人民日报》登载周扬的《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周扬在文章中写道：“《龙须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老舍先生不过忠实纪录了修龙须沟的事件，但他没有做新闻报道式的纪录，也没有写真人真事，他创造了几个真正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他使这些人物都和龙须沟联系起来。”并且他“锐利地观察到了革命的影响所引起的各种人物的深刻的心理变化”。最后，周扬号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向老舍学习。

周扬想给老舍颁发“人民艺术家”称号，但解放区来的一些作家不服气。因为，老舍既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在解放区生活过，被认为是革命的“摘桃派”。

这时北京市长彭真就及时站出来，提出由北京市政府表彰他。于是，1951 年 12 月，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决议，“授给名剧《龙须沟》的作者舒舍予（即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奖状原文是：“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怀；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特授予老舍先生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同时获得奖励的，还有导演焦菊隐和演出该剧的“人艺”演员及工作人员。

这个奖状上署名有：市长彭真，副市长张友渔、吴晗。老舍十分珍惜这一声誉，将奖状一直挂在他的书房。12 月底，北京市文联召开理事及文联干部会，到会的 40 余人，热烈祝贺老舍先生荣获“人民艺术家”荣誉。

对《龙须沟》而言，从这部剧的写作之初，到最后的表扬，都有政治领导人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在起作用。

那么，老舍自己又是怎么总结的呢？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暑中写剧记》。文章结尾处，他详述了政府给与他写作的种种帮助和便利，从帮助找资料、协助采访到减少日常工作。他写道：“写此二剧，我得到向来没有过的创作上的愉快与兴奋。在解放前，


（钟巨治 摄／新华社 供图）
1962年上演的话剧《神拳》剧照


电影《龙须沟》剧照

文艺创作几乎是件犯罪的行为；现在，我在动笔之前即得到各方面的鼓励，使我觉得我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大家重视文艺，尊敬文艺工作者。……这种体谅增加了我的自尊心，大家对我好，我便也要对得起人，绝不偷懒。”

而当时，和他同时代的老作家们，无论茅盾、巴金还是曹禺，都还无法写出新的作品。

此后，老舍陆续担任了27个团体的30个社会职务。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印友好协会理事、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他的身上有很多标签：出身底层、少数民族、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生活经验并对此“深恶痛绝”，还能讲流利的英语。这些社会职务占去了他大量时间，他要求自己上午写作，下午办公。

胡风的妻子梅志的话代表了当时很多作家的看法——“老舍很快就走了，被政府养起来了。”老舍从哪里走了？又去哪里了？很费思量。

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老舍曾在天津南开中学短暂任教。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在国庆典礼上说，他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任务。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预备牺牲，再负起一个十字架。

当1950年老舍成为“人民艺术家”4年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老舍在发言中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

从“好不好”到“对不对”

老舍虽然认为是穷苦人出身，但和其他来自国统区知识分子一样，思想改造这一关他一样要过。

1950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老舍选集》，这是老舍在新时代出版的第一本书。书中收录了几篇短篇小说，包括《黑白李》、《断魂枪》等。老舍写了篇序言，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序言中，老舍对自己的创作思想进行了第一次检讨和批评。

文中，他批评自己未“下工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特别是在革命文学兴起时，自己虽受普罗文学的影响，创作了《黑白李》，不过“没敢形容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他承认自己的作品“缺乏了积极性，与文艺应有的煽动力”。为此他检讨说：“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最糟糕的，是我，因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

写于30年代的《猫城记》，是老

舍最悲观的小说，也是他最受争议的作品。他不仅讽刺揭露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同时也对革命，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进行了讽刺。如称政党为“哄”，称共产主义为“大家夫斯基主义”。《猫城记》成为老舍在新中国的一块始终无法抚平的心病。

关于《骆驼祥子》，他承认自己“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他继而说：“我管他（祥子）叫作‘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最后，他谦卑地说：“我的确知道，假若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明确的指示，这篇序便无从产生，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

这篇序言首开老舍自我检讨的先河。在接下来的10年中，在各种散文、文论、时评，甚至是在对老友的纪念文章中，他都不遗余力地检讨、批判以前的自己。批判的核心在于他所秉承的自由主义立场。

1951年6月，老舍撰写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文。在极尽感谢之余，也对自己的思想做了较为深刻和全面的检讨。他说：“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我没有坚定的立场，因而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斗争。对什么事，我都愿意和平了结——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真理不放。”

随后，他在《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中着重清算了自己的幽默风格。他说：“我没反对过革命，可是我的没有原则的幽默，就无可原谅地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

对于自己思想的批判，最尖锐的一篇来自怀念亡友的文章——《悼念罗常培先生》。语言学家罗常培是老舍的挚友，从小学阶段即在一起，相知多年。他通过怀念罗常培，来批判他们共有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老舍说：“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的好处是能使他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可它也有“孤高自赏，轻视政治”的毛病。这个代价就是因为不关心政治而带来的。“在革命的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的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的独立不倚。”

“独立不倚”曾是老舍最为珍视的精神，他无党无派，独来独往，他曾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正是“独立不倚”成就了他的一系列作品，从《老张的哲学》、《猫城记》到《骆驼祥子》。现在他彻底反省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在1951年《为人民写作最光荣》一文中，老舍说：“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而现在，“我最注意写得对不对”；“对而且好，才算真好；不对，就不好”。

进而，老舍开始否定自己解放前的作品。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他撰写了《毛主席给了我新生命》，谦卑地总结说：“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

在新中国前后，老舍对自己作品的态度完全相反。

1946年，去美国前，老舍曾和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合作，成立了晨光出版公司。他从美国版税中抽取部分资金，汇给赵家璧，作为股本。出版公司的一个重要计划就是要出版一套老舍全集，用最好的纸张印刷。虽然全集没有完成，但是晨光出版公司陆续收回了老舍此前的一些作品版权，单独出了一系列小说单行本。这些40年代末的书籍，还能在国内大图书馆内查到、借阅。

但是，解放后，老舍不仅打消了出全集的愿望，甚至不再愿意出版自己以前的作品。楼适夷回忆说，1957年后出版社组织重要作家的多卷文集，计划中列入了老舍的名字，经过长时间多次要求，他就是不肯允诺：“我那些旧东西，连我自己都不想看，还叫别人看什么呢。出了一部《骆驼祥子》就算了吧，我还是今后多写一些新的。”

就连《骆驼祥子》，也是老舍进行修改后的“洁本”才得以重新出版。老舍将最精彩的关于祥子堕落毁灭的长段文字全部摘除——“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老舍还将“革命者”阮明的情节全部删去。在小说中，阮明是一个逃避读书，为了钱而去“革命”的青年人。而祥子最终将阮明出卖，换取了60块钱，继续堕落下去。《骆驼祥子》展示了一个双重的荒诞悲剧，健康的祥子堕落为野兽，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出卖了一个伪“革命者”。但经老舍“摘除”后，原作的悲剧意蕴便显得十分苍白。

很显然，老舍是出于政治考虑才做这样如此修改，事实上，解放后不久已经有评论者批判了《骆驼祥子》在思想上的“反动”。作家巴人在《文学初步》的“再版后记”中写道：“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将革命者看作是‘为钱出卖思想’，这正是单看现象，不明实际的‘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

老舍虽然没有办法将其改成无产阶级文学，但至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相同的情况还见之于《四世同堂》第三部。老舍在美国已经完成了第三部《饥荒》的撰写，一共33段，并翻译



1951 年，北京女二中学生踊跃签名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情景

成英文缩写本出版。但与《骆驼祥子》的小心修改不同，老舍干脆让这本书“突然死亡”。

老舍回国后，将《饥荒》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直到 1951 年连载了 20 段 13 万字后终止。后 13 段则被老舍删去。在有生之年，老舍并未说起过删节原因，而底稿也销声匿迹了。

老舍为什么会砍掉后 13 段呢？胡絜青和舒乙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小说的结局过于悲壮，中国虽然胜利了，小妞子和李四爷都死了，活着的人骨瘦如柴，衣不蔽体，与“胜利者”的高大形象太不相称。另外，老舍依旧没有正面写革命者，祁瑞全虽然作为地下工作者回来了，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只是一个爱国者。在书中，老舍也没有写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场和功勋。

除此之外，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四世同堂》还存在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雷区。比如，怎样评价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生活与斗争？能否在作品中出现“委员长”、“中央政府”的称谓？可不可以只写沦陷区人民的苦、饿、穷、绝望、死亡和反抗，而不写共产党和统一战线领导的战争？

事实上，50 年代的几部文学史都对《四世同堂》进行了批判。认为这部作品游离于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制定的文艺路线之外，责备小说没有表现抗战中的“积极”方面，批评作家仅把冲突限制在被占领的北平城内。



这些问题困扰着老舍，我们无法想象在他已获得“人民艺术家”荣誉后的内心挣扎。于是他采取了最简便的办法。只写到老三祁瑞全作为战斗者重返北京，便煞了尾，便将这部书尘封于故纸堆中，掩埋起来。

在如何对待自己思想和自己作品的问题上，老舍既是真诚的又是矛盾的。他实际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曾经的作品终究无法割舍，于是在表述中也不免暧昧。在《老舍短篇小说选》的“后记”中他说，“古董也有古董的好处”，没什么大问题一概不改。

他的秘书葛翠琳曾谈到一个细节。某出版社将老舍解放前的小说选取了几个片段集合在一起，出了一本书《大杂院里的人们》。老舍当时还在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他写信回来详细询问：“此书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究竟是从哪部作品中摘选的？选取的又是哪些章节？内容提要是怎么写的？”最初葛翠琳不解，后来才想明白：“那是一个信号。是对老舍解放前的小说给予承认，并且出版了，尽管它只是片断。因为出版社都是国家的，出版什么书是经过层层领导审查批准的，具有权威性的表态。”

在老舍内心深处，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以前的作品全无价值。1959 年，老舍对老友赵家璧说：“老巴（巴金）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这显然已经是对政治运动的恐惧了。

“赶任务”

戴着“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又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作品，老舍必须拿出新作品来。他一面检讨自己，一面不停地写作。

从 1950 到 1963 年，老舍共写了 15 部话剧、一部曲剧、三部京剧、一部歌舞剧、四部歌剧、一部电影剧本，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以及 40 多万字的各类曲艺、鼓词、相声、快板、太平歌词、新诗。如果算上没发表的“废稿”，他一共写了 40 多部各种剧本。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同一代作家中写作数量最多的一位。但遗憾的是，真正的精品很少。高峰之作，只有话剧《茶馆》和刚开了头的残篇《正红旗下》。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写得最多的是话剧，而不是让他声名鹊起的小说。老舍也自知不擅长写话剧，但却非写不可。主要原因，正是为了配合各种宣传任务。正如他在《十年笔墨》一文中所说的：“我急于写出作品，并期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政治热情。剧本这个形式适合我的要求。”

为配合政治宣传，就要写新时代、新人物和新政策，这恰恰是老舍不熟悉的。为了和政策靠得近，越写越多，越写越着急，就像“赶任务”一样。他在《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文中说：“以前，我写作，是要等着虚无缥缈的灵感的。现在，我高兴‘赶任务’。”

1952 年，独幕剧《生日》便是为了“赶”“三反”运动而写。这一题材，老舍已没有足以支撑剧本的生活基础了。剧本中不断地说斗争、坦白，全剧既没有戏，语言又全失光彩。

《春华秋实》是为了配合“五反”运动的，这个剧本一共写了 12 遍，每改一遍都是从头写起，“尾声又写了六遍”现存遗稿有五六十万字。一年间，为一个剧本忙活到如此程度，对老舍来说近乎空前，这也创造了中国话剧史改稿遍次及工作量之最。1952 年初，老舍开始写《春华秋实》，到了 5 月中旬，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将剧本交给北京人艺副院长、导演欧阳山尊。此后，一直到 12 月份，老舍一直在忙碌地修改。1953 年 1 月，彭真、胡乔木、周扬、吴晗等审看彩排，他们肯定剧本有基础，但指出戏里缺少对正义力量的描述。胡乔木指出，尾声要重写，第一幕要加一场工人的戏，“老虎窝”整场戏去掉。

第二天，曹禺、焦菊隐、赵起扬赶到老舍家紧急会商，谈了两天才有了供初步修改的框架想法。1 月 29 日，老舍向全体演员通读重新写过的剧本，大家听了继续提意见。1 月 30 日，老舍不得不重写第二幕。2 月 5 日，曹禺和部分演员到老舍处听改写后的尾声，众人提了意见，老舍只能再改。剧本的大杂烩色彩于是愈来愈浓：剧中工

会主席的报告词，就直接采用了当时大众铁工厂工会主席刘守中的发言稿，卓娅的台词也是根据一位女学生的日记整理而成。1953年2月15、26日，胡乔木两次写信给老舍，对此表示忧虑；他还用了一大段类似中央文件语气的文字阐述“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并表示，这样写，才真正写到了1952年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

老舍只能一次次应付各方的需求。比如，市公安局认为：“应把政府对私企业工商业的照顾与扶持、劳资关系等方面问题加一些进去。吸烟动作过多了一些，警卫在看守时可以不吸。”宣武区的几位干部建议，剧本应该在如何解除资本家的思想顾虑方面更充实一些，“五反”后劳资关系的改进、工人生活情绪的高涨也写得不真实、不丰富。

欧阳山尊后来总结，似乎谁都可以提意见，尤其是剧中涉及的工人、资本家、检查组、工商联等。其中有人提到“工商联应撤销丁经理职务”，这一条很快加入戏中。

最后剧本近乎失控了，只能由周恩来出面定夺。舒乙后来回忆，周恩来把老舍请去说：“我要跟你彻底讲一下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过去讲得不透彻，现在运动结束了，我们应该很明确讲出全部内容。你按照我讲的定论重新写一遍，要很艺术，不要公式化。背后要贯穿政策，让人领会团结、斗争、改造的政策。”“后来，这一遍总算基本合格，费了很大的劲。”

《春华秋实》的写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五六十年代“三结合”的“创作”模式：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剧作家在获得政治层面上的高度重视的同时，在艺术层面上却几乎沦落为加工员，甚至是书记员了。既然文艺作品要按照定论来写，那么所谓不要公式化，就只能着眼于对所写事件的表面进行一点艺术处理。

1956年，老舍的合作者、人艺导演焦菊隐，在《导演手记》中描述了一位“谨小慎微的费大哥”，从中多少能看出老舍的影子。他写道：“据我所知，有那么一位作家，把新写出来的剧本初稿，送到各方面征求意见。各方面都认为这个剧本基础很好，大有可为，一再加工，将会是很优秀的。但是，等到作家根据各方面一再提的意见，反复修改到十次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惊讶起来了，连他自己都不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了！他诅咒自己，再也不写剧本了。”

老舍不是没有困惑。1953年，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发现自己的作品“因临时赶任务而成了新闻的翻版”，尴尬的询问：“赶任务即是凑数，如何是好？”他微弱的反思很快就被强大的外力掩盖了。

1955年，老舍写了一个多幕剧《青年突击队》，全剧以在建筑工地上推广计件制为中心，写如何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如解决砖头供应不上及工种的搭接问题，找窍门提高生产效率，监视特务的破坏活动并在他放火时予以逮捕，教育青年工人虚心向老师傅学习，以及帮助老师傅克服保守思想和私心，在向青年人学习的同时，将技术传授给青年人等。剧本所写，除了特务的破坏活动外，就只剩下一些肤浅的矛盾。

1956年，他应公安部长罗瑞卿之邀，写了《西望长安》。剧本以骗子李万铭为原型，写他冒充战斗英雄，以此讨到了老婆，还得了处长级待遇，最后因冒充军参谋长兼师长而败露的经过。老舍想写一个讽刺剧，但实际上既不讽刺，也不幽默。因为他无法将讽刺的矛头对准“干部”。因此骗子能够得逞的原因，就只能归结为崇拜英雄、轻信和官僚主义。

他后来开解说：“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制度。”

1958年“大跃进”，老舍拼凑了剧本《红大院》，大家吃食堂，下乡锻炼，义务劳动，义务带孩子，办工厂不为赚钱等等，都从正面作了歌颂。剧中说“天下无难事，只要想做就能够做的好”，“会创造一个比月亮大一点的卫星”，剧末宣称“共产主义”“不远啦”。

老舍不停地写，被周扬称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但他对自己的作品却是不满意的。作为优秀的作家，他赶任务所得的一系列话剧到底水平如何，他心里最清楚。

“这二年我所写的东西……并不怎么好。”“五年来所写的剧本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近几年来，我写了大大小小不少的作品。可是，写得好不好呢？肯定的说，不怎么好！”“从写作上来说，解放八年来，我虽不肯偷闲，但并未得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成绩。”类似的总结有20多篇，时间跨度贯穿了老舍最后的17年。可以说，老舍晚年大部分时间都深陷写作困境中，不能自拔。

老舍一直以为自己之所以积极配合却没有配合好，是因为对新生活的理解不够，是“生活不够”，实际上却是配合的要求与配合的热心都错了位。这一时期，政策的宣传要求，正是他的短处。因为他根本不熟悉新人物，也写不好新人物。无论他怎样去“深入生活”，甚至拖着病体去朝鲜前线住了半年，写出来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依旧不忍卒读，与解放前的作品相差甚远。他在不停地追赶时代，却远离了自己的心灵家园。

到了1961年，老舍个人新创作的剧本还有《宝船》、《神拳》、《荷珠配》三个剧本。此时，老舍已离开了现实题材的创作。他所信奉并努力实践的，以主题先行论与题材决定论以及歌颂和拔高先进人物为内涵的“赶任务”



1958 年，北京的文艺工作者在前门大街做宣传活动

的创作观，黯然收场了。

但就在《红大院》之前的 1957 年，老舍却完成了中国话剧史的不朽之作——《茶馆》。

《茶馆》与“红线”

文学史总是出人意料。就在老舍深陷写作困境时，在多方机缘的共同作用下，他突然返回了自己的轨道。于是《茶馆》诞生了。

《茶馆》的写作是在 1956 年秋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文艺界暂时松了绑，也将老舍从困局中拯救了出来。在写《茶馆》前后，他自己的思想先被解放了。

这一阶段，老舍先后发表了《什么是幽默》、《谈讽刺》、《论悲剧》等一系列文章。他指出，社会主义同样存在黑暗面，作家也可以用幽默、讽刺甚至悲剧的形式去表现。显然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无冲突论”做出的回应。

1957 年 1 月，老舍在《人民中国》杂志用英文发表《自由与作家》一文，是他在解放后最为“大胆”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他对作协提出了批评，作协有义务帮助作家，但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不是一个衙门。有衙门就有官僚主义”。他对于宣传性的写作提出抗议：“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更加尖锐的是，他对某些领导干部也进行了抨击：“有些政府干部热情有余却成事不足，他们只想让创作服从于命令。行政干预无论动机多么好，都会必然妨碍创作真正的艺术。……实践百花齐放，首先就要取消以行政命令方式干预创作。”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老舍开始了《茶馆》的写作。当时他最先写了一部宣传宪法的剧本——《人民代表》，时间从清末一直跨越到了解放后，主人公为秦氏三兄弟。第一幕戏就设定在一座茶馆里。焦菊隐、曹禺等读过剧本后，觉得通过茶馆这个场景可以写一部反映时代变迁的大戏，建议这个戏就叫《茶馆》。对此，老舍习惯性的反应是：“那就配合不上了。”但他很快为这个想法而激动，兴奋起来，他表示“马上写出来”。

焦菊隐的建议，改变了剧本“配合宣传”的命运，使老舍重新回到了



（新华社/供图）

1958 年 3 月 29 日北京人艺彩排《茶馆》后，老舍与导演焦菊隐、夏淳（前排右二、右一和右三）及演员于是之（前排左二）等一起讨论剧情

融于血脉的“旧时代”中。《茶馆》的第一场便显出了夺目的光彩，又碰上了识货的人。于是，一个正确方案形成了：从这成功的一场中发展出一部多幕剧。

《茶馆》一剧很有气魄，上场人物多至 70 个以上，开口说话的就有大约 50 个。全剧共三幕，分别写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军阀混战及 40 年代后期这三个时代。与《龙须沟》愈往后矛盾愈淡化与减少不同，《茶馆》中的王掌柜是一幕比一幕日子难过；由此，与《龙须沟》的一幕比一幕内涵单薄不同，《茶馆》的悲剧色彩是一幕比一幕浓了。因而，《茶馆》显然比《龙须沟》更符合戏剧所要求的一幕比一幕收紧，最终形成总的高潮。三幕大戏中，老舍为旧时代送葬。其时代感与文化韵味，已大大超出了老舍长期遵循的“新旧对比”模式，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由于对旧生活的熟悉，老舍甚至能够教演员动作。由此在这部戏的排演上，他具有了一定的主导权。清末满人充满种种小玩意的生活习惯、北京的世俗人情，这一些被老舍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不仅是他极为熟悉的，他还深刻体会了其中的悲剧意味。因此他不再像《春华秋实》那样，听任四面八方的意见，跟着不断地修改。

最精彩的依旧是老舍最熟悉的第一幕。曹禺曾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变法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

《茶馆》首演是在 1958 年的 3 月 29 日，正值“反右”尾声与“大跃进”时期。政治风向再度收紧。在《茶馆》上演前的审看阶段，人艺内部已经受到了压力。原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回忆，意见主要集中在三点：一、为资本家秦二爷翻案；二、为以松二爷为代表的遗老遗少鸣冤叫屈；三、宣扬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茶馆》上演了 49 场，于当年 7 月 10 日停演。极“左”的政治氛围已不再允许这部戏的存在了。

饰演王掌柜的著名演员于是之后来回忆，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当时直接来到了人艺，召开党组扩大会，对《茶馆》进行批判。他谈的是“关于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刘芝明批评剧院领导在组织创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内容，有点过多地追求形式”。他质问：“《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

反抗的力量？”他进而提出，“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政治风格，其次才是艺术风格。离开了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政治灵魂不在位了。”

7月10日当晚，恰好有一位苏联戏剧专家彼德罗夫来看《茶馆》演出，由老舍、梅兰芳陪同。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他安排的。演完这一场后，《茶馆》经历了第一次停演。

随后，报纸上开始了对《茶馆》连篇累牍的批判。认为这个戏没有真实地、全面地揭露各个历史时代的本质，没有把反动派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贯穿到整个剧本之中，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更没有揭示出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垂死挣扎的“纸老虎”的本质；结尾三个老人的自悼，根本算不上“给旧时代送葬”；作者在塑造与对待不同阶级的人物形象时，缺乏阶级观点，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大量的负面意见甚至批判，老舍一概没有理睬。这在此前老舍新中国时期的剧作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次他没有再改《茶馆》。

1958年，老舍发表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所以不愿意写大人物大事件，改变《茶馆》的既成结构；“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沈处长“那几个‘好’字也有根据。没有生活，掌握不了语言”。话说得坚决，而且没有余地。

但《茶馆》要重新上演，就必须加政治“红线”。老舍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说：“我同意加强红线。咱们还是‘小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的好，要我来加强红线真有困难，因为我没有那种生活。”然后一拱手说：“那就拜托诸位了。”为了加强红线，人艺组织了一个小组，由夏淳、于是之、童超、英若诚等人组成。

第一幕加进茶馆茶客对老百姓砸教堂和谭嗣同讲维新的同情；第二幕，加上了五四运动学生在茶馆门口演讲，时代挪到了五四运动前夕。第三幕，继续加强学生运动的分量，全剧最后以常四爷贴革命标语而收尾。

1963年，加了“红线”后的《茶馆》再次上演。但老舍内心不愉快，但他又不能说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戏。于是之回忆：“演出前，连排两次、彩排一次及一次首演，老舍先生都去了，他没去后台，也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

7月7日，周恩来在出国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告诉焦菊隐等人：《茶馆》这个戏没有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说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在戊戌变法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他说完这个意见后马上叮嘱了一句，不要去传达这个意见，以免说不清楚，他要亲自去告诉老舍先生。

《茶馆》第二次上演，也只演了53场。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表“大写十三年”的讲话，提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还说，“‘天上的（神仙的）、地下的（死去的）’都不看了，要看十三年的”。所有的题材被限制在新中国13年的范围内。

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回忆说：“总理先说了这部戏没问题，后来又推荐我们演《年轻的一代》。我们见形势逼得紧，报上不让发演出报道，只好就收了，自个儿撤了《茶馆》。”此后，《茶馆》这部戏便被封存起来，再度上演要到1979年了。

政治运动中

老舍回国后不久，亲自去天坛参加了一次斗争恶霸的大会。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受现场气氛的鼓舞，他也和几百张嘴一起高喊起来，“该打”、“该打”。

老舍把这次参加运动的感受写进了一篇文章——《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他说：“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

老舍意识到“他变了”。从一个“文文雅雅”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反美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的主要课题。老舍对美国的批判从一回国就开始了。在欢迎老舍回国的联欢会上说，老舍说，美国的一切艺术都与金钱发生关系，几乎成了帮助资本家麻醉群众的工具。此后，老舍不断地申明这一立场。他在全国文联群英会的《致贺致敬》中说：“华盛顿是西风摇落，群鬼唱歌；北京是东风和畅，百花竞开。”

从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老舍几乎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罗隆基、章伯钊、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等“右派”言论。老舍或在会上发言“痛斥”批判对象，或写文章公开发表。

胡风与老舍在1938年武汉文协时期即有往来，虽说不上是一个圈子的至交，彼此也曾长期共事。1944年，“文协”在重庆为老舍举办创作20周年的庆祝活动，胡风专门写了长文祝贺。但在政治运动当中，老舍却不得不摆出一派誓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姿态。

1957年老舍写了批判好友吴祖光的文章，老舍批判的理由却十分可笑：“我的年岁比他大，精力比他差，也比他忙。……他自己写不出来，只好怨恨共产党领导错了。可也奇怪，我与



1963 年初春，老舍在家中



他都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写而他不能写，难道这真是党的错吗？……吴祖光，回头吧！”最后一句“吴祖光，回头吧！”仍是站在了团结朋友的立场上。

老舍写批判文章，是不是出于自愿，今天已无从查考。但是，当时对那些必群起而攻之的“反对派”，不写批判文章就过不了关，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批判是要批判的，也许还是出于自愿，但总归于心不忍。反而，总借一些机会说几句别样的话。

然而在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中，老舍却带了很强的主动性。也许，这是他受到此前某些解放区作家压制后，情感自然流露。在以《树立新风气》为题的一次作协讲话上，老舍甚至无法掩饰自己所承受的怨气：“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对于冯雪峰，他在一次发言中更具体地说：“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老舍感到很委屈：“冯雪峰同志来到重庆，我们必须向潘公展递收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保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

老舍从抗战“文协”时代起，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维护文艺界的团结。解放后，大小的讲话中，他说了无数次的“团结”。然而在“反右”时期他却要面对“他人是地狱”的叵测现实。他批判冯雪峰的文章标题依旧是《为了团结》，他真心希望“一切作家都该以诚相见，爽爽朗朗，见面，亲切握手；谈起来，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王蒙后来回忆老舍在作协的发言时说：“没有恶毒的语言，也没有主动去揭发。而且他还保持着老舍的风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所有批判者，他一定坚持用‘您’。‘您，丁玲同志，还有您，陈明同志，我认为您们的思想是错误的，您们的做法是反动的。’反正说的是这种空帽子，前面都加‘您’，让人哭笑不得。”

在某些场合，老舍的发言则带有一种自保的色彩。艾芜回忆：“1957年北京文艺界在王府井大街文联大楼开反右斗争大会，老舍参加了。在这会上，大家都很紧张，老舍也不例外。他在会上发言，大声地说：‘我过去在重庆的活动，艾芜、沙汀是知道的，他们可以做证人。’”

另一方面，老舍在履行批判的义务后，又通过自己的言行，向批判对象送去温暖。1950年当胡风已受冷遇时，老舍致信相邀：“希望您克服自己，多写点东西，我们都等着看读！……现在来京正好，小白梨正漂亮，螃蟹也肥，喝两杯怪好！”解放后，沈从文境遇极差，在文联听完报告后，老舍主动招呼他：“从文，一块儿走。”“反右”中邓友梅被错划下乡劳动，老舍关怀地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不是！有出头的日子。”吴祖光被送北大荒劳动，老舍赠送新凤霞信纸和钢笔，嘱咐她每天给吴祖光写信，又从街头买回吴祖光的画作送还。对没有什么交往的丁玲，当她1960年从北大荒返京参加文代会时，在异样的孤单冷清中，“只有老舍在休息时与丁玲寒暄过”。

无论老舍在政治运动中的言辞如何，几乎没有看到被批判者对于老舍的记恨。如吴祖光在事后说：“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

“反右”运动中，老舍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骂他的匿名信并作了回复。匿名信说：“老舍：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上万的所谓‘右派’就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没有呢？”老舍回复说：“我以前歌颂过共产党，现在和将来还要继续歌颂。”老舍为什么会公开这封匿名信呢？是自嘲、自遣、自证，还是一次无奈的表态？




1960 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与老舍握手，右二为梅兰芳，右三为田汉

场面外的老舍

“政治运动的事，老舍也不能介入，不好替别人讲话，但他还是很关心作家们的处境。有时他来办公室，送他几份简报，他看了从不说什么。”葛翠琳后来回忆说。她特别对比了老舍和冰心的不同处境。

“老舍和他的老朋友们在文化界大都担任了专职领导职务。”很多事情他必须要表态，即使他不说，上级领导也要主动了解他的态度和思想状况。老舍没有沉默的权利。“冰心最大的幸运，是从未担任过任何实质性的领导职务，她始终只是一位作家，完全以作家的身份，从作家的角度看待一切人和事，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或者沉默不发表意见。她完全保持了作家的气质和作风。”但“老舍却不得不把自己分成几部分。老舍的悲哀，在于他花费很多时间解决许多与文学创作无关的具体事务，而他又对任何事也无权决定处理”。

儿童作家葛翠琳毕业于燕京大学，解放后分配在北京文联，为老舍做秘书，直到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她在《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一文中描绘了另一个老舍。那是一个边缘的、“场面外”的老舍，他苦闷、孤独、困惑、压抑、抗争，与“革命”格格不入。“他似乎很孤独，常常静坐沉思默想。”

在公开场合，老舍虽然“积极主动”地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断发言、表态，甚至言辞激烈，但内心深处，却是对政治运动抱有怀疑态度。

有一次，文联在中山公园开完会。老舍徒步走回家，在公园北侧河边站了许久。他望着故宫城墙叹息说：“‘三反五反’运动中，有的朋友跳进这条河里了。”然后又情绪激动地说：“他没有贪污么！怎么能承认是大老虎呢！”随后，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河水，像一座雕像。“有一点老舍心里肯定很明白：在强大的政治运动漩涡里，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葛翠琳说。

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文艺报》也受到了批判。党内的主要评论家作家们，几乎一致地表态紧跟这次批判，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这种批判的正确性。老舍却为《文艺报》进行了申辩。当北京市传达布置学习时，老舍对一位领导说：“《文艺报》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刊物呀，白纸黑字印出来，上边都是看到的！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也不能完全是《文艺报》的责任。孰是孰非？应该实事求是。我看了《文艺报》，如果接受了《文艺报》的观点，那就是我的问题，我又不是小青年，长着脑袋干什么的？到这会儿了，我找《文艺报》算这笔账去？要批，我只能批自个儿喽！”

市领导同志向他解释：“这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不理解可以等待，但不能唱反调。”老舍叹了口气，不做声了。

在老舍写的那些表态文章中，我们并不清楚，究竟哪几篇是他写的，哪些不是。但可以确定的是，确实有文章为代笔。

萧乾 90 年代回忆，他就曾经代老舍写过一篇题为《纪念英国伟大的


1960 年，周恩来在春节联欢会上与老舍交谈

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的文章。那是1953 年，为纪念英国作家菲尔丁逝世200 周年，上头要求萧乾为老舍写个发言稿，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老舍派人送稿费，带话说，文章不是他写的，稿费不能要。但萧乾也不肯收，因为署名不是他。最后稿费一人一半。

上级领导要经常了解对一些事件的看法，掌握他的思想动向。在“肃反”运动中，某领导向老舍通报了一个案例：某党员老作家，将自己的老婆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重点揭批，以此教育大家，为了革命的需要，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然后领导问老舍有什么意见。老舍生硬地回复说：“我想问一句，那位老作家的老婆，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又坚定地说：“这样的事，我办不到。”随后转身离席，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在文联，他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恭顺者。

在自己的文学领域内，老舍会特别坚持底线。舒乙曾回忆，解放后老舍就不给别人的书做序了，现在《老舍全集》中也找不到解放后老舍为别人写的序。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曾经的学生和老友金受申，“他也对金受申那部工具书性质的著作感兴趣”。葛翠琳曾透露，文联党组书记、市文委书记李伯钊曾经写了一本书《长征》，请老舍写序。她是老舍的直接领导，还曾担任北京人艺的院长。但老舍一口回绝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老舍先生的一个原则，不给任何人写序，不管你有多大权势。其目的很清楚，就是他不好表态，不愿吹捧别人。”舒乙说。

北京某主管文艺的领导，挂职文联副主席，也是革命资历很长的女作家。她写了一部小说文稿，请老舍看，希望他能发表意见。老舍看完了说：“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这位老作家面孔严肃地说：“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啊、星星啊、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情调……”老舍也满脸严肃地说：“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花养花。”

老舍有很多社会职务，但这些职务工作多是迎来送往，完成“场面上”的任务，实际的权力很小。

1951 年，老舍曾应毛泽东点题、周恩来的要求撰写了电影剧本《人同此心》，内容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剧本写出来后，被江青枪毙了。她说：“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

到了 1960 年，躲过了“反右”运动的老舍，则被推到了批斗的边缘。这年 3 月，北京市委集中市属文艺单位及大专院校文科师生约百余人至工人体育场，开展对文艺上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学习运动。巴人、李何林、白刃被列为批判重点。老舍也是批判重点，材料都已印出，但最后被北京市政府保了下来，名字被勾掉。

去世前 6 年，老舍勉强逃过一劫。

50 年代末期，老舍曾经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郭沫若、茅盾等历史上中断了组织关系的老作家恢复了党员身份；程砚秋、梅兰芳等文艺界的名人刚刚被接纳为新党员。1959年的某个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老舍家，两个人有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事后，老舍再没有提起过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对老舍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还是强调，他留在党外比党内更好。

残篇《正红旗下》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自己都差一点被卷入批判中，此时老舍已年过六十。他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学家的老舍于是被不断唤醒。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长篇小说热，他批评说：“我们的文字还显粗糙”，“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他在 1961 年的一次讲话中甚至提出，《林海雪原》“起码可以删减几万字”。

在许多场合，老舍开始公开反对传声筒式的文学作品。他苦口婆心地说：“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话剧中的对话是依照一定的剧情而产生的，不是绕着圈子把所有的口号与宣传大纲都放在里边的对话，离开剧情便成为演讲”；“文学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名为文学作品，而全由政治术语堆砌而成，是谁也不愿意看的”。

进入 60 年代后，老舍不但重提作家的个人风格问题、文艺规律性问题，而且从基本功、生活深度等作家自身修养的角度向作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与要求。更难得的是，老舍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归附的“对不对”的问题，这背后，是作家对于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重新定位。

在经历了一系列作品的失败，以

及《茶馆》的“偶然”成功后，老舍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已经发现突击性的“深入生活”并不能让他写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作品。他依旧写不好工人、党委书记和战士。他领悟到“作家的生活经验积累是一辈子的事”，每个作家必须亲自去掘“自己的那口井”。

终于，在1961年底，老舍打开了自己心头那口尘封了60多年的“井”。他以自己的“家传”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再次回归了他最擅长的小说体裁。

老友罗常培回忆，老舍最早考虑写“家传”，是在1934年之前。老舍写了《小人物自述》，1937年8月发表了四章近两万字，但由于战争而终止。再次想捡回这个题材，是在1949年回国前，他给赵家璧写信，详细谈到了自己归国后的三个写作计划。都是历史题材。其中之一，便是“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他自己的历史”。他信中还说：“这三部长篇，可以放在全集最初部分陆续出版。那将是第二个十卷中的压轴之作，将和第一个十卷中的第一部分《四世同堂》成为首尾两套重点著作。”

当老舍终于提起笔时，已经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可以说，“家传”题材在老舍心中已经酝酿了数十年之久。虽然世事纷纭，写作计划屡屡被打断，但他从未忘怀。于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人物、事件、场景、风俗、玩意儿、人情世故终于可以顺势倾泻而出。对老舍而言，就像一壶多年陈酿，等到了开坛的时候。

“我”的出生、洗三、满月以及旗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大姐的公婆及丈夫、姑母、福海等熟透了的旗人的行为做派和文化心理，对曾经驰骋沙场、充满生命力的民族衰落的苦涩历史和沉痛教训的深切反思……老舍酣畅淋漓地倾吐出来。



1962年4月，老舍在广东参加潮剧座谈会后为潮剧题词。左二为阳翰笙、右一为潮剧作曲家马飞

就像他在小说中强调的，这些内容不是他“有意记下来的”，“它们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着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

与此同时，政治空气也开始放松。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不敢写了，帽子多了，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1962年3月，广州召开了文化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陈毅也在会上发言说：“应当为他们（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于是，1961至1962年之间形成了一个文艺界的小阳春，创作气氛再度活跃起来。

老舍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他为数不多的日记中，广州会议是最详细的一段，他几乎把每个人的发言都做了详细笔录。他的情绪是亢奋的，甚至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盗女娼。”在会议上，老舍自己也做了长篇发言，题目叫《戏剧语言》，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虽然说的

还是戏剧，但他专门谈到了他正在写的《正红旗下》。“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

他说的这部小说就是《正红旗下》。胡絜青说，老舍从广州回来后，经常邀请一些老朋友到家里，包括一些在广州会议上被平反的老朋友，兴奋地一起畅谈。老舍给他们朗诵《正红旗下》完成的部分，请他们提意见。老朋友中，金受申听得最多，因为他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风俗典故最熟悉。老舍曾答应把这部小说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从保留的手稿看，《正红旗下》写得非常用心，共 164 页，全篇字迹清晰、整洁，极少涂改，头尾如一。如此工整的底稿，在老舍自己的稿件中也是上品，可见他倾注的心力。

然而仅几个月后，政治风向再次发生变化。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批判了刘志丹弟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他说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刘志丹》株连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传记小说的体裁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胡絜青后来说 :“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老舍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写作。

转过年来，政治空气更紧张。1963 年初，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即必须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创作题材。这一年毛泽东对文艺界做了两个重要批示。第一个批示说，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的多个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第二个批示更直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历史剧《海瑞罢官》相继受批判，中国文联、作协等相关文艺机构，都需要整风作自我检讨。“左”的空气越来越浓，历史给老舍自由创作的时间太少。一部集老舍毕生功力的绚烂史诗，只能就此夭折。

除了外部环境的严苛外，如研究者石兴泽认为，老舍在创作《正红旗下》时也遇到了自身的内部矛盾，写不下去了。即“深切的历史记忆，与丰富的现实经验之间的矛盾形成巨大的写作障碍”。简单说，就是现实对历史的定性、阶级分析理论都与老舍的历史记忆不符。

“宣传文章说慈禧太后逃出京城，官兵无心作战，义和团英勇杀敌 ；而历史记忆则是官兵用抬枪土炮尽职尽责忠勇地保卫紫禁城，付出巨大牺牲。老舍的父亲便是忠勇者之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按照宣传文章还是凭借初始记忆写作？”要不要写清军的抵抗？要不要写义和团的迷信、愚昧，甚至滥杀？

按照阶级分析理论 ：富人是剥削阶级，其本性是不劳而获，贪婪腐败，压迫和剥削穷人 ；穷人靠出卖劳动维持生活，遭受剥削和压迫，勤劳正义，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依据阶级属性塑造文学人物，就要依据阶级关系确定人物关系，混淆阶级阵线，美化阶级敌人，丑化劳苦群众，都是原则性错误。但在老舍看来，人性是道德问题，心理意识问题和文化教养问题。其好坏与经济地位相关，但不相等。穷人中有好人，也有刁钻狡猾之徒 ；富人财大气粗为富不仁，也有善良仁义之士。

在已经出场的十几个重要人物中，如母亲、姑母、大姐、大姐夫、大姐公公、大姐婆、富海、多老大、多老二、牛牧师等，品性有好坏，均属性格脾气问题，与阶级无涉。更重要的，他又该如何塑造“定大爷”呢？“定大爷”的原型是资助他上学的刘寿绵，曾经家财万贯，乐善好施，但又不善理财，最终破产当了和尚。老舍专门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师》。刘寿绵是好人，也是老舍的恩人。但按照阶级分析，他应是贪婪、凶残的剥削阶层。老舍接下去怎么写呢？小说也正是写到定大爷见美国牧师的时候便停止了。老舍似乎陷入了历史与现实的迷阵，找不到方向。

“写家”的尊严

搁笔《正红旗下》后，老舍陷入了少见的写作低潮期。从 1964 年 7 月到 1966 年 4 月，他留下的文字中，除书信外共 61 篇，其中旧体诗 51 首，文论仅 6 篇。而且一年比一年少。

翻检那个时期的文论，理性平和了许多。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禁令中，他辗转腾挪。有时甚至不惮为捍卫真理而出声反击。

在 1963 年 3 月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发言中，老舍反复坚持说 :“要求文艺表现新时代，反映现实生活，并不排斥其他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完全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历史题材不但可以写，而且应当写。”这很明显是对柯庆施、张春桥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唱反调。到了 1964 年 4 月，题材决定论已被推到顶点时，老舍在《祝贺话剧的新胜利》一文中还能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并不排斥历史戏。”虽然这篇文章总的意思是为《龙江颂》等现代题材话剧的出笼唱颂歌。他还是把自己真正想说的

话包裹在其中。

就像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所说的："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既不愿随波逐流，又无法说真心话，在文艺与政治的夹板中，老舍进退维谷。他只能小心翼翼斟酌着自己的语言，仿佛随时担心被人抓住把柄。在谈论话剧语言问题时他说："我没有专重语言，不顾其他的意思。"在谈文艺书籍的选择问题时，则不忘声明："我并没有经验看别种著作，说别种著作不需要选择与鉴别的意思，请勿误会。"

他一遍遍提醒读者，我说这样，并不是说就不要那样，这种讲话竟成了老舍最后三四年的一种语言习惯。比如他说话剧："盼望话剧丰收，并非愿见戏曲歉收，绝对不是。""这次我来参加会议，实在是为向青年剧作家们学习。这并不是说，我不愿向老剧作家们学习。"


(杨北钊 摄)

1962 年，老舍与妻子女儿在福州鼓山合影

这些毫无必要的声明，"仅供参考"、"以免误会"类似的言辞在他的文章、发言中出现的次数越来愈多。即使是文艺理论，诸如谈创作经验这样的文章也越来越难写。写真实想法，多半犯忌，写应时套话，于心有愧。于是到了 1964 年的下半年起，老舍便基本上不谈文艺了。写的最多的是朋友赠答的旧体诗。

一个热情活跃，曾经以最热烈的情怀、最端正的姿态呼应政策、配合时事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只能借风月聊寄情志的诗人了。

老舍知道自己的才华一天天荒废了，但又不甘心。既然历史题材不能写，那还是回到现实题材的路上。1964 年夏天，在别人搞"四清"运动的时候，他自己带着行李，来到了密云城关公社檀营大队。这是个满蒙杂居的村子，乾隆年间搬迁到此，负责皇帝到承德避暑或狩猎中途的保卫工作，到解放时，这里只剩下 200 来户。老舍在《下乡散记》中说，他想看看从贫困中挣扎过来的人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他创作的主题，依旧延续着《正红旗下》的方向，还是要写旗人的故事。老舍在檀营住了两三个月后，又搬到了另一个满族村——海淀区四季青的门头村。据说当年曹雪芹的故居也在附近。在门头村，他给郭沫若写了一首应答诗："金玉红楼终是梦，镰刀碧野遍地花。"在信中说："饭食稍苦，但颇欢快。"

老舍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但依旧徒劳。此时，他虽然还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却被打入了政治的另册。江青在 1963 年的一次谈话中，将老舍列入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名单。她攻击说，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

1965 年，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一个多月内，他拜访了包括水上勉、井上靖等 33 位日本作家，即席写下了 30 多首小诗。回国后，他依据日本见闻写成长篇散文，名为《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他寄给了报纸，却石沉大海，无法发表。

他觉得自己慢慢地被遗弃了——人艺不再找他写戏，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他主动要求和文艺工作队一起下乡去为农民演出，但还是没被批准。他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1966 年的春天，他再次下乡。像赌气似的，一个人带着行李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陈各庄大队。这是一个以养猪而闻名的村庄，他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饲料的配比、仔猪的饲养关键、配种的次数与时间等养猪细节。最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快板书——《陈各庄上

养猪多》。“喂养猪。也是闹革命，／毛主席的著作活学又活用。／思想红，不利己，／贫下中农的高尚风格，全心为集体……”还在努力维持一个“写家”最后的尊严。

在50年代，他曾说过：“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这篇快板，发表在了当年《北京文学》4月号上，也是老舍最后公开发表的作品。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等人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文艺领域，一股脑儿定性为“文艺黑线专政”的天下。局势更加紧张。这时候，老舍似乎终于觉得他和革命已经渐行渐远，他无论怎样努力，始终无法跟上“革命”的步伐和要求。他也明白了自己终于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老人”。

始终无法忘怀的，依旧是他心头的那几部小说。就在1966年4月，老舍去香山拜访谢和赓、王莹夫妇，他又重新提起自己的“创作计划”。第一部是他的家史；第二部，写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的悲惨故事；第三部，写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欺诈下层平民。“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竟老泪纵横。

让他感到更加压抑的，还有他周围朋友们的遭遇。老舍对王莹、谢和赓说：“这三十年来，有多少悲欢离合的事值得回味呵！您想想，自从‘五七干校’以后，朋友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几个月后，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活动上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没有问题”，当然指的是政治问题。

老舍感到自己老了。在文章中他会有意无意提起：“我已近58岁了”或者“我们六十多岁的人”。好朋友们，罗常培、洪深、王统照、梅兰芳、郝寿臣、欧阳予倩……相继去世。在北碚时，他就患上了贫血与眩晕，美国时留下了坐骨神经痛，此后必须与拐杖为伴，在新中国时期发作的腰脊神经炎与高血压又时时折磨着他。

这一年7月的一个夜晚，老舍突然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中，他在一个小学生用的笔记本上起草了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病愈，您不用来看我。”但这封信并没有发出。他还打电话给臧克家：“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

老舍出院后，情绪始终低落。有一天他在什刹海边散步时，遇到了回民马松亭大阿訇。马松亭老人1957年被错误打成“右派”，处境十分凄凉，时常在湖边闷坐。老舍见到马松亭说：“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而据林斤澜回忆：“辞世前几天，我听见老舍先生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老舍先生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除了鼓动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提出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但这点在随后的运动中没有真正落实。

8月21日，老舍在家中和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谈起了当前形势。儿女告诉老舍，红卫兵在街上“破四旧”，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匾额已经被砸了，连四联理发店的大镜子都被学生贴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女儿舒雨劝老舍，把家里多宝阁上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不然会被当成“四旧”被扫掉。老舍坚决回复说：“不，我绝不收！”

老舍一口气说了下去：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又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侮辱而在什刹海投水自杀的例子。“文革”刚刚开始，他便有了清醒的认识。

两天之后8月23日，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革”运动。他说，康生同志捎话，让他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这一天是老舍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他遭受到了红卫兵的多次殴打与侮辱。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被胡絜青接回，已是遍体鳞伤。8月24日清晨，他先劝夫人胡絜青去上班，然后和自己3岁的小孙女告别：“和爷爷说再——见——”最后走出了家门，走向城市西北角的太平湖，投湖自尽。

老舍是熟悉太平湖的。他年轻时候，在这一带做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30年代，他替老母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内买了一所房子，安享晚年。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做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小说课。

老舍手里握着一沓稿纸，在湖边独坐到午夜。清晨时，稿纸漂浮在水面上，是他亲手抄写的毛泽东诗词。

这时候，老舍似乎终于觉得他和革命已经渐行渐远，他无论怎样努力，始终无法跟上“革命”的步伐和要求。

美国 QE 落幕

美国的 QE 功过并无定论，支持者认为量化宽松降低了市场的资金成本，成功刺激了经济复苏和就业市场改善，而反对者则认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就业市场改善其实和 QE 并无太大关系，相反为资产泡沫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主笔 谢九

10 月 29 日，美联储宣布结束资产购买项目，第三轮 QE（量化宽松）如期结束，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货币刺激试验终于落下帷幕。

尽管美国的 QE 已经谢幕，但是其功过并无定论，而且预计争议还将在未来很多年内持续下去。QE 的支持者认为量化宽松降低了市场的资金成本，成功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就业市场改善，美国经济能够率先于欧洲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 QE 的刺激。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发布的声明也认为，自美联储推出资产购买计划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前景有了显著改善。而美国 QE 的发起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对 QE 的评价是：“实际上有效而理论上无效。”

而反对者则认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就业市场改善其实和 QE 并无太大关系，相反，QE 为资产泡沫埋下了更大的隐患。纵观三轮量化宽松，从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美国的 QE 政策仅在第一轮起到过一定作用，第二轮的主要效果是制造全球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而到了第三轮，刺激效果更是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在反对 QE 有效性的人群中，包括伯南克的前任、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在美联储宣布正式退出 QE 后，美国发布了第三季度经济数据，GDP 增速达到 3.5%，显著超出市场预期，这也从侧面支持了美联储退出 QE 的时机。不过，尽管美国经济数据超出预期，但是市场对此反应平淡，认为美国三季度超预期的表现可能很难持续。在美国三季度 3.5% 的经济增长中，其中 1.3 个百分点来自净出口的贡献，在全球经济疲软以及美元升值的背景下，净出口对美国经济的拉动难以给予过高的期待。另外，美国三季度的增长中，国防支出贡献了 0.7 个百分点，这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对“伊斯兰国”武装的空袭行动，正因为如此，也有市场人士开玩笑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应该感谢“伊斯兰国”。

QE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后，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关注集中于何时加息。美联储何时加息，主要取决于就业和通胀水平，尤其是后者是否能够达到 2% 的预期目标。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此次发表的声明中表达了对于未来加息的态度，委员会认为，为支持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在资产购买项目结束后，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当前 0% ～ 0.25% 目标范围内相当长时间是合适的，如果未来信息显示就业市场和通胀的改善快于预期，美联储可能早于预期加息，反之，如果改善速度慢于预期，则美联储可能晚于预期加息。

从目前看，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 2015 年中开始加息。不过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的复杂性，欧洲经济再次面临第三次衰退的风险，中国增长预期也开始下调，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这些都为美国经济的通胀目标带来较大干扰。因此，虽然未来美联储加息是高度确定的事件，但是加息的时间窗口是否会出现在 2015 年中，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加息，美联储的另外一大挑战在于如何缩减资产负债表。在经过数轮大规模量化宽松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扩张到史无前例的 4.5 万亿美元，即使是现在退出 QE 不再继续购债，美联储只要持有这些庞大的债券资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起到打压债券收益率的效应。所以，严格意义上看，美国还并没有完全退出 QE，量化宽松的影响在未来几年还将继续存在。如果美联储不采取主动出售资产，而是依靠债券自然到期的方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到危机前的常态水平可能需要 10 年左右才能完成。

虽然美联储在表面上退出了量化宽松，但是全球性的货币宽松并未因此终结，其他一些大型经济体的宽松政策方兴未艾。美联储刚刚宣布退出 QE，日本央行宣布将每年基础货币的货币刺激目标加大至 80 万亿日元，此前目标为 60 万～ 70 万亿日元，日本央行此举大大出乎市场预期，被视为“孤注一掷”。由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效果并不明显，加之面临即将上调消费税的压力，日本在货币宽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欧洲央行也在酝酿继续放大货币宽松力度，计划将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从现有的 2.1 万亿欧元扩大至 3.1 万亿欧元。由于欧元面临第三轮衰退的压力，加之通缩和就

业毫无改善的迹象，核心区德国经济也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欧洲央行要求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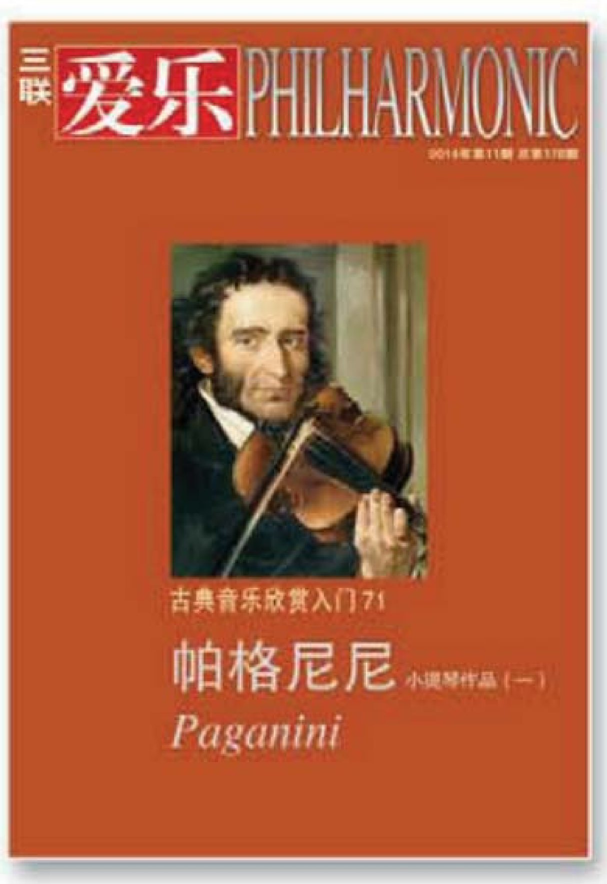
在增长压力面前，中国央行也开始明显放松了货币政策，虽然力度不及欧洲和日本央行，更多还只是定向宽松，但是基本上可以视为已经处于全面宽松的前夜。从央行上半年对国开行提供1万亿元的抵押补充贷款开始，市场就解读为中国式QE拉开帷幕，随后央行开始陆续对五大行和其他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还通过正回购等方式引导利率下行。货币调控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而放松力度也越来越大，无论从资金供应量还是资金利率，央行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按照中金公司最新的预测，中国央行明年可能全面降准四次，降息两次。

不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另外的风险。在美国终结QE和加息的预期之下，美元中长期走强是大概率事件，美国量化宽松期间刺激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在后QE时代将会逐渐回流美国，这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冲击。在目前欧洲、日本大幅宽松之际，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势，在“金砖五国”中，除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在今年都已经先后加息，一方面是为了对抗通胀，更是为了抵御资本外逃对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近期的俄罗斯，尽管遭受油价暴跌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打击，但由于卢布在最近一个季度已经大幅贬值超过15%，俄罗斯央行不得不通过加息来阻止卢布下跌，即便如此也难以挽回卢布的颓势。

与其他金砖国家比，中国目前所受资本外逃的冲击相对较轻，但是随着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美国正式结束QE之后进入加息周期，这种风险可能会逐步上升。下半年以来，我国的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资本外流的迹象。长期以来，中国以就业作为稳增长的重要风向标，本届政府在过去一年多里也始终强调不搞大规模强刺激，其中很重要的底气来自就业指标始终保持不错的水平，今年经济增速虽然大幅放缓，但是前8个月就已经完成了全年新增1000万人的就业指标。但是从下半年以来，在就业指标没有恶化之际，国内货币政策开始明显放松尺度，很重要原因在于除了就业之外，债务违约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成为中国需要担心的另一大潜在风险，如果未来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这场危机就有可能通过房地产市场引发。在过去一个月里，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性再次得到明显关注。从国庆前夕央行突然放开房地产信贷政策，到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稳定住房消费，过去一年多时间几乎不被提及的房地产，在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被两次关注，房地产的引擎地位似乎又开始重新回归。

中国经济如何应对增速放缓，以及后QE时代的挑战，随着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明年“两会”的召开，中国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将会逐渐明朗。美国的QE虽然已经正式终结，但是新一轮的全球货币战争才刚刚开始。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4年第十一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71

被记住的，被遗忘的——帕格尼尼的永恒传奇

- 鲁瑶、孙健、石岩、李庆任对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的精彩解读

逝者　纪念霍格伍德：从两种角度
话题　钢琴家避开了什么？（前篇）
爱乐笔记　寻找心目中完美的《赋格的艺术》（上）
乐史空间　圣－桑谈音乐与音乐家（上）
歌唱家档案　女高音莉齐娅·阿尔芭尼丝
指挥家档案　纪念洛林·马泽尔
唱片说明书　卢恰诺·帕瓦罗蒂的第一个十年
作品　小议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 Op.83
听片、购片与收藏　竖笛演奏家、指挥家布吕根的唱片收集

《爱乐》2015年订阅须知

2015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5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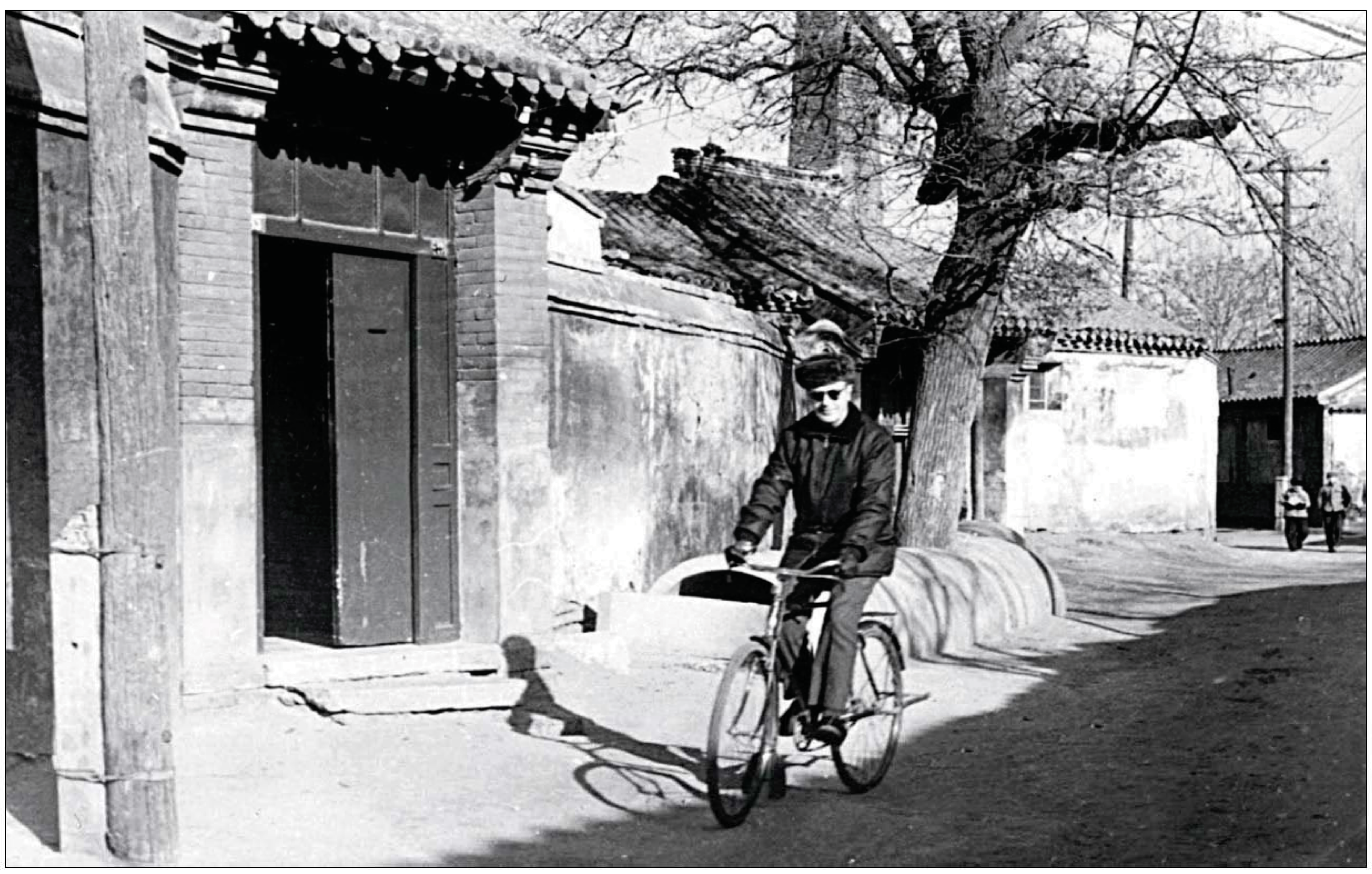


沙博理与夫人凤子的新婚照片（摄于 1948 年）



“二战”时一身戎装的沙博理（摄于 1944 年）

沙博理：在中国“旅行”一生



1962 年，沙博理骑着单车在北京南官房家门口前



1925 年，沙博理与父亲、母亲和妹妹在纽约合影

10 月 18 日上午，98 岁的美裔中国籍外文专家沙博理在家中去世。自 1947 年来华后，他在中国度过了 67 年时光：翻译、写作、研究，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各处考察，上交提案。在中国的“旅行”，沙博理持续了一生；而在这趟旅行中，中国变成了他的家园。

记者 ✎ **周翔**　供图 ✎ **中国外文局**

“外国专家”

南官房位于什刹海附近，这里的四合院、胡同、人力车、古槐，多少还可以让人窥见些老北京的旧影。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 50 年代搬进这里的一座小四合院后，沙博理一住就是几十年，有条件更好、更现代的住所也不愿意搬去。“他不愿意住楼房，说要完全融入中国。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是外文专家里的领头人，要给他住友谊宾馆的专家楼，他坚决拒绝了。”老舍的儿子舒乙因为父辈的关系认识了沙博理和凤子夫妇，许多年来，他都会不时地去那座四合院里拜访，有时候是出国回来给沙博理夫妇带去糖和巧克力，有时候是带去母亲或者朋友的画送给他。1996 年夫人凤子去世后，沙博理仍然住在这里，没有保姆，也不要助理，女儿亚美照顾着他。家里的陈设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墙上挂满的画最易引人注意，它们都是黄永玉、吴作人、傅抱石等朋友送给沙博理夫妇的。屋里还摆着凤子的照片，沙博理说，在和凤子一起待过几十年的小屋里，时常能想起以前的生活，“是一种满足”。

沙博理 1915 年出生，在中国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除了无法改变的外貌以外，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而地道的中国老人：穿布鞋、丝棉袄，在四合院里种花养猫，对烧饼、油条、豌豆黄一类的小吃充满了兴趣。他生活简单，从不轻易打破每天的起居规律，吃得也清淡简朴，还学会了在中国老人中流行的太极拳，因此舒乙每次见他都觉得“瘦溜溜的”。甚至在待人接物上，他也学会了中国式的温和、婉转、有分寸。《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李霞负责杂志社的外事工作以来，和沙博理接触很多。“他骨子里有那种美国人的幽默和敏锐的感知力，对陌生的东西稍一接触，马上能摸出门道，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又懂得委婉，很‘温良恭俭让’。”这几年，沙博理很少出门，有人要访问他，他总是很客气地让对方先跟《人民画报》打招呼。如果是他不愿意接受的采访，就会很坚决推辞。但遇上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大学生、年轻人想来拜访，他总是欣然同意。“他很清楚自己对于不同的人的价值在哪里。”李霞总结说，“他就是一个特别体面、正派的老头。”

尽管在 1963 年，沙博理就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了中国籍，但是他还是被人们当作“外国专家”，每年的春节、国庆总理宴请外国专家时，他总在被邀之列，并常常被安排坐在总理旁边的位置。“把他当外国专家，他觉得很有趣，但也不计较，因为他知道这是人们对他成就的尊重和肯定。”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告诉我们，但在沙博理心里，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身份其实是在意的。“2011 年，凤凰卫视授予他‘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这个奖以前都是授给华人的，像金庸、杨振宁、袁隆平，但沙老是第一个以外裔中国人的身份获此殊荣。他对能获这个奖非常开心，因为觉得这是对他‘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对于沙博理会聊天这一点，周明伟感同身受。“他的表达有自己的风格，非常简单明了，不复杂，但是引人入胜。他从来不用干瘪的语言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而是会讲故事。跟他说话就是处在一种互相感染的语境，看起来不费劲，但是你得动脑筋，才能跟得上他。”一次，周明伟问过沙博理，凤子的英文好不好，沙博理不正面回答他：“有人说，凤子的英文只有我听得懂，我的中文全世界都听得懂，但是凤子是我的老师。”这种描述让周明伟觉得非常有趣，“一下子就非常幽默地把两个人的关系真实地描述出来了”——凤子教沙博理中文，沙博理教凤子英文，结果自然是凤子这个老师当得更合格。另一次，谈及毛主席，周明伟问沙博理的看法。沙博理简短地说：“毛泽东不听毛主席的话。”这让周明伟“心里一震”：“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主席提出的哲学观、社会观、革命观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但他后期恰恰是违背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他的表达很形象，没有把对毛主席的评价简单化。”周明伟感叹说，这个回答“非常深刻”，然而又是极其形象生动的。“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别人说的干巴巴的东西他能说得很形象。他从来不简单用概念解释概念，你听了以后很容易就记住，而且理解得清清楚楚，这是他语言的天赋。”

周明伟觉得，每次和沙博理聊天总有深入的空间，常常意犹未尽。也正因此，10 月 18 日早上，正在开会的他收到沙博理去世的消息时，震惊而难过。赶往南官房胡同的路上，他一直在想那些还未能和沙博理深入的话题，感到“无尽的后悔”。尽管沙博理已经快 99 岁了，但在周明伟等身边熟人看来，他既没有器质性的疾病，



2011 年 4 月 2 日，沙博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10~2011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并获颁“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又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他的骤然离去让人一时有点难以接受。“他跟协和医院的大夫、护士关系都特别好，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老头，但是他不喜欢医院，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今年春节前，沙博理主动跟周明伟讲到一个人生命的起始和终结方式。“他非常坦然，尽管大家都不愿提。他说人老了就老了，不要折腾，不要浪费资源，不要麻烦别人，如果我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就让我平平静静地走。”周明伟说，“不过他从没跟我讲过，如果他走后房子如何安排，或者他能享受什么样的荣誉。”

沙博理也从不跟李霞谈起生死问题，但李霞觉得他心里特别明白，甚至早早做了一些准备。“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打开书柜，说你想拿什么书就拿。后来他给了我三本由舒乙和姚珠珠主编的《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说写得特别好，让我留着。去年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里有录音，是有生之年所有媒体采访我的录音，你帮我数字化，保存好，千万不要随便给任何人。我说行。”沙博理去世后，亚美告诉李霞的同事：“这一二年沙老陆续把一些奖杯扔掉，把旧衣服送人，都自己处理好了。”

“他的坦然，是他心境的体现。”周明伟说。在他看来，沙博理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照顾，但是他对这一切并没有诉求。“他这么老资格的专家，不要助理，也从来没有配过专车。他爱喝咖啡，后来年纪大了怕麻烦，煮了咖啡还要洗，就改喝速溶的金牌雀巢咖啡。然而他并不是不知道追求生活的情调，并不是不注重人生的质量。他在意听力和视力，他认为人活着如果听力和视力不能满足需要，生活质量就受影响。”2012 年给沙博理过生日的时候，周明伟少有地感受到沙博理有一些焦虑。“他告诉我眼睛越来越不行，视力越来越差，不光报纸上的字看不清，电脑上的字很大都看不清，我帮他将电脑上的字体调大后，还是很吃力。耳朵也越来越不好使。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关心是职业的、条件反射式的，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就会很焦虑。”商量后，人民画报社选了几个年轻人时常去给沙博理读报。“他主要是了解国内外的大新闻，还有些另类的、好玩的杂志。他对人物文章是感兴趣的，对中国形形色色的人，对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寻找中国：上海、北平与北京

沙博理对中国的兴趣，要追溯到遥远的青年时代。1947 年，美国犹太青年 Sidney Shapiro 第一次踏上了

中国的土地时，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沙博理”，取的是“博学明理”之意。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系的沙博理，曾经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然而他却对律师职业生涯毫无兴趣和激情。“二战”期间，沙博理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于时局的需要，当局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外语，本来报名学法语的沙博理，因为学法语的人过多而被分派到康奈尔大学学中文。退伍后，沙博理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直到在朋友鼓动下，带着 200 美元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一个看上去充满偶然的选择，又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诱惑。沙博理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就有对未知的渴望：30 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曾和同伴一起免费搭乘便车和扒乘货运火车横穿了美国。而这次横越太平洋来到“富于魅力的东方”的旅行，无疑是一种诱惑——“我仍然渴望冒险。”

沙博理刚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在码头上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在后来的回忆里，这成为一个颇有隐喻的意象：“1947 年 4 月的中国，是很有点出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意味。”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在海关处用美元兑换中国货币，沙博理发现自己被“狠狠地欺骗了”；走在上海的街头，衣衫褴褛的工人、随处可见的乞丐和耀武扬威开着汽车横行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到处嘈杂、喧闹，还有难闻的气味。

幸运的是，沙博理很快在乱世的中国找到了让他欣赏、认同的群体，这入口正是来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凤子。经在美国时的中国朋友杨云慧介绍，沙博理找到凤子，一开始两人约好互相教对方语言。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凤子是最早一批出演《雷雨》、《日出》等话剧的演员，在进步革命思潮影响下，当时在上海秘密协助地下党工作。通过凤子，沙博理得以接触到左翼进步人士。“经过她，我也认识了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也听他们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政治情况。我就开始明白了，当然水平还是很低。我至少能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948 年 5 月，在冯亦代等文艺界好友见证下，沙博理和凤子结婚。同时，他利用律师身份做掩护，和凤子一起做了一系列地下工作：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把解放区来的密使带进美国人办公的商务楼密谈，设法冲破国民党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等。

因为局势紧张，1948 年末沙博理和凤子离开了上海，原定前往解放区的计划没有成功，最后在地下党安排下来到北平。与时髦的“东方巴黎”上海相比，古老的北平更符合沙博理对中国的期待和想象。“北平很清静，没有那么乱，有各式各样的小胡同，还有故宫，很美。”1949 年北平解放后，冯亦代来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在《我不能忘记的人》一文中，回忆了与沙博理夫妇的见面：“我们相见时，十分欢喜，一则是久别重逢，二则是明朗的北方天空，周围的一切欣欣向荣的气氛，置身其中，似乎每天都在过节日似的。……沙博理总乐呵呵地迎接这批旧友新知，眉宇间显得对于新生的中国，怀着一种无比的欢欣。他有时还哼着当时流传的陕北秧歌调。”

在那个时刻发现新的中国，在李霞看来，对于沙博理这样的外国人是一个“特别可贵的时机”：“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试验田，一种新的试验，这样的试验特别吸引西方的年轻人。当时中国共产党推崇的那种民主、自由、平等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沙博理后来多次提起他和凤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观开国大典的经历：“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可能是太激动了。”身边的凤子激动得大哭，而他也同样激动，觉得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

周明伟觉得那是对沙博理影响异常深远的时刻：“毛泽东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瞬间，是他记忆中永恒的东西。那一刻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在他心中的地位。他由衷地认同新中国，要一个西方生活背景的人来认定这样一件事情是多么不容易，这也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当时的沙博理当然不会想到，此后在中国的几十年，他还会经历“文革”的动荡。但是即便那样，周明伟和李霞也很少听到他对那段历史的抱怨。“他在书里说，一般出错一年可以解决了，没想到一错就错十年，这是我听过他最大的牢骚话。”认识沙博理的人都会提到他所崇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正义。而在沙博理心中，那个他发现的新中国代表了这样一种理想和追求，对此他并不怀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沙博理对种种社会问题不乏批评，李霞就听到过不少，但她能从沙博理的言谈中感觉到，这不是怀疑：“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推崇的东西是坚定信仰的，所以无法接受那些现象的存在。他不是对此失望，他只是觉得他心目中的中国不应该是这样。”

中国古老的文化也对沙博理形成吸引。如果说在新旧中国之交来到这里对他是一个可贵际遇，那么和凤子的结合则是另外一个。“他这么爱中国绝对是因为凤子。”舒乙特别笃定地说。沙博理曾对舒乙说：“是凤子的手拉着我沙博理的手，像登长城那样，来到中国人民中间，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对他而言，凤子不仅是妻子，还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在凤子的影响下，沙博理阅读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品，后来一一将它们翻译成英文，从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到许地山、王统照、张天翼、柔石、端木蕻良等，范围甚广。也是经由凤子，沙博理打开了与老舍、黄

苗子、司徒慧敏等一批中国文化人交往的大门。

“老一辈的文人自身带有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对外国人有无限的吸引力。当时那一拨中国文化人身上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同时又接受新社会的洗礼，对沙博理有很大影响。他们推崇待人温柔敦厚，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些后来都能从他身上看出来。”李霞说，“我觉得整个人类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中也一定是有同质的东西，通常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互相加持，在这个过程中人日趋完善，日趋让两种文化都能接受。老舍、杨宪益等都是学贯中西的，沙博理周围是一些这样的人，所以他爱上中国一点都不奇怪。”

在由“北平”更名后的北京，沙博理开始了他新的“职业生涯”。他先是成为对外文化联络局的一名英文翻译，1951年又进入英文版《中国文学》，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等共同工作。他的翻译是从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起步的。沙博理非常喜欢这一类小说，把它看成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武侠精神的代表。此后他翻译了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书籍，直到上世纪70年代翻译《水浒传》，迎来了自己翻译生涯中的巅峰。

《水浒传》的翻译正值“文革”期间，沙博理后来对周明伟说是翻译这本小说才“救了自己”。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在当时环境下，“他必须要选择最喜欢的东西才能调节他的心情”。“如果没有血性，没有对武侠的钟爱，翻译不了这本书。”周明伟记得自己曾经问沙博理，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喜欢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翻译时还遇到麻烦。小说的名称他采用了“Heroes of Marsh”，而当时正值批《水浒传》，江青说宋江是投降派，不允许使用“hero”（英雄）的译法，于是有人找到了沙博理。沙博理没有争辩，只问对方：“那outlaws行不行？就是‘无法无天的人’。”对方同意了。时隔多年，沙博理向周明伟讲起这段往事时形容自己当时心里“偷笑”：“因为这一改，使书名与内容更一致了。outlaws比heroes更贴近‘绿林好汉’的意思。”后来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名字没有再改回来。

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受到了广泛认同，不仅因为他的版本比此前赛珍珠的版本更为完整（赛珍珠只翻译了前70回），更因为他的语言流畅、准确，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21世纪初，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张经浩编著《名家·名论·名译》一书，选取了百年来十几位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文加以论述，其中选了两名外国译者：沙博理和霍克斯。他喜欢沙博理的翻译，觉得既不是死板的直译，又忠实于原著内容，于是写邮件和沙博理讨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沙博理回信称自己赞同这一标准，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我觉得，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例如，想翻译诗歌，译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语写诗。”

“现在中国研究翻译的人，有的只是照搬国外的理论，根本不做翻译，和搞翻译实践的人的体会完全不同。沙老先生主要搞实践，但是从他的翻译中体现出来的理念我是非常认同的。‘信’是第一原则，但这是意义上而非字面上。”张经浩说。这就意味着当中文是地道的中文时，翻译的英文也得是地道的英文——传达原文的“神”，而非原文的“形”。

要做到传神的翻译，背后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沙老始终认为，翻译最难的不是字对字翻译本身，而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他认为每部作品的文字是一样的，但是反映的文化内涵不一样。要做好翻译，得了解每个人说话的腔调，了解他穿的服装，了解他吃的东西，以及为什么吃这个东西。这是他的不同之处，他确实是钻进去看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周明伟说。

某种意义上，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掌握中国文化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吸引沙博理的所在——从中他可以看见中国，了解中国。“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

多重身份

“人们会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会想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1979年，沙博理在美国出版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自传，试图回答这个他遭遇过无数次的问题，并且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20年后，沙博理补充其间的见闻经历，写成《我的中国》，在美国发行时名字被改成《我选择了中国》，态度更加直截了当。

1983年沙博理从《人民画报》社退休，同时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且连任六届。这期间他随着考察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积极就各类他看到的问题提出建议。同时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等。从文学翻译起步，沙博理了解中国社会的“触须”一点点张开。在舒乙看来，沙博理是一个学者型的人：“他会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这就变成了他的课题。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法律还是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变迁和遭遇，都是他自己选择研究的，是他经历中碰到的。”

在周明伟的印象中，沙博理从来不避讳自己是个犹太人，甚至是“把作为‘犹太人’放在作为‘美国人’

之前的”。因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的情况，沙博理受邀成为最早访问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当时中国与以色列还未建交。在北京，他也和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保持了亲密的关系，每一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都会前去看望他。接触沙博理越久，身边的人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存在着多重身份的烙印，而这一切又显得协调自然：犹太人的精明，美国人的幽默独立，中国人的温和善良，最后变成典型而有趣的叠加。

对沙博理犹太人式的“精明能干”，李霞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谈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为什么老解决不了？政府可以在每个公司成立时收取保证金一类的东西，如果将来拖欠工资，政府可以拿这笔钱先支付给农民工，然后再追究公司的责任。”

舒乙记得，沙博理办事情很讲约定，出书一定要有合同，合同的条文一定会亲自把关。“他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遇到不依法办事的地方，他不习惯，就会跟人争执，但一般最后他是胜利者，因为他有道理。”舒乙觉得，沙博理在中国活得非常愉快，因为他得到了诸多尊重，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他不是中国哲学培养出来非常中庸的人，相反，非常有原则，观点非常犀利。他不怕提意见，而且每次都能提建设性的意见。”“他根本不在乎谁的官大、谁的官小，有时候他身边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大政治家，他会悄悄地问，这家伙是谁？他没有等级观念。”舒乙说。

多重身份又正是沙博理的优势。“他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他的离世使我们少了一位能给国际社会讲故事的大师。我们现在说的事国际社会还不太听得懂，不光因为讲故事水平本身不够，还因为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对方文化。中国文化能在国际交流中走多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外国文化了解多少。沙博理深深了解两边的文化，这是我们难以企及的。”第一次见到沙博理之前，周明伟已经专门读了沙博理翻译的作品，他把沙博理称作“大师”，沙博理却又一次用形象的语言重新表述自己。“他对我说，我不在乎大师这个名声，我希望是一座桥，它是能够沟通中文和英文之间的桥。通过这座桥，能让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宗教背景、有不同族群肤色的人都来看看中国风景，读读中国故事，听听中国声音。”周明伟说。





1881 年在英国纽卡斯尔的埃尔斯威克船厂即将竣工的超勇舰



北洋水师致远舰水兵在甲板上的合影（约摄于 1887 年）

甲午沉船：120 年后重见天日

虽然已经过了 120 年，1894 年 9 月 17 日发生在丹东海域的甲午海战依旧可以轻易撩拨起中国人的情绪。“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也许是命运要告慰亡灵，今年 9 月 17 日，距离甲午大东沟海战整整两个甲子，考古专家在大东沟海底沉淀的淤泥里发现了 19 世纪的格林机关炮，它可以证明这艘沉船正是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沉没的军舰之一，而研究北洋水师十几年的发烧友们更依据这个遗物读出了更多的信息，他们推断最大的可能性是邓世昌统领的“致远号”。临近冬天，丹东海域已经无法进行作业，水下考察告一段落，而随着明年淤泥的继续清理，这一艘经历了中国近代史转折的军舰也将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记者 ✎ **杨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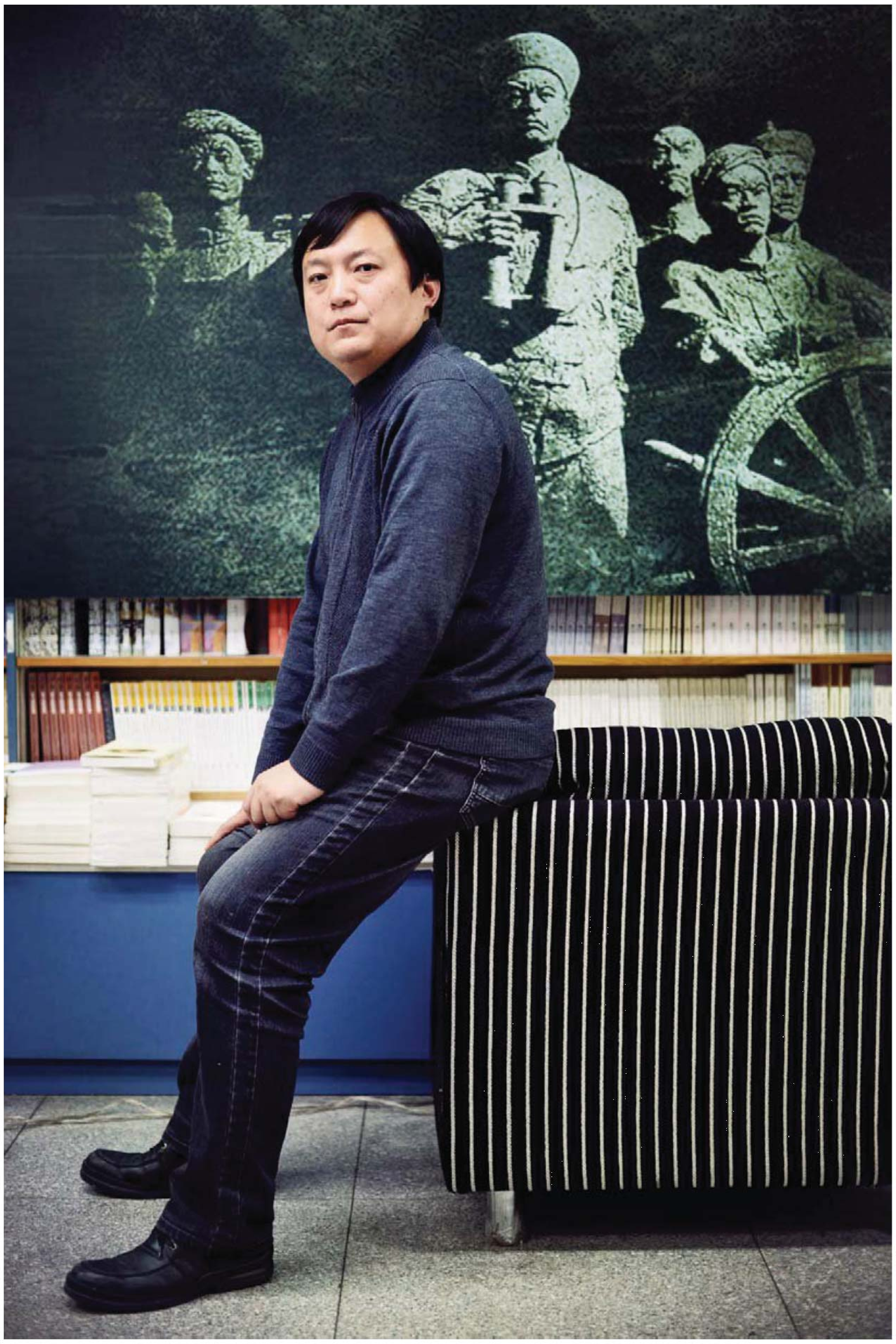
从未被遗忘的沉船

重大事件中，被津津乐道的经常是巧合。参与这次考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9 月 16 日下午，丹东考古现场在水下发现了一枚直径大约是 11 毫米的子弹，开始有人判断是步枪的子弹，可它又很长，于是把水下照片发给了正在威海筹备甲午海战 120 周年活动的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的专家，其中一位刘致先生猜测，可能是当时北洋海军 11 毫米口径 10 管格林机关炮的炮弹。根据史料记载，北洋海军的致远舰和超勇舰上都配有这一口径的格林炮。

9 月 17 日，是中日甲午大东沟海战 120 周年的纪念日，国内研究北洋海军的专家、发烧友、北洋海军的后

裔在北洋海军的总部威海刘公岛、广州的邓世昌纪念馆、福州马尾海军昭忠祠举行祭奠活动，而丹东大东沟海战的现场还在进行考古调查，潜水员终于发现了考古队进驻以来最完整的物件，一门火炮。这位负责人给我展示火炮的照片，在水下灯光下，火炮像一个长长的圆桶，外面是灰白泛绿的颜色，有像化石一样的水生生物附着的痕迹，边缘的圆形断面上可以看到均匀分布的砖红色小圆圈，那是生锈的枪管口。他又拿出一张在日本三笠公园拍到的机关炮照片，跟丹东水下发现的一模一样，那一门机关炮是作为甲午战争的战利品展出的，据说是从沉没的致远舰或同型号的姊妹舰靖远舰上拆下来的。火炮的发现，证明丹东水下的沉船是甲午海战中遗物。两个甲子过去了，北洋海军以这样戏剧化的方式重见天日。

这一次水下考古并不是为了迎合甲午海战120周年而进行的主动发掘，而是丹东港新开辟的海洋红港区扩建工程的前期探测。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丹东港处于鸭绿江的入海口，是东北亚的交通和战略枢纽，清朝时候这里是渔船码头，大东沟海战的起因就是北洋水师护送陆军运兵船在港区水域接驳渔船登陆到丹东，再从丹东去朝鲜。这位负责人所在的日林集团接手丹东港后，已经投资了400亿在丹东港的基础建设上，要扩建的海洋红港区也是其中之一。



（王旭华 摄）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发起人陈悦

“扩建港区，我们就要开航道和挖掘锚地。船在停泊前要先等在锚地上，有泊位才能停，发现沉船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规划中的锚地。”负责人说，虽然基建前要进行考古探测，海洋并不如陆地执行得严格，可这一地块不同，它在甲午海战的地标大鹿岛的西南方向，当地人都知道那里是甲午海战的战场。“我们董事长王文良是丹东人，又是甲午年生人，有甲午情结。他非常慎重，因为那片海很浅，要进大型船必须要下挖十几米淤泥，一个大型机械抓斗下去，什么都没有了。他怕文物因为扩建工程毁了，那就是千古罪人。”这位负责人曾经在纪念馆系统工作过，是集团里跟这个领域最接近的人，就被董事长委托全程跟踪这个考古勘察。

因为涉及到甲午海战地区，国家文物局指定了最权威的水下遗产保护中心来丹东现场考察。负责人告诉记者，考古队进驻的时候已经到了2013年的11月8日，一共在海上扫测了11天，扫了将近10平方公里却一无所获。扫测就是把一个像鱼雷的仪器放在水里，用渔船拖着走，它能扫出海平面的起伏来，如果有沉船的地方就会有凸起，磁力仪还会对水下金属有反应，探明金属的大致重量。“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一上船就傻眼了，那么大一片海，船扫测时候，每次能走的宽度只有100米，相当于在大海上面打探沟。考古领队周春水干得很

玩命，一天起早贪黑的工作量也就完成一两平方公里。”负责人说。

今年4月，扫测的仪器终于有了反应，证明了沉船的位置，有关部门批复丹东港的扩建工程要向西移，避开沉船区域。“我们的任务就算结束了，可王文良觉得既然发现了沉船，丹东港愿意出钱资助这个考古调查，包括将来在港区里建博物馆，划保护区，都愿意支持。我们跟水下遗产保护中心签了5年的合作协议。”负责人告诉记者。水下遗产保护中心于是把我国第一艘考古船派到了丹东，丹东港也派出3艘船、一个工作平台和50多个工人配合考古。水下的考古调查花费巨大，丹东港集团告诉记者，虽然不方便透露全部花销，仅考古船走一趟的油钱就要几十万元，50多人在水上待了50天，所有开销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技术难度超出想象，进入到潜水阶段，发现沉船的情况很复杂。“不是想象中电影《泰坦尼克号》一样，船是坐在海底平面上的，直接就上了船，进了仓。经过120年，这艘沉船全部被淤泥覆盖了，表面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地方露出几个钢板，最深的地方埋在淤泥下面7米。”负责人说，埋船的淤泥非常坚硬，为了保护船体，他们只能派潜水员下到海底，拿着管子抽泥，海底水流急的时候，潜水员甚至都被冲得漂起来。潜水员每次下海只能工作一小时，上岸就要进减压舱，所以要把埋住沉船的淤泥抽走，工程量非常大。现在公布的50米长、10米宽并不是沉船的规格，而是50天清理淤泥所露出的工作面。要弄清船的全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持续了100多年的打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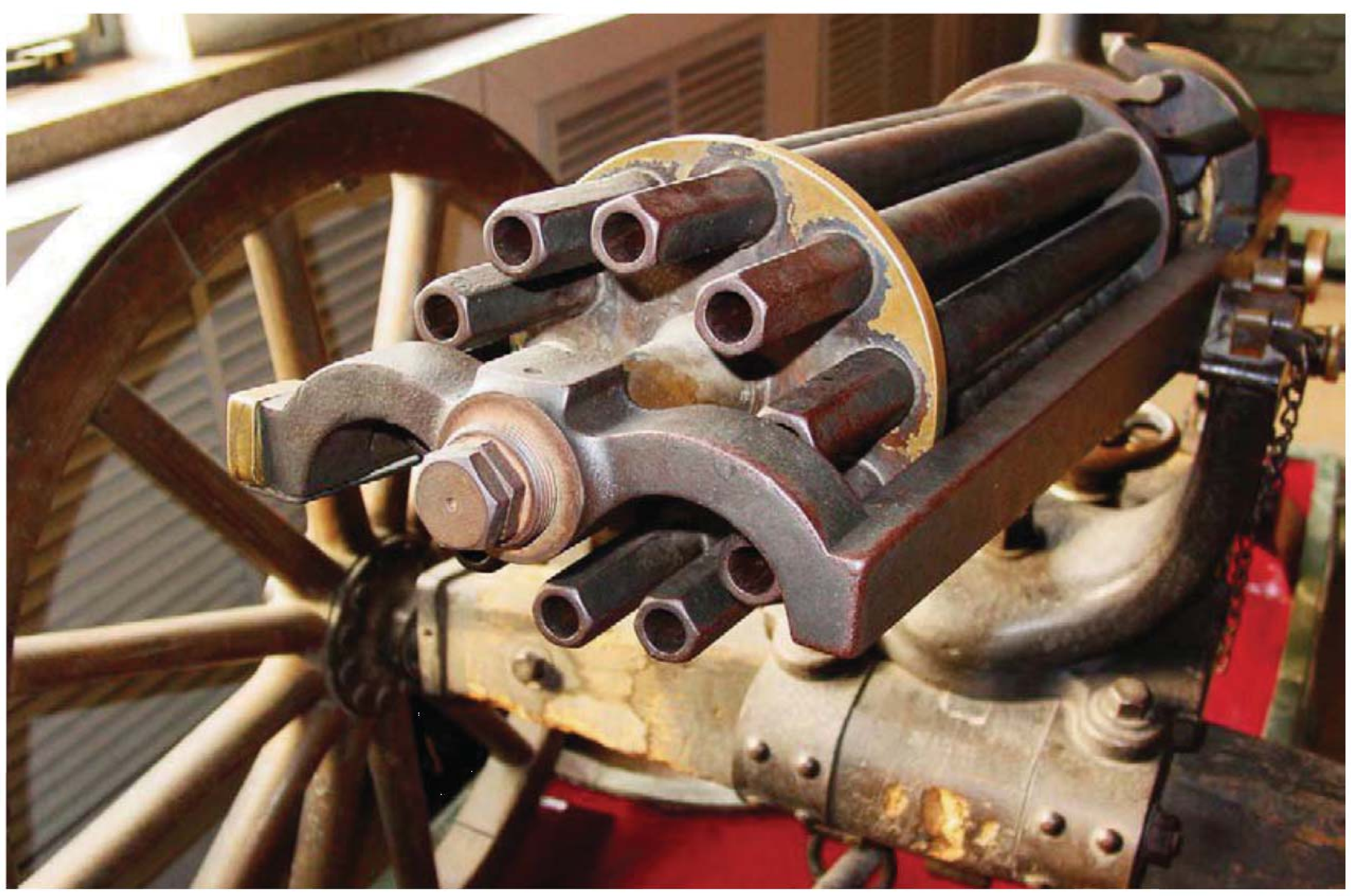
在这一次考古调查前，甲午北洋水师的沉船并不像古代沉船一样神秘，它的沉没经过和大致范围一直为人知晓，也一直有人计划打捞。2010年左右，日本防卫厅公布了许多明治时代的军事档案，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的陈悦告诉本刊记者，他从这些档案里翻到，1895年日本就已经卖掉了“致远号”和“经远号”的打捞权。

“《马关条约》签订后，那片海域就是日本人控制的了，它卖打捞权主要是为了卖废铁，我们沉了四艘船，他只卖‘致远号’和‘经远号’，‘扬威号’在海战里是搁浅的，9月18日日本人重新回到战场，看见半浮的‘扬威号’，就发射鱼雷炸碎了，所以它已经不存在了。‘超勇号’档案里没有提，可能它在海战里烧得特别厉害，捞起来也不值多少钱。”陈悦说，卖打捞权有两个附加条件，一个是日本几个舰长联合提出的，他们发现‘致远号’和‘经远号’最后沉没的状态是向右侧倾斜，怀疑造船设计上有什么说法，所以特别要求打捞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提交详细的报告。另一个是日本海军提出的要求，必须向日本海军提交完整的打捞物资清单，所有打捞的武器归还给军方。

虽然有人购买了打捞权，档案里



丹东甲午大东沟海战的考古现场，潜水员正准备下水探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门早期型号的格林炮，与“超勇”、“扬威”舰装备的格林炮同型



致远舰舰长邓世昌（居中双手交叉站立者）率属下军官与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在舰上尾楼前的合影（约摄于18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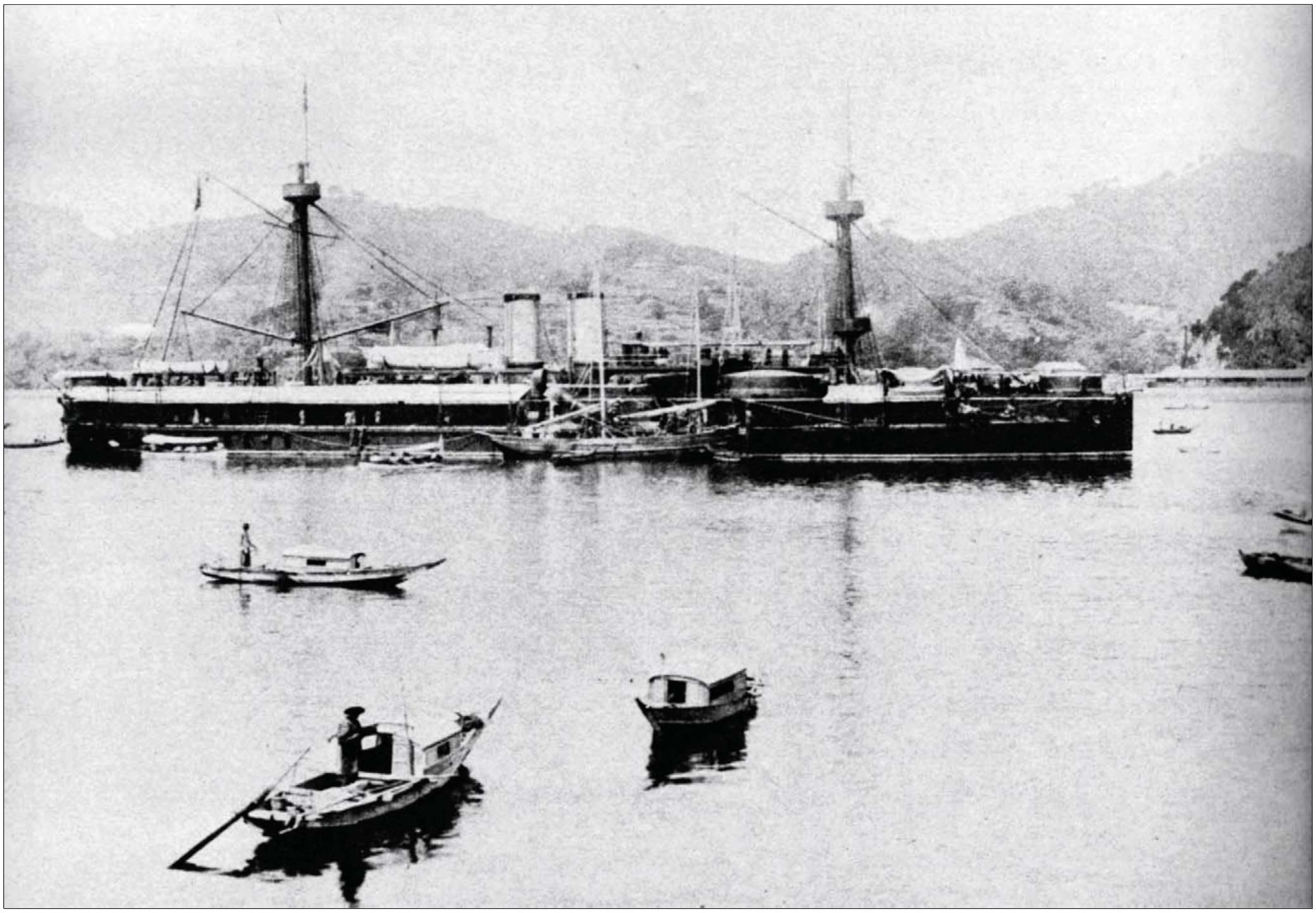
并没有反馈日本军方要求的报告。陈悦说，他继续翻阅，在1919年的一份档案里，“致远号”和“经远号”又被卖了一次。这一份档案里显示，1895年购买的人根本就没有捞到。1919年这次卖出打捞权，档案里依旧没有下文。

日本人被目击到的一次打捞在1937到1939年，距离海战战场大约10海里的渔村大鹿岛村村民于开臣告诉本刊记者，10年前村里还有经历过打捞、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时常会讲起那次打捞经过——日本人先派了自己的潜水员下去，死了。他们就从庄河雇了一个中国的潜水员。日本人后来拆走了许多钢铁，他们走后，中国潜水员从水里背出了一具尸体，穿着清朝的官服。“他认准这是邓世昌，一路背着尸体去了山顶的一个乱葬岗哑巴营，就埋在那里了，还竖了块木牌子。”于开臣说。

与日本人打捞的目的不同，甲午沉船特别是致远舰对于中国人来讲具有告慰亡灵、奋发图强的意义。大东沟海战刚结束，邓世昌和致远舰因为英勇和壮烈成了这场海战里的英雄。1894年9月21日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采访亲历海战的军官而报道：“邓管带指挥的中国军舰‘致远号’，在海战早期以全速接近敌人，试图撞击，不知其使用撞击还是鱼雷，日舰翻转沉没，随即四艘日舰包围‘致远号’，它水线以下被炮弹撕裂，带着所有舰员沉没了。”10月5日，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写道：“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光绪皇帝亲笔撰写悼念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1962年上映的电影《甲午风云》中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在中国家喻户晓。

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筹措了资金，到大鹿岛来打捞致远舰。于开臣告诉本刊记者，那次探摸又死了一个潜水员，打捞就不了了之了。3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打捞都死了人，于开臣说，当地人说起这艘军舰，就增加了迷信的色彩。

最高调的一次打捞是在90年代，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一位负责人倡议，国家文物局下发文件成立了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1996年底北京召开了打捞致远舰的座谈会，许多机关单位、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致函打捞筹备办公室，支持这项“打捞致远，爱我中华”的宏伟工程。国家有关部门以文件来支持这项工程，并没有资金拨付。打捞的思路是“中



定远舰 1891 年访问日本期间停泊在长崎港

华民族每人献出一份爱，将致远舰打捞出来”。先期扫测、探明位置的钱全由打捞公司垫付，打捞筹备办公室派出“打捞致远、爱我中华”的宣传车到全国许多城市募捐。打捞费用岂止千万元，依靠募捐难以完成，这次打捞的结果是打捞公司将国家文物局、东港市政府和艺术研究院告上了法庭。

2004 年，甲午海战 110 周年时，北京的一家电视台与东港市政府接触，提供策划案，希望可以从社会筹措资金几千万元打捞致远舰，但最后也不了了之。陈悦说，2012 年连北京的一家杂志社都来接触过，希望可以由他们版权合作的美国杂志派潜水员来探查致远舰，这个想法最后也没实现。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人接近大东沟海战中沉没军舰一步。

丹东境内能看到的大东沟海战遗迹只有大鹿岛村的北洋水师水兵无名墓和山头上 20 世纪 30 年代的邓世昌墓。于开臣说，海战第二天早上，渔民要出海时发现岸边漂上来许多北洋水兵的尸体，那天就没有出海，而是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些水兵都葬了，这是个老坟。1988 年，村里决定把山上邓世昌的坟移下来跟这个老坟在一起。“村委会特意买了红布，把骨头包起来，村里木匠给做了一副棺材，做棺材的木匠现在还在世。”于开臣说。如今，这座邓世昌墓几乎成了当地的守护神，于开臣说，初一、十五都有老百姓来上香，孩子考大学，家长要来拜，每年春天渔船下海，老板也要来墓前祭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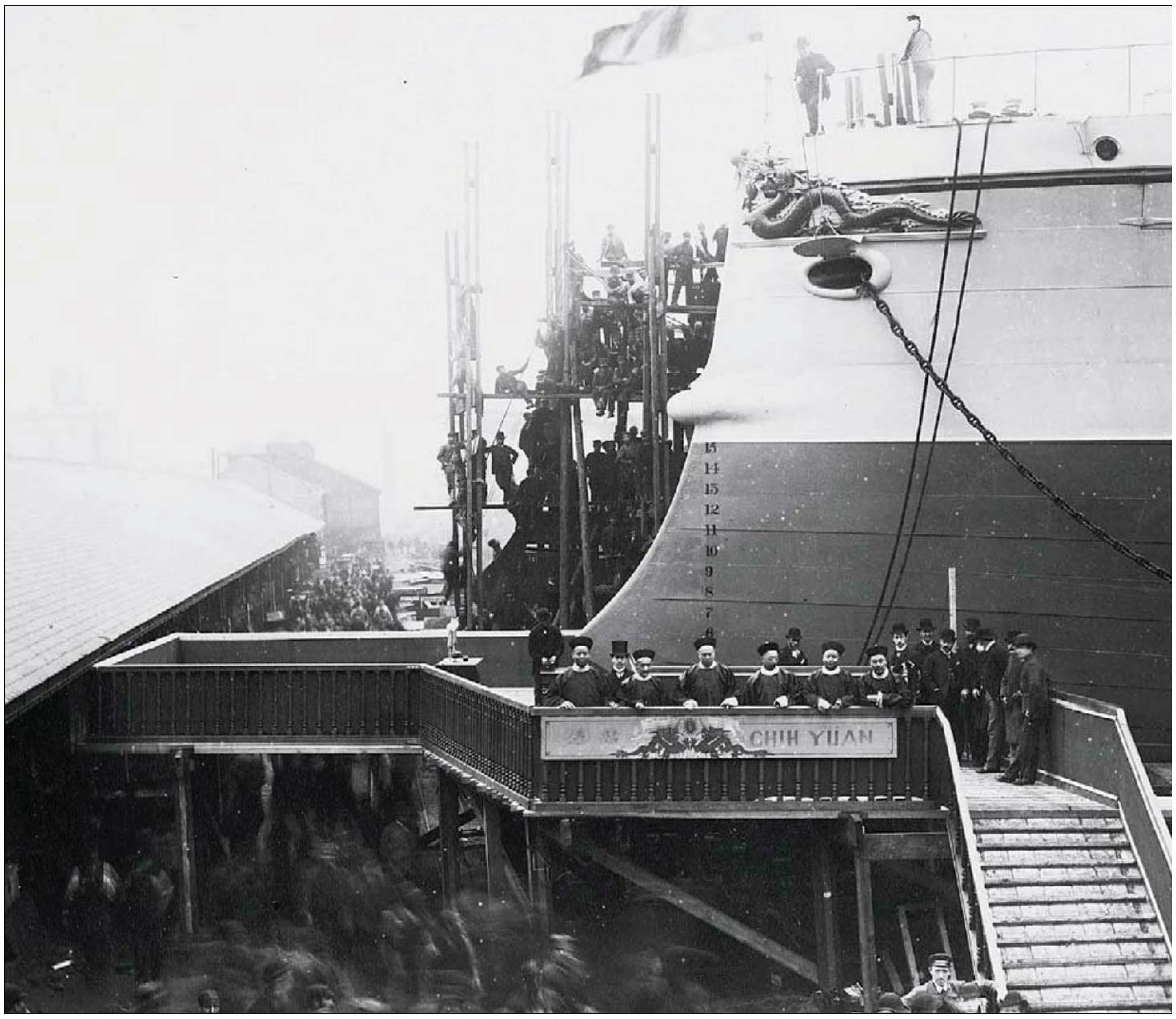
致远舰和邓世昌依旧是丹东老百姓心头的一个结。2013 年，丹东的几个企业和商人捐钱，找到丹东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一比一仿造致远舰。“最早东港农民做了个小模型，觉得丹东作为甲午海战发生地什么都没有是不行的，所以几个人就张罗做这件事情。说通俗一点，跟民间捐钱造庙是差不多的道理。”参与者告诉记者，现在买钢板就已经花了 200 多万元，可是这些钱花得很有意义，从船厂到工人也都非常支持，仿造涉及一些老工艺，丹东的老工人义务来船厂帮忙的都有。这艘船还在造，以后放在哪里都没定下来，沉船发现机关炮的事情就出来了，他们的工程也会缓一缓，等进一步考古发现，如果真的是“致远号”，可以对照和修正。

两套坐标：发烧友的贡献

1997 年那次以官司为终结的打捞

留下了一套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沉船的坐标。负责人告诉记者，扫测开始阶段，主要参考了那次的坐标，可是一无所获。而现在发现沉船的位置，与中国海军史研究会陈悦提供的两套坐标几乎是一致的。中国海军史研究会是一个通过网络聚集起来的海军发烧友组织，他们不但在论坛里讨论，还在关于北洋水师、甲午海战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研究实力很强。

陈悦是这个研究会的发起人，他是通过小时候看《甲午风云》电影小人书而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1999年，互联网刚刚兴起，他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北洋水师，搜下去的结果只有十几条，许多还是重复的，就建立了叫“北洋水师”的个人网站。“那个年代个人网站非常多，各种主题都有，像我这样活下来的不多。其实我就是建立一个类似于百度百科的东西，网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资料都补充上去，其他人也能通过这里得到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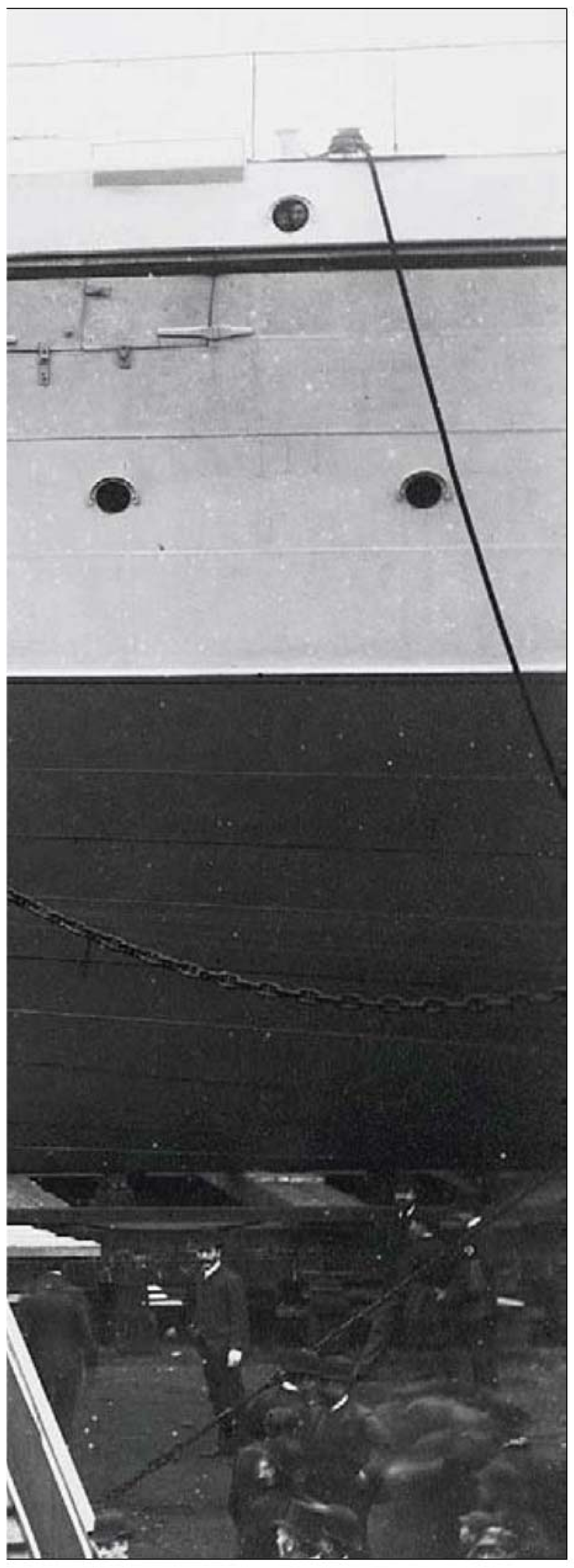
致远舰1886年在英国纽卡斯尔的埃尔斯威克船厂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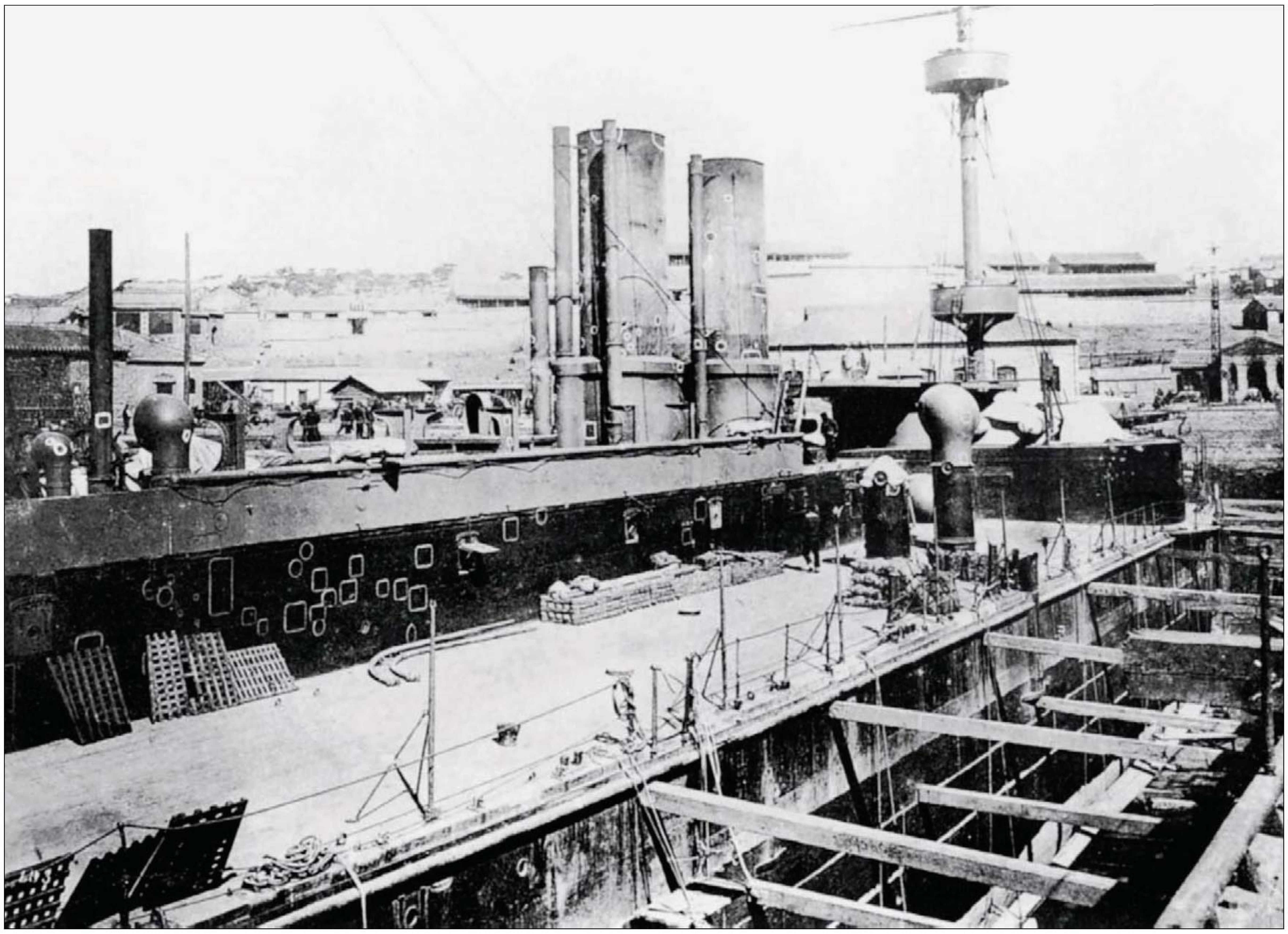
网站有一个BBS留言板，让陈悦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就聚集了一二十个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警察、飞机修理的技师，还有当时只是高中生，现在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建筑设计师等，坚持到现在的，他们已经是研究甲午海战的主力军了。

“那时候说每周更新一次，所有人都期待着，看更新什么内容，甚至还有预告。我就去找档案、书，后来书也找不到了，其实国内并没有太多的内容。”陈悦说。海军史研究会的张黎源也有同样感觉，他告诉本刊记者，读高二的时候开始看北洋水师的网站，高三毕业的暑假，他写了一篇黄海海战经过的文章，大约有三四万字，是国内关于那场战争最长的文章。直到去浙大读大学、去英国留学，他才逐渐注意到这个领域并不是专业学者所关注的。“历史学者研究的是海权，军事史专家研究的战略战术，这些内容一定要对现实有意义，这样一场100多年前的战争，在国外也主要是发烧友在关注。”张黎源说。

甲午海战的发烧友们在这个空白领域越走越远，国内资料很快就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2000年英国的海军史发烧友、一个牙医写了一本叫《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的书，从1860到1945年中国海军的军舰、发展都写了进去。虽然文字不多，是一个简史，可每一艘中国军舰都有照片。陈悦说，他通过互联网花了500块钱买回了书。这件事对圈子触动很大，他们下决心要像老外一样去研究中国海军，当时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要把每一艘中国军舰吃透，走到这艘军舰里面去。

国外的海军史发烧友研究军舰的方法是找这艘军舰足够清晰、足够多的照片，排在桌子上，拿着放大镜从照片上一点一滴研究分析，船头上是什么，船尾是什么。陈悦说，他们当时非常憧憬这样的方法，最后把定远舰作为研究目标。定远舰是北洋水师的旗舰，又是那个时代相当于航空母舰的铁甲舰，在辽宁舰出现前，定远舰是中国海军历史上准排水量最大的军舰，研究起来很有意义。选定了目标，陈悦和朋友们开始搜集铁甲舰的资料和定远舰的资料。发烧友们对定远舰的研究得到了官方注意，威海市要一比一复制定远舰，通过德国驻华使馆去寻找定远舰的图纸，可制定远舰的船厂倒闭了，没有图纸留下来，用的就是陈悦和伙伴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从前的注意力都在外观上，可真正复制时候，船厂会问我们许多专业问题，这个仓做什么，那个仓做什么，烟囱通向哪个地方。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也促进我们找资料研究。复制完定远舰，同时代的铁甲舰我们就都通了，看一眼外面烟囱大小、位置，就知道





1895年，甲午海战中被俘的镇远舰在日军占领的旅顺大船坞内维修

里面的构造。”陈悦说。

英国牙医的《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给发烧友们的另外启示是，北洋水师的军舰都来自欧洲，大量资料要到国外去寻找。张黎源从浙大毕业后到英国留学，课余时间走遍了英国相关的图书馆、档案馆搜集北洋海军的资料。

“北洋水师的军舰很多是纽卡斯尔造的，我去纽卡斯尔的泰恩威尔郡档案馆查资料，居然找到了1880年下水的超勇舰及1881年下水的扬威舰的蓝图、技术说明书和购买合同。这是造军舰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副总经理保留下来，由子孙捐给档案馆的。”张黎源说，他在英国的遗憾是没有找到太多致远舰的资料，只是在海事博物馆找到了致远舰的照片。“那里的藏品需要预约去看，只有文字，我也不知道到能找到什么。在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我翻开第一页就觉得有戏，那是A4纸大小，跟致远舰同时期的其他军舰，翻着翻着就看见致远舰了，从来还没看过它下水前什么都没安装时候的照片，那种心情可能只有疯狂的爱好者能够体会到。”

陈悦的一个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日本。“2005年，我找到了日本在1905年出版的一本书《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海战史》，书里不但有海战经过，而且记录了一套北洋水师四艘军舰沉没的坐标。”陈悦说，他拿着日本的这套坐标同1997年打捞留下的坐标对比，并不相同，1997年的坐标没找到沉船，这套日本的坐标下面是否就有沉船呢？2010年日本防卫厅公布了明治时代的军事档案，其中有为了编写《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海战史》这本书而做的档案汇抄，陈悦又发现了一套北洋水师四艘军舰沉没的坐标。“这一套坐标跟海战史那套相对比，又是不一样的。我当时想，海战史作为公开出版物，为了防止盗捞可能乱写了一个坐标。日本防卫厅档案里那一套更隐蔽，不为人知，可能是准确的。”

为了提高扫测效率，负责人辗转找到陈悦时候，他把发现的两套坐标都提供给了丹东港，这也是一个验证他查资料成果的机会。“中秋节那天，我从考古工作船上抄取了沉船准确的坐标读数，晚上对比史料和档案图片，沉船坐标读数跟防卫省档案中记录的超勇舰坐标只差两分，可是这个坐标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海战史》上记录为致远舰。”陈悦说。

“致远”还是“超勇”？

从日本查到的1895和1905年的两套坐标里，分别认定丹东考古探查发现的这艘沉船是超勇舰和致远舰，并不统一，而今年的探查没有发现军舰的铭牌、刻有军舰名称的器物，相

当于陆地墓葬考古没有发现墓志铭或墓主人的刻章，严谨的考古专家对沉船的身份不做认定，虽然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这一次采访，可负责这次考古探查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是拒绝了本刊的采访。

研究了十几年北洋水师、谙熟军舰知识、掌握大量国外资料的发烧友们却有一番推论。9月17日发现的格林机关炮是解读沉船身份的一把钥匙。格林机关炮也叫加特林机枪，是由美国人在南北战争期间发明的火力凶猛的武器，它的初衷是让一个士兵拥有很多士兵的战斗力，所以机枪的原理是很多根枪管圆形排列，射手转动手柄，枪管就跟着转动，完成连续不断的射击，即便是到了现代以它为基础设计的机枪依旧杀伤力强大，电影《终结者》里施瓦辛格使用的6管火神炮就是它的近亲。

超勇舰和致远舰都配有这种武器，陈悦告诉本刊记者，超勇舰是1880年的军舰，它的机关炮枪管全部暴露在外面，可以数出十根枪管来，可是格林炮的转速非常快，一分钟几百发子弹就出去了，子弹发射得快，炮就会很烫，必须要停止射击来降温，否则炮管就会变形。张黎源在英国泰恩威尔郡档案馆里看到的超勇舰资料上，机关炮也符合陈悦的描述。

致远舰的完工时间比超勇舰晚了7年，机关炮设计也向前发展了，枪管外面包了圆筒，里面可以加水或油，枪管转动的时候，外面的水起到冷却作用，从外面看不到枪管，只能看到炮筒，就是这次发现的沉船上机关炮的样子。

更有说服力的是跟格林机关炮同时发现的炮架。陈悦说，这个炮架不是常见的圆锥形底座，而是当时称为铁猫式的炮架。铁猫是19世纪对一种滑轮结构的称呼，它有上下两组滑轮装置，分别卡在上下滑轨上，可以带动铁猫在滑轨上滑动，增强连接牢固性，移动时像猫一样轻松自如。这种炮架用在有限空间的固定轨道上，军舰通常只用在安装桅盘上的机关炮使用，参与大东沟海战的北洋水师军舰，只有致远舰和姊妹舰经远舰的桅杆上有桅盘，经远舰沉没于大连庄河海域，而且没有装备格林机关炮。

沉船全部由淤泥覆盖，清淤犹如盲人摸象，可如果继续清淤，沉船身份的确定只是时间问题，北洋水师主力军舰的年代、功能、设计、生产厂家都有差异。回到19世纪的东亚局势里，才能理解北洋水师军舰的配备。陈悦说，1878年日本的铁甲舰“扶桑号”竣工，在19世纪末铁甲舰在海军中的分量可以用现在的航母来理解，这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李鸿章当时资金不多，中国也没有能停铁甲舰的军港，在做买铁甲舰准备的时间里，必须购买可以克制铁甲舰的武器。当时欧洲有一种小炮艇，船很小，驾驶也简单，但是装有跟铁甲舰口径差不多的大炮，虽然只有一门，但是发射出去有打穿铁甲舰的可能性。李鸿章买了十几艘，是亚洲拥有小炮艇最多的国家，但是这种船在欧洲并不是军舰，而是当移动炮台使用的，做成船的形式只是为了便于移动，打海战根本扛不了风浪。

李鸿章继续寻找克制日本铁甲舰的方法。海关税务司赫德向李鸿章推荐了英国一种新式军舰，它没有装甲防护，时速快，机器被水下舱板遮蔽，用煤堆保护，装备的两门后膛炮足以穿透任何铁甲舰。这种军舰的杀伤力在于撞击，因此也被称为撞击巡洋舰。1879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订购了两台“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的撞击巡洋舰，就是超勇舰和扬威舰。

1881年，中国终于跟德国订购了两艘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定远舰的排水量是7355吨，几乎接近日本“扶桑号”铁甲舰的一倍，火炮口径是30.5厘米，装甲也很厚。陈悦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世界上铁甲舰的出现还不到10年时间，定远舰是亚洲第一军舰。1886年交货给中国之后，定远舰去了一趟日本长崎，去了一趟俄罗斯海参崴，在亚洲地区有了制海权。

中法战争后，中国又分别向德国和英国订购了四艘军舰。姊妹舰“经远号”和“来远号”是装甲巡洋舰，来自德国。陈悦说，装甲巡洋舰的样式跟铁甲舰差不多，只是装甲薄一些，安在军舰的侧面，像墙一样。姊妹舰“致远号”和“靖远号”是穹甲巡洋舰，来自英国。英国人的理念是巡洋舰追求的是高航速，竖在侧面的装甲会让军舰变慢。他们放弃侧面装甲，而是在军舰的要害部位的上方、甲板的下方，平铺一层装甲。

1894年9月17日，午饭时分，中日舰队在大东沟狭路相逢。提督丁汝昌下令摆出犄角雁型阵，也就是横阵，所有军舰舰首始终对准敌舰。日本舰队摆出了竖阵，军舰首尾相连，把火力凶猛的侧舷对准我方。陈悦说，大东沟海战中国战败的原因很多，一个主要原因是刚进入蒸汽船时代，火炮数量不但减少而且发射间隔长、准确度不高，并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打沉敌舰最有效的方式在于近身撞击，所以军舰对撞角的设计都很重视。这样的战术需要对军舰优秀的操控能力和海军令人钦佩的巨大勇气。北洋水

> “出水防护太难了，我们馆里的藏品，很头疼的就是防止上锈。沉船整体打捞，必须考虑周到。”

师许多军官在英国留学，炮弹的命中率其实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890年后，清政府不允许再买军舰，而世界海战理论有了发展，不但提高火炮数量，而且缩短了发射间隔。日本舰队正对中国的侧舷，装有大量的速射炮。北洋水师向前冲，日本军舰往外躲闪，避免拉近距离，同时发挥速射炮的威力。镇远舰上的美国顾问马吉芬记录了海战开始时的状况：“一群群肤色黝黑的水兵将发辫盘在头上，将袖子挽上臂肘，一群群地聚集在甲板上火炮旁，迫不及待准备决一死战。”

在日本速射炮火力下，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超勇舰和扬威舰，它们本来就是为撞击战术设计的，为了追求高航速甚至没有装甲防护。到了1894年，两艘军舰已经老化，航速低，设备老化，几乎没有自卫能力。大东沟海战开战半小时，水师右翼的超勇舰就在烈火中逐渐沉没。

从大东港外赶向战场的北洋水师“左一号”鱼雷艇向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投掷救生绳，被他拒绝，随波沉没，成为大东沟海战第一位殉国的舰长。大副翁守瑜在灭火失败、军舰即将沉没的时候，投海自尽。清末海军史料记载了这一忠勇惨烈时刻：“左右援之，参戎曰，全船既没，吾何生为？一跃而逝。”

捞还是不捞

参加大东沟海战的军舰遗物，有济远舰流传于世，跟致远舰相同，它也是穹甲巡洋舰，1883年由英国制造，1885年回国。济远舰命运多舛，大东沟海战开战不久，就被管带方伯谦指挥逃跑，途中还撞上了已经受到重创的扬威舰。1895年2月，被日本海军俘虏编入日本海军军籍。1904年日俄战争中，在旅顺口触水雷沉没。

1986年国家旅游局拨款300万元计划对济远舰整体打捞。经历过这次打捞的甲午战争博物馆前馆长戚俊杰告诉本刊记者，烟台捞救局当时出动了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参与打捞，可是难度太大了，最后一共出水28件组文物，最醒目的是舰首两门210毫米火炮。它现在被陈列在北洋水师总部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府里，在院落最后的高台上，炮口面对大海，静静矗立。

看到火炮的实物才对军舰的庞大有了直观感受，济远舰舰首的克虏伯主炮，炮身有7米多长，重20吨，有效射程5000多米。打捞出水后，刘公岛上没有大型吊运机械，采用圆木滚动的搬运方法，从码头到提督署1500米的路程，走了45天。

体积庞大的打捞和搬运在技术上还可以解决，更大的挑战是军舰出水后的保护。戚俊杰1984年从海军手里接过刘公岛，当时岛上没水没电，他寻访北洋水师后裔、劝捐征集藏品，苦心经营20年，一手将甲午战争博物馆做到如今的规模。戚俊杰告诉本刊记者，大型钢铁材质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军舰在水下沉没了100多年，氯化钠已经浸入到钢铁材质的内部，它出水后一见太阳和空气，从里面往外生锈。19世纪的军舰都是铆钉连接的，一旦生锈军舰就散成一堆废铁，不成形状了。如果钢铁材质的体积小，可以用蒸馏水处理，可是一艘军舰60米长，要做一个65米长、2米高的大水箱，水箱即便做好了，水就需要多少，去哪里找这样巨大的蒸馏器材？就算是军舰出水后，做一个巨大的水缸，把军舰泡在水里，这个水也是要经常换的，维护费用非常大。“1988年我去夏威夷，看中途岛海战被日本炸沉的美国军舰，它没有打捞，也只是坐船往海底看。出水防护太难了，我们馆里的藏品，很头疼的就是防止上锈。沉船整体打捞，必须考虑周到。”戚俊杰说。

从发现沉没军舰到确认身份，再到将来的命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有很大的工作量要完成。北洋水师几乎是那个时代封闭沉闷的中国最接近世界的一个小团体，爱国、忠诚、勇敢和悲壮感动和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站在刘公岛上毁于甲午战争的水师学堂遗址上，看着地面残留的地基和遍地的荒草，仿佛北洋水师虽然战败解体，可他们还是以另外的形式在延续。戚俊杰说，大东沟海战中靖远舰的管带叶祖珪是第一批去英国留学的海军将领，他的孙子现在加拿大，专门召集儿孙分别从新加坡和日本到威海汇合。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名录墙前，他指着叶祖珪的名字告诉在日本生活的孙子，爷爷的爷爷是北洋水师的管带，你是一个中国人。

回到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现场，复盘致远舰最后的时刻。它在开战后表现奋勇，参加了对日本赤城舰的冲锋和追击。下午15点刚过，定远舰起火，舰上官兵冒着浓烟和弹片在甲板上灭火自救，管带刘步蟾指挥操舵尽量躲避日军的攻击，争取救火机会。邓世昌指挥着没有竖侧装甲的致远舰驶到了定远舰的前方，为定远舰遮挡日军射来的炮弹，使定远扑灭了大火，可防护能力不强的致远舰面对的是4艘日本军舰的速射炮，火力恐怖至极，一些炮弹打中了接近水线的位置，海水涌入，舰体右倾即将沉没。最后时刻，这艘北洋水师航速最快的舰还在邓世昌指挥下试图一搏，撞击前方的日本军舰。冲出途中，舰体发生爆炸。15点20分沉没。

邓世昌在军舰沉没后落水，仆从刘忠递来救生圈被他推开，鱼雷艇赶来相救，但他“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他养的狗“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最后邓世昌抱住爱犬一起沉入海中。那一天刚好是他45岁生日。

（实习生祝童对本文亦有贡献）

北京进入 APEC 时间

记者 / 邱杨



2013 年 10 月 8 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 21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前，与会国领导人集体合影

今年是 APEC 成立 25 周年。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全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之初是一个区域性经济论坛和磋商机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也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它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时隔 13 年，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此次 APEC 会议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定为主题，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定为三大重点议题。

会议能产生哪些实质成果才是人们真正在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区域经济总量占全球 57%，对外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的 46%。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客观上需要一个统一的制度化安排，使发展趋势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亚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大国的竞技场，亚洲的一体化制度安排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而东盟则提出了新的东亚合作框架倡议——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加上一直延续下来但陷入胶着状态遥遥无期的中日韩自贸区，亚太区域合作实际上出现了三驾马车并存的格局。谁会最终成为亚洲未来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核心，将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与亚太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就将拉动亚洲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2013 年，中国与 APEC 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60%，直接投资占比近 70%。本届 APEC 会议或许就是中国的一次机会。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将利用主场之利，在民主透明、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亚太区域合作：为制度化安排贡献中国智慧

——专访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李向阳所长

“除非中国自己内部出问题，否则外部很难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进程，这种进程持续下去将决定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种前景使得大国对中国羡慕嫉妒恨的心态都有，所以，中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为我们在未来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对称与断裂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过去数十年获得了高速发展，是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诱使各国纷纷转向区域经济合作？

李向阳：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多边贸易谈判机制本身出现了问题，尤其是WTO关于国际规则的制定受到了阻碍。2001年WTO启动了多哈回合谈判，本应在2至3年内结束，但直到现在13年时间过去，多哈回合谈判都没有成功。今年上半年关于服务业的一次谈判，因为印度不同意，谈判也流产了。这种多边层面的谈判和规制制定出了问题，使得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逐渐转向区域层面，利用FTA这种平台来制定能实施的规则。

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再全球化浪潮。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在过去2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是利益的相对受损者，虽然他们也承认全球化给所有国家带来了收益，但跟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比，他们获得的份额相对更小。至少从表面看，新兴经济体取得了高速增长，而西方国家经济增速相对比较慢，所以最近几年，西方谈再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所谓的再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制定或修改原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改变国际经济规则的本质就是要改变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西方国家认为，西方的经济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新兴经济体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相结合的模式，这使得西方国家处于不公正的状态下，所以要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来改变这种格局。但这些要求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又没法达成共识，只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这种新的平台和机制来制定新规则。正是由于西方大国对待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立场的转变，最终使得区域主义在过去十几年中取得了迅速发展，包括美国、日本这些多边主义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都转向了。

三联生活周刊：有说法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让位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李向阳：这个说法应该是能成立的。面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平台从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大国都在力图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平台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传统上欧洲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区域，欧盟的东扩更是通过扩大一体化的范围和规模来放大自身的竞争力。美国从最初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曾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虽然因为巴西等国的不合作最终没有谈成，但都显示出美国在对待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立场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由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日本在传统上是一个对多边主义极为坚定的国家，但是近年来日本也在转向。由此我们看到世界上三大经济体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都在发生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在发展速度和程度上存在着地区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热点的亚太地区，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处于什么水平？有何特点？

李向阳：亚洲的区域一体化水平是比较奇特的。按照一体化的机制或自贸区的协定来说，它的发展水平非常低；但是按照实际一体化程度来看又比较高。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靠市场驱动自然形成了一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分工越来越细，形成了一个从高到低的产业链。日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接下来是韩国、新加坡，再往下则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亚洲的区域一体化程度是市场驱动型，跟欧洲、美洲的制度驱动型不一样。从制度驱动的角度看，亚洲并没有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可以说一体化发展水平很低。但从市场驱动的角度看，亚洲的实际一体化程度和经济相互联系程度又很高。这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亚洲区域一体化协定的数量和质量不对称。现在亚洲地区的自贸区数量在几大洲里是最多的，但却是分散的，很多是双边或少数几个国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涵盖整个区域的自贸区安排。

第三个特征是亚洲地区一体化的推动者跟实际经济实力不对称。在其他地区都是由最大的经济体来推动，而在亚洲，则是由一组小国组成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东盟作为亚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

第四个特征是区域外大国跟区域内大国对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不对称。在其他地区，区域一体化的主导者或影响力最大的都是本地区的国家，而在亚洲影响力最大的是区域外的国家，也就是美国。最近几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的立场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洲的一体化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现状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经历了怎样曲折迂回的过程？

李向阳：亚洲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一直存在，但直到本世纪初，亚洲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才进入真正的发展阶段。起点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1999年正式表态要参与推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国与东盟启动自贸区谈判，进而引发韩国和日本分别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10+1”进程。与此同时，中日韩也启动了三方自贸区谈判，虽然到现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按照中日韩与东盟“10+1”机制下的发展逻辑，应该逐渐进入到“10+3”的发展阶段，形成一个能涵盖整个东亚地区的自贸区安排。但是由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这个进程被搅乱了，“10+3”演变成“10+6”，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10+3”的基础上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就是说，现阶段亚洲区域一体化出现了三驾马车并存的格局。至于哪一个最终会成为亚洲未来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核心，现在还不确定。

竞技场

三联生活周刊：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强调对成员国的静态经济收益，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更多是寻求动态经济收

益和非经济收益。这里的静态经济收益、动态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具体是指什么？

李向阳：传统国际经济学强调的静态经济收益主要指贸易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或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益是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因引进投资数量增加而带来的收益，而在参与过程中受损的则被称为贸易转移效应。动态经济收益是考虑到了时间因素，比如说因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引发产业调整，劣势产业逐渐萎缩、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动态过程。除此之外，尤其对一些大国来说，还有非经济收益，包括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解决非经济领域的冲突和争端等。比如巴西跟阿根廷，两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冲突，但是因为融入到南方共同市场这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这种冲突都降低了。


（于楚众 摄）

李向阳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这个场域里，美国、日本、韩国、东盟等各大势力参与其中的实际动因是什么？各自寻求的真正收益又是什么？

刘向阳：美国是世界霸主，同时也是亚太地区经济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所以美国的自贸区战略应该放在全球层面上来看。作为再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利用新的平台重新制定新的规则，应对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亚太地区是TPP战略，在大西洋就是TTIP战略。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美国率先推出TPP，就是要主导亚太地区的秩序和规则的制定，防止中国成为主导者，这是美国的基本动机。

日本的情况就跟美国不太一样。之前日本一直在试图成为亚洲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自从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后，尽一切可能制止中国来主导亚洲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是日本从民间到政府精英阶层的基本共识。但日本本身又没有能力单独跟中国竞争，只能采取“脚踩多条船”的策略，在中日韩自贸区、RCEP、TPP这三个亚洲最重要的自贸区协定中都有它的身影。“脚踩多条船”策略是和日本在亚太区域及全球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日本既不想只跟着美国一家走，最后失去亚洲市场，又想依靠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至于韩国，它在亚洲是一个中型国家，没有单独主导亚洲秩序和规则制定的能力，它采取的是在大国之间搞平衡的策略。韩国跟世界上主要大国的自贸区协定都已经签署，同时又在参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但由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预计今年中韩的双边自贸区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对韩国而言，单独依附于某一个大国对它来说是不利的，只有跟相互矛盾的大国或者不一致的大国同时合作，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而东盟是由亚洲的10个小国组建起来的共同体，它最重要的目标是防止被边缘化。由于亚洲的主要大国尤其是中日之间存在矛盾，客观上为东盟充当亚洲一体化的驾驶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它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成功。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又是什么？

李向阳：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实际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有这么几个方面我想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的。第一，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客观上必然要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规则的基本特征是非中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的国家带来的成本/收益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国家都希望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到规则里来，从而在国际分工中获得较大利益，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第二，通过开放促进国内改革，是中国特有的目标。无论是参与多边合作还是参与区域合作，实际上都有这么一个连带的效应，通过更高程度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对国内管理体制和企业构成压力，促进改革。

除此之外，中国参与区域合作还

有一个特殊的目标就是国家的统一，这是其他国家不存在的动机。海峡两岸之前签署的ECFA，包括跟香港、澳门地区签署的ECFA，都是为了促使国家统一而参与的准自贸区安排机制。

最后一点，既然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那么中国毫无疑问必须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因而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或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与中国的外交战略一致，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先选择是东亚地区、亚洲地区，然后扩展到亚太地区。

中国的机会与风险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分析了不同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也必然存在对未来区域主导权的争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向阳：主导权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前些年我们好像不好意思承认，但实际上大国的所谓主导权并不是说让别的国家成为你的附庸，而是通过在自贸区规则制定过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在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也把美国的规则和理念贯彻进去，当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在多边场合时，更多体现的就是美国人的理念，客观上把美国的影响力在多边层面放大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自贸区里都存在主导权，这是不需要回避的问题。我想中国不会致力于成为区域的霸主，但在客观上我们也不能否认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有主导权的争夺。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机会在哪里？

李向阳：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为我国参与区域合作提供最坚实的基础。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取决于经济规模，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贸易规模。而贸易规模里更重要的则是进口规模，也就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多大的出口市场。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自然而然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调整，我们不再寻求一种以贸易顺差为目标的贸易战略，而是进口规模增速会越来越快。这几年已经出现这种现象，我国的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这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大的出口市场。市场规模将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风险和潜在风险又是什么？

李向阳：我想风险有两个层面。一方面，亚洲未来的区域一体化安排高度不确定，存在几种合作机制并存的格局。如果将来不包括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安排成为这个地区未来的主导机制，那么中国就面临着被排除在外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未来区域一体化中不仅有商品还有资本、人员等的流动，这种流动可能会对我国现行的金融安全乃至政治安全产生冲击。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会不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三驾马车

三联生活周刊：亚太区域合作发展到今天，在合作路径上出现了多种竞争性构想。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而东盟则提出了新的东亚合作框架倡议——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是否意味着亚太区域合作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框架重构阶段？

李向阳：还不能简单地说是重构，因为亚洲原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只能说在框架形成过程中，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得原来的发展进程改变了，出现了三驾马车并存的格局。对于三者未来的前景，各方的评价也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未来可能TPP还是最有影响力的。虽然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参与TPP，但TPP对亚洲的影响将会是最大的。按照TPP的发展势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将是TPP的成员。并且从制定的规则看，TPP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是最高的，这是美国人所标榜的“21世纪的高质量的规则”。

RCEP是一个涵盖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东盟十国共16个国家的自贸区协定，可以说把亚洲主要的国家都涵盖进去了，包括的人口从区域来说甚至比TPP还要大。但是RCEP本身制定规则的质量跟TPP比起来档次较低，更重要的是，这16个国家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谈判，仍然是未知数。从目前谈判的难题看，RCEP即使谈成了，它的自由化程度也会比TPP低。

第三个是中日韩自贸区，虽然它的经济收益潜力非常大，但是中日、日韩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个谈判短期内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我把它称之为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三方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谈判平台，但是又谈不出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我国该如何处理与这三驾马车的关系？

李向阳：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且不说陷入胶着状态遥遥无期的中日韩自贸区，如果2015年以后TPP和RCEP都谈成了，那么在亚洲就出现了一个不包括中国的TPP和一个不包括美国的RCEP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其他国家会如何选择，把合作重心放在哪个平台上，都是不确定的。对于中国来说，很显然我们不能消极等待。一方面从外交上我们必须要支持RCEP谈判进程，使它成为一个更具有活力和实际意义的自贸区协定。另一方面，我觉得要积极推行已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的“一带一路”主张。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

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自贸区协定，更不是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而是一个适合亚洲发展多元化诉求的新型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并不排斥其他现有的自贸区，这可能是中国在未来的区域一体化里的一个新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认为TPP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牌，你怎么看？我国该如何应对？

李向阳：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如何来应对，是美国21世纪对外战略里最优先的目标。我在这里没有使用“遏制”，而是“应对”，是一个更加中性的词。至于这种“应对”是采取遏制式的，还是竞争式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遏制因素的。TPP有些规则跟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无法相容，并且是根本意义上的不相容，所以我只能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还无法接受TPP这套规则。而从美国的角度，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受中国加入，从TPP的框架设计到谈判进程，美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接受不了，并且美国已经明确表态，在TPP12个创始国谈判完成之前不再接纳新的国家，所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TPP是一个排除中国的俱乐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倒是认可美国的TPP战略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但并不是“冷战”时期的那种遏制，所以我更愿意使用“应对”这个词。

听上去中国是被排除在外，但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前景反而是最好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在可持续发展，除非中国自己内部出问题，否则外部很难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进程，这种进程持续下去将决定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种前景使得大国对中国羡慕嫉妒恨的心态都有，所以，中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为我们在未来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PEC 25年，调入改革频道

——专访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APEC找到了适合自己渐进发展的方式和发展路径，并且非常积极主动地做出有益的调整和改变。这两方面因素是APEC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根本原因。


（王旭华 摄）

刘晨阳

25年，再回首

三联生活周刊：APEC在过去25年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哪些成果？

刘晨阳：如果要把APEC25年的发展历程划分阶段，我个人认为从1989年APEC成立到1994年设立茂物目标是APEC的起步阶段。1994年后进入APEC的发展阶段，茂物目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上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导引，使APEC的合作向具体领域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亚太地区区域合作一体化格局逐渐发生较大变化，很多以自贸区为主的新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合作机制与APEC形成了并行发展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APEC从2000年以来陆续在合作领域、理念和导向上做出积极的调整。

APEC的成果体现在诸多方面：成员数量上从1989年最初的15个国家到现在的21个成员，成员数量的增长本身就体现了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核心的区域合作组织的巨大吸引力。从合作领域和合作框架来看，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几大方面构建了全面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使成员们从贸易投资到社会人文能全方位密切联系。从合作机制和组织结构来看，从领导人会晤到部长级会议，乃至委员会和工作组，由上到下构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能够推进工作实施的机制设置，同时建立了一个“官产学”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能吸引到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来。

三联生活周刊：APEC创造了独特

的运行模式“APEC方式”,特点是什么？为何会形成这种模式？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实际效果如何？

刘晨阳：“APEC方式”用关键词来概括就是“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突出了APEC的论坛性质，是并不具有强约束力的合作组织。亚太地区成员数量多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都有很大差别，如果不采取这种“灵活渐进、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方式，是很难在差异性如此巨大的成员中建立起合作机制来的。“APEC方式”是适合APEC诞生和前期发展的理性选择，使成员能不受制约条件的限制，真正平等地参与合作。学界对这种方式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有专家说这是一种既有南南合作，又有南北合作、综合不同合作方式的首创，顺利推进地理范围如此广大、成员数量如此众多，差异性又如此巨大的亚太地区区域合作，这是“APEC方式”独特的价值。从实际效果来看，在APEC诞生和发展的前期阶段，“APCE方式”也确实实现了它的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APEC传统的重点合作领域是什么？近年来不断开拓的新的合作领域又有哪些？

刘晨阳：APEC传统的合作领域是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这三大支柱，又叫“三驾马车”。贸易投资自由化实际上是从市场开放的角度来逐渐削减和降低贸易壁垒，使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能够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进行。贸易投资便利化是在海关通关程序、电子商务、技术标准等方面确立合作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贸易投资活动更加方便。而经济技术合作则是重点照顾发展中成员的利益，通过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技术交流和援助使发展中成员有足够的凝聚力和意愿参与合作。

这些年在合作领域上确实有了很大拓展，尤其是非传统领域。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APEC在合作领域上根据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做出了相应调整，反恐、防灾减灾、卫生防疫、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合作领域成为APEC这些年固定下来的重点合作领域。最近两三年，互联互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创新改革议题也逐渐成为热门。

三联生活周刊：APEC在这25年里能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晨阳：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亚太地区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亚太地区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贸易的引擎和火车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最大的驱动力量。从政治和外交角度看，除欧盟外，中、美、俄、日等大国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APEC找到了适合自己渐进发展的方式和发展路径，并且非常积极主动地做出有益的调整和改变。这两方面因素是APEC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根本原因。

内忧外患下的改革突围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APEC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APEC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挑战。从内部看，APEC的问题出在哪里？

刘晨阳：“APEC方式”中自主自愿的方式与区域合作长期效率之间的矛盾，灵活渐进的方式与集体行动的公平约束性之间的矛盾，是两个根本的矛盾。如果少数成员消极地拖后腿，会对整个集体行动的步伐造成拖累，现在应该是到了对APEC合作的效率和实效性进行渐变式改革的时候。

三联生活周刊：从外部看，近年来各种新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纷纷出台，并在覆盖地域上和APEC形成了高度的重叠。尤其是美国积极推进的TPP和东盟提出的RCEP，这两大路径将对APEC的未来地位和发展前景造成怎样的挑战和影响？这是否意味着，APEC未来将被其他区域合作机制所取代？

刘晨阳：首先必须承认，TPP和RCEP对APEC确实有影响。一旦TPP或RCEP建成，其约束性和实效性成果将更明显，将可能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上部分地取代APEC原有的功能。但从性质上看，TPP、RCEP与APEC并不一样，前两者属于自由贸易区，而APEC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的合作机制外，在合作功能和涉及领域上要远远宽于自贸区的范畴。尤其是APEC领导人会晤机制目前在亚太地区是最高层面的平台，成员数量也是最多的，短期内要想重新成立一个全新的机制全面地替代APEC，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虽然有冲击,但从中长期看，APEC在整体维系亚太区域合作完整性上仍将继续发挥原有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在如此内忧外患的形势下，APEC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未来的发展机会在哪里？又该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真正提高APEC合作的实效性，以适应新形势？

刘晨阳：怎样利用好现有的机制，形成合力，摆脱干扰，推进亚太区域合作在APEC平台上深入有效地开展，才是APEC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从APEC自身的运行机制看，“改革”、“创新”这些词正被频繁提起，应该说在近两年内APEC会在加强自身约束力和提高合作实效性方面采取越来越多的具体措施。

其实APEC之前也做过类似尝试，不过没有形成主流延续下来。比如说APEC前些年曾经推行过“探路者方式”，如果不能在所有成员中达成一致，又有不少成员对某个合作领域达成了部分共识，那么这些成员就可以先行启动把合作先做起来，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后再去逐渐吸引其他成员加入。这种方式其实就是APEC曾为加强自身实效性和运行效率所做的尝试。而目前APEC正在推进的互联互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已经在为加强合作实效性

做一些有益的尝试。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既满足成员国共同需求又能很快见到实际效果的合作领域。

这几年来APEC也一直在强化同行审议机制，邀请专家、第三方对APEC成员推行贸易自由化等方面的进展和不足做评估，形成官方报告，为成员采取下一步更好的改进措施形成指导。我认为APEC未来还会更多地引入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进行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估，使成员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再就是从机制设置上，比如秘书处，以前更多是服务和协调的职能，但今后应进一步强化其在推进合作中的引导力和执行力等综合能力。同时，APEC能不能发挥孵化器的作用，推动亚太自贸区这种极具雄心、能为亚太地区一体化提供全新目标和框架的新的机制的发展，这可能是APEC未来最大的价值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如何处理APEC和亚太自贸区（FTAAP）的关系？

刘晨阳：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亚太自贸区到底是在APEC框架内来推进还是平行于APEC框架之外来推进。我个人比较倾向后者，亚太自贸区并不在APEC框架之内，将来一旦形成，也不必然导致APEC的消失。对于亚太自贸区，APEC还是发挥了一个积极的孵化器的作用。针对亚太地区碎片化、大量自贸区不断衍生的情况，APEC认为还是应该推进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能够包容所有成员的整体自由贸易安排，所以提出了亚太自贸区这个概念。但亚太自贸区的推进还是应该在成员间由官方政府来主导并进行正式的国际谈判，它的建立将对亚太区域一体化的长期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亚太自贸区建成后，APEC依然会作为一个全面的区域合作组织发挥原有的职能和功用，并不存在恶性竞争的关系。

中国今年作为东道主也是把亚太自贸区作为重点热点在推进。我想澄清一点，有人说亚太自贸区完全是中国在主导和发起，其实不是这样。亚太自贸区最早是10年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个畅想，很快获得了工商界的认可，由他们来向领导人和政府层面积极推进。2006年APEC领导人会议正式对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给出了一个积极回应，转眼8年过去了，到今年APEC成立25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想不仅是中国有这样的意愿，其他的很多APEC成员也有共同的意愿推进亚太自贸区。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才把推进亚太自贸区又提上议事日程，我也希望今年能够尽可能排除干扰和矛盾，取得更多有形的成果。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前亚太区域合作进程走到分岔路口的情况下，你怎么看APEC的发展前景？

刘晨阳：简单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如果APEC能够凝聚成员共识，它完全有能力在亚太区域一体化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加上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APEC作为亚太地区代表性合作组织的受关注程度和潜力，我还是比较看好的。说到挑战，可能还是亚太地区目前在政治、安全等方面出现了不稳定因素，部分成员间的博弈更突出，使得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趋于复杂。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彻底的扭转和改变，一定会对成员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但我个人的判断还是机遇大于挑战，就像这届APEC强调的“新型伙伴关系”，就是一种积极的合作方向来化解或缓解现有的负面因素。

中国的“桥梁”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中国来说，参与APEC的思维和政策又应当如何进行调整？

刘晨阳：随着自身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应发挥与此更相匹配的作用。这既是中国自己的主观意愿，又是其他成员对中国的期望。我们一直在强调周边是关键，处理好亚太周边关系是我国谋求长期发展最根本的利益诉求，也是我国实现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必经阶段。所以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中国要有主观意愿去发挥积极作用来放大正面因素，化解负面因素。另一方面，区域内很多其他成员也希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好地发挥责任感，为地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建设上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中国在参与APEC合作的早期还是更多地把自己归于发展中成员的阵营，在合作议题和立场选择上更多地从发展中成员的立场出发和考虑问题。但目前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中国在很多议题上已经不再单纯把自己放在发展中成员的立场上，而是更多地发挥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的桥梁作用，兼顾大家的共同利益。因为在很多合作领域上，中国既有发展中成员的某些特点，但同时又在某些领域逐渐与发达成员趋同，并且这种趋势未来将更加明显。所以我认为在思维和政策选择上，我们应该兼顾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共同利益，使中国更加全面地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引导力。这样才能使我们自身实力和应尽的责任更好地匹配。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今年即将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在发展成果上有什么期待？

刘晨阳：今年的三大议题各有亮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我还是希望推进亚太自贸区能够获得尽量多的共识，取得一些具体推进步骤的实质承诺。创新改革这个议题比较有开创性，其中反腐败、蓝色经济、粮食安全、城镇化、互联网经济等议题，如果能够通过今年的讨论使其成为APEC框架下具有延续性的议题，这对深化APEC合作、加强APEC生命力非常有益。最后一个议题基础设施建设就更不用说了，可能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不管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能很好地找到共同利益，为地区经济合作找到新的拉动力。总体来说，今年可期待的亮点和成果还是比较多的。



雁栖湖畔的城市新地标

解密 APEC 会场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2014 年 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时隔 13 年后重回中国，并将其坐标定位于首都北京。本次峰会酒店所在的雁栖湖地处京郊明珠怀柔，三面环山，山水相映。同时，依托良好的自然和交通条件，这里未来将形成以雁栖湖为中心，多层次、国际化的开放空间游憩网络，成为北京国际会都。2015 年，20 国集团（G20）峰会也将在此举行。如今漫步雁栖湖畔，一座名曰“日出东方”的会议酒店已经依山傍水，矗立在山水之间。

山水之间的自然建筑

日出东方酒店坐落于雁栖湖南岸。作为 APEC 和 G20 峰会的主会场，该酒店既是湖畔的对景，也是居高瞰湖的焦点。建成后的酒店总建筑面积 8.498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0278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4702 万平方米。建筑总高度 97 米，共 19 层，其中主楼堤上部分 79 米。

从雁栖湖会都核心岛向南望去，酒店的裙房消失在大坝之后，主体建筑好似漂浮在水面之上。曲线形的玻璃幕墙折射出天光与风景，与天空和自然融为一体。总设计师匡晓明对设计方案的阐释极具中华文化的诗意：“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为起点，落足于‘建筑与自然的有机共融’，以日出东方的诗意画面诠释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形成建筑藏其身于大地，寄其躯于山水，赋其形于意境的自然之美。”

新地标的本土化

放眼当下，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大多是由国外事务所设计并完成的，本土建筑师的缺失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本项目的一大特色在于该建筑完全是由本土设计事务所独立设计完成。“这个项目正是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的提炼而形成的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的现代建筑。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圆代表了万物的开始，代表着生生不息的传承，正是通过对这种文化的深刻理解，我们的设计才得以成功展开。”总设计师匡晓明与他的搭档张海翱如是介绍。



随处可遇的湖景

塔楼部分以客房为核心，共有 310 间客房，分布在 4 ~ 18 层。由于塔楼的特殊建筑造型，每层为不尽相同的椭圆形平面，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形态。平面两侧端头处设置套房，其余各房间也均能享有优美的雁栖风光。平面中庭采用双核心筒的模式，将酒店中间区域独立出来设置室内中庭，每 3 层为一个挑高空间，并与入口空间串联。

塔楼 3 层中部为沿湖景观大堂，两侧分别为茶室和 SPA，大堂为高达 3 层的大空间挑高，并配合两侧精致的索网幕墙形成了极为通透的空间效果。14 层设置面积 360 平方米的总统套房，位于观景最佳位

置，湖景、山色、核心岛尽收眼底。15 层北侧为行政酒廊，并设置了开敞的茶座区、私密的会议区和备餐服务等空间。顶层为 17 米挑高的多功能会客厅，立面与屋顶形成连续弧面 180 度的大角度观景效果，由于整体采用玻璃幕墙，非常通透，夜晚繁星点点扑面而来。

建筑裙房部分主要承担公共接待、酒店服务及公共活动的功能。入口大堂朝向南侧场地主入口景观处，通过景观楼梯可到达 3 层通高的景观大堂，并可直接连通雁栖湖畔。会议中心位于相对独立的西南侧裙房，宴会厅可供 1800 人同时使用。餐厅区域处于北侧裙房处，包含中餐厅、全日制餐厅和宝来纳酒吧三个餐厅，均有较好的用餐景观视野。

多样化的生态策略

LOW–E 玻璃幕墙

建筑采用 4 层 LOW–E 玻璃幕墙，既满足了建筑体量轻盈、通透的外形要求，又实现了传统实墙的保温隔热效果。幕墙使用的 LOW–E 玻璃在白天能使室外辐射的大部分能量透过，但在夜晚和阴雨天气，可有效阻止室内的热量泄向室外，具有控制热能单向流向室外的作用。

导风槽

酒店建筑一般不设可开启窗户，采用新风系统进行换气。而在该酒店中，匡晓明采用了更为前沿与低碳的技术——导风槽，使酒店在春秋季采用自然通风。导风槽设置于建筑立面竖向杆件，在位于室外一侧设置穿孔铝板，将室外自然风引入中空金属杆件内，再通过位于室内一侧的可开启铝板扇叶，最终进入建筑内部，实现自然通风。

新能源技术的应用

建筑采用冷热电三联供系统，以清洁能源天然气为主要燃料供应电力，以此替代电空调制冷而节约大量电力。系统发电后排出的余热通过余热回收利用设备向用户供热、供冷，综合用能效率可达 90% 以上。设计的雨水外收集系统将屋顶雨水收集统一排入设置于室外场地的雨水调蓄池，经过简单的过滤处理，可用于绿化浇灌、冲洗路面等。

访 APEC 峰会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总设计师匡晓明



总设计师：匡晓明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设计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
《城市中国》杂志总编

酒店由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独立设计完成，其总设计师匡晓明则是业内知名的建筑师与城市设计专家。“设计中应用了建筑与自然相融的理念，把酒店和雁栖湖的山水有机融合在一起，并且处处渗透着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匡晓明如此介绍着他的新作品。

笔者：在这个项目的设计中，你提到了“主动设计”和“被动设计”两种设计策略。这两项看似对立的策略在项目中是如何体现的？

匡晓明：被动设计主要基于环境、文化要素得出建筑的符号与语言。在形态的被动设计上，我们首先确定了“日出东方”的圆形形态，然后在裙房设计中采用了“祥云”的造型，迎合了当地“彩云追日”的民俗文化；通过“风环境模拟”，不断地修正体块的大小和轮廓，最终形成了遵从当地风环境的建筑形态。在生态的被动设计上我们设置了可开启的幕墙呼吸系统，并通过幕墙的多层体系设计形成了节能效果非常好的外维护系统。在被动设计的同时，我们也积极投入了主动设计，采用了冷热电三联供技术，通过燃气利用来实现能源的集约高效，并采用了太阳能、中水回收等一系列主动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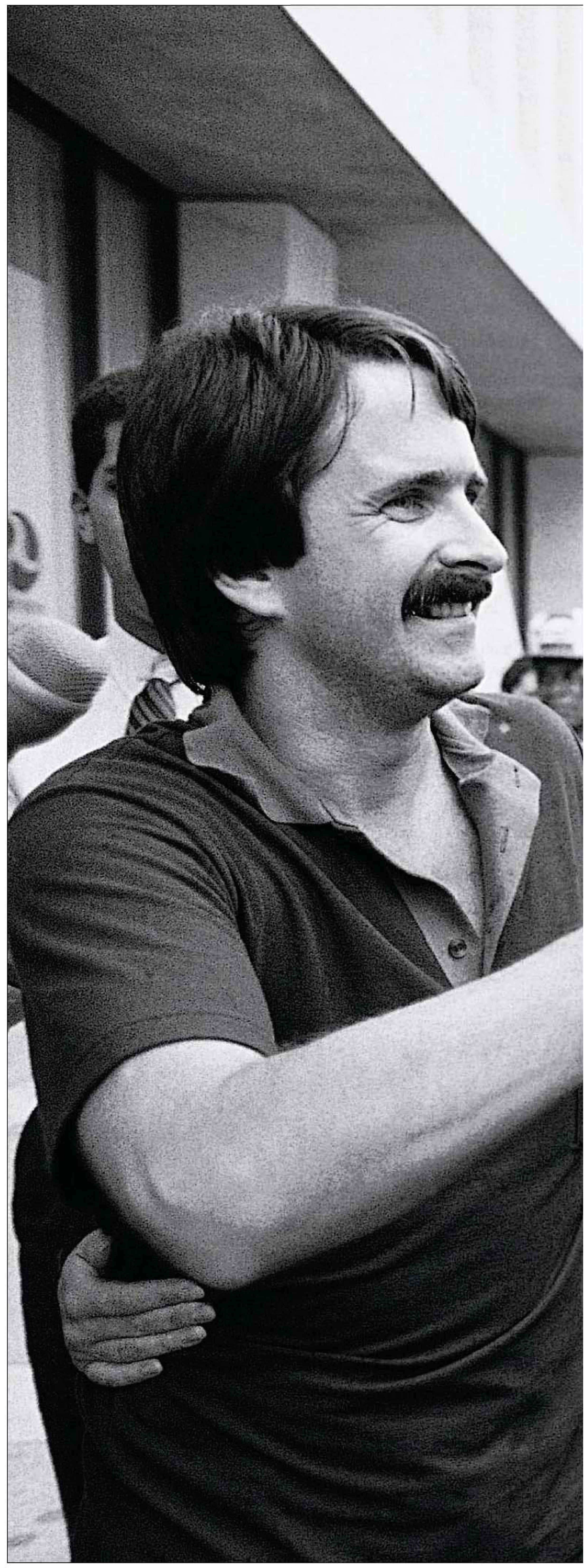
笔者：“日出东方”作为一座典型的“峰会酒店”，它的设计与一般酒店的设计有着怎样的不同？

匡晓明：峰会酒店的诞生建立在“大事件”基础上，在设计中更应体现国家利益与全球人民共同的价值观，以反映当代的时代精神与特征。峰会酒店应有一个独特的造型，使人们一见到该建筑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对该地区的联想，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峰会是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举办的，那就需要我们的酒店具有相当的亲和力。在“日出东方”这个项目中我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两点。

笔者：“日出东方”酒店的问世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华都设计”及华都的作品。“华都设计”自创立至今已走过了 10 年，你与你的设计团队秉承了怎样的设计价值观？

匡晓明：2004 年，我与顾敏琛等一批同济大学的有志之人怀着“以设计改变中国城市”的初衷，合伙创立了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寓意“中华都市”。“华都”有鲜明的团队设计理念——传承中华传统博大的思想，实现“中华传统智慧与现代城市发展的结合与创新”。我们在建筑与规划设计中从多个层次进行继承和创新：第一是传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强调建筑与自然的有机共融；第二是在空间技法上传承中华传统的空间特色，展现建筑、环境和空间的一体化；第三是在建筑造型上承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丰富建筑的非物质语言，传达建筑的精神。此次设计延续了“华都”一贯的研究城市的视角，我们始终坚信，传统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继承，是理念与灵魂的继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里根经济奇迹”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结果

“里根主义”变成了美国咄咄逼人，强硬干涉的霸权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并未给美国与世界带来承诺中的秩序、安定与繁荣，而是让其前途变得更加含混与不安。

主笔 ✎ **朱步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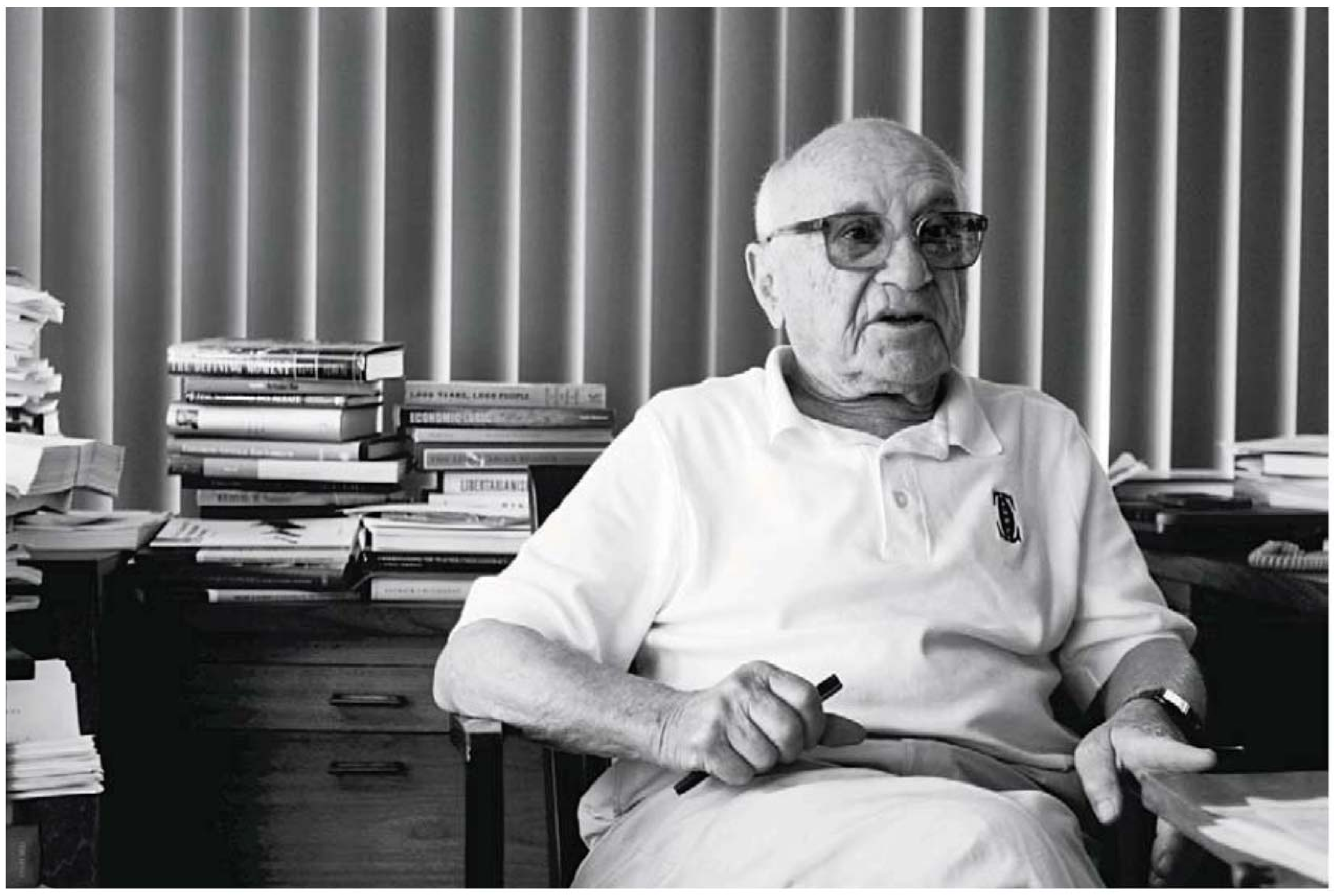


1981 年 9 月 7 日，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PATCO）主席波里（左）与诺瓦克机场工会负责人沃勒特一同参加罢工游行

从某种程度上说，“里根经济学”曾在新自由主义者总结中制造过奇迹：一扫 80 年代初笼罩在美国公民心头的阴霾，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2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 3.2% 的速度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至 4%，就业人口从 1982 年的 1.02 亿增长到 1987 年的 1.142 亿——“里根经济”于是被看作“新自由主义经济奇迹”的同义词。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这个口号会令人迷惑，因为自由主义通常意味着支持政府的福利计划，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凯恩斯所提倡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而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提倡把市场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然后控制供求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将会使穷人和富

人都从中受益。”北卡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H. 韩德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中这样论断，这是美国战后最大的一场社会变革与波动，重塑了垄断跨国公司的统治地位与上层精英对于经济与财富的掌控，在全球经济流动过程中重新启动资本积累的尝试，进而将尊重个人自由、消费主义与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等抽象原则作为某种放之海内而皆准的主导意识形态投放到全球。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恐慌时代的对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47年，风光旖旎的瑞士朝圣山，包括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此年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协会成立宣言的一开始便忧心忡忡地指出：“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地球广袤的表面，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必要条件正在消失殆尽，这种严重趋势的根源来自于道德基础的衰落……来自于对私有财产与市场竞争理念信仰的衰落……国家干预与计划之所以无法有效地保障紧急增长，在于它无法及时收集足够的市场信息并做出及时的反馈与应对。”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简明扼要：清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壁垒，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终结造成市场扭曲的政府补贴。对于这些支持市场主导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过分管制的国家是敌人，社会福利计划是祸根，而公益事业则是圈套，要达到最大数目社会成员的最大福祉，只需要给予每个经济个体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让他们按照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市场行为，就可以达到最大效率以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

对美国而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一段令人忧伤的岁月，美国遍体鳞伤地撤出了越战泥潭，总额达到1400亿美元的高额国防开支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约翰逊“伟大社会”改革方案造成了政府开支的进一步增长，欧佩克产油国宣布联合限制产量并提高油价，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新幽灵——滞胀，悄然来临。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缘于美国公众对于两种巨大威胁的同时恐惧，越南战争造就的国家——军工垄断综合体的阴谋与专断，以及60年代以来黑豹党、嬉皮士、民权运动等左翼激进街头政治与形形色色对于传统美国价值观造成威胁的破坏性的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一书的作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著名社会政治学家雷蒙德·普朗特这样总结道：“于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折中式的解决方案出现了，个人自由被严格界定为在市场经济秩序下进行自由消费与选择雇佣就业方式的自由，而资本则需要摆脱一切桎梏，无论是政府对其进行培植抑或是任何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歧途，并深信其后果是使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得益。”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一代共和党政治家们就开始激进寻找使美国重新回复上升趋势的药方，而新自由主义这种全新的政治主张应运登堂入室，早期华盛顿国会山中“新自由主义”信徒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理查德·维格利（Richard Viguerie）以及保罗·维利奇（Paul. Wyrich）等。当凯恩斯理论的魔法开始在70年代的滞胀中失效时，新自由主义者们呼吁开始另一次根本的变革：削减政府规模、赋税，共和党内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开始积极采纳一些知名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等的建议，并联合了一些保守派人士，最终，促使罗纳德·里根入住白宫。

1974以及1975年，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分别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70年代当弗里德曼担任加州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时，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就对其十分赞赏，称之为“经济学界最为敏锐的头脑”，并号称通读了他那本大名鼎鼎的《自由的选择》，虽然弗里德曼未曾在里根政府任期内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但他对后者的影响却最为深远。而在里根宣布参加1980年总统竞选时，弗里德曼也盛赞里根是一位真正将个人自由、削弱政府，以及尊重市场原则作为其基本纲领的政治领袖，里根曾在多次竞选演说中引用其论点，诸如赤字的来源就是“大政府”自身不可抑制的膨胀所导致的

后果，也是拖累经济增长与造成通胀的元凶。在《自由的选择》中，弗里德曼通过对战后英国与西德30年间的经济增长统计与政府干预、开支变换指出：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以及过分强调通过税赋福利杠杆达到社会平均的指导政策，是英国人均创造GDP值最终落后于西德（从1950年人均1254美元对人均1015美元，1980年人均9110美元对1.345万美元）的直接肇因，他进一步提出，美国政府开支占据GNP的比例，在战后30年间已经从10%左右急剧增长至33.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包括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研究所，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执教的芝加哥大学，他和其门下弟子形成了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在尼克松任期内，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如赫伯特·斯特恩，开始在华盛顿内部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发言权，尼克松奉行了一种被称为“渐进主义”的经济方针，期望用温和的货币政策逐渐削减通货膨胀率，并把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然而货币紧缩政策却引发了信贷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使失业率迅速攀升至5.4%，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政府又转而求救于传统的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然而危机并未缓解。到了卡特任期内，CPI与WPI指数都以两位数百分比狂飙突进，美元在70年代的疲软与欧佩克石油禁运、伊朗与阿富汗危机增强了这一恐慌趋势。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吉米·卡特任期内的某些政策已经被看作“里根经济学”的部分预演，包括一个为期两年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减税、增加公共事业项目就业等等，总规模310亿美元，然而这种半心半意的改革丝毫无济于事：1980年下半年，基本利率升至史无前例的20%，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工资下降了至少4.5%，当里根旗帜鲜明地在1980年竞选活动中向选民发问“在卡特政府的四年任期结束后，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否有所改善”时，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减税——皇帝的新衣

里根经济学的颇有争议的内核，就是假定经济能够在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严苛的条件下实现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将稳定继而降低通货膨胀，同时，减税将创造流动性，刺激投资与储蓄，从而避免因货币供应速度过慢而导致的衰退。

减税即可刺激储蓄投资与生产，这一被供应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理论却基于一个并不完全信服的假说，即减税后，经济个体的劳动价值有所上升，势必鼓励他进一步投入时间成本与劳动成本换取更多的劳动报酬，这不仅是理性经纪人健康的欲望所驱使，也缘于休息本身的（时间）成本在提高。累进税制之所以有悖市场原则与常情，在于它以越来越不合理的投入/回报率，抑制了人们在工作中尽自身最大的努力与产出，如果税率降低，纳税人就会取得更多的新收入，经济活力增进将保障更多的就业，反过来扩大了政府税基，从而补偿因降低税率造成的损失，这就是典型的“拉弗曲线”式效应。

里根与其经济顾问以及财政部拟定的最初减税方案，是在里根任期的头三年内，每年削减税收10%，然而众议院顾虑过分削减会导致政府赤字急剧扩大，最终将年度税收减免额定为5%左右，1981年8月正式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ERTA），给了里根政府以相当大的权力与自由度实施税收改革，个人所得税纳税最高比例从70%骤降至28%，投资所得税最高征收比例从70%降低到了50%，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政策。

1982年6月，全新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宣布，把年度赤字从450亿美元降低到300亿，但缩小了削减个人所得税与工商企业税减免的幅度，然而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看来，这对于政府赤字与经济增长减缓是杯水车薪，从而强烈要求增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多尔曾冷嘲：“供应主义经济学家的汽车掉下了悬崖，车上还有几个空位置，是留给总统的。”5月5日，里根被迫就范，宣布了达成妥协后的预算计划，包括增税650亿美元以及削减国防开支320亿美元。

纵观整个里根任期内，尽管整体美国公民的绝对收入在缓慢增加，但全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从4.8%降到了4.2%，并且在以每年2.4%的速度减少，而收入最高的20%则从42.7%涨到了45.1%，并以每年4.7%的速度增加：“穷人在滑向更加贫困的深渊，而美国的年轻人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厄运。”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英国经济社会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在其报告《里根经济奇迹真相》中说，里根任期内，中高收入人群的税赋显著减轻，然而却转移到了低收入与贫困人口身上，从总体看，1987年，15.08%的平均个人税率与其上台伊始之时基本持平，企业利润税率曾在1987年高至50.7%，使得卡特任内的35.5%相形见绌。而根据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供的数字，全美收入最上层10%的纳税额在1984至1988年之间减少了8.6%，次层10%的纳税额减

收入最上层的纳税额减少了8.6%，次层减少了2.4%，而最底层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的税赋却增加了3.8%～3.9%。



1986 年 10 月，美国前总统里根签署了税收改革法案

少了 2.4%，而收入处于最底层 10% 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在同期内税赋却增加了 3.8% ～ 3.9%，25 岁以下青年家庭的年收入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下滑了 4.1%，因为社会福利保险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只占据不到 1% 的比例，随着税赋的加重与社会福利向中老年富裕阶层的倾斜，他们变成了被剥夺的一代。

里根在 1984 年竞选连任时，面对的最激烈挑战之一即是，如何在减税增大贫富差距，使得政府赤字逐渐增加，预期中的经济刺激却迟迟未来的窘境下继续其税赋改革，实际上，在里根第二任期内，税收率已经悄然回升，美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 10% 阶层的税赋分别增加了 9.5% 与 20%，根据美国商业部提供的统计数字，《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在 1982 至 1986 财政年度造成的税收减少数字达到 7120 亿美元，然而由此拉动的经济回报仅 660 亿美元，却直接造成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赤字。更令人失望的是，里根时代，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也没有按照期望增长，而是跌到了 1947 年以来的最低点，自“二战”后至 1979 年，美国个人储蓄率占据个人可支配收入的 7.9%，而在里根任期内，这个数字却低至 5.5%，根据 1982 至 1987 年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美国国内居民储蓄率持续下跌，占据 GNP 比例从 17.1% 下跌到 12.6%

即便加上公司盈余储蓄率，整体里根时期美国储蓄率只有 3.2%，远低于 50 ～ 80 年代的 8.1%，而国内私人投资也只占据了 GNP 的 15.9%，还要略低于卡特任期内 17.5% 的表现。

原因何在？著名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杰瑞·豪斯曼说，供应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减税与刺激经济活力，增长储蓄之间的变量关系看得太简单，根据他对美国 50 ～ 70 年代联邦税收变化与总体产业工人工作数据的分析，减税额度达到 10% 左右时，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大约的变量只有 3% 左右，背后复杂曲折的社会心理变化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加以计算。况且 80 年代前期美元的长期坚挺以及公众对于通货膨胀恐惧的延迟效应，都共同促使美国公众将减税后得到的收入增加部分用于消费，而非储蓄。

赤字与福利——两难取舍之间

“里根采用供应主义学派观点主导自己的税收政策，而用货币主义经济学派观点应付赤字与政府开支。”《里根时代的经济》一书作者安东尼·S. 坎帕格纳这样总结“里根经济学”两大关键政策的特点。较之里根的税收



1981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低收入市民正在国税局政府官员的帮助下填写退税申请表

政策，其削减赤字与政府开支，以及货币政策虽然一样褒贬参半，却被认为相对积极有效：上任伊始，卡特政府给里根留下550亿美元的赤字，这使1981年剩下8个月里，很难实现其庞大的减税计划而不使赤字更加恶化，这一先削减政府开支的呼吁得到了美联储委员会新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呼应。

保罗·沃尔克上台，预示着凯恩斯主义式，以保障充分就业为目的的宽松货币与财政政策被取消，他上任第8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在沃尔克的力主下，美联储计划在里根任期的第一年内就把货币增长率削减75%，1981年财政年度第三四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只有3.1%和4.6%，只相当于1980年同期的18.3%与42.4%。

沃尔克的紧缩政策无疑是成功的，美国通胀率于是在1981年降为6.5%，再过两年又降到4%以下，CPI增长指数从1980年的12.4%，迅速递减至1983年的3.8%，推动了美元的翻转。从1981年开始，美元开始了强势上涨的5年周期。

然而，骤然紧缩的货币政策无疑是一剂猛药，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阵痛。里根和他的经济学顾问班子低估了自己的一揽子政策带来的后果。1981年，美国实际失业率曾一度接近10%，GNP降低了大约5%，极度紧缩导致了衰退降临，担任里根政府财政部助理部长的著名供应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雷·罗伯茨曾向财政部长里甘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全美每月就业增长率已经从上半年的27.5万人跌至5.1万。美联储于是只能被迫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供应用以刺激经济，尽管燃料与食品等消费必需品价格在两年内下跌了大约34%，但因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的美国年度家庭收入损失在里根首个任期内就达到了1557美元。

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由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里根政府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亦开始逐渐走向宽松，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1982年7月起连续7次下降，每次下降0.5%，由12%降为年底的8.5%，刺激了经济的回升，而M1货币实际发行率也始终保持在3%～8%。

作为里根经济政策第三大支柱的“政府开支削减革命”，其实只在部分领域取得了有限成功。终其任期内，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与开支实际上一直在扶摇直上。1980年，政府开支为5909亿美元，而在里根任期最后一年，



1981 年，里根在白宫办公室会见新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

这个数字增长为 1.1441 万亿美元，增加了 94%（扣除通货膨胀率 30%）。在里根任期内，联邦政府年度平均赤字为 1089 亿美元，大约是 GNP 的 2.8%，几乎是卡特年代的 10 倍，最终，1989 财政年度曾一度达到 2060 亿美元，里根政府留下的赤字总数，几乎是其所有前任任期内赤字的总和。

“政府开支才是里根经济奇迹这场增长背后真正的助推力。”艾玛·罗斯柴尔德是这样来认识里根创造的所谓“经济奇迹”的，“政府持续以超越税收水平的比例增长其开支，以巨额政府赤字为代价，向经济复苏提供财政刺激。在里根任期内，实际货币供应量是过去 20 年总和的 6 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国防军事开支，即便在 1989 年达到了 2650 亿美元，也仅仅占据政府总开支的 30% 左右。”

从表面看，里根的开支削减在一些政府事务领域非常有效，诸如国际外交事务（-43.5%），能源消耗（-72.9%），政府管理支出（-48%），但这也导致在教育、交通与公共卫生系统方面的政府投资严重下降，较之卡特总统时期至少下跌了 25%。例如社区与地区发展（-64.3%）、教育、培训与就业（-13.8%）。不仅如此，在健康（55.9%）、医疗（97.8%）、社保（46.5%）以及农业补贴（43.5%）、商业（133.1%）领域，里根政府被迫抛弃了竞选时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继续扩大其开支规模，无论是白宫还是参众两院，都无法想象自己敢向错综复杂而强大的院外利益集团以及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直接开刀的灾难性后果。“最终，里根政府终于承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能够促进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而免于急剧通货膨胀的危险，政府应放松对于金融与消费信贷的管理，这对于在总统竞选与执政早期，高举削减政府开支与紧缩货币政策的大旗，是一件无比尴尬的事情。”坎帕格纳总结道，实际上，在里根任期结束后，美国联邦债务增加了 1.5 万亿美元。

与减税项目一样，里根政府开支的削减大部分针对的是真正依赖这些福利救助的贫困人口，70% 的削减项目直接针对年收入低于 2 万美元的，占据美国总人口 48% 的贫困人群。“里根在任期内，不仅把美国变成了一个隐性福利国家，更糟糕的是，它还是一个仅对中上阶层收入者而言的福利国家。”艾玛·罗斯柴尔德举出了一连串令人侧目的数字：在里根时代，无论是联邦保险金还是个人退休金中，

劳动者自己缴纳的比例都在上升，并超过了平均薪酬上涨的速度。在1981年里根政府的预算中，收入保障被减少的开支为128亿美元，1984年则达176亿美元，其中近60%的削减集中在低收入补助项目，如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助、补充保障收入、低收入家庭能源补助、食品券、其他食品补助以及低收入住房补助等。在1981年财政预算中，日间看护（日托）、抚养照顾、计划生育等社会服务项目费用被削减了22%。取消了为社会低收入者提供服务的社会服务管理署，其社会服务项目和其他相关补助项目合并，经费估计被削减了39%。与1981年相比，1982至1985年财政年度对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的补助被削减13%，儿童营养补助项目费下降了20%，住房援助费下降了4.4%，医疗补助削减了5%，一般就业和训练基金削减了35%，工作刺激项目削减了33%。这一系列严苛的开支削减，使美国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于1982～1985年平均少得联邦津贴470美元（按1982年美元价格计算），收入在1万～2万美元的则损失360美元。

不仅如此，里根政府还削减了包括流行病疫苗注射在内的多项婴幼儿社会医疗福利投入，导致在其任内，婴儿死亡率显著上升，大约只有40%的美国有色人种儿童接受过脊髓灰质炎疫苗注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字，这导致有18个人均收入低于美国的国家，其婴儿死亡率依旧低于美国。从1980至1986年，联邦政府用于青少年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区发展、公用事业财政补贴在以每年9%的速度缩减，截至1986年，这个数字仅有191亿美元，只有年度政府总开支的1.3%，1230万儿童与青少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130万美国公民没有被纳入健康医疗保障体系之内。

具讽刺意味的是，里根麾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顾问们的另一项保证，即对福利与社保的削减将刺激经济复苏，也没有实现。根据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解释，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劳动者出于自由意志的抉择，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劳动价值都有一个潜在的最低价格，而失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福利社会”过于丰腴的保障潜在地将每个劳动者的“最低价格”提升到了不合理、违背了“市场规律”的程度。然而到了1987年，仅仅只有10.8%的贫困地区人口处于就业状态，比7年前还降低了两个百分点，而收入贫困线以下人口的就业比例在里根整个任期内，也不过是在50%左右徘徊，上下浮动只有大约0.3个百分点。1980～1987年，保险中的私人企业年金收益增加了3倍，然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覆盖的人群却从85.2%降低到了75.4%，被无情抛出的大多是贫困家庭儿童，其双亲无力支付不断上涨的保险费用，以及里根政府对于贫困家庭儿童相关项目补贴的大力削减。1982年，2300万美国人口没有任何公立或者私人健康医疗保险，到了1985年，这个数字迅速上涨至3130万，其中半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与儿童。

一些供应派经济学家争辩说，美国底层普通劳动者在税收政策与社会福利削减上遭受的损失，已经通过美国经济形势的持续上升与可分配财富的总量得到了弥补。然而并非如此。“80年代美国产业工人与底层雇员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大约只有50年代的73%，这一衰退趋势继续延续，在里根任期内对于工会组织的打击，是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坎帕格纳说，成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在里根任内变成了打击行业工会势力的工具，在新总统上任6个月内，它否决、推翻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大约40%有利于普通雇员薪资福利的法律规定，里根政府还降低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从1973年的每小时15.73美元，下调至14.15美元。

> “美国变成了一个隐性福利国家，更糟糕的是，它还是一个仅对中上阶层收入者而言的福利国家。”

低质就业与“汉堡可乐繁荣”

“里根经济奇迹”的支持者们最为夸耀的成就，就是这位总统在任期内，为美国创造了1200万个全新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新增就业机会为全日制，就业人口从1982年的1.02亿增长到1987年的1.142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减少，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以及一系列市场主导的刺激性私人投资政策，才导致了这一伟大的就业奇迹，政府雇佣与私人服务业，共同贡献了1981至1986年间新增就业机会的93%，较之卡特总统的最后一个任期上涨了35%。然而根据统计数字，尴尬的事实是，正是里根任期内公共开支与政府机构职能的扩张，才是这波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共有3200万美国人为政府机构，或者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型机构工作，其中增长最快的依旧是“非盈利性公用机构与事业”，包括医院保健、社会服务业、教育。在1986年，它形成了一个6000亿美元规模，工作岗位达到800万人的庞大经济体，除此之外，教育与医疗健康领域则贡献了其中的310万个工作机会，其次是零售、餐饮、酒店旅游业，在1981至

1988年这一领域的就业人数从180万猛增到300万人，大部分是非裔与拉丁裔人口，而建筑、交通运输、物流业贡献了230万个新增工作机会，其余2100万人处于兼职，或者临时雇佣状态，970万人处于个体经营状态。

艾玛·罗斯柴尔德将里根年代的就业称为“低质增长”与“汉堡可乐繁荣”——1987年，在全美1460万16～19岁的青少年中，25%就业于美国庞大的餐饮以及食品加工工业，占据全美就业人口总数的6%，大部分是流水线加工工人、临时帮厨以及餐厅服务员，而同年消费服务总体从业人员的薪酬福利水平只有其他私营行业水平的58%，这种模式既让联邦政府无法摆脱沉重的福利负担与政府开支，也无助于公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日后薪酬的增长，更遑论提高美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总体竞争能力。

所谓“里根就业奇迹”中的另一亮点，是妇女的就业形势与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在1981～1988年内，金融与法律咨询、保险业务、企业管理与医疗服务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职位，妇女所占据的比例以每年8.6%的速度增加，而这一阶层总体人数的往日年增长率不过2.1%。尽管如此，这些薪酬最高的管理职位，依旧严重向白人男性倾斜——他们占据了70%此类职位，非裔与拉美裔雇员人数不到5%，严重的贫富分化。1984年，230万个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数量不足5000美元，这个数字囊括了非裔美国家庭的54%，拉美裔美国家庭的50%，以及白人家庭的20%，美国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总值是3.9135万美元，黑人家庭则只有3397美元。

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与汇率后，里根任期内，每个就业劳动者的单位生产价值其实在回落，只相当于1974年水平。美国的衰落，造就了他在经济上最为强劲的对手日本的崛起——正是在里根时期，日本电子工业利用美元汇率的持续走高，在通产省配合下，利用低价倾销政策，将美国企业赶出了半导体生产领域。到了1990年，日本在人工智能、生物、新型能源等前沿技术研发的开支比重已经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然而美国依旧停滞在2.7%左右，如果再除去美国因“冷战”需要而投入的国防军事技术研发，差距更大。

在里根任期内，生产率显著增长的是农业，生产率在8年中年均增长6.4%，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迅速增长并非政府“放松管制”，推行市场导向政策的结果——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在里根的首个四年任期内，增长了200%，而所有农业补贴几乎是卡特任期内的三倍，对出口大豆、玉米、甘蔗、水果以及肉类加工产品的一揽子补贴方案被华盛顿称为“猪肉桶”条款，正是这一剂强心针，确保了美国农业在出口方面摇摇欲坠的地位。

更糟糕的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出口中，传统的钢铁、汽车与机械被金融、保险、工程设计咨询业务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自1983至1986年，美国整体经济规模增加了大约3000亿美元，然而贸易、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务贡献了其中的88%，产业空心化，使美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海外需求与投资，抗风险能力急剧下降。1987年，美国的“海外服务出口”贡献了大约1600亿美元，占据了出口总额（42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强，大多是与美国海外投资，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关的要素服务贸易，而消费性“非要素”服务出口，仅占据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里根任期内，被新自由主义称为经济动力之源的私人投资，其内结构也丝毫不令人欢欣鼓舞，大约三分之一流向了房地产建筑与开发，追本溯源，美国“两房”泡沫丑闻与次贷危机的根源，正在于里根时代。里根的经济顾问们充满乐观地假定，依据外来投资拉升的产能，足够产生足够的出口并用收入充抵这部分债务，然而用来建筑扩展美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比例，例如建造港口、电站、工厂厂房，或者农业大型温室——只有很少一部分，更多流向了商用建筑——从酒店、综合购物中心与大型停车场到度假游乐设施，1982年，两者投资比例为120亿美元与580亿美元。

“美国对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的掌控力，使得它能够利用这种独一无二的无痛手段，挽救自身经济。”

全球化时代的皮同巨蟒

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不仅充盈了形形色色的政府咨询机构，智库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也将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崇拜带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受美国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亦是里根政府经济与国内政策的延伸。正如斯蒂格利茨后来所批判的那样，自里根时代起，不仅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新经济发展政策时囫囵选择了新自由主义，而且在接受其援助时，必须接受它提供的一揽子“自由化休克疗法”，放开其外汇与金融市场，大幅度贬值本国货币，削减政府预算与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开支。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在1973年重新上台后，就在“芝加哥弟子”的指导下推行了经济改革，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实现了出口多样化，降低了关税保护与政府补贴，并将许多基

础性公用事业私有化。

在里根任期内，利率变动导致大批美元流向美国，美元指数从 1980 年 7 月的 84.75 点上升到 1981 年 8 月的 112 点，短短一年时间上升了 33%。美元强劲升势以及大幅提升的利率使以美元为外债的拉美国家偿债能力大大下降，这一切最终导致了 1982 年自墨西哥开始的拉美债务危机，并迅速蔓延，然而受到打击最大的，恰恰是智利等秉承“新自由主义市场发展策略”最为积极的国家。

杰瑞·豪斯曼由此批评说，假如美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需要接受各种资本外援时所附带的苛刻条件，那么，里根“经济奇迹”不仅无从发生，而将迅速变成一场严重的灾难，80 年代，个人消费开支占据了美国 GDP 的 65%，而日本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分别是 59% 与 55%

“美国对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的掌控力，以及其庞大的经济实体规模，使得它能够利用这种独一无二的无痛手段，挽救自身经济。”艾玛·罗斯柴尔德说，在 1981 至 1987 年间，美国私人投资率只占据年度 GNP 的大约 15.9%，较之 70 年代下降了 1.6%，毋庸讳言，流出的部分转移向了个人消费与政府采购项目，更大排量的汽车、住宅、购物与旅游度假，乃至里根政府的军备开支与竞赛、B1 隐形轰炸机、MX 洲际导弹以及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

伴随着美国吸引对外投资与进口商品的增长，美元在里根任内迅速升值，美国本土储蓄与投资率的下降，迫使美国经济复苏，尤为依赖海外投资。1981 至 1987 年，美国接受的外国净投资累计达到 5310 亿美元，超过 1948 至 1980 年的总和，而同期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亦只有 950 亿美元，这一切造成了 1988 年美国 5310 亿美元的巨额贸易赤字，然而大部分里根政府的经济与财政顾问认为，权衡得失之后，这是一项“可忍受的代价”，不到美国年度 GNP 的 2%。

1982 年，美国输入的投资与商品服务总额相当于冰岛全年的 GDP，1985 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整个瑞士全年的 GDP。美国对于海外投资、原材料、制成品与服务不断增长的贪婪需求如同一条“成长中的皮同巨蟒”。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争辩说，这种“贪婪”是健康的，美国将全球“沉睡”的资金与储蓄，以及过剩的产能变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力，进而通过美国旺盛的经济活力，对世界进行“反哺”。1987 年，仅仅从非 OPEC 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总额就达到了 1220 亿美元，多亏里根政府为了平衡联邦政府与贸易赤字所造成的巨大财政缺口，日本在 80 年代末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然而这种持续增长的输入无疑不可能永远上升，最终将在某个时刻迎来临界点，然后不可避免地下降，届时美国经济也许已经沾染了某种程度的“拉美综合征”（外资依赖）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场堪比 30 年代大萧条的灾难：伴随着利率增高与美元强势带来的大量海外投资，华尔街股市道－琼斯指数在 1987 年 8 月曾短暂达到了 2722.42 点的高度，旋即在 10 月惨跌 508.32 点。尽管如此，里根和他的智囊班子却抱着某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念头将问题抛给了白宫的继任者们——里根只是含混地表示，美国经济的复苏将使它在不远的 90 年代实现贸易盈余，从而顺利偿还 80 年代的债务，美国整体负债的不良状况，可能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交替时结束。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美国经济被全球充满信心的投资者所撑起：购买美国公司与不动产的日本人，购买美国国债的欧洲人，将现金存入美国银行，进口美国汽车与机器的拉丁美洲人……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孜孜以求，基于自由选择，市场导向的“理性经济行为”，它们保证里根时代的繁荣与稳定延续绵长，直至永远。

2002 年 9 月 8 日，著名漫画家戴维·霍西的漫画“多么不同的一天”发布于当日的《西雅图邮报》，深刻地抓住了美国人在“9·11”事件后尖锐而痛苦的幻灭感。迈克尔·韩德说，这次灾难性的恐怖袭击事件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洋洋得意的胜利成果（“冷战”结束与里根—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打得粉碎，诸如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断顿时失去了存在基础。不仅如此，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销蚀了美国乃至世界对于新自由主义笃信的全球化、资本与市场开放体系所保持的信心，而美国日益对国际政治秩序与经济公平性承诺产生疑虑，唯恐损害其自由市场原则和资本利润的倾向，从而使得华盛顿越发陷入了单边主义倾向，充当国际社会沟通解决问题的旁观者与阻挠者——“里根经济奇迹”终究让美国与世界在新世纪尝到了其苦涩的副作用，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使得俄罗斯、东亚以及欧洲国家开始对美国以及其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说不”。而“里根主义”变成了美国咄咄逼人、强硬干涉的霸权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并未给美国与世界带来承诺中的秩序、安定与繁荣，而是让其前途变得更加含混与不安。

〔部分参考文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年度报告》（1982 ~ 1988）；《美国总统年度经济报告》（1982 ~ 1988）；《里根经济奇迹真相》（英）艾玛·罗斯柴尔德；《里根时代的经济》（美）安东尼·S.坎帕格纳；《新自由主义国家》（英）雷蒙德·普朗特；《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美）迈克尔·H.韩德；《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美）保罗·克雷·罗伯茨；《并不自由的选择——弗德里曼与里根的政治经济学》（美）埃尔顿·雷亚科〕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

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齐泽克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民主之中的独裁，那无形的秩序帮助人们维持幻象，认为他们处于自由之中。”

记者 陆晶靖

在电影《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的开头，齐泽克引用了一部拍摄于1988年的电影《极度空间》的情节。主人公约翰·纳达（Nada在西班牙语里意为“什么都不是”）是一个贫穷的工人，在洛杉矶的工地有一份工作，却没有住处。有一天他偶然在僻静处发现了一个装满了墨镜的纸箱子。当他戴上墨镜后，眼前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天花乱坠的政治宣传的大公告牌上只写着“服从”，而另一个广告牌上只写着“结婚和繁殖”，他拿出一张钞票，上面写着“这是你的上帝”，大街上到处都是“不要思想”和“买”。这副神秘的眼镜帮助纳达看到了表面秩序背后的现实。齐泽克据此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民主之中的独裁，那无形的秩序帮助人们维持幻象，认为

他们处于自由之中。

齐泽克所评论的例子的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谈论自由主义的时候，必须意识到自身正处于这样一个“场”内，有些以“自由主义”的名号和形态出现的意识形态垃圾在生活中处处存在，它们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必须时刻警惕它们。

自由主义的尴尬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恩格斯当年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这句话被后人广泛引用，其意在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敌人和部分类似的价值观，例如反对宗教统治、土地贵族、封建专制政府，重视理性和个人的自由等。在斯图亚特·密尔和杰瑞米·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中，曾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被重新定义为许多个人的集合，在当时这个观点具有革命性，直接宣告了它站在了旧秩序的对立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个人解放的思想，现代性正是在“个人”的基础上看到了曙光，个人是理性的个人，不是愚昧的信徒，一种先进的社会秩序应当能够保证这一解放的理性最后取得胜利。

但令人尴尬的现实在于，这种思想传统的起源和奴隶贸易的盛行处于一个时代，并且如果细细考察，会发现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奴隶贸易有缠夹不清的关系。约翰·洛克甚至是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一位股东。意大利学者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在《自由主义批判史》中用很大篇幅去追寻自由主义的源头，发现自由主义的范围在它开端的时候，是极其有限、片面并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越是高扬自由主义的国家越摆脱不了嫌疑。亚当·斯密发现，奴隶制在“专制政府”统治下要比在“自由政府”统治下容易废除。托克维尔也同样记载了令人尴尬的现实：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和东方，奴隶制都比同时代的西方表现得更为温和，当突尼斯已开始废除奴隶制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法国和民主的美国却一直残存着奴隶制。孟德斯鸠甚至从气候上找出了原因，在他看来，自由是北欧日耳曼各民族的一种特性和生活方式，“炎热气候条件下的各民族，他们的怯懦几乎总是使他们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条件下的各民族的勇敢则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人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惊异，这是自然原因形成的后果”。

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知识分子纷纷指责北方人野蛮，考虑到奴隶制的废除不是靠代议制实现的，而是依靠联邦军队的枪炮，林肯便成了“专制”的代表：他不应该干涉种植园主蓄奴的自由，在这件事情上，作为总统的林肯背叛了他的先行者们。杰弗逊曾经考虑过把海地作为流放和安置黑人的垃圾场，“使黑人种族从我们的边界内最后消失”。这使人想到希特勒的计划：把所有犹太人都赶到马达加斯加去。而富兰克林甚至连欧洲大陆人都瞧不上：“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和瑞典人，一般都长有我们称之为黝黑的肤色。”集中反映人类最高级形式的是定居在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他们代表了最纯种的白人。这些话今天说出来，人们都难以把它当真，这确实令人尴尬。汉娜·阿伦特后来打算把这两者分开谈论，认为美国革命是基于自由的政治秩序的一种规划，而奴隶制则是一种散布于大西洋两岸的文化传统。但讽刺她的人说，大概反犹也是德国的一种文化传统。

自由主义曾经的片面性不只体现在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上，即便在白人内部，也并非人人都有资格享有自由。边沁在得知美国《独立宣言》内容后，认为它只是一堆“无政府主义的偏见”。怎么可能设想所有（白）人都平等？他说：“所有人（所有两性的人们）在权利上一直是平等的，那么学徒在权利上与它的主人平等，他在与其主人的关系上，如同主人和他的关系一样，有许多自由，他有与主人同样的权利来命令和惩罚主人。”因此这种“荒唐的平等原则只会使狂热者和无知的大众高兴”。他还说过一句更加简洁的话——“当安全和平等处于对立状态中，不应有任何犹疑：平等应该让位。”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反对封建贵族的结果是建立起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贵族制度，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说，一种秩序良好的自由不可能由技术工人和洗衣女工来保障，掌控权力的必须是那些“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在绅士教育和科学方面有正常程度的学识”的人们，是那些“出身高贵和富裕”的人们。这一观点其实在当代也不陌生，那些喜欢把素质论（素质太差不能搞民主）挂在嘴边的人，不过是在重复亚当斯的观点。

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是第三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以激烈的反美和反全球化的姿态著称。在《自由主义病毒》一书中，他也极其激烈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崛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出现的。现代性体现在人们要求摆脱过去传统的社会形式框架，淡化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神不再是最高的立法者，以神的法律为基础的伦理原则要让位于世俗的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规则，而理性呼唤一种新的三位一体：自由、平等和私有产权。从荷兰革命到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再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些人类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不贯穿着这三个核心。但阿明富有洞见地注意到，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总在一起的。经济的发展和自由的关系更密切，它要求个人自由，尤其是资本经营者的自由，当然，作为消费者也有选择商品的自由。



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

如果没有这些，商品社会就无从谈起，但平等就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必然要求，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者必须处于被雇佣的地位，必须出卖他们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他们与资本家不可能享有同样的自由。他说，在资本主义范畴内，个人自由变成了强者迫使其他人接受他们的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稽之谈，空想自由主义假设每个人都能成为洛克菲勒，正如人们过去所说的每个士兵在背包里都放着一根元帅棍一样。它与成为民主基石的平等的渴望直接相撞。自由主义者如以赛亚·伯林曾经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他说："每一件事物都是其所是，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正或正义或文化，或人类幸福或良心安宁。"但当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正义、自由、福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概念之墙彼此隔离，在每一件事情上，人们都看到它们彼此关联。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随着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显得越来越大，自由主义者也意识到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建设，其中约翰·罗尔斯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最大平等自由原则"，要求每个人都拥有最广泛的自由，同时也要让其他人拥有同样的最广泛自由，并且要求自由只有为了自由的缘故才能受到限制。关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使得：a 这两种不平等都能最大限度地增进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b 这两种不平等所依系的职务和地位，应该基于机会的公平平等条件向所有人开放。"但这种新的诠释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自由主义仍然受制于自由、平等和产权三者之间的锁链。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即只能在极小程度上实现平等——依然存在。退一步说，即使罗尔斯的正义论能够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得以实现，仍然需要由当权者在现有秩序内做出让步，才能建立一个原初的、神圣的最优秩序。这个秩序从未真正存在过。在阿明看来，在资本主义的现有秩序内谈论平等是不现实的，如果现有秩序合理，同样的人的贫富差距不因为其他因素而只是因为他们彼此先辈的牺牲不同导致的，那么是否存在过平等的那一天呢？那一天先人们自愿放弃一切遗产和权力，签订了平等的契约，规定从此以后人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在这个"公正"社会里自己的努力——这一天也从未存在过。

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用“博爱”取代了私有财产的概念，但“博爱”是个道德要求，人们无法在制度上规定“博爱”，反而更容易在教堂里听到这样的要求，即基督教常说的要“爱你的邻居”。齐泽克说，在现实社会里爱邻居是很难的，总有各种鸡毛蒜皮的事让你讨厌他，这时候“博爱”就转化为慈善事业。资本主义利用它衍生出了新的盈利方式，买一杯咖啡，就捐一分钱给原产地（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失学儿童，喝咖啡的人因此在良心上获得了安慰感，他爱了非洲儿童，就完成了道德律令的要求，没必要再爱邻居和大街上的人了。因此真正的商品很可能是这种感觉和真正咖啡的组合，它比单纯的一杯咖啡要受欢迎。

自由主义的命令

并不是所有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像洛苏尔多和阿明那样看待自由主义。作为著名的激进左派，齐泽克站在不一样的立场，他说：“如今有些女权主义者和反欧洲中心论者觉得批评自由主义很时髦，男性霸权，白人至上……我觉得自由主义没有那么简单，当然人权和自由主义的其他说法一开始就暗示着有些人被排除在外，然而在这种表象和现实之间的不安关系中（表象：人人享有权利和自由；现实则是有些人被排除在外），人们不能简单地说表象只是残酷现实的假面具，表象自身就具有解放性的力量……一开始女人被排除在外，但后来她们说：‘为什么没有我们？’黑人也说：‘那我们呢？’然后工人和其他人也站了出来。”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接受了马克思的想法，看到了自由主义的积极面。他反对的是那样一种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甚至在自由主义内部都受到批评。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中指出，当今人们谈到自由主义，很多人想到的是约翰·洛克、康德、罗尔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自由主义代表了最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嘴里的宽容是对不好的、错误的东西予以宽容，原谅他人的愚昧和落后，等待他们总有一天找到了理性的共识，投向自由主义的怀抱。而霍布斯、休谟、以赛亚·伯林等人代表了另一种自由主义，对他人抱有宽容，不是以唯一的理性来怜悯他们，而是为了达到和平共存。自由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没有哪种生活或者价值对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齐泽克认为第二种才是自由主义的真正根源，起先自由主义远没有现在这么傲慢，它在宗教战争中获得了广泛认可：人们都有不同的信仰，即使同一种信仰也有不同的派别，但即使对于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又译“原教旨主义”）的信徒来说，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杀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最早的自由主义开始于结束宗教战争的努力，为了避免出现霍布斯笔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情况，人们不得不宽容对方得以共存。

但当代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太过强大，以至于约翰·格雷呼唤的第二种形态在第一种形态面前太过弱小，自由主义本身成为新的基要主义，从而限制了自由的发展和进一步解放。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提出，当代工业文明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传统概念来说明，它们在当今社会太过重要以至于超越了传统模式。马尔库塞定义了新的自由维度，经济、政治自由在今天意味着从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中解脱出来的能力，摆脱其他力量对自己的控制，而思想自由则意味着免受宣传工具侵扰，要把“社会舆论”及其制造者一起取消。但即使激进如马尔库塞，也在随后意识到“这些主张听起来不现实”。

马尔库塞要做的不是如同洛苏尔多那样挖掘自由主义和奴隶制之间的关系，他想要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固然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窒息了进一步要求自由的意愿。人们的确享有比过去更多的自由，但“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同样的，在商品和服务中的自由选择也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他固然也承认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工业社会带来了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已经阻碍了质的变化，自由不欢迎新的自由，所有的实际努力和理论建设都被放逐了，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为现有社会秩序辩护的话语，它不再像历史上那样具有解放的力量，反而转向了它的反面：保守主义和基要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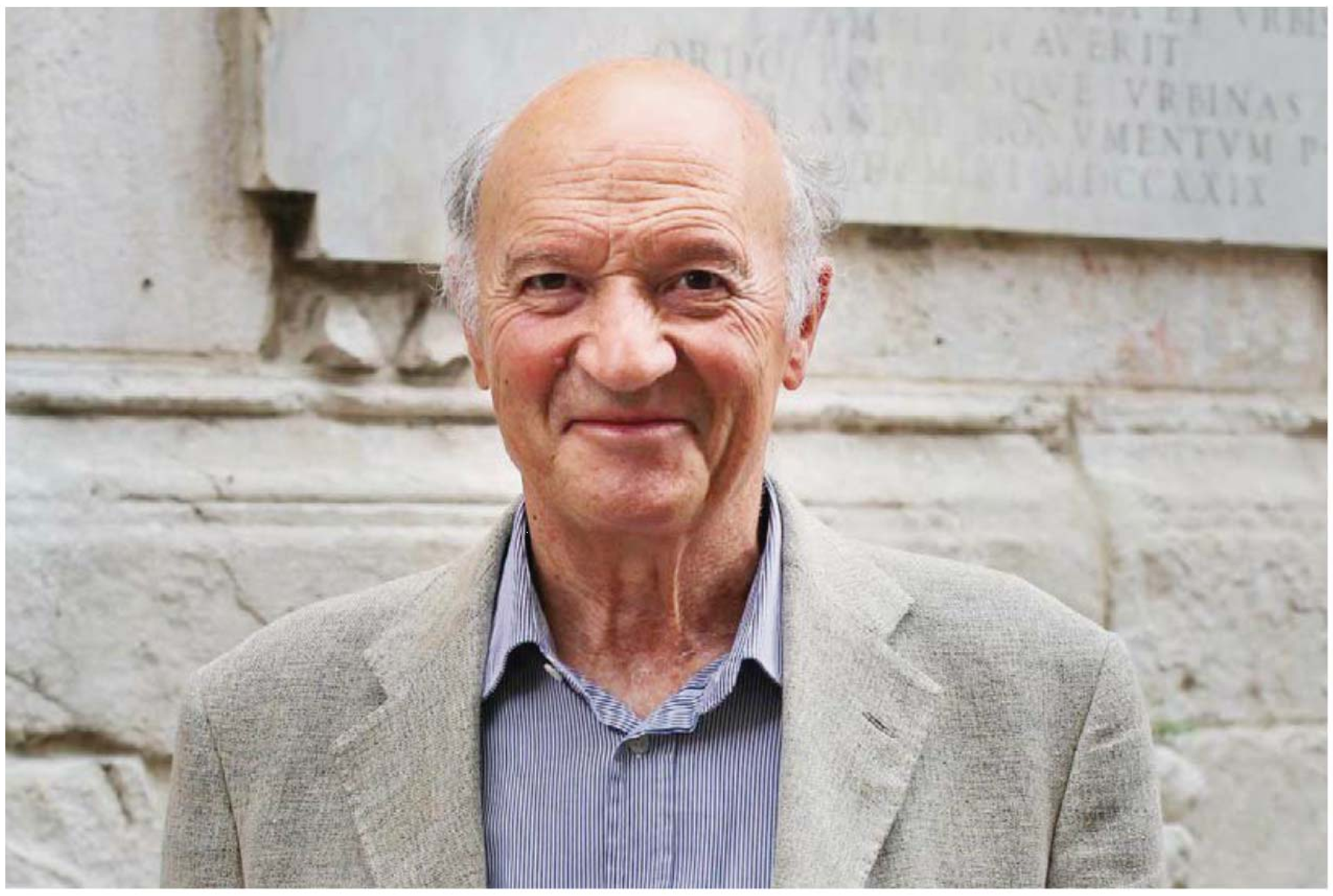
“空想自由主义假设每个人都能成为洛克菲勒，正如人们过去所说的每个士兵在背包里都放着一根元帅棍一样。”

齐泽克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冷战”中失败之后，新自由主义获得了霸权，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开来，既然与此对应的意识形态已经消失了，那么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就是不言自明的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帮助了自由主义兴盛发展，自由主义必须有一个邪恶的敌人，有一个陌生的他者在威胁着它。先是教会和基要主义，在20世纪是斯大林和劳改营，现在又是以拉登为代表的恐怖分子，如果要在自由主义和另一方之间选择，人们毫不犹豫地会选择前者——这就是自

由主义的命令：制造二元对立，以使潜在的可能批判他的人们忽视其他的可能——这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真正命令。如果说有乌托邦,则一方面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经济达到合理化，另一方面是人们的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制度上的不公。

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自由体现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各种享乐方式，人们不再是某种崇高意识形态的客体，而是自身快感的客体，意识形态负责给人们远离真相，提供快感：做一个好的法西斯，这样就可以合法折磨犹太人；合法体面地结婚，这样就可以享受出轨的快感……回到本文开头的眼镜，齐泽克假设了主人公看到一张纳粹党的海报，上面要求人们为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奉献自己，但戴上墨镜后，主人公看到的是这么做的种种好处：他可以发现牺牲的好处，可以折磨和羞辱犹太人，这是执行“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又或者3K党的海报上写着要保卫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但戴上墨镜后，主人公会看到他可以强奸和处死黑人。面对社会不公，意识形态会很快让不安的良心舒服下来，人们可能通过购买可口可乐或者星巴克咖啡向非洲儿童捐献了一点美元，但戴上眼镜后，看到的会是：“不要思考，不要想什么政治，忘记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贫穷，只要做点什么，捐钱，这样你就不用思考了。”

在电影中，纳达要他的工友也戴上眼镜看看，但他的朋友宁愿和他打一架也不愿意顺从。后者意识到这可能是某种危险的东西，某种涉及政治之物，它会毁掉自己的日常生活，毁掉“自由”的感觉。齐泽克说，被剥夺这种意识形态快乐是令人痛苦的，如同《黑客帝国》里，墨菲斯对吃下药片的尼奥说，欢迎来到现实的大荒漠。在齐泽克眼里，这才是今天自由的现状。而意识形态正是要以快乐原则来阻止人们看到这一切，使人们能够容忍这样的生活。



意大利学者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即便是约翰·格雷的第二种自由主义也没能逃脱齐泽克的批评。他说，当代社会倾向于用“宽容”来解释一切问题，对同性恋要宽容，对反同性恋也要宽容，对女性主义宽容，对压迫女性也宽容，但对于外国人呢，对于犹太人呢？种族主义不是宽容的问题，不是你应该宽容外国人，而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来宽容外国人。像不平等、剥削、不公正，难道也属于应该宽容的问题吗？“宽容”成了政治的替代物，但真正的问题一直在那里，并不因宽容而消失。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场辩论中，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说，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人们不会因为批评宗教而被杀，女人们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可以选择她爱的男人结婚。而齐泽克反问道，难道在一个到处是生态和食物危机的社会里，人们智识贫困，间隔日深，还不应当去寻找一个新的替代性方案吗？列维指责齐泽克为过去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招魂，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对话。齐泽克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的许多部分，相反，他认为过去十年中欧洲的自由和福利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他的担心在于，自由主义已经或者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形态。美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曾经讥笑道，人们可以想象2012世界毁灭，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齐泽克正是要试图开启这方面的想象，但如同列维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会指责他怀念铁托和斯大林。齐泽克十分坚定地承认，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甚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人们无法重复走到老路上去。自由主义的许多价值是好的，但一旦它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它就会成为自身的敌人。在《先是悲剧，再是闹剧》里，齐泽克提出了一种设想，在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新的种族隔离涌现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正在迈向一个新的爆炸点，自由主义者如果要保存他们美好的价值观，就必须要再往前迈一步。他举了一个王尔德曾经举过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因为缺少20美元做手术而不得不失去一条腿，那当然令人心痛，但如果替他搞来了20美元，却不改变他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的深层原因，那么即使治好了病痛，那只不过是改变了他痛苦的形式而已。自由主义曾经代表解放的理性，如今它也应该继续具有解放的精神。


湘泉彩陶酒
中国始创馥郁香型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JIUGUI LIQUOR CO., LTD.
湘泉彩陶酒
人/生/好/彩/头
湘泉
诚邀合作伙伴共同打造财富平台
全国统一招商服务热线：400-990-0799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000799.com
天猫酒鬼官方旗舰店：http://jiugui.tmall.com



400-605-2255

www.airmedia.net.cn



航美传媒

助品牌飞翔
成你我之美

中国领先的商务媒体运营商

50家机场 2300余条航线 30000余座加油站

纵贯天地的高端网络化媒体，是企业传播品牌的优质平台



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宋子文（左三）与杨虎城（左二）在西安机场

原汁原味的中国

海岚·里昂为他所记录的 1935 至 1941 年在中国期间的照片、手稿以及剪报取名为“原汁原味的中国”，这是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其中包括记录了“西安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等重要人物、事件的影像资料。

记者 李晶晶





上世纪 30 年代初，张学良与墨索里尼之女艾达在北京



上世纪 30 年代末，赵一荻与儿子张闾琳在香港

因为爱情，1934 年海岚·里昂（Hyland“Bud”Lyon，1908 ～ 1973）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定居上海，只为追随爱慕已久的好莱坞明星克莱尔（Dee St.Claire）。激情下的爱情虽然美好却很短暂，不久后，克莱尔回到美国，里昂却留在了中国，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最混沌的时光。

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此次秋拍中，将拍卖海岚·里昂在中国的 7 年（1934 ～ 1941）里所拍摄的 1 万余张影像资料及手稿、剪报。来中国前，海岚·里昂当过好莱坞的特技演员，做过飞机驾驶员，还在洛杉矶近郊的柏班克（Burbank）担任专业飞机维修师。到中国后，里昂给中国航空公司（CNAC）投去简历，希望得到一份工作，但遭到拒绝。1934 年底，里昂意外地接到了张学良的邀约，组装他新购买的飞机。

1934 年 1 月，张学良奉召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并代行由他自己亲兼的总司令一职。那时张学良买了两架飞机，进口到上海时全部都是零部件，当时张学良的基地是在汉口，必须在上海组装完成后再飞武汉。两个星期后，里昂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原本已经拒绝他的中国航空公司，转而决定聘请他做永久职员。

里昂爱好摄影，并且会在每次拍摄后做详细记录，这些成为日后见证一个历史时段最有力的证据。

嘉德拍卖公司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介绍：“1935 年一年时间里，里昂都在跑西南航线，他是中国航空公司第一个常驻内地的外国机械师，当时被称为首席机械师，他对西南地区有飞行调度权。在这一年时间里，能看到里昂所拍摄的多为西南地区风貌、民俗风情，以及航拍的影像。”

与此同时里昂也注意到了国共两党微妙的关系变化。在被中国航空公司派到西南地区工作了一年后，他再度回到张学良的工作团队，在总机师兼业务经理朱利叶斯·巴尔（Julius Barr）身边任副驾驶。里昂很快与朱利叶斯·巴尔、蒋介石私人机师罗耀·雷诺（Royal Leonard）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Jimmy Elder）共事，并在接下来的 5 年中，受托一直待在张学良及其家人身边，担任张学良的飞机驾驶员、机械师与保镖等重要角色。

1936 年 4 月，张学良背着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希望结束国共敌对状态。张学良当时虽然一直希望促成国共合作，但国民党由蒋介石全权掌控，任何停战协议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才能签署。张学良佯装作战，以掩盖谈判实情，几个月下来“剿匪”毫无进展，使得蒋介石先是恼怒，进而开始怀疑他的忠诚。1936 年 12 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也是测试张学良的忠诚。张学良与杨虎城竭力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连手抗日，蒋介石始终不肯让步，

“西安事变”由此爆发。

这一年里昂被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派到汉口任教官，随后在12月12日随同另一名机师前往西安。“西安事变”在当时被定调为张学良背叛党国，里昂在1936年12月15日的一份文件中记载了这段时间的详细情况：“我们被军警层层包围，不准离开空军基地，不准碰自己的个人财物，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西安事变”期间，里昂与另几名飞机驾驶员负责来回载送人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后，两人一同飞回南京时，里昂也在飞机上。在1937年1月18日写给外祖母的信中，里昂写道：“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陪詹姆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9日从西安逃了出来，11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

在里昂的影像记录中，可以看到“西安事变”前，宋子文、杨虎城在西安机场的合影，以及1937年初，里昂去奉化看望被关押的张学良，一组摄于奉化的照片，还有里昂和张学良的看守刘乙光，以及张学良和宋子文的合影等。宋皓说：“里昂跟随张学良的时间不是太久，认为他不会是亲信，所以才让里昂去给张学良送生活用品等。里昂在奉化拍摄的这一次，在宁波转船时，还出过一次事故，船触礁，当地的报纸头条报道：‘一名外国人在出事船上。’实际上里昂真正的任务是借送生活用品之名去奉化给张学良送信。”

里昂在1937年4月4日的记录中写道：“过去三个半月以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以来，朱利叶斯·巴尔、罗耀·雷诺、詹姆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避免被政治狂热分子欺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期间都遇到了千载难逢、千变万化的人生经历。”“西安事变”后不久，张学良托里昂担任赵一荻与幼子张闾琳的贴身侍卫。接下来的5年，张学良在上海服刑，而里昂协助赵一荻母子处理家务。

因为张学良被捕，里昂的工作丢了，但之前的工作和身份让他轻易获得了美联社驻中国特派记者的工作。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场会战持续了三个月，里昂此时恰在上海，他为“八一三淞沪会战”拍摄了近3000张珍贵照片。8月14日战争打响后，里昂就设法雇了船沿黄浦江顺流而下直至吴淞口外，拍到了三架中国战机正准备空袭日本航母的珍贵镜头，为此他特地请人用中文在照片背后写上“吴淞口我军轰炸敌舰”的字样。8月14日上午，中国炮手在外滩试图轰炸日本“出云号”战舰，但是炮弹误落在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门前，大约400人被炸死炸伤。同日下午，中国空军轰炸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吴淞口、黄浦江上的日舰，因飞机受伤有两枚炸弹坠落在上海大世界门口，约1300人被炸死炸伤。完整的死尸在跑马厅路（今武胜路）排了足足六排，破碎的尸体装了二十几辆卡车，史称“大世界坠弹惨案”。32张真实的影像照片，还原了那一天的惨况。


海岚·里昂

里昂作为美联社记者，在当时向美国发回大量“淞沪会战”的照片用于新闻报道，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淞沪会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的一组照片，拍出来却不见公开发表，原来当时日军一直在指责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在破坏中立，庇护“八百壮士”，并以此为借口要冲进租界。为此，一切有关孤军撤退到租界与接纳伤员住院之事都严格保密。

12月3日，全副武装的日军5000人曾通过公共租界，迄今为止有关文献只提到日军是从沪西丰田纱厂出发经延安路、西芷路、南京路、外滩回到虹口，至于如何从丰田纱厂到达相距甚远的延安路则无人提及，更不用说相关照片了。里昂用了近百张照片再现了日军这次通过租界的过程，特别用30多张照片详细拍摄了日军是如何经过愚园路到达静安寺旁的万航渡路与华山路再进入延安路的，再现当年静安寺旁百乐门舞厅一带的市容市貌，成为上海珍贵的城市记忆。

里昂为了达到最佳拍摄效果，不惜花费2600美元（当年可以买到100两黄金）买来当时世界上最高级的莱卡15型照相机。时至今日，这款相机也是照相器材收藏者追求的顶级藏品。里昂还使用当时最好的柯达胶片，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时依旧如新。

1941年里昂离开中国，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品的保险箱回到了洛杉矶。1973年里昂去世，这些重要历史资料由他的家人保存，直至2013年于纽约邦瀚斯拍卖公司拍出，由中国藏家买下带回中国，一段尘封的历史由此打开。

海岚·里昂拍摄作品





1940 年宋氏三姐妹合影

1940 年 3 月，宋美龄在香港看完病后和两位姐姐一起返回重庆，宋庆龄也难得地撇下她与蒋介石多年的恩怨，与姐妹一道露面以挫汪伪政府的锐气，提振抗战的信心。战火中的短暂春天来到这三位姊妹之间。



1936 年战前的上海外滩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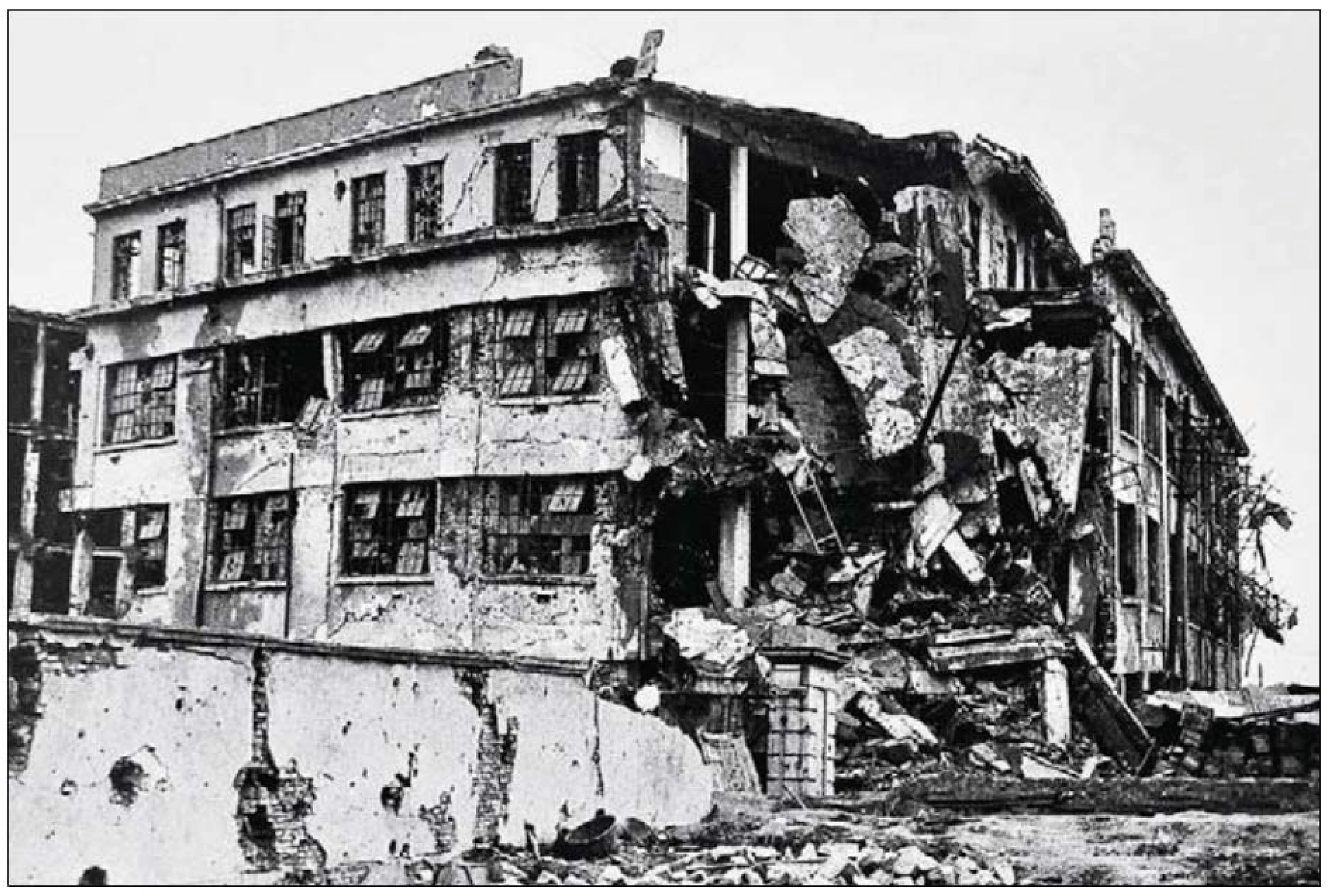
“淞沪会战”十六铺的最后抵抗

1937 年 11 月 9 日，固守南市的第 55 师一个旅准备撤退，由戴笠联合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第三、五支队担任掩护任务。鏖战三天之后，阵亡超过 70%，最后退入法租界。11 月 11 日，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照片为战斗中的十六铺一带。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毁

1937 年 8 月 13 日傍晚，日机轰炸商务印书馆，管理处、编译处、印刷厂、仓库全部被毁。接着日本浪人又冲进东方图书馆，一把大火将全部 46 万册藏书烧毁。





卓别林上海欢迎会

这是卓别林 1936 年 5 月 12 日访问上海的留影，当时他受到了隆重接待。当晚他在百乐门饭店留宿一夜，次日早晨乘船转道日本返回美国。



斯柯达想吸引更多年轻人

范安德对斯柯达在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斯柯达汽车的历史已将近120年，今年我们的销量有望打破100万辆纪录。到明年，我们就可以庆祝这两个纪录了。”他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的增速比较缓慢，但现在的速度又加快了。在欧洲，它几乎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欧洲汽车制造商。我们希望把目前在欧洲所达到的增速拓展到中国去。”

主笔 李三



全新斯柯达 Fabia 晶锐

姆拉达·博雷斯拉夫是距离捷克首都布拉格50公里左右的一个中等城市，是斯柯达总部所在地，2014年10月底，斯柯达董事会主席、总裁范安德（Winfried Vahland）在与总部比邻的培训中心向中国媒体展示两款未来即将在全球投放的“保密”车型，他说他希望听到大家对新车的看法。

两款未来产品分别是斯柯达旗舰产品速派以及还处于极度保密状态的设计超前的SUV车型。在范安德看来，斯柯达产品的技术实力已经可以挑战德系三驾马车ABB(奥迪、宝马和奔驰)，只是它在中国的品牌知名度还有待提升。

2005到2010年，范安德曾担任大众中国总裁5年时间，那是大众在华的黄金5年，在范安德心目中，中国市场是一块福地。时过境迁，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发展后，斯柯达在中国也已经走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目前中国市场汽车品牌繁多，范安德深知，入华只有7年的斯柯达，若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并非易事。“我们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他对在场的中国记者们说，“在座的各位都属于典型的斯柯达用户。”

三联生活周刊：斯柯达在中国的销售目标是2018年销量达到50万辆，你对这个目标有把握吗？

范安德：首先要找准面向市场的产品，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同上海大众的合作。比如新车在别的地方发布后，紧接着就要在中国发布，甚至在中国的时间还要早于其他地方。

信息已经变得非常透明，当欧洲有新车发布，中国人通过网络就会了解到。对于至关重要的市场，我们必须优先对待。此外，我们还应该更着眼于中国用户的需求。

我只想提两方面：一是车辆的大小，还有就是外观。斯柯达汽车的设计部门会进一步与上海大众合作，斯柯达汽车总部的设计师到上海大众去，上海大众的设计师到总部来，这只是一个开始。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我甚至可以设想，在上海开发的产品，将来可以拿到欧洲销售。这种方式也体现出我们同上海大众合作最高级的一种形态。

到2018年末，我们应该能够达到在中国每年销售50万辆的水平。这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斯柯达2018年战略中提到全球达到年销量150万辆，其中三分之一在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目标，中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你将以怎样的策略进一步提升斯柯达品牌在中国的影响力？

范安德：我们将着眼于品牌形象

更趋于年轻化，更有活力、更清新。我们认为斯柯达汽车的用户群不是那些比较被动的、整天坐在电视前缺少动力的人，而应该是有着积极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我们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分析，选择一种更为恰当的传播方式。

我们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汽车制造厂家，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二，这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我们应该主动来传播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在中国，历史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斯柯达还将进一步推进经销商网络建设，这方面的工作将在2017年底之前完成。在产品线上，我们还准备向中国市场推出一款比斯柯达Yeti更大的SUV，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已经为时不远了。

三联生活周刊：从长远看，未来斯柯达汽车和上海大众有没有直接合资的可能？

范安德：与上海大众以合资的形式开展合作，我认为没有必要。在销售方面，也未必一定要采取合资的形式，但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方面的事宜。

斯柯达就像大众一样，大众所拥有的技术，斯柯达也拥有。同样，奥迪所拥有的很多技术，斯柯达也拥有。这些内在联系，很多用户并不了解，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斯柯达跟大众汽车品牌在差异化方面如何体现？

范安德：斯柯达有自己的品牌形象，有独到的设计、产品，也有自己的途径与用户沟通，因此在用户眼里，我们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当然，它是基于大众的技术基础之上。同样的技术，我们的价格比大众汽车更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产品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宽敞的空间，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通过掀背式等有特色的车型，斯柯达在中国销售得很好。在中国，大众在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我们跟大众汽车同样优秀。

韩麦安（Andreas Hafemann，斯柯达中国总裁）：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拥有6款本土生产的产品，明年还将更多。除了产品进一步拓展外，我们也在积极做好经销商网络方面的建设，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我们正加强在中国树立斯柯达的品牌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大众集团正在力推插电式混合动力，斯柯达在这方面有何准备？

范安德：从技术的角度，大众能够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目前在中国市场，混合动力车型还仅限于进口车，技术成本相对较高，暂时还没有国产车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用户在这方面的购买力如何，几年之后，我们将会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但它的成本相对较高。所以，这种比较昂贵的技术，目前还只是那些高端车型的厂家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我想强调的是，凡是高尔夫和奥迪A3能够做到的，明锐也能够做到，凡是帕萨特能够做到的，我们未来的速派也同样能做到。

三联生活周刊：斯柯达近两年在欧洲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可以运用到中国市场？

范安德：在欧洲市场的成功因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关键在于我们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在为我们的品牌奋斗，他们着眼于开发新产品，并且总是要做得比原来更好。



斯柯达董事会主席、总裁范安德

另外还有两个其他因素：一个是在欧洲市场上我们推出的车辆，比我们的竞争对手具有更大的空间优势。也就是说，同样价格，用户可以买到空间更大的车。另外一点，可以说是我们的激情吧，我们的团队成员，他们的血不是红的，是绿的。每一个员工都在为这个品牌奋斗，并且非常相信我们的品牌。

大众收购斯柯达之后，我们用了24年的时间，建立起与大众的内在联系。而我们进入中国的时间只有7年，7年还不足以来培养这方面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讲，各位能够来到这里，加深对我们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中国还需要一些时间。下一代速派的方向性将更加明显，到时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基因转变。它的前脸设计非常有力，强调自己的地位，我们在速派的研发过程中，也切实考虑到了中国用户的需求，因为我们对这款车有很大的信心。

三联生活周刊：斯柯达的品牌更注重功能性和实用性，但全新Fabia晶锐似乎颠覆了之前的固有印象？

范安德：斯柯达不应该是一个冷冰冰的品牌，而应该是一个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说，进入斯柯达之后，手机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在后备箱里，永远都有固定物品的装置，有储物网、有挂钩，不会让这些东西在后备箱里滑动，这应该是工业界的基准点。也许在中国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点，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努力。

在速派的车门里，永远都有放置雨伞的空间，据我所知，只有劳斯莱斯车里才有这样的设置。我觉得这是睿智的表现，下一代速派在每一辆车的车门上都会有这样的设置。这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功能考虑，而这方面的想法，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没有。



冻土之上　进无止境

——福特探险者“破冰 66° 34′ N”北极圈探险之旅

零下 30℃，却是热血的沸点。在未知的经纬之上，烙下你生命的印记。混凝土世界中的竞争，怎及冻土之上的探险？不破除脑海的冰封，何以越入人生的佳境？登临过人生的巅峰，你可想造访世界的极点？与 1 亿年前的冰川对坐，人生的心结会否慢慢融解？见过极地霓虹的人，一生都不会迷失方向。越是遥不可及，越有征服动力。以冰雪之极，唤醒你心中的探险者。不被轻易征服的地界，恰是境界所在。66° 34′ N，探索无尽，越入佳境。

北纬 66° 34′ N，北半球发生极昼、极夜现象最南的界线，8 个国家、900 种植物、数十个人类族群、成千上万寒带动物，这里是地球最北端的极寒之地，亦是探险家必征之地。“这里有湛蓝晶莹像瀑布一样的冰川，积年不化的雪山，泠泠作响的清泉，清澈湍急的小溪里挤满了银光闪闪的大马哈鱼，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漂浮着不计其数、让人既爱又恨的冰山，还有天空中闪耀着的七彩极光。更为有趣的是，这里的夏天没有黑夜，午夜 12 点在室外仍可以照常看书。”这就是美国 19、20 世纪旅行探险家约翰·缪尔笔下的阿拉斯加。踏上地球顶端的这片冻土，冰川、雪山、清泉、极光、湖泊、河流与荒野，便成为极地之上如梦似幻的自然史诗。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大多数人的生活似乎都过于平淡、乏味，只有日日夜夜忙碌的追寻，林立的建筑丛林中，人们追寻的早已不是心中所向，探险的激情幻灭成每日的朝九晚五与柴米油盐，探索的心境淹没在喧嚣的城市街头。而生命、生活，本应以更浓烈、丰满的方式生长壮阔。人生，需要探险，当探险激情的渐渐隐灭，心中的探险者需要被唤醒！

在阿拉斯加的黄金九月，25 颗探险的心与福特探险者“破冰 66° 34′ N”北极圈探险之旅一起，以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作为起点，一路向北，体验无限的极地风景。

Day 1：安克雷奇 Anchorage——基奈峡湾 Kenai Fjords

海拔：28 米　温度：9℃

北纬：60° 58′ N　西经：151° 31′ W

经过一天的休整，我们与探险者旅程的第一天，阿拉斯加以其特色的多变天气迎接远道而来的我们。天空挂起灰蒙蒙的面纱，空气却依旧纯净、清新，用力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是阿拉斯加的味道。坐进即将带领我们穿越极地的福特探险者中，在典雅的环境灯映衬下，大气而现代的内外饰设计及精良的钢琴黑色中控台，都在骄傲地向我们彰显其世界级不凡的工艺品质。其搭载的 MyFord Touch 车载多媒体互动系统及 SYNC 车载多媒体通讯娱乐系统，通过中控操作面板、方向盘上的五向按键和语音识别等方式操控，更具人性化地整合了娱乐、通讯、导航、空调四大功能。凭借 SYNC 语音操作系统，通过语音即可轻松控制 USB 中的音乐播放，出类拔萃的索尼音响系统，使探险之旅在细腻饱满的音律萦绕中，行进在阿拉斯加瞬息万变的路途上，真正做到“眼不离路，手不离方向盘”，关注道路的同时亦能与移动娱乐生活实时互联。加上三排七座，舒适且灵活可变的车内空间及豪华行李空间，福特探险者精工细作且充满人性化的各项功能配置似乎都在对车内的探险者们轻语：探险之旅，它将为我们遮风挡雨，保驾护航。旅程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与它相伴。

北极圈之旅的第一天，我们乘 6 小时的小型邮轮，来到了位于阿拉斯加南部的不冻港——苏厄德市（Seward）的基纳峡湾国家公园。据悉，这里不仅有最优质的海洋环境，还是海洋动物与海上划船者的天堂。公园内 60% 的面积被冰雪占据，亿万年前形成的冰川随处可见，被冰川与河水经年雕琢的峡谷岩石嶙峋，峡谷之上的天空摘去了辰时灰色的面纱，蓝得刺眼，几抹白色的云丝点缀其上。我们便在冰川消融后



的冰河与湛蓝的天空所形成的绝美的原始风光中，对话亿万年前的冰川，触摸北极圈的奇迹！这里是北极圈的圣地，也是冰川世界的奇迹。与亿万年静默的冰川相对，人显得如浮尘般渺小，数十载的光阴蹉跎而过，渺小如我虽不能与冰川比肩，但渺小的人也能活出伟大，唤醒心中的探险者，探索每一个未知，感受世界的奇迹。

Day 2：塔尔基特纳 Talkeetna——德纳里 Denali

海拔：1150 米 温度：5℃

北纬：63° 38′ N 西经：148° 47′ W

据统计，德纳里晴天的概率仅为三分之一，我们伴着在阿拉斯加的第一场雨踏上了第二日的征程。迁徙的驯鹿漫游在荒原公路；灰熊漫步在溪流边静静等待着鲑鱼；浅紫色的小花仰视着高大的云杉；老鹰在阴霾的空中盘旋、俯冲，又在头顶呼啸而过……尽管天气阴郁，但阿拉斯加的荒野、公路、人和野生动物与这天色相衬，更显得壮美。这里与一望无际、平坦幅扩的草原与平原不同，没有五色斑斓的野花郁郁葱葱，没有油油绿绿莺飞鹭舞的草荡，当你来过阿拉斯加，疾驰过荒野间的公路卷起阵阵尘土，泥泞的道路上车轮飞转溅起片片泥水，与无畏各种路况的探险者同行，你将发现——“世界本该如此”。

此时，除却眼前的壮美景色，在海拔变化较大的公路上，福特探险者优秀的爬坡和扭力表现亦使我们惊叹。我们无畏眼前泥泞不堪的前路，只需扭动旋钮，即可简单便捷地启动探险者卓越不凡的路况实时管理及智能四驱系统。泥泞的公路上，探险者的泥地模式轻松应对。此时，只需渐进油门，限制升挡并减少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的灵敏度，探险者便可保持持续稳定动能，轻松通过泥泞路面，带着我们越入佳境。

德纳里国家公园是阿拉斯加游客最多的国家公园，幅员辽阔，冰川、雪山、湖泊、苔原地带和花岗岩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它是大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世间罕有的原始之地，也是阿拉斯加不能不来的地方。公园内有着宽广的平原、阴郁的山林、色彩明亮的麦金利山，而公园的中心地带是世间罕有的自然荒野，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给自足，繁衍生息，自然的原始面貌并未被人类的脚步所破坏，一切仍遵循着自然的法则发展着。私人的交通工具都被严禁入内，我们仅可乘坐巴士成为大自然的旁观者。公园里遍布永久冻土区，因表面的土层很薄，所以园内的植物都比较矮小，只有能挨过漫长寒冬的植物才能存有一席之地。未被驯服的原始之地，唤醒心中的探险者，与探索前行。

Day 3：德纳里 Denali——麦金利山 Mt Mckinley

海拔：1800 米 温度：－ 2℃

北纬：63° 41′ N 西经：151° 11′ W

随着天空放晴，探险者征途的第三天，我们搭乘 Talkeetna Air Texi 私人飞机飞越平原和峻岭，无惧变幻莫测的高山风，飞越海拔 6193 米的麦金利山，近距离欣赏北美第一高峰的盛景并停泊在海拔约 1860 米的亘古冰川之上，堪称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探险。麦金利山为北美洲第一高峰，位于阿拉斯加山脉的中段，有南、北二峰，南峰较高，山势陡立。麦金利是印第安人心中的圣山，他们称其为迪纳利，印第安语意为“太阳之家”。后来，此山以美国第 25 届总统威廉·麦金利的姓氏命名。这里大部分地区终年积雪，山间雾霭缭绕，雾气在皑皑白雪中缥缈弥漫。从高空俯瞰，乌黑的山体披覆雪白的素衣，蜿蜒的雪路在山间盘绕延伸，山顶的蓝天与雪山景色映衬，美得纯粹且无畏。为了完美征服冰川，麦金利山还是世界登山爱好者的汇集之地。每年 5 月到 7 月都有成百上千的登山者试图登上顶峰，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难度较低的

东线登山。其中，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顺利登顶。攀登麦金利山不仅是对高度的挑战,也是针对极地气候的探险。抵达顶点，在山之巅峰，俯瞰色彩斑斓的苔原地带特色美景，我们对着连绵的冰山放声歌唱，有人脱掉厚厚的冲锋衣，感受冰山之雪在皮肤上灼烧、融化，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曾这样表述：“崇高山巅之美无穷无尽。即使我用最华丽的辞藻来描绘眼前盛景，但对一个未曾亲见类似壮景的人，也难以领会其雄伟及闪耀的灵性光芒”，探险的价值正在于此。这一切绝美的景象，正是拥有探险灵魂的探险者们能够独享的奢侈享受与心灵体验，那一刻，我相信，有决心没有越不过的高山，与探索同行，世界就在脚下。

Day 4：麦金利山 Mt Mcinley——费尔班克斯 Fairbanks

海拔：258 米 温度：12℃

北纬：65° 01′ N 西经：151° 12′ W

连日阴雨未能阻碍我们征服极地的步伐，旅途第三日，我们随探险者驶往费尔班克斯。途中邂逅了无数绝色极地秋景，阳光偶尔穿透乌云，为探险之旅送上一道彩虹。在路况复杂多变的公路上，福特探险者凭借搭载的 3.5 升 V6 发动机，最大功率 214 千瓦，最大扭矩 354 牛·米雄沛不绝的动力，搭配 6 速 SelectShift 自动变速器，以更优化的挡位传送比，提供最优化的车辆性能与油耗表现，兼顾手动挡的驾驶乐趣和自动挡的方便舒适，加之其深邃充盈、从容果敢的气势，傲视群雄，一路所向披靡，处处如履平川。

前往费尔班克斯的途中，我们见到了美国七大工程之一的阿拉斯加输油管，它北起北冰洋的普拉德霍湾（Prudhoe Bay），南至北美最北面的不冻港瓦尔迪兹（Valdez），穿越无数山脉、河流和永冻层，根据数据统计，阿拉斯加输油管自 1977 年落成以来，已经输送了 150 亿桶原油。666 公里的砾石公路蜿蜒向前，1300 公里的输油管道贯穿期间，寒温、碎石、雪崩随时有可能降临。这里没有一家加油站，没有任何补给。这里只有穿越永冻层的输油管，只有穿越苔原的道尔顿公路。坐在河水清冽的碎石河畔，看着远处或高或矮的植株，在这极圈内肆意地生长，秋色已染红了一片片苔原植被点缀于荒野之上，尚不及膝的苔原如绒毯般无尽延伸，白色的飞鸟自由地飞向远方，耳畔是泠泠的河水作响……探险，是因生命之于自然的忠爱，探险的旅途中才让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与力量，正如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所说，“能够领略万物之美的人，会发掘一生受用不尽的力量。举凡候鸟迁徙、潮汐涨退、春天待开的花苞，这些景象均具象征性与真实的美。大自然周而复始中，蕴藏无限愈合力——正如寒冬过了就是暖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Day 5：费尔班克斯 Fairbanks——寇夫 Coldfoot

海拔：159 米 温度：8℃

北纬：60° 58′ N 西经：151° 31′ W

道尔顿公路（Dalton Hwy），邻近北冰洋，被 BBC 评为全球最危险的公路之一，约 666 公里长的全砾石路面，是我们通往北极圈的必经之路。666 公里的偏远公路几乎所有路段都没有进行铺筑，但却是探险者最好的挑战之地。虽然道尔顿公路满地砂石，满地泥泞，实时路况管理系统开启，便不惧任何险境。通过路况实时管理系统下的沙地模式，调节油门向车轮输送最大扭力，变速器尽可能长时间地处于低挡状态，福特探险者的车轮保持高速转动，带着我们轻松通过沙石路面。凭借同级领先的安全设计和智能连接技术，包括三位一体式前段碰撞结构、带防侧翻稳定控制技术的 AdvanceTrac 系统及弯道控制系统等，我们安坐于被美国道路安全协会评为 2012 年“顶级安全之选”的福特探险者内，即便是脚下全球最危险公路之一的道尔顿公路，也不能使探险者们畏惧。望眼窗外，我们行进在全球最危险的公路之上，危险将世界置于强光之下，沿途荒凉、寂静的极地荒野，绵延不断的岩石，黄色或白色的地衣，时而如丝绸时而如棉絮的云朵，光影交错中，探险者带着我们轻松驶过一个又一个陡坡，每一个坡路的背后，都是一片素未谋面的天地，那未知的天空在探险者的眼中才是最美的天空。对我们而言，这公路的终点，便是最美的北极光所在。

北极光得名于古罗马神话里的织架女神——“欧若拉”(Aurora)，代表旭日东升前的黎明。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一年之中有超过 200 天的极光现象，因此被称为“北极光首都”。当人类第一次看到极光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了一个谜。有人说它是狐狸之火，有人说它是黎明化身。在探险者看来，它是追梦者的希望之光。我们在北极的星空下静静地等待了许久，但当极光跃动于天际的那一刻，它曼妙幻舞的身姿让再多的等待都变得值得，那是语言和辞藻难以修饰的美景，梦幻得令人迷醉，似雾非雾，似纱非纱，起舞于极地的夜幕。它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美的礼物，充满期盼与希望。探险者们在迷醉的极光下光绘出“66° 34′ N I Love U”的标语，这一刻，绿色幻化的极光与耀眼的光绘火花，将烙印于我们的脑海，为此次征途的探险者们加冕。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突破，不断挖掘未知的一切。

Day 6：寇夫 Coldfoot——阿提甘关 Atigun Pass

海拔：56 米 温度：5℃

北纬：65° 01′ N 西经：150° 12′ W

探险之旅的第六天，探险者们来到了北极之门国家公园，游历了极光的首都——费尔班克斯。北极之门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北部的国家公园，公园整体坐落于北极圈内，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公园，Coldfoot 就在其中。探险者们若想寻得一处既原始又充满挑战的地方，北极之门国家公园是绝不能错过的地方。探游这里，一定会感觉自己真的来到了“世界的尽头”。犬牙交错的山峰与云彩共舞，蜿蜒的冰河与森林山谷，北极苔原与黑云杉森林形成强烈且鲜明的反差，在这片永恒的土地之上，充满了足以让探险者血脉贲张的各种未知，深入其中，不知自己身后的那一片美景是前任从未踏足的地方。当阳光静洒在湖面，这里的一切让探险者们震撼而澎湃，让人不自觉地眼眶泛潮。未临此境、未感此情，怎能体味探险之于探险者心灵的震撼及意义。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离北极圈仅 240 公里的城市——费尔班克斯，1902 年，它因淘金而兴，今天，它因北极光而闻名。这座阿拉斯加州内陆最大的城市，曾经的淘金圣地，现在的极光之都，是阿拉斯加中部地区商业、金融、行政的中心。乍看之下，费尔班克斯只是一个充斥着快餐店、

购物中心和饭店的普通城市，但在这里仍有许多除极光外有趣的事物。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涌入这里的淘金者般在第8号淘金矿场遗址体验淘金的乐趣；与福特探险者在长达160英里的史提斯高速公路上驰骋撒野；或健行、骑越野脚踏车、划独木舟和越野滑雪；抑或沿河缓缓漂流而下，都使我们在征服极地的同时，体验了探险征程的惬意与阿拉斯加的城市之美。

当我们路过阿拉斯加第一届狗拉雪橇比赛中唯一完成比赛的女选手玛丽（Mary）的房前时，我留意到院前朴质的绿色的木门上，有一行白色的字写着："May i be the person that my dog think i am." 探险的意义，便如此般简单、纯粹，每一次征服，都是对生命的感悟，拥有无惧的探险精神，便是最简单纯粹的生命礼赞。

Day 7：阿拉斯加 Alaska——进无止境 ∞

7天，2000余公里探险旅途，25颗探险的心，8辆福特探险者，跨越北极圈，完成破冰征程……每日不同的风景与未知，为探险者们领路。探险的征程上，我们体验着福特探险者高速疾驰的酣畅、雪地甩尾的淋漓、泥沙扬尘的激情、岩石震荡的癫狂，但无论何种路况与天气，探险的旅途因福特探险者的保驾护航与完美强悍的驾乘模式使探险和驾驶乐趣横生。邂逅冰川、飞跃雪山、探索原始，穿越景观公路……探险者们探索到了极地冻土之上的绝美风景，带着对自然无限敬畏的心一路向北，完成了一次毕生难忘的北极圈破冰之旅。天光火焰，亿万冰雪，融于原始，与野性和荒野同行。北纬66° 34′ N，北极圈探险之旅的最后一天，阿拉斯加以晴朗的天空为探险者们送别，这里却并非探险者们的终点，人生的巅峰、自然的美景、世界的旅途与探险的精神永远在路上，进无止境。

从海洋开始，发现新大陆，征服地球极点，飞向太空——人类探险史就像是一部名为"进无止境"的史诗，扉页叫作天性，封底则是下一次探险。探险的征途中，没有终点，只有不断探索与征服的勇者路途，告别阿拉斯加，告别这片原始净土，福特探险者的北极圈之旅只是探险者无止境路途中的一处驿站，人生的旅途、世界的征程中，只有探险者才能看见绝美佳境。（文 / 拾月）







专补命门，治诸虚百损，得阴阳之气全也，药性温和，老少病虚者皆宜食用……
冬虫夏草的珍贵价值，在《药性考》、《本草纲目拾遗》等医药典籍中被记载传承。
今天，冬虫夏草的多重应用价值已被现代生物科学证实。西方学者研究揭示，冬虫夏草是一个天然的化合物宝库，价值珍贵。
诸多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对冬虫夏草价值的认识惊人的一致！

执著于它的宝贵价值，人们孜孜求索，渐行渐近……



冬虫夏草·现在开始含着吃

纵观冬虫夏草吃法的进化，有两个重大发展趋势：
一是从配伍吃到单独吃。随着对冬虫夏草阴阳同补、自成天然大复方这一独到特点研究与认识的深入，发现其独特功效来自于已知与未知的上千种成分自成体系的协同与相互作用，天然的精妙配方，任何添加都可能是多余的。
二是从高温加热吃到直接生吃。加热超过 60 度，冬虫夏草中的活性酶类、真菌多糖等会被破坏，功效明显下降。常温生服，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追求：**多吸收，好吸收！**

冬虫夏草低效利用的五大误区：
1、洗洗直接吃（错误指数：★★★★★）
不密封的脏虫草、未达到直接服用级标准，绝对不能常温生服！小牙刷刷不净，寄生虫（卵）、致病细菌、霉菌难去除，泥沙残留、重金属超标；浸泡刷洗时间长，水洗超过 3 分钟，部分精华成分将损失 50% 以上，效果降低。
2、钢磨打粉吃（错误指数：★★★★★）
小钢磨打粉不破膜、未破壁、效果差；未清洁不灭菌，泥沙残留、重金属超标，打完粉加速变质！
3、每天几根泡茶（水）嚼着吃（错误指数：★★★☆☆）
不卫生，危害大！泡水喝、嚼碎吃，人体能够吸收的精华成分仍然很有限！因而，每天几根的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药典》对冬虫夏草建议服用量为 3-9 克（3 克相当于 10 根中等大小的原草）。
4、三、五根炖着吃（错误指数：★★★★☆）
加热会破坏冬虫夏草中多种重要精华成分，造成效果下降；量不够，吃了也白吃！
5、虫草发霉，处理一下继续吃（错误指数：★★★★★）
精华成分已破坏失效。霉变产生的毒素易致癌，简单加热或酒精处理去不掉，洗洗、晒晒更不可能消除。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PICC）承保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产品上市至今未接到一例赔偿申请，未发生一起赔付案件。
青海春天郑重向消费者承诺：极草•5X 冬虫夏草均为 100% 冬虫夏草，如有不实，假一赔百。



草是草

区离粉碎增溶技术

虫是虫



极草 冬虫夏草纯粉片(双层片)

●运用**区离粉碎增溶技术**，针对虫和草物质结构的不同，实现均匀破膜破壁，使虫和草分别达到精华充分溶出区间，虫破膜，草破壁，冬虫夏草精华成分释放提升至少 7 倍。

●利用**纯粉多维成型专利技术**，无任何添加，按虫和草的天然比例制成纯粉双层片。含着吃，部分精华通过口腔黏膜毛细血管直接吸收，实现口、咽、胃肠多部位的高效利用。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 荣誉出品　全国尊享专线 400-888-9991　地址：中国·青海互助·冬虫夏草湿地公园　网址：www.verygrass.com



神秘莫测北极光

“人们发现北极光越来越多的秘密，但这并不妨碍你被它的神秘莫测所震撼。”

记者 ✎ **曹玲**



挪威摄影师弗雷德里克·布罗姆斯拍摄的北极光



北极光大部分呈黄绿色，有时候呈现红色和蓝紫色，天空映照得如梦似幻

北方的天空

“太阳让我着迷了很多年。”挪威人帕尔·布莱克（Pål Brekke）说。他是奥斯陆大学天体物理学太阳物理博士、挪威航天中心高级顾问，去年出版了两本科普书，一本叫《我们狂躁的太阳》（*Our Explosive Sun*），一本叫《北极光》（*The Northern Lights*）。因挪威弗拉姆号博物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探索北极”的展览，挪威驻华大使馆也邀请布莱克一同来中国讲一讲北极光。

“中国人对北极光的热情让我惊讶。”布莱克告诉本刊，“很多人觉得北极光很神秘，想亲眼一见。”他说，在成为一个科学家之前，北极光在他眼里也一样神秘。他最早被太阳所吸引，早年曾被导师介绍去位于奥斯陆北部Harestua的太阳天文台工作，他父亲也在那里工作。那时他开始对太阳动力学入迷，于是转向天体物理研究。“太阳让人类为之着迷了数万年，它从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生活。太阳有很多好处，比如有了它我们才能生存，才能看到绚烂的北极光，但是它也有很多害处，太阳风会影响卫星通讯、GPS、无线电通讯等等。”他后来热衷于和公众分享关于太阳的知识，参与了一些纪录片的拍摄，还写了一本介绍太阳来龙去脉的书。

写完《我们狂躁的太阳》之后，他和因拍摄北极光而获得很多国际奖项的摄影师弗雷德里克·布罗姆斯（Fredrik Broms）一起筹划写一本关于北极光的书。“虽然已经有不少关于









北极光的书，有的介绍如何拍照，有的介绍科学知识，有的是旅行指南，但是没有一本从各个角度解读北极光的书。于是我们打算写一本包括很多漂亮图片的北极光大全。”

北极的天空曾让很多人入迷。著名的卡弗利奖的创建人弗莱德·卡弗利（Fred Kavli）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说：“在挪威这样的国家长大，冬天时北极光在蓝色和黑色的天空中舞动，整个天空像燃烧起来，它还照亮了白雪覆盖的山顶，银河系中繁星闪烁。我坐在静谧而孤独的雪山上，这是最接近自然并对它产生兴趣的时候，我开始沉思宇宙、星星、自然和人的神奇。”“至今，我还在沉思。我认为，物理学是最接近自然和宇宙的科学。”他在功成名就后于2008年设立了卡弗利奖，奖励在天体物理学、神经科学和纳米科学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的科学家，每项奖金为100万美元，每两年评选一次，现在已经成为科学界一项重要奖项。

“北极光让人们思考宇宙。”布莱克说，“事实上，北极光和太阳有很大的关系，人们用了很多年才发现这一点。”

最早记录北极光的是挪威编年史《国王的镜子》，成书大约在1230年，作者可能是国王拉嘎伯特（Magnus Lagabøte）的儿子。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被海洋所包围。一种解释说，海洋被大火包围，极光是火光在天空中的反射；另一种解释是，地平线下反射的太阳光照亮了天空；第三种解释是格陵兰岛的火灾。

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才第一次将极光与地球磁场联系起来。他指出，极光弧度并没有指向地理学极点，而是指向磁极。“这一点是正确的，而且是一个重要发现。”布莱克说。

17世纪还有几位科学家发现了北极光的出现和磁场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挪威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汉斯庭（Christopher Hansteen）建立了一些观测站来测量磁场，第一次指出极光是一个围绕磁极的连续的环。“今天我们知道极光是围绕磁极的椭圆形，他的绘图是第一个例证。”法国科学家让—雅克·德麦兰（Jean-Jacques de Mairan）是第一个提出极光和太阳有关的人。1774年，他提出太阳的大气层和地球通过某种方式联系，“那时候这样想是很难的”。

最早的突破性发现是挪威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克兰（Kristian Birkeland）于19世纪末做出的。布莱克指着一张200克朗面额的挪威纸币上的人像说：“这就是伯克兰和他的研究。”

1896年，伯克兰提出，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能够点燃北极光。为了证实他的理论，他建造了一个实验系统，用一个装有电磁铁的模型来模拟地球，被称为“特洛拉”（Terrella）。他注意到引向磁化小地球的电子流将自动流向磁极，同时产生一圈光晕，他断定极光也是依据相同原理产生的。

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第一个稳定的极光观测站，并证实了太阳风的存在。基于地磁学测量显示，北极光的活动几乎是不间断的，他得出结论说地球不停地被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射线轰炸。伯克兰还发明了线圈炮和从空气中固氮的“伯克兰—艾德电弧法”，曾被提名诺贝尔奖达7次之多，可惜最终没有获奖。他设计的精彩实验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为技术所限，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终于被卫星观测所证实。


挪威科学家帕尔·布莱克

200克朗的挪威纸币上，印着伯克兰和他做出重要贡献的特洛拉实验、北斗星、北极星、极光环带。

太阳的故事

“用肉眼注视天空，太阳似乎一成不变地宁静和稳定。从地面看，太阳唯一明显的变化是它的位置，有时表面上可以见到深色的斑点。太阳才是北极光故事的开始。”布莱克说，银河系内有数十亿太阳大小的恒星，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发电厂，中心温度超过1400万摄氏度，巨大的压力把氢原子挤压在一起，成为另外一种元素——氦。这种剧烈的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从太阳中心向外辐射，热量到达表层形成巨大的漩涡，被称为对流单体。

太阳表面最明显的特征是被称为太阳黑子的暗区。太阳黑子实际上是太阳表面一种炽热气体的巨大漩涡，温度比周边低大约1000摄氏度，所以看上去像一些深暗色的斑点。太阳黑子可以从几个小时持续到数月，一个大的太阳黑子体积是地球的几倍。

每11年，太阳都会进入活动高峰，被称为太阳活动极大期，极大期后大约5年进入一段相对平静的太阳活动极小期。在太阳活动高峰期会出现很多太阳黑子，极小期只有少量太阳黑子。因此，依靠太阳黑子数量可以观察太阳活动的情况。

有时，太阳黑子附近的强磁场区域会扭曲和断裂，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被称为太阳耀斑。强烈的爆炸会让粒子和X射线加速进入太空，释放的能量等同于10亿兆吨TNT爆炸。

在某些情况下大量的气体也被投掷到太空中，我们称这些喷发物为日冕物质抛射。它们喷发出数十亿吨粒子，速度高达每小时800万公里。在太阳活动极大期，太阳风暴可能会每天发生数次，有时会对准地球方向。“太阳给我们的不仅是光和热，还有持续不断从太阳吹来的粒子流，被称为太阳风，速度高达每小时1500万公里。”布莱克说。

当太阳风到达地球，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它们被看不见的盾牌——地球磁场所偏转。地磁层是地球周围一个保护层，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巨大磁化区域，是太阳高能带电粒子的天然屏障，正是有了这道屏障我们才能安稳地生活在地球上。

地磁层的外边缘与行星际交界的地方叫作磁层顶，在地磁南北极上方的磁层顶形状像漏斗，少量的太阳风带电粒子可以从此处“漏”进磁层，在地球附近沿着磁力线绕圈，同时向地球两极沉降，在沉降过程中和地球高层大气发生碰撞，发出灿烂的光芒，这就是极光。

绚烂的色彩

碰撞通常发生在距离地面 80 ～ 300 公里的高度，绿、蓝、白、红四色光芒在天空中形成了一个椭圆的环形区域，也就是极光环带。

“极光的发光原理跟霓虹灯、荧光灯以及老式电视相似。”霓虹灯管中封存着氖、氩等惰性气体，电子在其中跑来跑去，撞到气体原子时，就会使后者受激发光。不同的原子在不同条件下受到激发，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

极光也是如此，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闯入地球大气层时，会在不同的高度撞到不同的气体分子，发出不同颜色的光。通常来说，在 200 公里以上的高空，带电粒子撞到氧原子时，氧原子会受激发出红光；在 100 ～ 200 公里高空，氧原子则会受激发出黄绿色光，这是极光最明亮、最常见的颜色。电离状态的氮则会发出蓝光，中性的氮受到撞击时发出的则是紫红色光。“所以，极光帷幕上最高处一般是红色，中部是白绿色，低处边缘是蓝紫色。”

北极光有不同的形状和结构，最常见的是帷幕状移动和闪烁。“极光活动就像磁层活动的实况电视画面。你能看到的戏剧化移动，瞬间消失，迅速出现，都是太阳风引起地球磁场震动的表现。”

北极光一般遵循持续 11 年的太阳活动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北极光出现频率先是达到一个峰值，接着逐渐减少，直至最低谷。“太阳活动剧烈的年份也是观察极光的好时候。”

“观看极光的最佳地点当然是在高纬度地区。距地球磁极大约 1000 ～ 3000 公里的地区北极光每晚都会出现，它横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到俄罗斯北部，然后穿过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并进一步横跨格陵兰岛和冰岛南部，这些国家都是不错的极光观测点。”

在挪威北部地区几乎每一个黑暗晴朗的夜晚都能看到极光。“事实上，极光通常很淡，并没有长时间曝光的图片那么绚烂，但足以令人激动，不亲眼一见非常遗憾。”布莱克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2012 年。“当时举办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已经举行了 7 年，每年都遇到很糟糕的天气，但是那一年天气甚好，大家出城看到了绚烂的极光。很多人因为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梦幻的景象激动得想哭，这让我也很感动。第二天同行的人说这是一个梦，我们一起做过的梦。”

不光地球上有北极光，很多行星都会出现这样的奇景，比如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些行星都有大气和磁场，极光以同样的机制出现。木星和土星这两颗行星的磁场比地球更强，哈勃太空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两颗行星的极光。

“如今，科学家已经不需要像往年那样在天寒地冻的野外观测极光，他们可以坐在舒服温暖的房间里，通过各种仪器和设备进行研究。”由于观测容易、气候温和，挪威相继成立了大量的极光研究机构，包括安德亚火箭发射场（Andøya Rocket Range）、阿洛玛观测站（Alomar Observatory）、欧洲非相干散射斯瓦尔巴雷达（EISCAT Svalbard Radars），以及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亨里克森观测站（Kjell Henriksen Observatory）。

北极光会出声？

“北极光有一个未解之谜，它究竟会不会发出声音？”

很多人宣称强烈的北极光会伴随着声音，一些人坚称他们能听到一些声音，常常和北极光的运动同步。记录在案的极光声音类似于“噼啪”声和低沉的轰鸣声，持续时间短暂而微弱，需要认真倾听。

能否听到北极光和它的高度有很大关系。北极光的高度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北极光距离地表几公里，也有人认为有 800 公里。今天我们知道它通常为 80 ～ 300 公里，有时候会在 500 ～ 800 公里。

“北极光发生在离地表 80 公里以上的空间，那里近乎真空。因为声波不能在真空中传播，所以声音很难传到地面上。”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有趣的解释。1911 年，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的同伴约翰森（Hjalmar Johansen）在日记里写道，阿蒙森出去之后告诉同伴，他呼气时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被冻住的声音。于是约翰森和另外一个人也出去尝试了一下，同样也听到了“噼啪”声，这种声音他们曾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出现强烈极光的时候听到过。而当他们屏住呼吸，摇晃脑袋，声音就消失了。

2012 年，芬兰阿尔托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记录极光声音的观测地安装三个独立的扩音器，比较了扩音器捕捉到的声音，发现这些声音来自地面以上约 70 米的高空，而北极光则出现在地面以上约 120 公里的地方。科学家无法确定声音是如何出现的，他们记录到很多种类的声音，这意味着声音是由不同的机理共同产生的。

“挪威萨米人称北极光为‘guovssahas’，意思是‘可以听见的光’，似乎有其合理之处。”极光还有很多至今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令人震撼的极光碰撞等现象。“随着对太阳和地球磁场的深入了解，人们发现北极光越来越多的秘密，但这并不妨碍你被它的神秘莫测所震撼。”布莱克伸出手臂做拥抱状，“欢迎大家来挪威看北极光。”

终点？未必

文 ✎ 张斌



跑过 80 多次马拉松的 91 岁跑者玛格丽特·哈格蒂

乔伊·约翰逊从来是不怕死的，除了例行检查，几乎不见医生。去年，86 岁的乔伊连续第 25 次完成了纽约城市马拉松赛，成绩是 7 小时 57 分 41 秒。成绩还重要吗？以人瑞之寿，哪怕是溜达完那五个街区的赛道，也是极为惊人的。在比赛中意外跌倒的乔伊在通过终点后不到几小时被发现穿着跑鞋在旅馆的床上停止了呼吸，与生命的终点不期而遇，就在她刚刚成为纽约马拉松完赛年纪最长的女性跑者之后。

乔伊离去安详，不曾惊扰任何人，甚至没有让同龄的耄耋跑者们心头有一丝的异样。去年纽约城市马拉松赛，80 岁以上跑者完赛者 22 人，今年这一“银发组”报名人数达到 34 人。10 年前，不过 4 人。乔伊可非凡人，据跑友回忆，6 年前在跑步训练营中见乔伊气场活似摇滚歌星，与之合影的人很多，82 岁的年纪引得一阵阵惊呼：“我们的妈妈在这个岁数往往走路都会遇到障碍，连续跑马拉松那简直就是传奇。”乔伊每一次出现在赛道上都在激励着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如此高龄，每一次奔跑都有可能抵达的是生命终点，但痴迷于奔跑的老人们竟然没有退却之心，实在状况不佳，在家人的看护之下，也要走完属于自己的里程。退休投资家约翰·门德斯报名了今年纽约城市马拉松赛，比赛第二天老爷子就将年满 94 岁，如果顺利，名字将被写入史册，成为完赛年纪最大的跑者。参赛前一周，门德斯的子孙们苦劝老爷爷三思而跑，切莫冒险。门德斯平日里，每天徒步 5 公里，去年纽约城市马拉松中，走了 13 公里，实在是气力不支，只好在人海中黯然退赛。凡记者必会问门德斯，为啥要再次参赛？老爷子的回答很爽直：“问这不就是好像问我为什么早晨一定要起床嘛，你说为什么？”再问急了，老爷子就嚷嚷说：“我这辈子从小就喜欢户外生活，从来闲不住。”其实呢，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门德斯一直是位轰炸机飞行员

好像没有答案的，天生爱跑步也就是了。玛格丽特·哈格蒂老奶奶第一次报名纽约马拉松赛，报名单上填写的年龄——91 岁，作为世界上在七大洲都曾完成过马拉松赛年纪最长者，玛格丽特期待着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填补无限的空白，此前她已完成了 80 多次马拉松赛，去年在乞力马扎罗山还曾跑完一个半程，90 岁高龄啊。哈格蒂今年总算有了些服老的姿态，宣布将以“养老院的脚步节奏”完成马拉松，并坚称此次的纽约奔跑将是人生最后一个马拉松。熟知玛格丽特的人都会嘿嘿一笑：“千万别信所谓的最后一次”——2010 年在基洼岛马拉松赛前就曾诅咒发誓“最后一个”，4 年过去，依旧还有很多心事未了。

今年马拉松在纽约遇到了大风和低温，玛格丽特真有些不惧生死，她告诉身边人，死有何惧，死在纽约也不怕，至少在记录册上又多了一次马拉松。何等壮烈，也许真是父亲狂热的体育基因一直在影响着玛格丽特，让马拉松作为一种需要流淌在血液里，父亲 60 岁时因为一次动力艇事故辞世。

悉心体会老者奔跑，自律和信仰缺一不可。乔伊每日 4 点起床，早课读《圣经》一小时，简单早饭，随即跑进黎明前黑暗，与跑友一道奔跑起来。无数次，在奔跑中她都会默念：“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不知今年又有多少跑者的心中也会鸣响这《圣经》名句奔跑在纽约的街头，终点看似一致，但怎知何时何处才是生命终点。



平板客户端

数字精选版：
在App Store、各大安卓市场中
搜索“三联生活周刊HD”即可免费下载
（支持NewiPad Retina高清屏幕）

iPad原貌版：
内容完整，年订阅价低至3元/期，
在App Store搜索“三联生活周刊iPad版”

手机客户端

3.0版全新上线，完美支持iPhone5，
微博、微信一键分享

在App Store里搜索
“三联生活周刊for iPhone”免费下载

在各大安卓市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免费下载安卓手机版

微博
@三联生活周刊
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
搜索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或手机发送短信“三联生活周刊”
到12114获取下载地址

彩信手机报

每周六期，当周杂志核心内容。8元包月（需开通彩信服务，价格不含通信费，前72小时免费试读）

移动：发送SLZK到10658000订阅　联通：发送SL到10655111订阅　电信：发送SLZK到10659000订阅

俄罗斯的“面子”与中国的“里子”

文 宋晓军

8月30日，我在从南京回北京的高铁上，接到一个媒体记者的电话。电话内容是，问我俄罗斯高调出动战机前出北大西洋和成功试射了“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会不会引发美、俄之间的新“冷战”。接到电话我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关注的是俄罗斯的“面子”，而美国人真正关心的可能是中国的“里子”。

接下来，我反问那位记者的问题是：既然俄罗斯派战机群前出北大西洋和成功发射了“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美国为什么还决定要将最先进的F-35战机和60%的攻击型核潜艇部署到亚太呢？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就在俄罗斯战机飞临北大西洋上空时，美国媒体还在炒作中国海军潜艇前出印度洋进入波斯湾和访问斯里兰卡港口一事。其实上，美国关注俄罗斯的，只是俄罗斯对军事资源存量的使用，而关注中国的是军事资源增量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增量。这就是“面子”和“里子”。

为了说清楚“面子”和“里子”的区别，可以拿核潜艇来举例。俄罗斯的核潜艇无疑是“冷战”后最大的军事资源存量。但自2010年美国推出“重返亚太”战略后，为何要将60%的攻击型核潜艇调往亚太，同时还将刚刚研制成功、尚在试验改进期的P-8反潜巡逻机调往亚太盯着中国呢？原因在于，工业大国之间的军备角力是一种体系对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核潜艇作为单个作战平台虽仍有一定优势，但从其财力和工业潜力上看，已经很难再构成与美国水下核力量对抗的独立体系了。相反，美国的智库在评估了中国的财力和工业潜力后，认为中国未来有形成水下作战体系的潜力。这也是美国未来要把更多核潜艇力量和反潜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真正原因。

那么“体系对抗”是什么呢？可再用潜艇和南海做例子来说明。美国军方认为，南海不仅是重要的贸易通道，而且还可能是未来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打击美国本土的发射阵地。同时，根据美智库的预测，当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和核潜艇通过更新始终维持在60多艘时，到2028年美国能部署到西太平洋的攻击型核潜艇就只有24艘。这就需要美国潜艇在南海的水下发挥系统对抗的优势。比如美国海军拥有一个由军方、其他海洋部门和国际数据交流建立起来的可实时更新的海洋环境数据库。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可快速将海洋环境数据传给舰队海洋环境保障中心。“中心”通过补充、修正系统将修正后的有关作战数据及时传给海军相关作战群的海洋环境报销组，最终将数据分发给作战群中的潜艇、舰艇和飞机等作战平台。所谓“体系对抗”，就是看参战的双方哪一方由作战平台组成的作战群传输数据的速度快、准确。近年来，美国频密地派军舰、飞机和测量船对中国近海进行抵近侦察、测量，就是在不断地获取和核实相关的海洋环境数据，进而及时补充到海军海洋环境数据库中，其目的就是提高在南海海域潜艇兵力和反潜兵力的对抗能力。

话说到这儿，我不能不说所谓的海洋强国、海军强国，不仅是你拥有多少航母、潜艇和飞机，更重要的是你的航母、潜艇和飞机在海上战场上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事实上，就在我接到前述记者电话的几个小时前，我在南京的一次会议上，刚听到了海洋物理学家、中科院苏纪兰院士的发言。他呼吁国家应尽快制定海洋数据共享的相关法规，并投资开发有助于“海洋水文环境预报”的相关技术。而这些都是提高中国海军“体系对抗”能力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真正的中国“里子”。



美国海军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甲板上的F-35闪电II联合攻击战斗机



科技改变生活　新蒙迪欧领跑汽车智能时代

科技的每次更迭，都能够让我们的生活随之改变。百年前，蒸汽发动机的出现，蒸汽汽车成为风靡全球的奢侈品；而后，汽油发动机诞生，以汽油驱动的汽车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用品；而今，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对汽车提出了更高需求，一部能够带来智能科技体验的汽车已经逐渐为中高级车消费者所追捧。

纵观现今竞争激烈的中高级车市场，新蒙迪欧凭借其独树一帜的“科技·品位”主张，上市一年多的时间表现出了惊人的销量增速，迅速成为中高级车市的领衔车型。这样的表现有力地说明了其所拥有的超越同级的丰富智能化科技配备成功抓住了消费者的心。

智能科技成就超前便捷

新蒙迪欧在人与车之间直接利用科技架起桥梁，为驾乘者提供超前的便捷体验。当担心家人的驾驶安全时，使用新蒙迪欧搭载的同级独有的 MyKey 我的智能钥匙，对车辆的最高速度进行限定设置，可以提前预防超速行驶的发生。坐进新蒙迪欧驾驶座上，在科技感强烈的座舱氛围灯下，按下一键启动键，拨动方向盘边的 SYNC® 按键，通过语音就可以轻松接打电话、播放音乐、调节车内温度等等，识别率非常高。详尽的信息通过 MyFordTouch™中控触摸屏来显示，娱乐、通信、导航及空调等相关信息一目了然。在空间日益紧张的城市里，停车越来越考验技术，而有了主动泊车辅助系统，驾驶者只需要控制好油门、刹车，车辆就可以自动完成泊车操作了，非常简单智能。

安全科技为行车保驾护航

讲求品位的消费者更加注重智能科技在安全方面的体现，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ACC 智能自适应巡航系统给你带来的是惬意与安心，只要你设定好速度，它就能自动巡航，自动调整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而当变道或转向时，BLIS 盲区监测系统就站出来了，通过安置在车辆后部两侧的雷达传感器，侦测驾驶员视线盲区内是否有车辆，并通过外后视镜上的 LED 闪烁来提示驾驶员注意。LKA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和 LDW 车道偏离警告系统会在车速 64 公里 / 小时以上时自动开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并未开启转向灯而离开车道，系统就会震动方向盘并在仪表上显示提示信息，尽量保持车辆的行驶轨迹。



绿色科技兼顾动力环保

作为中高级车型，新蒙迪欧的绿色动力表现展现出了同级领先水准。新蒙迪欧搭载排量分别为 1.5 升和 2.0 升的两款 EcoBoost 系列发动机。主力型号 2.0 升 EcoBoost®GTDi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 SelectShift™六速手自一体变速器的配合，使得新蒙迪欧的动力输出快速而平稳。而更加令人惊喜的是，新蒙迪欧还通过先进的发动机管理系统，精准控制油量，提升燃油直喷效率。此外，新蒙迪欧还采用了一系列降低风阻的设计，达到节省油耗的目的。最终，新蒙迪欧 2.0T 车型实现了低至 7.9 升 / 百公里的综合油耗水平，对于一款车重超过 1.5 吨的中大型车来说，节油效果相当突出。

显而易见，从车门开启的瞬间，新蒙迪欧的人性化智能科技体验就在点火、行车、泊车等方方面面体现开来。而新蒙迪欧所具备的一系列科技，恰恰迎合了当今消费者对于智能驾乘体验越来越高的需求，也彰显了他们的高品位用车生活理念，获得如此青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相信，融入更为丰富的智能科技将是中高级车型的必然趋势，而新蒙迪欧作为先行者已经获得了追求时尚驾乘品位的消费者的热捧，未来新蒙迪欧的道路还将更加宽广。



（蔡小川 摄）

作家贾平凹

贾平凹：原来如此等老生

“很多事情在经历看透之后就不需要一惊一乍，不需要花言巧语了，有啥就说啥，很简单。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有‘包浆’了。要不就是唠唠叨叨，要么就是没话，很直白。”

记者 孙若茜

“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平均每一两年，贾平凹都会有新作出炉。他有个习惯，每写一部长篇时，都会写书法给自己鼓劲儿，五言、七律、顺口溜，写下后大大小小地挂在墙上。他说这就像是跑马拉松，一定要有人在一旁喊加油才能坚持下来，写作没人在旁边加油，就只好自己说给自己。这一次创作新书《老生》，他写给自己的就是这几句，原本也无意公开，却被到访的朋友见到时拍了照片公之于众，最后索性就印在了书的封底上。

前一句他提醒自己，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后一句就是在指这本新书的内容。《老生》中的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里，依然是乡土写作。书中以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唱师作为回忆的讲述者，分四个故事，从20世纪初一直讲到了今天，时间跨度大致是100年，被评论家认为是作家首次借用民间写史的方式创作长篇小说。

“老生”可以理解成一个人活得很

久，或是理解成在借用戏曲里的一个角色，也可以当作是老生常谈，贾平凹在书中的后记里提出了这几种解释，为了读者不因执著于某一种解读而使思维受到局限。仔细读还可以发现，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总会有一个人的名字里有“老”，也总会有一个人名里有“生”，他说这一方面是为了应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不必陷在“老生”这两个字所表达出的任何一层意义里。

研究者借用“老生”这个概念，将贾平凹称为“老生写作”，而对立于现代作家的青春写作。对于这样的评定，贾平凹说：“这就像是一年的四季，有春天就有冬天，如果说有老生写作这个概念，那至少是秋天以后了。春天的东西都在成长，因此柔软，而老的就都是僵硬的了。很多事情在经历看透之后就不需要一惊一乍，不需要花言巧语了，有啥就说啥，很简单。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有‘包浆’了。要不就是唠唠叨叨，要么就是没话，很直白。”

《老生》就如他所说，很直白。残酷、血腥、丑恶、荒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他都是老老实实地呈现。“琐琐碎碎的，乡里邻间的家长里短，他写得生动有趣，历史的巨大的惨烈和巨大的虚无、荒唐，又和琐碎的乡间的大荒唐、小荒唐结合得非常好，虚与实、写意和写实扣得非常紧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它同时也是一部带有实验性的作品，书中有很多魔幻的地方，这种魔幻笔法在贾平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太白山记》，以及1999年写、2000年出版的《怀念狼》中都出现过。在这部作品中，“他的魔幻笔法越写越随意，你完全不觉得它是魔幻，你觉得它就是现实中存在的”。

上一部长篇小说《带灯》出版时，贾平凹曾说自己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观念的形成都可以追溯于《山海经》。当时浅谈辄止，这一次写作，他将《山海经》直接放入了自己的作品中。全书被分为四个部分讲述故事时，分别是以《山海经》原文的四个片段来作为开始。“他用《山海经》的四个片段来切入、来叙说，来作为某种影子，把最古的历史，中国神话一样的历史、开天辟地的历史和我们近代、现代所面临巨大转折、裂变的惨痛的历史跟它对接，首尾连接起来。”从这一设置上解读，陈晓明认为：“这部作品在叙述时间上做了非常大的实验。”

这几个《山海经》的片段，全部来自于《山经》。贾平凹说，因为在《海外经》、《大荒经》等部分中，更多是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这样的神话故事，“那时候关于神的理解，和对人的理解是一样的，神话就是‘人话’”。而《老生》里面写的本来就都是人事，就不必再选择那里面的神话，而只要选《山经》这样有关山水的描写了。

贾平凹特别喜欢这些山水的描写，“在写法上，节奏、气息的把握都特别从容”。以往的写作中，他特别爱写环境，但这次不写，把《山海经》的原文引入书中后，自己就纯粹地去写人事斗争，人与人之间的事儿。《山海经》一个山一个山地写，贾平凹就一个村一个村地写，是为有所对应，这是在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也是《山海经》和《老生》之间最为明显的联系。

相比之下，这本书在故事情节上与《山海经》的关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我也不想写得太巧了，太巧就矫情了。”贾平凹说自己不主张把书里的故事和《山海经》之间变得太有关系，因为这本书不是单单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讲述整个时期，从完整的故事性来说，结合得太密反倒使容量变小，会把读者局限在一个小故事中。

鲁迅曾指《山海经》是“巫觋、方士之书”，《老生》中故事的叙述者恰恰是贯通于天地之间的唱师身份，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这正是所谓“巫”。因此，《山海经》在《老生》中，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性因素。“我觉得他将其作为一个艺术写的时候，差不多也是一个巫行，我想这里面至关重要的命题，就是看到了历史之重、记忆之重，同时一定要在这个架构里，在整个艺术过程中要让它变轻，这个‘轻’和‘重’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是轻的就好、重的就不好，因为只有重才会碰到地上，有轻才能碰到天上。这部小说看到最后应该看到，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不再是历史；记忆也不再是这个现实、个人执著于此的这个记忆。”

三联生活周刊：不论是之前的《带灯》，还是现在的《老生》，你的写作都不会把笔墨集中在书里的某一个故事上，这是因为书写历史时有特殊性，还是存在一种传统小说的书写方式？

贾平凹：这四个故事是一路发展过来的，把那个时代记录下来，没有办法突出某一部分。其实，这四个故事在别人的小说里也都写过，严格说它都不是纯粹来写这个东西的，重点也不在这方面。我想把四段写完后，就能看到一百二三十年的历史是怎么过来的。看历史要从大的角度来看，从小的角度看就只会注意这个写了什么那个写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对什么不利之类的。从历史长河来看，100年是很短暂的一瞬间，一眨眼工夫，从人文发展的过程中看这个问题，只能是从这一段里面看给后面的人吸取什么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所谓民间写史的叙述方式里，你的文学和你讲述的历史怎么互相介入？

贾平凹：《老生》的时间跨度基本上是100多年。作为一个作家，具体

笔墨在纸上写的时候就要写得实，这样就必然提出一个历史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如果把文学变成历史，那就没有文学了，就没有意思了。怎么把历史规划到文学里面呢？说到最后就是具体来看每一段有几个具体事件，百多年来，我所知道的、所听到、所参与的。这四个阶段是四个时期，也就是中国这100多年来的四个社会转型期。没有写什么时间段，也是故意不让太具体，太具体从文学角度是不好的，从政治角度也不好。

把历史规划到文学里面有好多办法来转换，记忆就是其中一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项。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记忆。具体到一个作家来讲，他写的东西基本是他的记忆。个人的记忆是个人的，大了以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历史的一些记忆。荣格说过一句话我特别欣赏，‘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表现集体无意识’。我当时看到这句话觉得很震撼，怎么抓住这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必须要了解、要关注这个社会，有了这个意识以后你再寻找原始具象的东西写出来，你的作品就成功了。所以在这类故事里面，字面写的过程必然要写到某一个阶段的人和事，写这个过程中也要面貌，要搭一个大纲来看这个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选择唱师这样一个角色作为整本书的串联，出于什么考虑？

贾平凹：因为他是超越年代的，他活得长得很，同时他也是超越制度的，因为国民党的时候他在，共产党的时候他也在，几个社会转型的时候他都在，他还是超越阶级的，他给地主唱，给贫农也唱，谁死了他都唱，他也是超越生死的，他站在最最基层，这个历史就是唱师的历史，一般老百姓谁管你什么改朝换代，我只关心我这儿发生的这些事儿，它是从这个角度写的，写得更真实。现在人写东西是看谁是主导的，谁有话语权谁来写。这样的角色游离于更多的东西，就像医生，也像教堂的神职人员一样，或者寺庙里的和尚，能够更超脱一些，看清很多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想要模糊掉说史的立场，你的办法就是找到游离于各种阶层之外的角色。所谓民间写史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么？

贾平凹：对，他是站在一代代人是怎么过来的这样一个立场上来看待这个历史的，这就更符合民间的“说古景”。一个老奶奶给你讲80年前的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可能告诉你那个人符不符合当时的政策、那个人的表现是还是非，她只说事件，这样你才能看出那个年代是怎么过来的。

为什么叫古景呢，其实是从“古、今”这两个字慢慢转变来的，就是从过去说到现在，说那些闲话，但是闲话里面经常能透露朝廷的事情，过去说要知朝廷事必须在民间，他总是有些流言蜚语，小道消息的透露。民间的信息，经常也有大量不真实的东西，汇到一块儿，任何东西到民间，就像是米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的时候上面都是泥啊灰尘啊，但是你把它洗净以后，它还是米。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把《山海经》借用进来，又在叙述节奏上和它有了一些吻合之处，有评论就认为这是你对于传统的中国小说写作的一种找寻和回归。就这种类似口口相传的记述，就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样貌吗？它最终是从评书而来的？

贾平凹：我有一个体会，有一天看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原来看元代的剧本或是一些民间的没有名的剧本的时候，发现它的场次特别多，大部分戏都在交代故事。如果你看过过去的剧本就会发现，戏曲的写法其实更像中国小说，比评书更接近小说。有些场次就是过场，幕一拉几个人一交代就完了，完全是按照剧情走。到某些唱词的时候，对白都是交代，唱就都是抒发感情和内心活动，它和目前的小说要求是一样的，那些交代就是小说的写法，中国小说的写法。

我说的这个是老剧本，不是现在的戏曲，解放后戏剧家开始改编古典戏，场次压缩唱词也压缩，这种特点就不多了。只把故事高潮情节交集在一块儿的地方和演员抒发感情的大段唱保留下来，有的就交代不清了。看剧本的时候，一开始我也觉得啰唆，但后来我就想，那时候中国没有小说，但是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用的还是这种办法，而且中国小说并不是不注重心理描写，唱词就是心理描写。

三联生活周刊：现代的小说写作和中国传统小说之间还存在着什么样的继承么？

贾平凹：所谓现在小说的写法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一定的章法规矩，只要你能把事情说清楚，怎么都行。现在没有纯粹的西方手法，也没有纯粹的中国手法，都是汇集起来慢慢衍变的，就像现在乡下人和城市人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既没有中国人独有的，也没有外国人独有的，世界的发展速度是一样的，你在干啥我这儿也在干啥，相差不大，好像你那边吃啥我这边也吃啥，只是制作的不一样。思维方面我认为都差不多。为什么这边能产生戏曲、那边产生话剧，为什么这边产生水墨画、那边产生油画，它就是环境、气候、物产不一样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好比人类生活的地方就是一座山，往往山上这条沟里生存的是一群狮子老虎，这些大的动物；另一条沟里就是羊、牛、猎狗、狐狸这些小动物，还有的沟里都是飞禽，麻雀、喜鹊、老鹰，就像是人的不同种类分布在这个地球上。欧美人就是狮子老虎，比较高大凶猛，平时不言语，掠食的时候有攻击性，东南亚人是一群鸟类，集中在树林里，喳喳喳喳永远在吵。

往往是这样，大动物完全凭实力攻击，小动物没有这种力量就多变、敏感、伪装，善于跑，而且身上有毒。

道理上就是这样，看任何事情，大事情看不懂的时候就当小事情理解，比如世界上的事看不清的时候，你就想想你老家村子这户人家和那户人家之间的斗争，小事情就要放到大事情上靠拢分析，就能看懂。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作品里提供一个概念，就是历史是循环的，如果是这样，那写作之于这个大的循环里，还能有突破么？

贾平凹：这个东西确实，现在好多观念，你细细研究古人，他们早都说过了，只是说的方式不一样。在我理解，世界上真的就是那么一个真理，不停地解释它不停地说它，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或者一代比一代强。

当世界很简单的时候，文学是起作用的；当世界变得很复杂，各种东西都有了，互联网的高科技的越来越多，小说势必就衰败了。当年的小说是引导人通往未知世界的一个东西，现在科技方面大大超越了，它改变的不仅是物质世界，同时也是精神世界，代替了好多文学的功能。文学在媒体不发达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新闻功能，好奇、猎奇，这些都是新闻的功能；媒体发达了就把这一块儿从文学拿走了，文学势必又削弱了一部分。科技、媒体都来削弱文学，你说文学怎么对古人超越呢？越来越难了，几乎不可能了。

实际上说循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循环的，任何都没有灭，就像水一样，不停地循环着。佛教的观念人都是转世的，有人转世、动物转世、植物转世。从这个时代很容易看到上一个时代，如果说这个时代是弱者时代，上一个是强盛时代，那强盛时代与强盛时代相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和上上个时代的人的结构是一样的，不停在转换。文学也应该是这样的，总的来讲是悲观，不可能出现曹雪芹、托尔斯泰，但也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李敬泽说中国小说的精髓在一个“荒”字，你怎么看？你认为这精髓是什么？

贾平凹：在我理解，小说、文学作品最高的境界就是与政治无关了，也和故事所说的事情无关，连时代都无关了，完全是人活在世上产生的命运。《红楼梦》最后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给你感觉是人生原来是这样虚无的事情，伟大的作品应该产生这样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作品（我说这个“作品”，当然不一定是发表的），提醒你把这个事情干好，或者打击你这个事情不能干，或者攻击你是个坏人，或者表扬你是个好人，这些都是小境界，都不是文学要表达的东西。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文学的东西是要提升你开悟你的精神世界，了解人到世界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事情到最后衍变原来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满是荒唐言，实际上人生就是大的荒唐，说不清的一些事情。你去到高空，或者坐轮船，看到山川、大海，觉得人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么小一点儿，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你如果坐在家里，就会觉得这顿饭没有吃好就是特别生气的事儿，因为你看到的范围小，就容易悲伤愤怒抑郁，看大了以后就不会在意这些。文学表面看讲的都是你家里那些小的事情，但是要把你领到另一个地方去，让你腾飞起来把它看透，就是起这个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的第四个故事一直写到了“非典”时期，其中有很多新闻事件都被融入到了故事中。虽然每个作家的处理方式不同，但这种将新闻当作故事情节的情况似乎近来常在小说里出现。新闻是现今小说写作中难以绕开的部分么？

贾平凹：过去要深入生活就是到社会里去了解发生了什么。媒体不发达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现在媒体发达了，无论多么小的一个事情，很快大家就都能知道。小说为什么不能用这些材料来写呢？也可以来写，因为要写的是它背后的东西，不是这个事件本身。比如老虎的那个，我到那儿专门去过，以我的角度我必须要用这个事，不用这个我没办法说明我要写的这个人的变化，后来还有“非典”时期的材料，不是纯粹的那个东西，要写这一段时期的事情，要真实得让人相信，不能胡编，这些东西是没办法回避的。

这也存在一个写作陌生感的问题。要考虑一个作品不是今天写完，明天一看，后天就被丢掉了。往后一看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比如说土改时期的事情，如果在当时写，大家看到也会觉得这都是我知道的事情了，可是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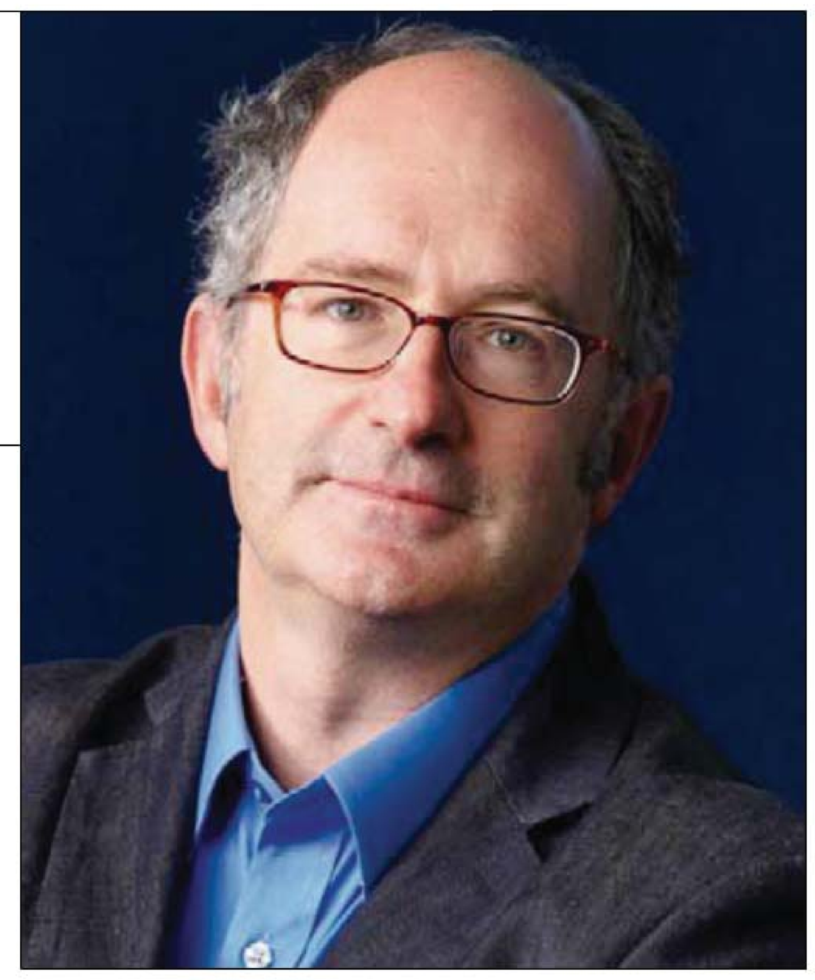
现在社会公开化、透明化以后作家怎么写眼下发生的事情，必然涉及一些事情。万不得已不用不行的时候，角度要不一样。只是故事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采用它，肯定要有设置，不是很虚地写就能把它掩藏过去，肯定要很细致地写，这个东西我估计还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是摆脱不了这个东西，作家来说尽量避免，读者来说还得客观地来看这个东西。不管用什么材料，要看投入多少真情，是伪情的还是矫情的，读者能看出你的态度。

“文学表面看讲的都是你家里那些小的事情，但是要把你领到另一个地方去，让你腾飞起来把它看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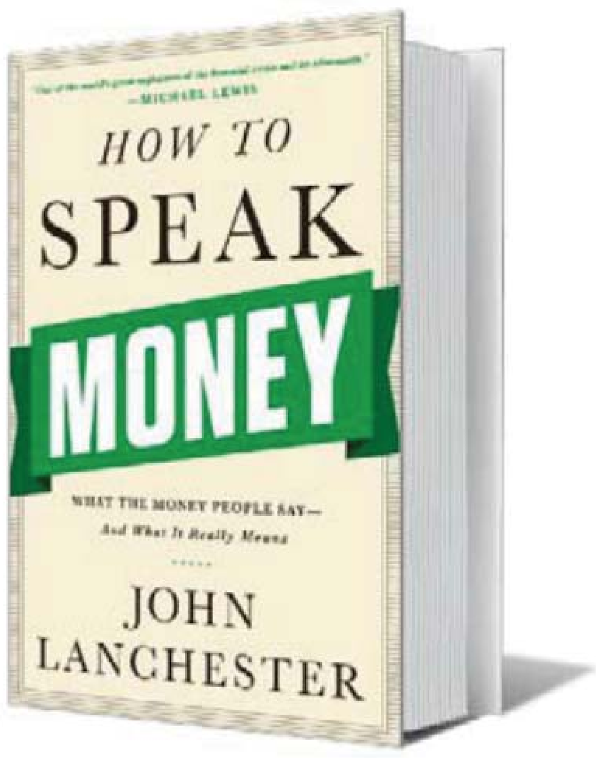
金融业行话大起底

英国小说家约翰·兰切斯特说，金融业的行话在普通人看来非常高深，但没谁是生下来就懂这些行话的，一旦你弄明白这些行话后，世界就变得不同了。

文 / 小贝



约翰·兰切斯特



《如何谈钱》

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告诉我们，要想成为股票经纪人，你必须足够聪明：影片的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只需几分钟就能把打乱的魔方复原，他在海军时是雷达课的第一名。但兰切斯特说，对金融业一头雾水的人也能够理解这个行业的术语，只要他们能够克服心理障碍。

兰切斯特为金融学的门外汉编了一个小词典。有些词语很常见，比如利率，懂经济学的人一听到利率上涨，就能推断出 11 个结果，从股票下跌到通胀上升，因为通胀意味着钱变得不值钱了，而利率上升意味着钱更贵了。滞胀是经济增长停滞加上高通货膨胀。这种现象之所以危险，原因之一是通常经济停滞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利率，使借钱变得更便宜。但高通货膨胀意味着利率已经特别低了。

稍微难一些的术语有“机会成本”，指的是选择一件事而非另一件事的成本。它有些难以捉摸，因为它是不可见的，因为一旦你选择了这个，你就体会不到其他选择的好处。兰切斯特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帮助读者理解：提前预订度假的机票和酒店的机会成本是你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订到更便宜的机票和酒店。

“本福特定律”不太为人所知，它是一个很酷但是很奇怪的数学定律，其内容是：在各种随机数据中，1 是最常见的数字，大约会占到 30%（比如全世界各国人口的数量以 1 开头的占 27%，以 9 开头的只占 5%）。这个有用的发现常常被用于检查会计和科学中的虚假数字。

经济学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诞生于大萧条之后，研究的是大范围内的经济，如税收、贸易、货币政策等。微观经济学是用经济学定律研究人的动机和行为。比如有一项研究是看零售商应该提供几份样品，顾客品尝之后才会购买。如果提供的免费样品的类型太多，顾客就会陷入混乱，结果啥也不买。最佳数字是 6 种。”

兰切斯特说，金融业借用了一些日常词汇，但有的词原意被高度扭曲，比如“对冲(Hedge)基金”中的“对冲”，原意是篱笆，引申为防范风险，但如今的对冲基金缺乏管制，风险并不低。再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租”的意思是付给其主人的钱。在经济学中，“租”的定义稍微不同，它是某人仅凭他控制了其他人需要的东西、什么也不做就额外得到的钱。租是跟存在真正的竞争相比时某人额外得到的钱。一些观察家认为，当前贫富差距的扩大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它伴随着寻租行为的增长。这类行为的典型特征是试图拿走现有蛋糕的更多部分，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当富人在经济不增长的时期游说减税时，他们就是在寻租。所有的腐败都是一种寻租。

兰切斯特编的词条中还有许多人物，比如亚当·斯密，他说：“人人都应该读斯密的书，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并且他的著作是以常识为基础的，让读者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常识思考经济学问题。读《国富论》还会发现，斯密不像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样教条、狭隘。”

兰切斯特说，富豪榜好玩，但是不要太把它们当回事，因为那些数字无法验证。“有些钱希望躲开富豪榜，主要是继承而来的钱，有些钱则希望得到重点突出，主要是办企业得来的钱。”



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强世功 著　定价：45.00元

“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作者把香港作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来思考，将其看作是理解中国的钥匙，因为它一方面生动地展示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较量，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最根本的不同。



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哈贝马斯等 著　逄之、崔博等 译　定价：38.00元

1980年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国一大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恩斯特·诺尔特等人围绕纳粹罪行的独特性、如何评价第三帝国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和书写历史等问题在德国的报纸、期刊等公共媒体上展开了一场影响广泛的著名争论。本书是这些争论文章的合集。



伍尔夫（企鹅人生）

【英】奈杰尔·尼科尔森 著　王璐 译　定价：39.00元

本书作者的母亲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是伍尔夫的恋人与最亲密的朋友。他在书中回忆了儿时与伍尔夫相处的点滴，更敏锐地探究了伍尔夫对于女性问题和战争本质的态度，为这位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性描绘了一幅真切而传神的肖像。



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

【美】简·亨特 著　李娟 译　杨志 审校　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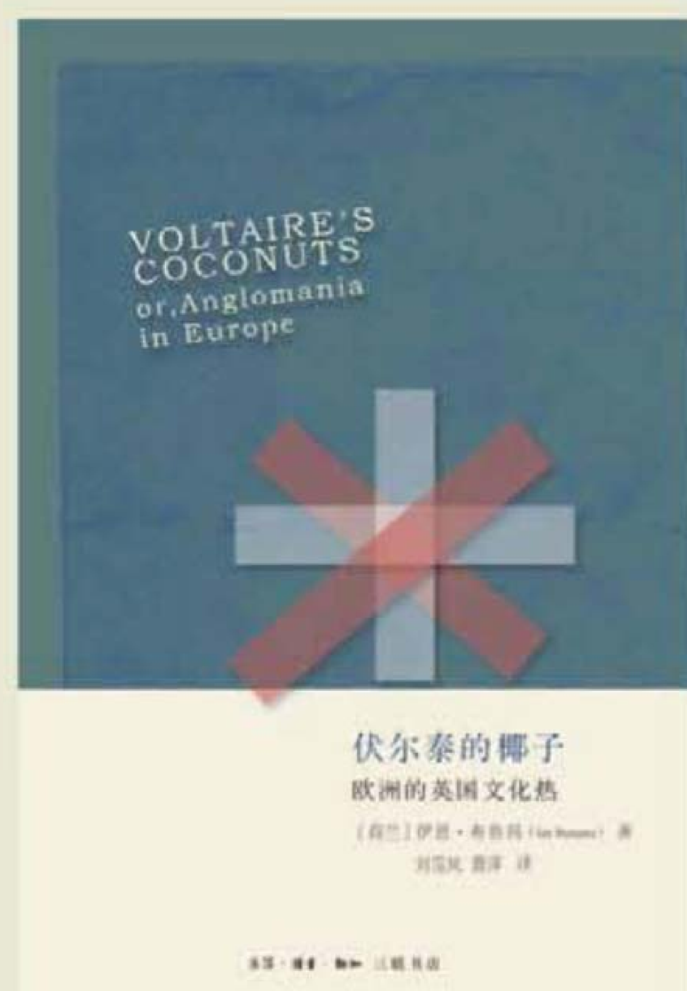
她们既是从属于男性的女性，又是肩负宗教使命的传教士，还是拥有权威地位的殖民者。在20世纪之交的中国，她们的身影遍布通商口岸、贫瘠的乡村、繁华的大都市。这批美国女传教士不仅开启了美国女性主义的新篇章，也在无形之中契合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女性历史。



我们现代人（王鼎钧作品系列）

王鼎钧 著　定价：24.00元

在传统淡出、现代降临之后，应该怎样适应新的环境和规则，怎样看待传统的缺陷？哪些要坚持？哪些要放弃？哪些要融合？现代人需要怎样的标准和条件，才能坚忍、快乐、充满信心地生活？作者将经验和思索加以过滤提炼，集成一本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书。



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

【荷兰】伊恩·布鲁玛 著　刘雪岚、萧萍 译　定价：42.00元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有着令人歆羡的自由贸易、远征探险、自由和理性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还有教育“特产”公学及其培养的“英国绅士”……三百多年来的崇英风尚造就了无数深切的“崇英者”，或是“仇英的崇英者”。然而作者指出：“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充满幻想的，最终都会发现自己的梦想因幻灭而暗淡了光彩。”

爷爷的四合院

文 苏禾 图 陈曦



老家的四合院是一进院落，谈不上多么气派，却很精致、紧凑，东西分别是门屋和厅堂，南北都是厢房，中间围合成一个“口”字形天井。天井四周，布有连廊，将院中所有房间串成一个有机整体。天井里种有很多美丽的花花草草，比如桂花、月季、百合。四合院朱红色大门外，东边视野开阔，院子边沿种着松柏、泡桐、杉树等高大刚健的树，树下则会种植凤凰花、鸡冠花、美人蕉等柔弱娇美的花草，相映成趣。南边除了菜园、稻田，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和水井。西面是一片碧绿的菜园，菜园后面是一座娟秀的小山。北边紧邻那座小山。

在布局和景观之外，四合院让我回忆最多的还是生活在那里的似水年华，我珍贵的童年时光，最亲爱的亲人们，尤其是我的爷爷。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生活在同姓聚族而居的老屋，几十户人家，虽说热闹，生活空间却是十分狭小，多有不便。老屋的那座房子，面积也不大，全家人生活在一起，显得拥挤不堪。我不太清楚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爷爷萌生离开世代聚居的老屋，重选一个新址，自己造一座四合院的想法。他坚毅而果断，为了给全家人提供一个相对幸福的生活，毅然选择挑起这副重担。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爷爷身上具有很多农民都不具备的开拓和担当精神，我常常想，若不是因为环境受限，机缘不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十分成功的商人。

那个年代，造一座四合院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选址、打地基、挖土、制砖……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就耗费了爷爷巨大心力。造屋那些年，爷爷经常会独自在未完成的新屋里过夜。那些清风如水的晚上，他带着一条狗，一个铺盖，一袋烟斗，望着漫天繁星，像一个设计师那样静静地思考接下来的计划与方案。

在他精心统筹下，造屋进展很快，南北厢房先完工，剩下东边门屋时，全家人已经陆续搬进新房。

生活环境渐渐改善，爷爷对于这座四合院所倾注的心思，却丝毫未减。我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夏夜，前半夜月华皎洁，后半夜却下起暴雨，爷爷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紧急喊起家里大人们，原本寂静的夜顿时被哗啦啦的暴雨声和喧嚣的喊叫声填满了。幼小的我躺在床上，听着大人们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不知所措。第二天才知道，他们晚上为了抢搬那些白天晒在院子里的自制土砖，大家浑身湿透，爷爷更是忙碌了一夜，未曾合眼。

我的童年基本在这座四合院里度过，小时候总觉得这座四合院神圣而宏大。渐渐长大，四合院逐渐褪去了那层外在光环，回归到它原本质朴的模样。然而，四合院曾经给过我的那份亲切与温暖，时隔经年，未曾有过丝毫改变。

后来，父亲和叔叔们都在城里买房安家，再后来，我在城市里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们都先后离开四合院。

前两年，家人为了更好地照顾爷爷奶奶，将他们接到县城。爷爷起初是万不肯离开四合院的，坚持了许久，最终拗不过儿女，才心有不甘地搬到县城。

四合院陈旧了，安静了，变得空荡荡了。

每年临近过年时候，家人常常会说不如今年都回四合院过吧，大家说着四合院的百般好处，不过心里都清楚地明白，这件事根本不现实：交通不方便，用水不方便，睡觉也不方便。就连我自己，也开始抱怨四合院各种不方便之处，留恋着城里所谓的先进生活方式。

唯独爷爷，依旧打心底深深眷恋着这座四合院。他总是幽幽地跟家人叹惜，老家那么多屋空着，不住，可惜！


每年夏天，他都会带着奶奶回四合院小住一段时间，春天时候回去摘茶叶，必定会顺便住上一阵子，秋天收绿豆什么的，也会住上一阵子，平时一有机会，比如说叔叔或者姑父有顺风车，他肯定会带着奶奶回去住上两天。

记得有一次，送爷爷奶奶回老家，看着他打扫落满灰尘的屋子时眼神里弥漫的那种愉悦而纯净的光芒，那一瞬间，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在那一刻理解了他对这座四合院的浓烈情感。这座四合院是他投入巨大心力的作品，承载了他太多的情感与记忆，对于他来说，四合院远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段奋斗的历程，是对于美好的追求，也是对于生活的守望。

本栏目投稿信箱：FRANKMW@VIP.SINA.COM



Let's Get Together
关注天达华联暇步士新浪官方微博
关注暇步士服装官方微信


OMEGA
www.omegawatches.cn
Ω
OMEGA
PRESENTS
Ladymatic
妮可·基德曼
完美演绎
北京✆(010) 8518 7188 上海✆(021) 6287 8686 广州✆(020) 3868 2020 沈阳✆(024) 2358 9877
成都✆(028) 6129 5692 杭州✆(0571)8755 5623 重庆✆(023) 6381 6811